

香港天主教修會 及傳教會歷史

夏其龍，譚永亮 編

目錄

序	3
作者簡介	5
1.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 (1848–1998)	7
申頌詩著，馮彩華譯	
2.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 (1860–2000)	78
詹秀璉	
3. 香港的耶穌會士 (1926–1991)	166
張學明	
4.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的貢獻 (1947–2008)	223
張學明	
5.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的神恩與使命追隨納匝肋人耶穌	242
耶穌嘉麗小姊妹著，耶穌麗芳小姊妹譯	
附錄	289
1. 聖母痛苦方濟傳教女修會簡史	289
2. 安貧小姊妹在香港的簡史	298
3. 聖母潔心會大事年表	300
4. 母佑會中華區在香港的大事年表	302
5. 顯主女修會大事年表	306
6. Congregation of Our Lady (CND)	313
7. 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	318
索引	321

序

香港天主教建立於十九世紀中葉。當時，前來一起開闢這一塊新田園的男修會有方濟會，道明會，本篤會，巴黎外方傳教會，米蘭外方傳教會，基督學校修士會。他們都在宗座傳信部任命的監牧及代牧下展開工作。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有兩個女修會先後抵港，她們分別是法國沙爾德的聖保祿女修會及意大利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這些修會的成員拓展了當時政府不願承擔的社會服務及教育工作，為香港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女性方面的照顧，立下了不汗馬功勞，亦為香港教會作了有口皆碑的愛德及犧牲的見證。

本書的第一、第二章便分別講述這兩個女修會的百多年歷史。「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由馮彩華修女翻譯了去年本中心出版的與本書同名英文版的該修會歷史¹。「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則由詹秀璉修女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撰寫而成。

這兩個修會來港服務，增強了本地教會的實力，開展了照顧棄嬰，孤兒，病弱的工作，提供了教育及醫療服務，在傳揚福音方面作了實在的見證，亦吸引了本地的女性加入她們的行列。時至今天，這兩個修會仍努力為港人服務，但各種事業都主要由本地修女擔任，可作為教會本地化的佳例。

到二十世紀則有另一番的局面。首先耶穌會於十八世紀被教廷解散（1750-1773）後，於十九世紀中葉重返中國，但卻要1926年才由愛爾蘭派遣會士來港開辦教育工作。其後的八十多年的歷史便在第三章由張學明教授以年代史的方式交代。

¹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UHK, Volume 2, 2009 pp.116-197, 第三章，由申頌詩(Josefina Santos)修女撰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市民成為受害者。日軍佔領時期，宗教活動幾乎停頓。有關香港淪陷前後及日治時期的教會情況，都罕有記載。其後難民的湧入及修會成員的應急及持續的服務，都令人感動。當時的危急情況，都由這三篇歷史文稿一一反映出來，極有參考價值。

戰後，教會忙於提供救濟，居住，教育等工作。修會各成員都付出最大的努力投入救亡工作。教會亦因會士們在這段時間的無私服務而大幅增長。

第四章由張學明教授再以年代史方式，闡述了瑪利亞方濟各傳教會的歷史，反映教會團體戰後在香港新的服務方式。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從 1956 年在香港建立友愛之家起，已半世紀有多。她們與香港最基層的居民一起生活及工作，包括艇戶人家，工廠工人，清潔工人等，標榜要將基督精神滲入香港社會大眾市民的生活中。這第五章的記載大部份基於珍貴的口述歷史，亦深深表達了生活與靈修的精神。

其餘下的六篇，是簡史或大事年表。除了從事安老工作的安貧小姊妹外，其餘都是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才踏足香港的。她們是聖母痛苦方濟傳教女修會、安貧小姊妹、聖母潔心會、母佑會中華區、顯主女修會及聖母頌主會。她們未能抽空由自己或提供資料給別人撰寫歷史，正好證明了她們還在努力創造歷史，未有餘暇來整理及反省她們的過去。但讀者們肯定可以從簡短的年表中，獲得一些初步資料，體察到她們的生活見證，並期望於最短的將來可以讀到她們較詳盡的歷史。

夏其龍

2011 年 6 月 30 日

作者簡介

張學明博士是中大的歷史系副系主任及副教授，他於一九八三年從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取得博士學位。他於一九七八年出版第一本史學譯著：霍爾本教授的《歐洲的沒落》。他近年的研究包括：「歷史上的慈善活動：聖保祿修會案例」，「嘉諾撒聖瑪利書院的音樂劇」及「香港的耶穌會之文化影響及社會貢獻，1926-2005」。張博士剛獲 GRF (Earmarked Grant, 2009/10) 研究「香港耶穌會的社會貢獻」。

詹秀璉修女是嘉諾撒仁愛女修會修女，曾在這修會辦學團體屬校服務包括特殊教育，現在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檔案室工作。

馮彩華修女是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修女。在聖保祿屬下教育機構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現亦協助修會的事務。

申頌詩修女 (Sr. Josefina Santos) 是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修女，原籍菲律賓。自一九九一年至今出任該會之省會秘書。她在羅馬加入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後，在英國倫敦完成暫願培育。在倫敦必文中央書院進修速記及打字教師課程，完成後於一九七一年到港服務。申修女在跑馬地聖保祿中學之商科部任教及出任校長之職共十八年之久。

耶穌嘉麗小姊妹 (L.S. Claudia Elisabetta of Jesus)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修女。一九五六年生於義大利，一九七九年加入耶穌小姊妹友愛會，一九八一年來港接受初學培育，一九八三年宣發初願，一九九二年宣發永願。除了接受培育的數年間，其餘二十多年來分別生活在香港和澳門，服務於老人院和不同的工廠，與工人同行。

耶穌麗芳小姊妹 (L.S.Agnes Lai Fong of Jesus)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修女。一九四二年生於香港，一九八一年加入耶穌小姊妹友愛會，在法國母院接受初學培育，一九八五年宣發永願。曾在老人院和工廠工作，分擔友愛會的家務。十多年來每周一次參與教區聖神研究中心為中國教會的事工；近月來也每周一次到扶康會的家舍與智障的朋友同在。

1.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 (1848–1998)

申頌詩著 馮彩華譯

由樂維威至沙爾德

17 世紀，法國已躋身歐洲強國之列，無論在軍備、政治及文化方面的成就，都處於優越和顯赫的地位。然而，法王路易十四世（King Louis XIV）因昂貴的戰爭、奢華的宮殿，花費耗大；適逢天災、嚴冬、瘟疫及農作物失收，引發饑荒，低下階層須面對嚴重的民生及經濟困境，這情況延伸至下一世紀。以慈善救濟工作而著名的聖雲仙·保祿（St Vincent de Paul），在 18 世紀初也因而創立了「仁愛女修會」（Daughters of Charity），為幫助陷於貧困艱辛的貧苦大眾。

1693 年，法國經歷了一場浩大的饑荒，不幸而死去的人高達二百萬。就在此時，1694 年，一位年約三十歲的年青神父，抵達樂維威村·迺桑里堂區（Levesville La Chenard）。這條小村位於沙爾德（Chartres）東南約十五里，人口不超過一百五十人。沙路易神父（Louis Chauvet）對基督的福音懷著深切的熱愛，更深受聖保祿的說話所催迫：「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些人。」（格林多前書九：22）沙神父立即展開行動，決心要把他窮苦的教友，從貧窮的禍害中救出，更重要的，是要幫助他們脫離無知。他深知這不是他個人能力所及，必須別人的幫忙。

*沙神父尋找的是善良、充滿宗教熱忱的女性，
不管來自什麼階層、也不計是貧或富。她們只需天
賦勤勞，因為她們將誓許委身基督，追隨祂仁愛的*

榜樣，以探訪窮人、病弱及教育小孩為她們唯一的生活理想。²

很快地，兩位年青的女子及一位女士，雀躍地表示願意跟隨沙神父，把她們的生命奉獻給天主，為服役人群，特別是那些有需要的人。她們都非常慷慨、勇敢和無私。最初，她們都住在家中，直至 1700 年，沙神父在鄰近聖堂為她們所蓋的房子落成。沙神父更為她們定下了簡單的會規，並揀選了十七歲的瑪麗·米素（Marie Micheau）為院長。³ 村中一位熱忱的貴族女士迪瑪利·安娜（Marie Anne de Tilly）協助他。沙神父指導她們的神修生活，培育她們，引領她們開始她們的使命：教育無知的村童、探訪村民及病弱者。

沙神父起初的意願是組成一宗教團體，沒想到創立一有規模的修會，他所關懷的是他堂區內貧窮的教友。但在天主奧祕的眷顧下，這弱小的團體成為了一顆種子，且茁壯成長為一棵大樹。

巴斯卦（Paschal）的精神（經歷死亡而進入生命）及以基督為中心成為修會的神修特徵，這也是源自天主明智的安排。修會初期飽歷巴斯卦的奧跡；1702 年，第一位院長瑪麗·米素不幸死去，這迫使迪瑪利·安娜女士冒著家人頑強的反對仍離開家庭，追隨她熱愛奉獻於基督的聖召。可是，一年後，她也隨著瑪麗·米素而逝世。

1708 年，這被稱為「樂維威學校的女兒」（Daughters of the School of Levesville）的新生團體，已向週遭的村落發展。沙爾德（Chartres）的保祿·葛德·馬列主教（Mgr Paul Godet des Marais）也在這時接管了她們，並把自己的名字給予她們，把她們正式命名為「聖保祿修女」（Sisters of St. Paul）。這也

2 Rene Gobillot, *The Sisters of Saint Paul of Chartres*, trans (Manila: 1956), p. 5

3 狄路易神父，根據他的扎記，《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歷史的起源》，中譯本（1986），頁 115。

真是上主意願的顯示，清晰地指出修會將來的發展方向，就是如聖保祿一樣，成為傳教士。

修女們搬遷至沙爾德不久，死亡再次襲擊這個新創立的修會；沙爾德主教於 1709 年去世，翌年，創立她們的摯愛會祖沙路易神父也相繼英年早逝，只有四十六歲。

憑著對復活基督的信德及摯愛，這個團體才能在重重的逆境中掙扎求存。充滿血腥暴力的法國大革命，摧毀了法國所有的修道團體，這修會也於 1792 年至 1803 年被解散，但卻未能熄滅修女們的心火，或減弱她們的意志，她們堅守理想，決意跟隨耶穌基督，向每一個人宣揚祂的愛。

修女們退居至她們的家人或親友家中，改穿便服，仍繼續教育兒童、探訪和照顧那些病弱的窮人。

4

傳教旅程

1727 年是修會歷程的一個轉捩點，修女們的慷慨、勇毅精神和傳教熱忱都受到重大的考驗。這一年，歷史尚短的修會踏出了實踐傳教使命的第一步。從眾多的志願者中，揀選了四位勇敢的年青修女，開始一百二十天的航程，向著那陌生之地，遠在南美洲的嘉應(Cayenne)、法屬圭亞那(French Guiana)進發，在這些殖民地上居住的，是被法國政府遞解出境的戰俘、囚犯。在那時，派遣女性傳教士往外地是嶄新的嘗試，在法國，聖保祿修會是第三個派遣修女往遠地傳教的女修會，比她們早的，是 1639 年派遣修女前往加拿大。⁵ 如此，這寂寂無名的修會進入了兩處最重要的傳教地，第一是新大陸的美洲，

4 James B Reuter, *For the Young At Heart: highligh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Manila: 1965), p. 19

5 Gobillot, p. 45

第二是古舊世界的中國。奇妙地，日後證明，古舊世界的旅程是更顯著和結出更大的果實。

1770 年，修女被派往非洲海岸的毛里裘斯（Mauritius）及留尼汪（Reunion Islands）。1848 年，首次往海外傳教後約一百年，修會開始了第二次重要的海外傳教工作。其間，修會亦有在其他方面發展；1734 年，由沙爾德誕生了兩株新的嫩苗，一株在亞撒爾（Alsace）的史達堡（Strasbourg）成立，另一株於 1846 年在英國成立。在史達堡成立的修會，更相繼在荷蘭、奧地利、南斯拉夫、巴爾幹（Balkans）、甚而美國，開枝散葉，成立獨立的修會。可見，在樂維威成長，不顯眼的小樹苗，繁衍成一個美麗的國際「花園」。

1846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會士狄奧多·奧斯定·科嘉神父（Theodore-Augustin Forcade, 1816-1885），被委任為日本宗座代牧（Vicar Apostolic）及領銜薩摩士教區主教（Titular Bishop of Samos）。在等待日本開放門戶給外籍傳教士進入時，1847 年 10 月，科嘉主教再被委任為香港宗座代監牧（Pro-Prefect Apostolic）。其後他返回巴黎，心



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
狄奧多·奧斯定·科嘉主教

中卻縈牽著他那新的使命。香港需要修女的幫助，他決定不會獨自回去。1847 年 12 月 14 日，他寫信給與他最熟悉的修會，他的姊姊更是那修會的修女。

如所週知，香港島距離廣州只有數哩之遙，目前香港居民，除了管理政府的英人之外，還有華人以及來自淪陷城市澳門的葡籍移民的後裔。駐守香港的愛爾蘭官兵，幾乎全是教友。在華人方面，至

少已有一個教友的小團體，而且大有與日俱增之勢，只希望它能夠在三數年間大事擴展。

愛爾蘭的官兵醫院，正需要有修女協助管理。官兵的女兒也很需要修女辦學施教。……修女的學校成立以後，可以收容澳門的葡萄牙女童。……。

最後，目前有一間以前成立的醫院，正在照顧從街上拾回來的華人棄嬰。……都急需修女的幫助。

還有，愚見認為，香港甚至需要有修女以其修會的幫助來訓練華人青年，好使他們日後能夠承擔管理醫院和學校的責任，為同胞服務。⁶

回應是迅速的。被派遣的修女數目雖未能達到他的要求，但也能暫時應付目前的工作。

香港的傳教工作

科嘉主教帶著四位傳教士回到香港，她們是：奧古斯·嘉萊修女 (Auguste Gallois)、佳播·祖賓修女 (Gabrielle Joubin)、雷絲·莫斯修女 (Louise Morse) ——她是一位英籍的歸依者，最後是主教的親姊姊雅芳善 (Alphonsine) 修女，她從傳教地瓜德羅普 (Guadeloupe) 被召回，且被任命為院長。歷經四個月海上的危險旅程，她們最終於 1848 年 9 月 12 日踏足香港的海岸。

那時，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才剛七年，不但居住的衛生環境惡劣，且貧瘠得很，甚麼也缺乏。修女們初被安頓在灣仔 (Wanchai) 山邊一「茅寮」，這地點在前天主教墳場外，也

6 Jean Vaud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中國傳教簡史 1848 年–1926 年》，中譯本 (香港：1980)，頁 2。

是政府發給天主教會的第二塊地，第一塊在中區。七個月後，在同區靠近堂區的地方，為修女們找到較佳的居處。

香港的天氣及居住環境，與法國的有著很大的分別，首批抵港的修女生活艱苦，沉重的工作及壓力使修女們的健康響起了警鐘。兩年後，飽受工作疲累的雅芳善·科嘉修女(Alphonsine Forcade, 1813–1850)，於 1850 年 10 月，竟罹患腦炎而去世，享年只三十七歲。她悲哀的弟弟科嘉主教稱她為「愛德的殉道者」。然而，好像這祭獻還未足夠，芳齡只有三十三歲的佳播·祖賓修女，也於三星期後相繼去世。第一粒種子已被撒播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猶如將茁壯成為大樹的麥子。雅芳善修女及佳播修女為天主及中國人民獻出了她們的生命，無可置疑地，她們的生命必孕育出新生命！

兩位初期傳教修女的去世，對在香港的傳教工作打擊很大，卻未能減退修女們勇往直前的心。幸好，在沙爾德的長上們已準備給予增援，同年 3 月，三位修女抵達香港，其中一位是聖瑪素修女（Ste Marcelle），她代替雅芳善修女，成為新院長。



跑馬地聖彌額爾墳場
雅芳善修女的墓碑

她們首先從事的工作是拯救被遺棄的嬰兒。很快，她們的房子已不敷應用。為了收納更多的兒童，於 1851 年，科嘉主教在離開香港前，為修女們在皇后大道東（Queen's Road East）獲得一較大的房舍。那時候，那兒已有「兩座英式住宅」了，⁷聖瑪素修女這樣形容它。

7 Carl T Smith, *A sense of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 121

房子就好像是特別為我們而蓋似的，地點位於海邊。裡面有一個小聖堂，此外還有聚會廳，寢室，為鎮內幾位女士教授法文的課室，宿舍，飯堂和為男孩子而設的教室。在另一邊的建築物，則有宿舍，飯堂及女孩子的教室等等。新修院裡設備完善。⁸

初期，社會對修女們並不友好，對外籍人士更懷有惡意。憑藉修女們鍥而不捨的精神，四出尋找棄嬰並細心加以照顧，終於贏得華人的信任，他們對基督徒溫婉的愛德並不是無動於衷的。一位院長於 1857 年 11 月 26 日給沙爾德寫了一封信，內容提及一名華人麵飽師企圖毒害外籍人士團體的社會情況，她說道：

這裡的人都害怕中國人會趁外國軍隊不在（英國及法國軍隊）而乘機搶掠，縱火燒毀歐洲人所居住的城市，以及搶劫市內的居民等。我們只能把一切都交託天主的庇護，雖然我們認為中國人不會襲擊『聖童之家』（*Holy Childhood*），因為他們都清楚及讚許我們所做的工作。最近他們關閉商店，並且拒絕售賣東西給歐洲人達一兩日之久。可是，他們如常把供應品送到修院，讓我們不會因這次的風潮而受影響。雖然當時我們都被迫要付出較多的金錢購買食物及供應品。⁹

除了要應付工作上巨大的困擾外，修女們還要面對接踵而來的天災人禍，如傳染病、瘟疫、火災等。1863 年爆發的霍亂肆虐最大，奪去了三位修女的性命。1878 年，第一位華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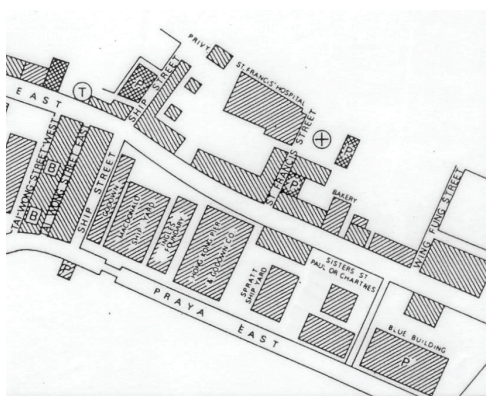
8 Jean Vaud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中國傳教簡史 1848 年–1926 年》，中譯本（香港：1980），頁 25。

9 同上註，頁 40。

修女—戴本雅明修女（Benjamin Dei），在灣仔的一場火災中喪失生命。

較早前，修女們曾面對一沉重的十字架，受到威脅的不是她們的生命，而是修會在香港的存亡。若沒有天主仁慈的眷顧和協助，恐怕今天修女已不在香港了。裴神父（Fr Feliciani）重被委任接替科嘉主教，而他又被盎神父（Fr Luigi Ambrosi）所替代，後者於 1855 年成為宗座監牧（Prefect Apostolic）。

科嘉主教離開香港之前，代法國「聖童之家」（*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從裴神父處購入海旁皇后大道東二十三及二十四地段（Marine Lots 23 & 24）。由於聖童之家在香港不能擁有物業，因此就以聖保祿修會的名義購買該



1972 年灣仔地圖
顯示 23-24 地段（Marine Lots）

地，其中一個條件是：「修女倘因任何理由離開修院，該物業就改屬傳教團所有，而他們將按照修院所付出的買入價補償修院。」¹⁰



首位省會長本雅明·諾爾·古斯修女駐守越南西貢，同時管理香港及澳門

可惜的是，價錢沒有立即付清。當新院長本雅明·諾爾·古斯修女（Sr Benjamin le Noel de Groussy）於 1859 年 6 月 21 日抵港，接替雷絲修女（Sr Louise）時，便立即收到盎神父的通

¹⁰ 同上註，頁 45。

知，修女們須離開她們的房子。震驚之餘，修女不知事出何故，猜想盎神父意圖把法國的傳教工作與意大利的傳教工作合併為一，如此，修女的精神及物質生活，將全屬他的管轄之下。

本雅明修女堅拒遷出，因她須先獲得聖童之家的准許，他們才是真正的業權人，再者，她也須先取得沙爾德長上們的同意。他們的答覆需時，因為那時的通訊系統非常緩慢。然而，盎神父等不了。隨後的一個月，即 1859 年 7 月，他邀請了一個意大利修會到港，他希望她們取代聖保祿修女。六位嘉諾撒修女於 1860 年抵港。¹¹

盎神父要求修女們立即遷出，因為他已把房子賣給了一位名叫華西（Vacher）的瑞士人，盎神父深信他能把修女逐出住所；為達到目的，他用盡一切恐嚇的手段，向修女施加壓力。修女們所能做的，就只有祈禱，及耐心等候羅馬的回音。期間，本雅明修女往澳門（Macau）尋找棲身之所，以防修女們真的不能在香港停留。

久候的回音終於抵達。沙爾德主教類思·尤真·雷諾（Louis-Eugene Regnault）於 1861 年 6 月 5 日給她們寫信：

羅馬當局舉行了一連串會議，有關該等會議之結果，及我與傳信部總監（*Prefect of Propaganda*），巴拿甫樞機主教（*Barnabo*）所達成之協議，現敬覆如下：

一、院長及各修女皆獲准繼續在香港居留。

11 NM Clarke, *The governor's daughter takes the veil, Sister Aloysia Emily Bowring, Canossian Daughter of Charity*, (Hong Kong: Canossian Missions Historic Archives, 1980), pp. 111–114

二、院長可向宗座監牧盎神父再次提議，接受買賣合約中所釐定之款項，另加利息。¹²

聖保祿修女在香港的一段痛苦又哀傷的經歷也就此而結束了。為修女們，結局仍是喜樂的，但為能繼續在香港服務人群，她們須付出昂貴的代價。約一年半之久，她們接連地被剝奪領受聖體聖事、參與感恩聖祭、保有聖體、甚而聖堂等權利，而這些都是她們神修力量和慰藉的唯一泉源。

幸而，祝福也隨著災禍而來。自此，修會在澳門及越南展開了新的發展。本雅明姆姆在她困難的日子，與越南商討開設一新的傳教站。1860年5月11日，她先派遣兩位修女前往，當香港的爭議完結後，她也跟著前去。本雅明修女在磨難中能保持堅毅不屈的精神，1861年，她被委任為西貢的首任院長，管轄範圍包括香港和澳門，對此新任務，她實在當之無愧。

對香港教會初期的發展，盎神父也有很大的貢獻。當他於1867年3月10日逝世時，天主教徒哀悼他，稱他「深受尊重和愛戴，並為羊群付出他的生命。」跑馬地（Happy Valley）天主教墳場的小聖堂也是為紀念他而建。¹³

1867年，香港監牧區（Hong Kong Prefecture）交由米蘭外方傳教會（MEM）負責管理。遺憾地，修女們與意大利籍的神職人員關係仍緊張，未如理想。修女們只能投靠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司鐸們，尋找指引及神修指導。不過，這些法籍神父偶爾也未敢給予意見或加以協助，恐防引致意大利監牧們的不悅。沒有了神職界的支援，很自然地，修女的宗徒工作也受到阻撓，五十年之久，她們的服務範圍仍只局限於灣仔區內。

12 Jean Vaud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中國傳教簡史 1848年-1926年》，中譯本（香港：1980），頁 59-60。

13 Thomas F Ryan,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9), p. 44

1891 年，保祿・十字姆姆（Paul de la Croix）去世，由菲力斯・佐頓姆姆（Felicie Jourdan）接任。在她長久的任期內，修會在香港完成了最重大的發展。她更被任命為第一位香港省會長。她較前任的院長們幸運，獲得和主教（Louis Piazzoli）的極力支持及援助，他待修女們如慈父一般。溫和聖善的和主教於 1894 年被委任為宗座代牧。無人不知道他對修女們的愛護，他身邊的人甚而稱他為「法國神父」。

他經常往灣仔探望沙爾德聖保祿會的修女。其時，修女在港服務已快五十年，數千名的嬰兒被她們從死亡邊緣中拯救出來，撫育教養，踏上新的生命。沒有別的工作比這個更使他感到喜悅，這是他心中的摯愛。¹⁴

和主教解除所有曾加給修女們的限制，他對她們說：「繼續你們的善行吧！當你們未能遵守舊的限制時，請告訴我，我會負起全部的責任。」¹⁵

拯救棄嬰

來自法國的首批修女，於 1848 年抵港後不久，便發現最刻不容緩的工作，是拯救和撫養被遺棄的嬰兒，且主要是女嬰。在那時的中



左邊第三間是灣仔「聖董之家」（19 世紀 60 年代）

¹⁴ 同上註，頁 110。

¹⁵ 同上註，頁 90。

國社會裡——包括香港，遺棄嬰兒，視他們不配祖先的名字，或是家庭的負累，是普遍及被接受的習俗。尤其是女嬰，她們被當作貨物般看待，可被棄掉、售賣、遺棄，亦可被拾起撫養，待長大後再賣給富裕人家作妹仔（mui tsai）或妾侍。更壞的是，大部份的女棄嬰常被收集並賣到妓院，價錢則視乎年齡及健康狀況而定，綁架或監禁女孩子也是常見的事。這些悲慘境況驅使修女們立即展開拯救棄嬰的行動，盡量把他們從惡運中救出。一位修女寫信給沙爾德的一位女恩主，講述她如何因這些可怕的行為而感到沮喪。

如今，我們可以這筆款項去購買一些年齡較大的女孩子了，她們的價錢較高，我們往往需多付數塊錢，這遠遠超越聖童之家的經濟能力。最使我們難受的，是深知大部份較年長的女孩子，將被賣到沒有信仰的人手中，而越是漂亮和健康的，更會被交到鴇母的手中。啊！但願我們有足夠的金錢，把她們全部買過來！她雄偉的心渴望拯救的，不是數名，而是全部的女孩子！

面對販賣人口的邪惡陋習，在沒有法律保障這些不幸的兒童及少年的情況下，修女們開創的孤兒院，也是一實際的解決辦法。香港政府還要花費多年，於 1923 年才定出律例，制訂妹仔陋習為不合法。

修女抵港後不足一個月，便開始收納第一名棄嬰，那是隨後數千名可憐棄嬰的首名，修女把他們從孤苦無靠，甚而面對死亡的命運中拯救出來。當修女收養，甚而購買棄嬰的消息傳開後，很快地，很多華籍基督徒也來參與這救靈的工作，而另一些人則為購買棄嬰的金錢所吸引，把棄嬰帶到修女面前。

修女的工作，經濟上是受到聖童之家機構的支援，那是法國主教嘉祿·霍賓·鄭信（Charles de Forbin Janson）於 1843 年為天主教兒童而創立的機構，中國無數幼小受害者的哭聲及悲慘命運，使主教深受感動。他向法國的兒童呼籲，提議他們每月為援助中國兒童而祈禱，並作少許捐獻，他的呼籲受到熱烈的歡迎。這個獨特的「讓兒童幫助兒童」的構思，發展至整個世界，也使修女得以拯救數千兒童脫離悲苦，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失落天堂。為表示對這機構的感謝，修女在香港的第一個機構也以此為名——「聖童之家」（*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 - Home of the Holy Childhood）。

修女的工作不斷增多，需要的經濟支援也越大。修女開始教授法文、售賣物品、籌款及出售孤兒的針織手工藝品等，以增加收入。



「聖童之家」的孤兒、老弱、殘障（20 世紀初期）

1849 年末，修女共接收了二百二十六個兒童，他們大部份的狀況很壞，死亡率很高。

1850 年至

1855 年間，平均死亡率是百分之六十八，而 1880 年至 1885 年間，死亡率更增至百分之九十四。

雖然大部份的兒童都死亡，能夠生還的，修女都給予他們終生的照顧，「由搖籃至墳墓」，修女細心教養他們。由於感到工作量超越了她們的能力，修女組織了一支由教友組成的支援隊伍——「十字架的愛護者」（Lovers of the Cross）。這些華籍貞女穿著特定的服飾，她們多來自香港及中國內陸良好的天主教家庭。¹⁶修女又聘用奶媽來照顧年幼的嬰兒。

當她們所照顧的兒童成長至適合的年齡時，傳教司鐸為她們物色對象，安排她們與天主教的男青年成婚。司鐸首先接觸聖童之家，而修女們再以她們的條件，篩選未來的新郎，看看是否適合作一理想的結婚伴侶。他的年齡必須是二十至三十歲之間，必要是熱誠的天主教徒及品格良好，且經濟充裕，有足夠的能力照顧一個家庭。

教育使命

修會起源的神恩是教育無知者，修女忠於這個精神，對她們所收養的兒童，不單提供住宿、衣物及日常所需，更籌劃他們的將來。相信修女於 1851 年左右，當她們已遷至靠近海旁較大的建築物時，已開始為孤兒們提供教育的服務。

開始時，修女教導他們基本的讀寫能力、計算，當然



孤兒學習編織及縫紉

16 Gobillot, pp. 83 – 84

還有宗教培育，後來更教導他們謀生的技能。起初，他們學習縫紉，為自己做衣裳；能力較高的，修女教導他們製造通花花邊、編織麻紗、刺繡等。當那些英國的女士們看到女童所製作的精美物品時，便立即訂購，這為聖童之家增添收入。

當修女於 1848 年抵港時，已有三所由監牧區開辦，專為中國男、女兒童的小型學校，¹⁷ 但仍沒有為外籍兒童而



上課中的孤兒

設的學校。天主教家長憂慮他們子女未來的教育，懇求司鐸們，司鐸轉而催迫修女為他們開辦學校。

首批由法國來港的傳教修女中，其中一位是英國修女——雷絲·莫斯修女。在 1850 年第一位院長逝世，及 1856 年第二位院長返回法國時，她便當上第三位院長。那年終結前，雷絲修女開設了一班級，取錄了十四名兒童，1857 年五月時，已增加至二十四名。她這樣向沙爾德的長上們述說當時的情況：

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那些意大利司鐸們已不能再忍耐了……，天主教的家長們認為修女抵港已有很長的時間，仍未能開班教學，對此感到很憤怒……。每天我與另一位修女前往，在不同的部門教授數小時。我們這兒沒有地方，而路途遙遠，

17 Sergio Ticozzi,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1997), p. 21

不適合小朋友來往，所以我們不能在這兒教授.....。

由於聖童之家沒有空間，莫修女有五個月之久，在附近租賃了一層樓房。

雷絲修女體力日漸衰退，於 1859 年返回法國，自此，這首次為女童開辦學校的嘗試也因而被擱淺。十七年後，1876 年，保祿・十字・庇雅姆姆（Paul de la Croix Biard）再次開辦一班級，取錄了十二名歐籍兒童。¹⁸無論是為孤兒或學生，或所做的任何事情，修女的目標，顯然不單只限於這個世界。1910 年出版的章程，清楚地列明這目的：「傳授給學生的.....不單是良好的基礎教育，更要能使她們獲得永生。」¹⁹

位於灣仔的學校，距離維多利亞市（Victoria City）中心，



灣仔英語學校學童（20 世紀初期）

仍算是「遙遠」。開埠初期，在城中行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平地走，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車，往山上走則要

靠轎子了。高主教（Raimondi）准許修女收納寄宿學生，但不得超過十二人；這指令於 1895 年為和主教所免除。

18 Bord, Paul, *Mother Benjamin le Noel de Groussy*, trans. (np: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p. 101

19 *Hong Kong : 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 (Chateaudun : Societe Francaise de Phototypie, 1910), p. 43

學校於 1902 年轉為一補助學校，不斷努力提昇教學水準。1910 年底雅斯·羅柏修女 (Beatrice Roberts) 抵港，她被任命為校長，隨而帶給學校一很大的推動力。她非常能幹，才能超卓，不斷精益求精，她務求學校達到優異的品質，提供優質教育；至今，學校仍保持著這質素。

學校的法文部於一九二六年關閉，但法文仍被保留為一科目，其他科目有音樂、美術、繪畫、縫紉、打字及速記。一九三七年底雅斯修女被調往菲律賓，兩年後返回香港，出任香港大學聖母女子宿舍 (Our Lady's Hall) 舍監。

「喜樂之家」

修女的仁愛工作逐漸延伸至援助人類不同的困苦及需要。孤兒院也酌量收容傷殘的人士，她們在聖童之家內另立一部門，稱為「仁濟之所」(Alms house)，在那兒給予他們特殊的培訓，並教授他們學習一些技能，聾啞的人學習以一套香港特有的手語彼此溝通。修女教授他們縫紉，但更多的時間，他們從事家務，及協助修女照顧年幼的兒童。

至 1880 年，聖童之家的房舍已日漸殘舊，且過於擠迫。擴充樓房是緊急的需要，保祿·十字修女立即向沙爾德母院訴說。

我們所熱愛的工作令我們欣慰萬分。一八七九年的年內，我們收容了一千零六十二位兒童。……我們或是加建宿舍，或是把一部份兒童送走。我已聽到你心內的答案了：建造更多的宿舍。事實上，

我實在沒勇氣關起大門，把這些應該長在天國花園中的花朵摒諸門外。²⁰

修女們一接到准許，立即採用各種的方法進行籌款——募捐、舉辦賣物會、義賣等。她們的努力沒有白費，籌得的款項足以興建一所比原有大一倍的房子，可收納途經香港往中國大陸的傳教神父、修女，及受到颱風、海難影響的受害者等。

1894 年，爆發了一場厲害的瘟疫，使很多人變得一貧如洗，棄嬰的數目也驟然增加。不管怎樣，修女照顧的，不單是兒童；在這次流行疫症中，老年人也深受其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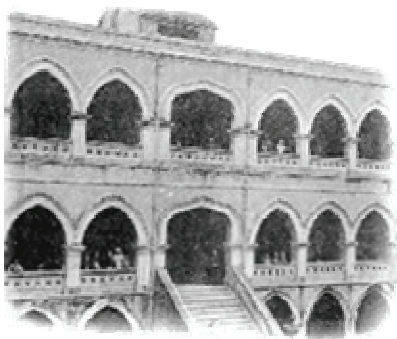
修女們教授長者手工藝

一天，一位年老的病婦，聽別人述說修女有無盡的愛心，心血來潮地跑到法國修院的聖童之家，單懇求一件事：就是「能進入喜樂之家」。房舍的空間已很狹隘，更重要的是已接收了大量的兒童，這些理由，足以驅使修女拒絕接收這位病婦；然而，

20 Jean Vaud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中國傳教簡史 1848 年-1926 年》，中譯本（香港：1980），頁 94。

院長修女好像只聽到仁愛之聲，「喜樂之家」(House of Happiness) 的門，也隨之為這位病婦而打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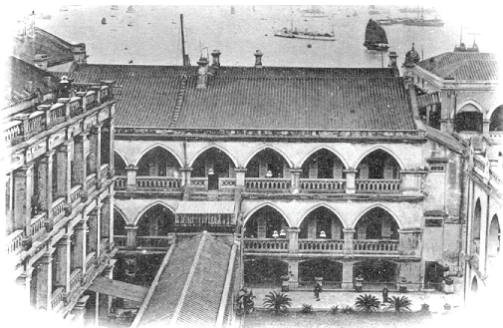
很快地，更多的人跑來懇求收容，他們也受到同樣的歡迎。因此，隨著天主的指引，藉著修女不忍拒絕的心，一項新的愛德工作——照顧長者，便展開了。事實上，這項工作促成了另一項更龐大、要求更高，但也更長久的宗徒工作。



醫院於 1898 年啟幕
(20 世紀初期)

香港的環境轉變使修女需要開始一項新的服務。1894 年，爆發了極具破壞性的淋巴腺鼠疫，修女即時作出反應，在毫無計劃下，開始了現有「聖保祿醫院」(St. Paul's Hospital) 的工作。在灣仔這個「庇護之城」(City of Refuge)，已收容了很多居留者：

棄嬰、孤兒、盲的、聾啞的、跛的及老弱的。他們很多都需要醫療及藥物的供應，修女認為建立一所醫院應是天主的旨意。聖童之家的空間已到了極限，接替保祿姆姆的菲力斯·佐頓姆姆，不用多想便提出建立一所醫院的請求。這所醫院在兩年後完成，於 1898 年 1 月 1 日正式啟幕，也就是人所通稱的「法國醫院」。



聖童之家：左右兩旁是孤兒院、修院及學校面對海旁，其右是醫院 (20 世紀初期)

院舍頂層曾被「美國聖母升天女修會」(American Assumption Sisters)作避難之所，她們因美國及菲律賓大戰而逃離菲律賓。首三層則為仁濟之所及「育嬰院」(Crèche / nursery)，有三十六名老婦人居住，後更增至超過六十人，另有一間大房專為收容貧苦的兒童。三樓是手術室，設備完全符合最嚴謹的衛生條例；著名的德國籍醫生如加爾·猶迪醫生(Karl Justi)，他是醫療主管，奧斯加·梅利醫生(Oskar Muller)等，都在這兒施行手術。那時，醫院沒有固定的收費制度，病人各按自己的經濟能力及心意付錢，如此，富人的慷慨補償窮人的不足。醫院旁附設藥房，每年約有二千名婦人及孩童來求診和取藥。

本地聖召

當年科嘉主教在申請聖保祿修女來香港協助的書信裡，最後列出一個理由，是為培育中國籍的修女。這個祈求中國籍女子加入修會的夢想，在五十多年後實現了。

修女們的信德、熱誠及無私的奉獻，吸引及啟發了年青的女子。早在 1857 年，聖瑪素修女曾寫信給沙爾德，提及三位女青年願意加入她們的團體；雖然，這個請求最後沒有實現，



灣仔 1899 年 2 月 11 日建成的初學院
(20 世紀初期)

可能，時機仍是太早，對適應這陌生的會規及生活方式，少女們還未有充足的準備，感到很大的困難。

1862 年，
在越南西貢開

設了第一所初學院。入會者戴本雅明修女（Sr Benjamin Dei）是第一個來自中國的聖召。她後來返回香港，度一聖善的生活，深得眾人的愛戴和敬重，實是後來追隨她足跡的中國少女的好榜樣。很不幸地，她年輕的生命，在 1898 年被灣仔的一場火災奪去。

直至 1899 年香港才有一所初學院，開始收納本地的望會生。在此之前，望會生要被送往越南西貢（Saigon）的初學院，其中有些是來自澳門葡萄牙籍的。來自香港的望會生很多後來留在越南，一些返回香港，一些更被揀選前往韓國、菲律賓等地，作傳教先鋒。第一位加入香港初學院的是余施蓮修女（Celine Yu），她在病床上，臨終前宣發初願，時為 1905 年。

走出灣仔

19 世紀末，聖童之家的容量達到了飽和點。雖經多次在海旁東（Praya East）填海地取得新增的空間，灣仔的活動範圍仍是過度擠迫繁忙。在那有限的空間裡，容納了修院、初學院、孤兒院、育嬰院、課室、勞作室、為傷殘老弱人士的療養院、醫務室、醫院及藥房、還有一寄宿學校。

一份呈交沙爾德的報告，給我們描述了在 20 世紀初，修女所從事的慈善工作種類的繁多。

聖童之家平均每天接收五至七名棄嬰——每年約有一千九百名，其中三至四名或更多在數天或數星期後逝世。政府給予小量的棺木及殯葬津貼。僥倖生還的嬰兒在聖童之家被撫養成人。今天，那兒約有三百九十個一至二十歲的……他們在育嬰院、勞作室，或在療養院、盲人及傷殘者的醫院等。在鄰近的醫院裡，有五十至六十名老婦人。現有一百八十八個身體健全的女子，在兩間勞作室工作，一些負責縫補，另一些製造通花花邊，她們售賣這

些花邊以維持生計，年青及較年長的女子更為歐洲家庭縫製服裝。達到婚嫁年齡的，我們為他們安排婚嫁，對象多是來自中國內陸的男教友；不願結婚的，也就留守在聖童之家。另有兩所學校教授歐籍兒童，一為法文，一為英文。現共有九十五名學生，其中二十五名是寄宿生。有二百四十六名兒童（孤兒），他們每天上課兩至三小時，為此她們聘用兩名老師。²¹

那有限的空間容納了那麼多的人，那麼多的活動及工作在同時進行，明顯地，增添空間是刻不容緩的事。數年後，已很擠迫的醫院更達到不能接受的地步。再者，1904 年電車開始行駛，所發出的巨大聲響，對醫院裡的病人實在構成騷擾；巴黎外方傳教會總務金神父(Fr Leon Robert)住院時，不勝其擾，催促修女遷移地方。

在灣仔找不到發展的空間，房舍兩邊被屋宇包圍，另兩邊則是街道和海水。突發的事件再次幫助她們解決了困難。1902 年，聖童之家爆發了一場霍亂疫症，促使政府認真注意菲力斯姆姆增加土地的訴求。巡視院舍之後，衛生局局長建議菲力斯姆姆須把兒童留在屋外，以防過度擠迫。對此，菲力斯姆姆反應激烈，向他說：「我已準備好蓋一所新房子，只要政府能給我一些土地.....」。²²

之後，事情進展迅速多了。督察官親自處理這事，修女的要求被提交至英國。1903 年 8 月 17 日，政府授予修女一塊在跑馬地的土地；四十年前，這片土地本是華人墳場。修女請來工人清理場地，把掘出的骨殖歸還家屬，進程卻非常緩慢。菲力斯姆姆的健康狀況不穩定，因此她未能全力處理此事。她感

21 Emile Legue, *Journal de la Communauté*, Vol. 1 in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Arch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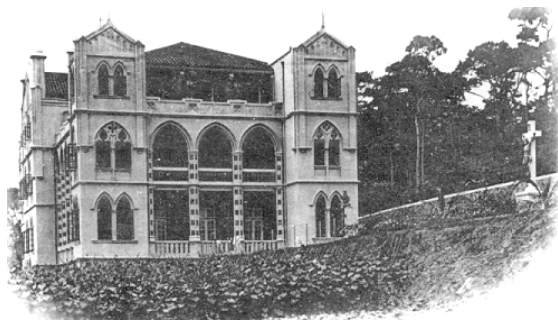
22 同上註 Vol. 2

到非常疲倦，最後不得不與另一位同樣需要休息的修女，往上海稍作歇息。期間，跑馬地的工程繼續緩慢地進行；待至 1906 年，面對黃泥涌道的石牆建成，才開始建造房舍。

終於在 1907 年聖誕日，菲力斯姆姆以一隊列的車輛，把患病的嬰兒及長期病患者，送抵這所位於跑馬地、名為「加爾瓦略山」（Le Calvaire）的新居所。很多人提問：為什麼要稱作加爾瓦略山？

這所房子為我是加爾瓦略山，可能也是將來的好預兆，所以它以此為名。……。為什麼害怕加爾瓦略山？我們的主基督不是說過，人必須經過苦難的磨練，才能進入光榮嗎？²³

她把一巨大的、花崗石製的十字架放在進口處，以紀念深受修女愛戴、已亡的和主教。新屋宇搬進翌日便由師多敏主教（Dominico Pozzoni）祝聖，但正式的開幕禮卻於 1908 年 1 月 6 日舉行。師主教在他的講道中說，因亨利·亞瑟·卜力爵士（Henry Arthur Blake）的推薦而獲得土地，由瑪竇·彌敦爵士（Matthew Nathan）主持奠基，現在則由弗德烈·盧押爵士（Frederick Lugard）正式揭幕。



跑馬地「加爾瓦略山」最初是灣仔孤兒院及醫院的分支

在灣仔的原修院，則用作醫院的附屬院舍，收容病弱的老人；直至 1918 年，醫院被遷移至銅鑼灣。1923 年，「安貧小

23 Marie Paul Bord, *In China*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1996), p.16



香港首位省會長菲力斯·佐頓
姆姆 (1891-1926)

姊妹會」(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修女抵達香港，菲力斯修女把五十名老人交給她們照顧，幫助她們展開服務。

新的服務中心

修女的工作由灣仔轉移至跑馬地，但噪音的問題仍未能解決，為正身受病苦的人，那是極難忍受的。金神父再次提出要

求，催迫修女把醫院遷往另一地方。至 1914 年，事情有了轉機；

她們獲悉在銅鑼灣有一大棉紗廠——「香港棉紡織染公司」(Hong Kong Cotton-Spinning, Weaving and Dyeing Company) 出售物業，包括土地及廠房。棉紗廠因不願面對劇烈的競爭，決定轉往上海經營。保祿·遮打爵士(Paul Chater)在這龐大的計劃中，是修女慷慨的贊助人及「保護者」，他購入灣仔的物業，並幫助修女以一合理的價錢，獲得銅鑼灣的廠房。

修女
搬遷至銅
鑼灣，在
那兒展開
她們的服
務，實是
明智的決
定。



禮頓道聖保祿機構正門入口。左邊是中文學校，正中是英文、法文學校，右邊是孤兒院。(20 世紀 20 年代)

這是一勇敢、甚而冒險的嘗試。在當時，銅鑼灣也可算是貼近市區，在市區內有電車行走，但在那遙遠的地區，卻沒有交通工具。香港棉紗廠附近只有很少的房屋，棉紗廠是那區內最大的一間了.....。它的位置被描寫為「處於跑馬場及銅鑼灣馬球場」之間。很少人認為那兒會發展成住宅區。

24

再者，它的周圍是沼澤地，瘴疾猖獗。

在獲得沙爾德的認可後，金神父被委託全權代理，他不單處理灣仔及銅鑼灣物業的買賣，更負責把棉紗廠改裝。他把殘舊的工廠轉變為一小城市，內有修院、孤兒院、學校及醫院。整個計劃需時三年，師主教稱之為「龐大的創舉事業」。



從棉花路遙望聖保祿機構。左起為修院、初學院、學校和醫院。（20 世紀 20 年代）



銅鑼灣的孤兒及殘障者

廠房的改裝及維修工程始於 1914 年 12 月。待第一座建築物落成及獲得入住准許後，灣仔的歷史性遷移便立即開始。由修女照顧的

孤兒人數眾多，他們首先獲被安置在最大的房舍內，那兒有兩個大的內庭院，可作遊樂場之用。1915 年 10 月 6 日舉行賣物會，慶祝孤兒院喬遷之喜，獲港督梅軒利爵士（Francis

Henry May）的太太——梅海倫娜夫人（Helena May）蒞臨祝賀。

翌年，銅鑼灣的學校也在翻新了的棉紗廠舉行開幕禮。港督梅軒利爵士在夫人及秘書的陪同下，在學校進口處舉行剪綵儀式。

最後遷離灣仔的是醫院。舊工廠工人宿舍的地盤需要大規模的重建，更需要大量的資金。菲力斯姆姆深感到這龐大工程的壓力。



銅鑼灣學校的祝聖及開幕禮 1916 年 10 月

她埋怨自己的衝動，沒有充足的資金而作出如此巨大的承擔。.....。她唯獨投靠天主及祂仁慈的眷顧，上主從不遺棄行事正直、尋求天國來臨的人。

25

1918年3月24日，醫院由師主教祝聖，並沒有舉行其他儀式或開幕禮。在修女努力的耕耘下，醫院很快成為香港最優秀、設備最完善的醫院之一；修女辛勤的奉獻，獲得社會人士的讚揚。在《印度支那經濟復甦》（*Economic Awakening of Indo-China*）雜誌中的一篇文章這樣描述醫院：

該院駐有一英國籍醫生，為貧苦大眾服務，但該院的所有醫生都擁有行醫資格。.....。照料病人的工作則由八位法國修女及兩位中國修女主持，有四位由馬尼拉修會屬下學院畢業的護士.....從旁協助。該醫院的手術室為香港最完善的手術室.....。醫院還設有產科，分頭二等的病房，還有普通病房及置有新式設備的特別護理室，裡面有特別的雙摺床等.....。

頭等病房除設有一張病床外，還有一張床，專供陪伴病人的親友用的.....費用每天為七元。二等病房費用為四元至五元，房內的設備與頭等的大



1918年由灣仔遷往銅鑼灣的聖保祿醫院

同小異，只是沒有那些豪華的設備而已，食物方面也比頭等病房較少選擇。三等病房設有四張病床。.....病房費用為一元五角。對於那些完全沒有能力支付藥費的病人，醫院免費為他們診治。.....此外，還有一所特別的診症室，特別為貧苦的中國人而設，主診的醫生是年紀老邁的安娜修女（Anna），她在香港行醫及推動慈善工作已有三十五年了。在貧苦大眾的心目中，她是香港最佳的醫生。²⁶

金神父和菲力斯修女的心血及辛勞確實沒有白費。

人們通稱那所醫院為法國醫院，已成為遠東最優良、設備最先進的醫院之一。而寬敞的孤兒院也裝置了不同的設備，為所收容的可憐女孩子提供多類型的訓練。²⁷

1931 年，「佳士得耶公司」（Gestetner）慶祝五十週年金禧紀念，同時推出他們首部電動複印機。他們舉行投票活動，要選出全港最優秀的醫院。聖保祿醫院榮登榜首，隨後是「東華醫院」（Tung Wah Hospital）。

當時灣仔的物業售予「香港置地公司」（Hong Kong Land Company）。公司把它發展，並於 1917 年開發成兩條街道，即蘭杜街（Lendale Street）及晏頓街（Anton Street），那是取自「英商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兩位大班的名字——達味·蘭杜議員（David Lendale）及查理士·愛德華·晏頓議員（Charles Edward Anton）。²⁸

26 Jean Vaud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中國傳教簡史 1848 年-1926 年》，中譯本（香港：1980），頁 120 - 121。

27 Ryan, p. 15

28 Smith, p. 122

最初，在灣仔聖童之家的學校，包括中文、英文及法文三個部門，只算是修女多項工作的一部份，沒有特別的部門名稱。1915 年遷移至銅鑼灣時，修女給予一個新的名字，稱為「聖保祿機構」

(St Paul's Institution)。

稍後，於 1920 年，學校才有自己的名字——「英法學校」

(Anglo-French School)；戰後，



改稱為「聖保祿學校」 (French Convent School)。

1955 年才把英文校名轉為「聖保祿學校」 (St Paul's Convent School)，一直沿用至今。

師主教一直渴望在（維多利亞）城外設立一漢文學校。自 1850 年始，修女在灣仔已為孤兒們設有一本土語的學校，更在 1867 年，為外籍兒童開辦英語及法語學校。1924 年 2 月，「漢文女子學校」（Chinese Girls School）開放給公眾，讓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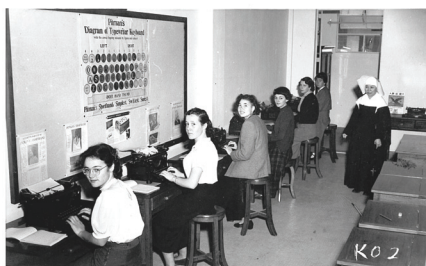


1924 年開辦的「漢文學校」

意以本土語求學的人士加入。這滿足了主教最後的心願，因他在同一個月逝世。

漢文女子學校開校時有三十六名小學學生，分為四級，有五位老師；家境清

貧的學生可獲免費入讀。一年後，學生人數增至一百二十五人，因此加開兩班；1926 年增設幼兒班及五年級。同年有十名



小學畢業生，為協助

姬瑪利·聖心修女與初期的商科班

這些畢業生繼續學業，於 1929 年開辦中學預備班，雖是試驗性質，效果也頗理想；1931 年開辦高中班級。由那年開始，每學年的開課日期，由春季改為秋季。1933 年，首五名中學畢業生獲頒授畢業文憑。

1927 年 2 月，在跑馬地開設分校，由 1930 年至 1945 年間，稱為「聖瑪加利漢文學校」（St Marguerite's Vernacular School），即現時聖保祿天主教小學的前身。

為了讓灣仔英語部的學生有更好的培訓，使他們能適應商業界的要求，於 1913 年開辦打字的特別課程，1915 年加設速記課程。那時，女子沒有進入大學的機會，因為至 1921 年，「香港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才開始招收女生。²⁹ 1933 年，銅鑼灣的英法學校開辦晚上的速記速度班，特別訓練學生們的速記速度，由一位葛達太太(Goddard)教授。至 1940 年，姬瑪利·聖心修女(Marie du Sacre Coeur Gil)開辦首次的商科課程，學生有十二人。

當修女遷移至銅鑼灣時，政府授予她們一項新的工作。在不遠的山邊，有一所「聖保祿庇護所」(St Paul's Refuge)，本是「庇理羅士感化院」(Belilios Reformatory)，由一位著名的猶太慈善家厄瑪奴爾·拉法·庇理羅士(Emmanuel Ralph Belilios)捐贈予政府，為教導男童。可是，從沒有收錄任何人，

29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ast and present* (Hong Kong: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1993), p.59

曾收納了一名男童，但沒多久，他便逃走了。1909 年，立法會質疑它作為分支監獄的功能，那不是捐贈者的原意。他們提議把它交予「愛爾教區庇護所」（Eyre Diocesan Refuge），那是「聖公會」（Anglican）的一個慈善機構，專收容被遺棄的中國少女及婦人。³⁰

1914 年，庇護所的德國籍總監，因歐洲連連的戰事，須偕同其他德籍居民離開香港，庇護所便搬往九龍。³¹ 翌年，政府把那所屋宇的使用權轉給修女。

.....他們照顧困境中的婦女，她們多來自中國內陸，當中國事務秘書接收到這些有需要的婦孺時，便常把她們帶到這兒。她們可從事多項工作：洗燙、縫紉、家務，甚至園藝。這庇護所多年來肩負了重要的任務，以不顯眼的方式，為有需要的婦女提供康復之路。³²

1925 年，那兒有四十五人。1932 年 6 月，政府收回屋宇，以發展另類的工作。

基督君王堂

當修女把灣仔所有的工作，都成功地搬遷至寬敞的銅鑼灣新址後，菲力斯姆姆開始計劃另一夢想：在這場地的中央建造一聖堂，以敬禮主基督。這原已包括在金神父最初的計劃中，但工程受到延誤，一方面欠缺資金，另一方面中國內陸出現了麻煩。

30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inutes of the Meeting, 7 October 1909, <http://www.legco.gov.hk/1909/h091007.pdf>

31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inutes of the Meeting, 3 December 1914, <http://www.legco.gov.hk/1914/h141203.pdf>

32 Ryan, p. 188

隨著所有的債務於 1923 年清還後，新的育嬰院於 1925 年相繼落成，菲力斯姆姆再次與金神父商討這計劃。可惜的是，猶如梅瑟當年領導選民翻越沙漠，自己卻未能進入天主許諾的福地，她及金神父同樣未能目睹他們所開展的工程完成。1926 年 6 月，金神父返回法國，而菲力斯姆姆竟於同年 7 月去世，回歸父家；兩人都未能享見他們的夢想成真。

她忠誠地、能幹地在香港的會院團體服務了三十六年，其中三十五年為省會長。她的任期富有特色，展開了龐大的擴展，修女的工作由灣仔伸展至跑馬地，再進展至銅鑼灣，甚而到中國內陸。也是她實踐了科嘉主教的最後兩個心願：醫院及初學院。現在，留待她的繼承者瑪加利·聖保祿·盧斯姆姆（Marguerite de St Paul Nuss）——她喜歡人稱她為保祿姆姆（Mother Paul），及接替金神父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衛神父（L Vircondelet），去完成她最後的心願。然而，為基督建造聖堂卻也碰到很大的阻撓——主教的反對。1928 年提出申請時，香港宗座代牧恩理覺主教（Enrico Valtorta）因恐防建築費過於高昂而不願意批准。後考慮到傳教工作的需要，他提議建造一座較廉價的建築物以達目的，餘錢則更好用作發展他們的慈善工作。三年前，當地的報章曾刊登有關修女將在銅鑼灣興建一座三十萬元的聖堂。保祿姆姆向主教解釋那並非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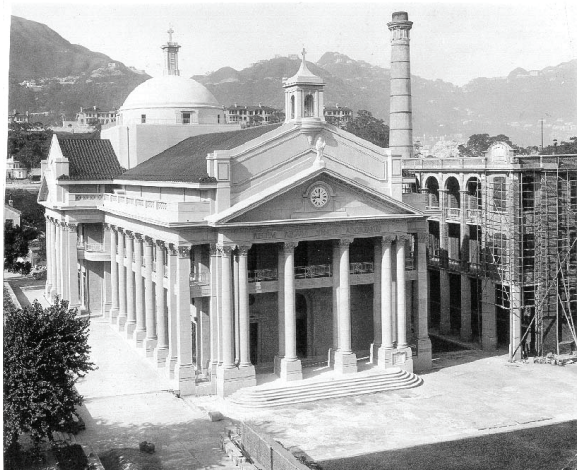
現在是一全新的計劃，很簡單且不用花費分文。聖堂將簡單地採用磚及強化混凝土建造，內外都沒有華麗的裝飾。聖堂內部唯一特出之處是那圓拱屋頂，也只以強化混凝土建造，建築費不會因此而增加。根據建築師的估價，建築費不會超越十三萬。.....。³³

1928 年 7 月 24 日，恩主教喜悅地主持聖堂的奠基石祝聖典禮。

33 Bord, p. 26-27

敬愛的姆姆，你常向我說：要使「基督君王堂」(Christ the King Chapel) 宏大而美麗。是的，它應是宏大的，美麗，它更應是。首先須向建築師陳納堂先生 (Chanatong) 致謝，他把這項工程作為禮物送給我們。聖堂會是寬敞的，明亮而通爽。內部沒有一根柱子，從聖堂內任何角落都可看到祭台，這正附合什麼都走向它，都以它為中心的原則，也是每一聖堂的所以然。³⁴

兩年後，宏偉的基督君王堂落成。正祭台為意大利雲石，獲熱誠的友人慷慨捐贈，法國的藝術家加以雕刻。威廉·賈納先生 (William Gardner) 贈予一雄偉的耶穌聖心雕像，他的兩位女兒正是我們的修女——聖若望 (St Jean) 及麗達修女 (Rita)。英法學校的聖母孝女會 (Children of Mary) 則贈送一非常美麗的聖母無原罪雕像。



基督君王堂 (20 世紀 30 年代)

1930 年 5 月 10 日上午舉行新聖堂的祝聖及奉獻禮，下午則舉行感恩典禮，由中國貴陽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 of Kweyang, China)、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施恩主教

34 同上註，頁 27。

（Francois-Lazare Sequin）主禮，另參與的不少於六位主教，儀式感人。共祭神長除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亨利・恩理覺主教（Enrico Valtorta）外，還有汕頭宗座代牧、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實茂芳主教（Adolphe Rayssac），嘉應州（梅縣）主教、美國天主教傳教會會士福爾德主教（Francis Xavier Ford），北海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賚主教（Jean-Baptiste Penicaud），及納匝肋會院（Nazareth House）院長、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祝福主教（Gustave-Joseph Deswaziere）等，由耶穌會蔡伯德神父（Patrick J Joy）證道。

聖堂是一私人物業，故不會公開給公眾使用。但很快地，很多天主教信徒，甚至主教本人也向修女請求，准予他們參與感恩聖祭；自然地，他們的請求沒有被接納。為避免因拒絕別人而引起尷尬，主教逼於無奈地，於 1930 年 11 月 25 日發出告示，向公眾宣報聖堂乃私人重地，只為聖保祿機構使用；若有修道團體按照規例在那兒舉行特別會議、神修活動或退省、又或轉衣發願禮儀等，則作別論。

度過九年的熱誠服務，保祿姆姆於 1935 年返回法國，由於健康衰退，她再沒有返回香港。接替她的是聖沙勿略・維美斯姆姆（St Xavier Vermeersch），她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比利時籍傳教士，曾多年服務於越南、泰國及菲律賓，到香港前，已在菲律賓出任省會長凡十二年。

聖沙勿略姆姆常尋找新的方式回應新時代的需要，1937 年，她在基督君王堂背後開辦了一所為年青女職工及女訪客而設的宿舍，名為「法國修院宿舍」（French Convent Hostel）。

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請求聖沙勿略姆姆在太古樓（Tai Koo Lau）開辦一所中文學校，因為在薄扶林有一天主教華人團體，他們起初是由法國神父從中國帶來香港，為協助神父們在「伯大尼會院」（Bethanie）及「納匝肋印刷所」（Nazareth Press）的工作。這團體由數個家庭開始，至 1924 年，已增長

至二百五十位教友。³⁵神父的要求被接納，1937年5月，三位修女被派往管理「聖約瑟女子學校」(St Joseph Girls' School)，還有一所小型的診所及藥房。

耶穌會於1926年抵港，三年後，他們開辦了「利瑪竇宿舍」(Ricci Hall)，那是一所天主教宿舍，專為香港大學的男生而設。1939年，耶穌會佐治·博爾神父(George Byrne)計劃開

創一所專為大學天主教的女生宿舍，他與聖沙勿略姆姆商討，並獲得贊同；1939年8月30日，「聖母宿舍」(Our Lady's Hall)隨之啟幕。



邁向九龍

屬於政府的「九龍醫院」(Kowloon Hospital)於1926年在旺角開設，很快地，它已宣告「過度擠迫」。當時，由於中國內陸的政治動盪和不安，引致香港的人口，特別是在九龍，急速上升。

恩理覺主教一直勸諭菲力斯姆姆向九龍發展，因為九龍的土地面積比香港更大。1931年，保祿姆姆策劃在九龍創建一

35 Alain le Pichon, *Bethanie and Nazareth –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2006), p. 125

所醫院，地點擬在太子道（Prince Edward Road）的一段斜坡上。「可是，後來發現，該位置鄰近機場，建築物的高度受到限制，故不能在該址建造我們計劃中的大樓。」³⁶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不太熱衷在九龍醫院附近設立一所私家醫院。受著重重的障礙及困難，雖然主教不斷要求重新考慮，該計劃於 1935 年終被放棄。主教感到非常失望，其間有兩個修道團體表示願意承辦這個計劃，但主教屬意聖保祿修女照管醫院，故他寧願等待。

1935 年保祿姆姆離港返回法國沙爾德，參加修會的總代表大會，會議結束後卻沒有回到香港。接替她的是聖沙勿略姆姆，她於 1936 年在九龍買了一座平房，開辦孤兒院接收棄嬰，名為「聖德肋撒育嬰院」（St Teresa's Nursing Home）。部份平房用作小型診所，一些慷慨善心的醫生醫護貧窮的病患者。1938 年，政府不再反對，聖沙勿略姆姆於 5 月便向政府重提保祿姆姆建院的計劃。



1936 年的「聖德肋撒育嬰院」——外牆上已用了「醫院」的稱號

同期，「九龍居民聯誼會」（Kowloon Residents Association）非常渴望在九龍多增一所醫院，他們於 1939 年致函多個機構，包括透過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顏思回神父（Andrew Granelli）上書給天主教會，顏神父是新建的「聖德肋撒堂」

36 Ryan, p.210

(St. Teresa's Church) 的主任司鐸，他把他們的請求轉達恩理覺主教，主教再次強烈地向聖保祿修女提出他的請求。

誤會隨而接踵而來。不幸地，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沙爾德總院給予否定的答覆，這使恩理覺主教極度不滿，他立即寫信給沙爾德的總會長，清晰地表達他深深的遺憾及困擾。

容我再次歇盡所能地要求，因為，作為香港的主教，我認為在這差不多一百萬人口的城市裡，設立一間天主教醫院是非常重要的。

我懇求你們的修女，因為我覺得她們在香港聖保祿醫院的管理工作辦得非常成功。你們的猶疑——我差點要說，你們的矛盾，真的使我很失望。我不能理解，你的省會長向你要求的，不是增加修女或金錢，只是簡單地請求你的批准.....。

倘若你仍對這項工程不能給予一肯定的答覆，可是你曾多次給予准許，未來，當教區有重要的宗徒工作時，我也只好轉向別的修會了。³⁷

主教曾告知教廷駐華大使有關九龍急需多一所醫院，及曾與聖保祿修女商討時所遇到的困擾，教廷駐華大使乘他返回歐洲之便，跑往沙爾德母院拜會總會長。總會的長上們向他解釋，雖然有關建築那所醫院的信件來來往往，卻從沒有正式請求批准，也沒有附上圖則或預算案等。

37 Bord, p. 68-69



聖德肋撒醫院於 1940 年啟用

疑團頓釋及獲得准許後，醫院的各項建築工序進行順利，在短短的八個月內，工程便完成。新醫院有六個病房，七十五張病床，以堂區的主保命名，稱為聖德肋撒醫院（St. Teresa's Hospital）。

正式的開幕典禮於 1940 年 10 月 3 日，聖德蘭·里修（小德肋撒）（St Thérèse of Lisieux）的瞻禮日舉行，但醫院在 9 月 14 日已開始接收病人。

戰事年代

新開啟的聖德肋撒醫院發展迅速，九龍區的居民感到十分興奮和喜悅。但他們的喜樂未能長久，1941 年 12 月 8 日，啟德機場被轟炸，醫院鄰近機場，立即擠滿了傷者。消息像野火般迅速蔓延，日本軍來了！戰鬥延續了數天，12 月 11 日黃昏，修女目睹英兵乘軍車退到香港島。日本軍人數比英軍多，故能迅速地朝著香港推進。年青的士兵懷著鬥志，準備作戰到底，無奈已損失了很多生命，英軍被迫於 12 月 25 日宣布投降。

修女堅守醫院，繼續服務，直至 1942 年 2 月某天午夜，她們突然接到日軍統領緊急通知，命令修女須於翌日清晨七時前離開醫院。她們整晚趕快執拾行裝。

翌日，修女們搬進原屬於數個家庭的五所房子，位於窩打老道的巴頓先生（Barton）、費嘉度先生（Figueiredo）及蘇納德醫生（Bernardo de Sousa）等的房子，這些家庭被日軍扣留在赤柱。修女在那兒設立一個小診所，一向對修女友善的醫生沒有放棄修女，每天踏著單車前來，因為他們的汽車全遭日軍強行徵用。

1942 年 7 月，曾於我們醫院接受治療的阿根廷領使到了日本東京，他往見日本高層，訴說日軍對修女的不公義。主管香港戰俘營的軍官便接到一道命令，須立即把醫院交還給修女。8 月 15 日，修女重返醫院，卻遭禁止接收病人。九龍區的居民奮力為修女爭取，他們哀求日軍要員，准許修女營辦一所診所及藥房，可是，他們未能如願以償。1943 年 7 月，「日本衛生部」召叫修女，告訴她們「日本民政部」欲再次徵用醫院，為醫治平民，不過，軍方將支付租金，為打退他們的主意，修女開出高昂的租值；「自衛隊辦公廳」多次召見她們共同商議，修女卻堅持到底。經過兩個月的交涉，毫無結果，修女們再次被召見，這趟可不是自衛隊辦公廳，而是一官階甚高的軍官，他態度冷酷，修女們卻如常地堅守立場，軍官最後強橫地發出命令，無論修女喜歡與否，他們也會佔用醫院，最後限期是 8 月 15 日。日軍更把醫院易名為「博愛醫院」。

聖母升天節日，修女們的物品被放到卡車上，由苦力拉到油麻地碼頭，修女則步行至佐敦碼頭，乘渡輪往銅鑼灣。

在跑馬地的「加爾瓦略山」會院也被日軍佔用，修女被逼帶著行裝遷往銅鑼灣。學校幸好獲准在銅鑼灣繼續開辦，但有嚴令不准教授英文，代之須教授日文，而銅鑼灣原有的學校則被關閉。

在日軍佔領加爾瓦略山會院期間，菜園被改作細小的牢房，囚禁華籍及一些歐籍的囚犯，後把他們處死。園中巨大的銅十字架也被毀壞，銅則被用來製作軍械。

1941 年，銅鑼灣的孤兒院仍有九十五名嬰孩、一百零六名兒童及成人，在醫院內則有二百二十九名老弱傷殘者，另有約六十名病人。如何養活他們？還有修女及寄宿生！聖沙勿略姆姆面對的是一惡夢。一名學校寄宿生陳香梅（Anna Chan），在她的自傳——《香梅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nna）中，記述了第一枚炸彈落下香港時的情況。她下嫁給二次大戰期間

著名的美國英雄陳納德將軍（Claire Lee Chennault），她自己成了一著名的記者、作家，後更成為美國共和黨總統甘迺迪（Kennedy）至列根（Reagan）期間的特別顧問。

所有的食店關閉，我們缺乏供應品。.....。我們，包括五十名修女及寄宿生，每天早餐只有一塊麵飽，晚餐是半碗飯。

聖沙勿略姆須作出艱難的決定，她讓一些修女踏上危險的旅程，分批送往越南。望會生及初學生可選擇回家，六十六人中有二十九個選擇離開，初學院隨而關閉。

銅鑼灣修院座落於軍事中心的危險地帶，北面有被日軍佔用作儲存油及軍火的「英商渣甸洋行」貨倉，南面是「掃桿埔軍事訓練營」，東面是「德士古油庫」（Texaco），西面是一停車場及小型軍械廠。轟炸期間，不單有來自日軍的炸彈，更有來自英軍的。只有聖堂及部份醫院能奇蹟地避過頻密的轟炸。據估計，戰爭初期，落在我們範圍內的炸彈不下二百個，三個分別落在聖堂、醫院及孤兒院的工作室內，卻都沒有爆炸。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這些都是天主慈愛護佑的實證。

戰爭爆發前，政府作了準備，提出徵用醫院及其他鄰近的樓宇，修女宿舍及聖堂除外。修女及初學生們都上了由「瑪麗醫院」舉辦的急救課程，學習簡單的家居護理。戰亂期間，整個地方成了醫院及避難所，擠滿病人及傷者，學校及孤兒院也轉作醫院用途，課室更被用作手術室；後來，連聖堂也要用來容納那大量的傷者。來自瑪麗醫院的醫護人員及一些英籍軍官加入駐守，當英籍醫生及護士被拘留在集中營時，華籍的護士便來替代英籍的護士；醫院只接收華籍平民，患病的、受傷的，數量非常多。

聖堂常響起警報，修女背誦詠唱聖詩及歌曲，振作精神。在這危險不穩定的時刻，耶穌會的神父，特別是嘉利華神父（Robert W Gallagher）和祁祖堯神父（Gerard Hugh Casey），

常在病人身旁，安慰病者、給予修和聖事、為垂危者付洗、為教友施放病人傅油聖事，準備他們踏上永生的旅程；又有誰能保證自己不會在瞬息間遭逢巨變呢？在這備受壓力的時刻，多少傷殘的、病弱的及垂危的，在修女的手中獲得照料，領受聖洗的人更達數千。

修女每天生活於混亂、破壞及痛苦中，卻沒有想到，更壞的將要來臨。1945年，戰事臨近結束之時，悲劇突然降臨。4月4日那天，幸好是兒童節，是學校假期，美國戰機不停在銅鑼灣上空盤旋，數秒鐘後，警報響起，人們爭相走避，躲進防空洞內，轉瞬間，在修院範圍內，炸彈如雨般落下；美軍企圖轟炸日軍在加路連山的電油及火藥庫，卻誤炸中「仁愛小城」（City of Charity）。

在電光火石間，奪去了五十人的性命，包括六位修女。所有建築物不是完全被炸毀，便是嚴重受損；但奇蹟地，聖堂竟再一次絲毫無損！餘下破爛的房子已不能居住，六百人頓失蔽身之所。聖

沙勿略姆姆飽受驚嚇，整個星期之久，她的精神健康瀕臨崩潰，差點兒喪失了性命。她偕同四十位修女及一百名孤兒，不得不投靠嘉諾撒會修女。透過澳門主教善心的協助，部份修女及孤兒撤離香港，往澳門「嘉諾撒修會」及「天神母后修會」暫住，達十一個月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銅鑼灣的鳥瞰圖。可見孤兒院及部份中文學校被完全破壞（20世紀40年代後期）

戰後重建

無論對生命或財物，戰事都構成了非常嚴重的破壞，修女們只好重新開始。沒有浪費片刻時間，修女們立即回復正常的生活及工作。銅鑼灣及跑馬地的學生，同於 1945 年 10 月 1 日在跑馬地復課。在銅鑼灣的房子，經過緊急維修後，英文及法文部遷回銅鑼灣。全部孤兒及老弱者也遷往銅鑼灣，跑馬地全用作漢文學校，包括銅鑼灣學校的中文部。商科部仍留在跑馬地，至 1951 年才遷回銅鑼灣。

九龍聖德肋撒醫院費了五個月的時間清理及重整，於 1945 年 12 月重開。醫院盡量改善，以克服戰事帶來的禍害，但設備卻仍落後，未能解決病人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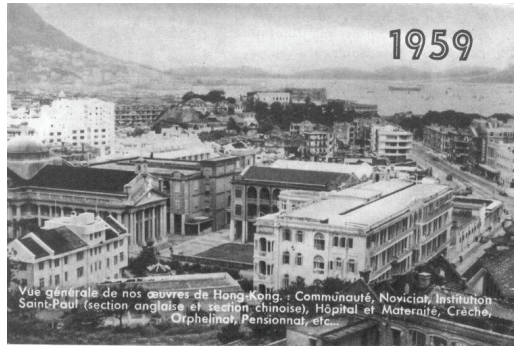
1949 年，銅鑼灣的重建工程完成。一幢新的孤兒院，易名為「聖保祿育嬰院」（St Paul's Orphanage），於 9 月開辦，一些孤兒重回育嬰院。戰後，很多男士失業，很多家庭被迫拋棄嬰兒。再者，由於香港房屋短缺，業主常拒絕把房子租給有嬰兒的家庭。因此，大量可憐的幼小嬰兒，被送到育嬰院門前。

香港的人口，在戰亂期間大量減少，於 1945 年回升至六十萬，1947 年更增至一百七十五萬，且以每年平均增加七萬五千人的速度增長。香港聖保祿醫院於 1949 年加建產科新翼「聖母產科醫院」（Pavillion Notre Dame），以紓緩產科服務的需求。

當學校、醫院及育嬰院的服務重上軌道，初學院於 1948 年 5 月也接收新會員，一些工作卻被迫放棄；其中包括太古樓的聖約瑟女子學校，銅鑼灣的法國修院宿舍改為容納學校的寄宿生，在香港大學的聖母宿舍更被永久關閉。

聖沙勿略姆姆歷經戰爭的衝擊，更要在艱苦的時刻，肩負管治整個團體的壓力，辛勞損害了她的健康，當她從嘉諾撒修會返回時，便住進了聖保祿醫院。但她毫不理會自己老邁的年

紀及潺弱的身體，仍不懈地負起重修戰爭遺留下來的破壞，直至 1947 年 12 月 30 日，保蓮·費格姆姆 (Pauline Figus) 接替她。聖沙勿略姆姆的健康一直沒有起色，於 1948 年 3 月 13 日病逝。



1959 年 銅鑼灣：會院、初學院、聖保祿機構（英文及中文學校）、醫院及婦產部、育嬰院、孤兒院、寄宿學校……等

香港省會長首次有四位助理協助，構成省議會。保蓮姆姆於 1949 年 7 月歡迎第一位菲律賓籍的傳教修女到港，她是迺依撒伯爾·天神修女 (Isabel of the Angels Narciso)。香港修女數目因戰事而驟減，迺修女的到來，正好增添人手，分擔修女們繁重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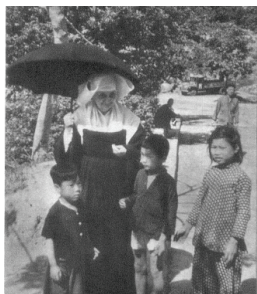
中國大陸難民潮

戰後的香港正從戰爭的恐懼、毀滅性的破壞中，努力振作爬起來；卻於 1949 年，因中國落入共產政權，香港的存亡又再次受到威脅。當共產黨戰勝「國民黨」，毛澤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的形勢受到很大的衝擊。不斷湧入香港的難民潮，致使共產黨政府封鎖中國與香港的邊界。數以千計湧入香港的難民中，不少是神父、修道人及教友。保蓮姆姆歡欣地接待了上海的奧斯利姆姆 (Auxiliatrix)、「善牧會」(Good Shepherd) 的修女、「聖奧斯定頌經團」修女 (Canonesses of St Augustine)、還有其他修會。香港的天主教人口由 1950 年的五萬上升至 1960 年的十五萬。

聖保祿修女在中國內陸的多個傳教站，戰爭時雖沒有關閉，現在也要一一被迫放棄，包括——福州、海南島、昆明等地。1949 年修女從福州退出時，把約二十名孤兒帶同來港。由於銅鑼灣的居住環境已非常擠迫，修女於 1952 年把孤女們搬往寶珊道舊有的聖母宿舍，改稱為「聖貞德工藝室」(*Ouvroir Ste Jeanne d'Arc*)。

由中國來的難民充塞著香港，他們隨處為家，在山邊、在路旁，在任何一個可以停留的地方。數以千計的難民湧入，使香港慈善機構提供的社會福利服務超越了極限，為解決這個問題，香港天主教區動用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統籌照顧這些中國新移民的重大工作及責任，落在新委任的香港主教白英奇(Bianchi)身上，他是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接任時正在中國海豐教區傳教。白英奇於 1949 年受任為主



一位法籍修女探訪難

教，卻須待至 1952 年，從共產黨的牢獄中被釋放出來，才能履行主教之職。援助數千中國難民成了白主教的首項要務，他須先協助他們獲得生活的接濟和提供教育。白主教留給香港的其中一項貢獻便是開辦學校，至今仍在運作中。³⁸ 營辦這眾多的學校，白英奇主教須大量依重男女修會的協助，堂區及天主教機構也積極投入這項服務新移民的工作。

跑馬地的聖瑪加利大堂於 1950 年在跑馬地加爾瓦略山開辦聖瑪加利大夜校，收錄三百三十名難民子弟攻讀一至六年級，每天上課兩小時；另有二百二十名兒童在銅鑼灣上課。教員都來自「聖母軍」的義工。

38 Piero Gheddo, *Lawrence Bianchi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92), pp. 136–137



納德·貝克維會長
(1960-1968)

1958 年，跑馬地開始了重大的轉變。幼稚園部被關閉，同時開始籌建新的中學。1960

年，一所理科中學——「聖保祿中學」

正式啟幕。同年，附屬銅鑼灣聖保祿學校的跑馬地小學，轉為一所政府津貼的上、下午學校，上午為英文部，下午則為中文部。校名亦更改為「聖保祿天主教小學」，由原是校務主任的周耀真（周依利莎）修女（Elisa Joseph Chow）出任校長。



在堅尼地城教授難民要理（20 世紀 60 年代）

新的氣息

大戰後十年，九龍聖德肋撒醫院已從戰亂的禍害中復原，且有良好的進展，醫院常住滿病人。醫生喜歡推薦病人到那兒留醫，走廊及露台塞滿病人也是常見的現象，病人須於數天前預定病房。

1949 年，一位年輕、充滿熱忱的比利時籍傳教修女抵港，她是三十四歲的納德·貝克維修女（Bernard de Marie de Broqueville），她出任聖德肋撒醫院的新院長。醫院需要擴建，沙爾德母院立時授予准許。年輕的院長在經歷了很多的考驗和

困擾後，醫院的南翼終於在 1960 年 10 月 3 日正式揭幕。病床數目由七十五張增加至二百七十五張。

60 年代，香港教區的活動如火如荼，同樣地，聖保祿修會團體也有一番新現象。1960 年 4 月，聖德肋撒醫院那位能幹、熱誠、充滿活力的院長納德修女，被委任為省會長，她給整個團體帶來新的氣息和朝氣。首先，她在省會的組織架構方面，作了一全新、重大的改革。整個省會本全以省會長一人為依歸³⁹，貝克維會長把整個團體按照修女從事的宗徒工作：醫療、孤兒服務、學校及修院等四大範疇，分為四個會院，會院各有自己的院長。初學院則搬往寶珊道，原在寶珊道的福州孤兒遷出；但初學院也沒有在寶珊道居留太久，由於周圍新建了很多高樓大廈，1967 年，初學院搬往上水一個比較寧靜的地方。

不單修院方面有改革，學校的組織也被重整。聖保祿學校的幼稚園、小學及中學本由同一位校長管理，現委任另一位校長負責管理幼稚園及小學部。1961 年決定停止接收寄宿生，那時，在灣仔也有學校的寄宿生。在這些寄宿生中，其中一位成了鄧蓮如男爵（Lydia Dunn），於 1985 至 1992 年間，她是立法及行政兩局的首席非官守議員，對香港在 1997 年回歸中國前的歷史，發揮了很重要的影響。修女方面，除了在學校及孤兒院工作的修女外，其他修女都在修女會院、即學生曾寄宿的房舍內居住。

貝克維會長充滿傳教熱忱，活力充沛，且仁愛慷慨，為貧困的人，特別是香港當時最嚴峻的問題——難民，推動了很多援助的行動。她更踏出香港的境界，擴展至台灣。1977 至 1983 年，她被委任為總議員，離開香港，後重回台灣，至 1986 年因健康轉壞而退居沙爾德母院。

39 Bord, 79

1962 年，沙爾德的初學院遷往羅馬，除取錄法國女子外，也收錄能說英語的女子。貝克維會長顧念修會的未來，開始接納來自菲律賓的聖召，並把她們聯同來自香港的女子，送往羅馬的國際初學院受訓。她更鼓勵年青修女在香港或到海外接受更高的職業培訓。

60 年代，正值貝克維會長在任期間，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在香港引發起強烈的衝擊，幸好修女們沒有因此而擱置她們的宗徒工作。除了在堂區的牧民工作外，更發展至銅鑼灣以外貧困的地區。

1960 年 11 月，兩位修女往深水埗「聖老楞佐堂」（St Lawrence Church）擔任牧民工作；開始時，她們在聖德肋撒醫院居住，常往探訪李鄭屋邨徙置區的家庭。初期的牧民工作並不容易，很多都是所謂的「麵粉教友」，他們的信德非常薄弱，唯一的渴求足維持生計。無可否認，很多難民成為教友，只為求得到教會贈予他們的物質援助，如米、麵、麵粉、餅乾等等，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⁴⁰

1961 年 1 月，在聖老楞佐堂旁設置了一細小的房間，供修女使用，房間非常細小，沒有廚房或衛生設施，生活頗困難及不方便，修女卻也能隨遇而安。除了祭衣房的工作，修女還教授要理，探訪教友，鼓勵及安慰難民的家庭，聆聽他們訴說困難和辛酸的遭遇。修女與教友們同甘共苦，教友們深受感動，對修女予以深深的敬重和信賴，初期的敵意逐漸減弱，修女慢慢成為他們家庭的一份子，安慰者和顧問。

1959 年，白英奇主教豎立他任內的另一里程碑——成立了「香港明愛」機構。⁴¹

40 A Granelli, "The Bumper Harvest", *Catholic Hong Kong, a Hundred Years of Missionary Activity*, (Hong Kong: Catholic Press Bureau, 1958), p. 65

41 Gheddo, 140

貝克維會長於 1964 年與明愛機構合作，開設了兩所專為難民服務的診所，一所在銅鑼灣大坑金文泰道的木屋區，名為「隆巴迪診所」（Lombardi Clinic），另一是位於堅尼地城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診所」（Pope John XXIII Clinic）。身為護士的貝克維會長，總愛偷空溜出修院，跑往大坑道的診所護理那些貧病的人。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也在這個時期召開及結束，捲起了改革的浪潮。天主教女修會的會衣也是其中一項，修女們開始改革她們款式古舊落伍的會衣，不少修會甚而索性取締穿著會衣，改穿時款的便服。超過兩個半多的世紀，聖保祿修女一直穿著沿自法國 17 世紀農民服式的會衣，只於 1953 年曾作輕微的修改。1966 年，本較適宜寒冷國家的會衣款式，改為較簡單及輕便，這使在遠東的修女，包括香港，感到欣喜。會衣的改革是漸進的，首先是那頂古老的帽子（cornette）被頭紗所取代；數月後，會衣的款式也被修改。

60 年代末，香港經濟大大改善，原因之一，是政府巧妙地利用了那大量來自中國內陸的廉價移民勞工。50 年代時，香港的工廠由三千增至一萬間。生活指數雖然上漲，工資卻保持低廉。透過政府、不同的信仰團體和慈善機構的不斷努力，市民的居住、教育和醫療方面的需要都得到照顧，難民已不需要緊急的援助。1967 年，在跑馬地及銅鑼灣開辦的聖瑪加利大夜校被關閉，翌年，設於大坑道及堅尼地城的明愛診所也相繼停辦。

歷史里程碑

1968 年是修會在香港的一個里程碑。首批法國修女來港傳教一百二十年後，一位中國籍修女被委任為香港省會長，她是張佩瓊修女（Marie Isabelle Tchang）。她原籍中國雲南省昆明縣，修會於 1911 至 1951 年曾有修女在那裡服務。張會長秉承貝克維會長推行慈善工作的原則和計劃。九龍藍田是一徙置區，很多新移民在那兒居住，他們的子女極需一所學校，為他們提供教育。1970 年，第三間聖保祿中學在藍田啟幕，被委任為校長的是一位剛由英國修業回港的年青修女——王德蘭修女（Marie Pauline Wong），她更將會領導香港整個團體。



1970 年啟幕的藍田聖保祿中學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眾多重大的改革中，禮儀方面的革新對一眾信徒的公開敬禮影響至深。感恩聖祭沿用的拉丁語，被本地語言取代，主祭的神父也改為面向教友。為慶祝修會在香港傳教一百二十五週年紀念，基督君王小堂在 1973 年 3 月進行了大規模的裝修，半圓拱形屋頂及祭台部份被完全改裝。為配合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禮儀改革，領聖體欄杆被拆除，一座簇新的祭台被放置在中央，祭台下方前面有一塊最後晚餐的美麗雕刻，祭台兩側的地面被增高五級，好使整個新祭台與舊祭台的高度一致。

聖堂其中一個特色是朝向祭台的彩色玻璃窗，那是保祿姆姆留給我們的美好之物，她不單對窮人富於仁慈憐愛，對上主的殿宇更充滿熱誠膜拜之情。為聖殿，她豪不吝嗇，每一事物須是最美好的，那包括祭台的裝飾、祭台布、花瓶、苦路聖像等等。在

香港找不到，她會到上海、澳門，甚而巴黎搜尋。她親自佈置祭台，她的插花藝術無人能媲美。

最初，聖堂為修女專用。1961 年，「聖瑪加利大堂」（St. Margaret's Church）的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容達榮神父（John Pittavino），要求在主日使用聖堂舉行特別的兒童彌撒，漸漸地，更多的人參與彌撒。後來，在修女及主教的同意下，堂區獲准在聖堂為信眾舉行主日彌撒。聖堂深受堂區歡迎，因堂區空間不足，未能容納數日日漸增多的教友。不過，由於它是一私人小堂，故不能在那兒舉行婚禮。聖堂能容納近乎一千人，故教區及其他天主教機構也常因特別的慶典而借用。

香港人口不斷增多，使醫院的收容量達至極限。九龍聖德肋撒醫院很快也不敷應用。一位法籍護士修女這樣描寫醫院忙碌的一天：

一天，我們接收了四十七名病人。．．．．．他們中間有些很富有，有些卻是很貧窮的；有些是遊客，有些卻來自徙置區！但全都為獲得照顧及治療而來。他們都是病者，健康欠佳，沒有活力！我們費了很多的時間及愛心，陪伴他們，送他們到不同的病房，幫助他們安睡床上，使他們明白他們定會獲得良好及迅速的護理，因為每一位護理員都深切關懷他們，我們將盡力給予他們悉心的照顧，因為這對他們的康復是很重要的。⁴²

不久，醫院準備加建。但 1966 年及 1967 年所發生的暴動使人感到不安，醫院管理層對這計劃也抱有存疑；他們深恐左派份子引發更大的騷亂，或更使人擔憂的，是共產政權的入侵。北座及西座的擴建工程因而被擱置，只進行了很小的維修工程。後來社會慢慢回復正常，擴建工程也隨而正式展開，1971 年醫院新翼落成。開辦一所護士學校是醫院很多醫生不斷的渴

42 Cécilienne Huard, *Give and Take*, No. 2, November 1968, p. 15

望，當時的醫院院長艾蘭德修女（Marie Noel Aranda）開設了一所先創的護士學校，主要收納中三至中五的學生，培訓為助理護士。1969 年 4 月，十二位學護開始了培訓課程；至 1974 年，獲香港護士管理局正式承認為護士

學校，那時最低的收生標準需中五畢業。在護士學校畢業後，他們是登記護士，這有助他們繼續進修，成為註冊護士。至 1998 年，完成兩年制課程的，已有四十八組護士學生了。

孤兒院轉型 為幼兒園

1960 年初，貝克維會長在孤兒院的設施方面，作了顯著的改革。當「社會福利

署」為不同機構培訓員工，而開辦幼

兒護理課程及急救課程時，我們也有三位修女參加。這些進程使孤兒院兒童的存活率得以提升。有能力修讀的孤兒，修女們都鼓勵他們完成中學課程，好使他們離開孤兒院後，能繼續接受職業培訓，有一技之長。有一些長大後結婚，組織自己的家庭。

有一些卻因不平衡的情緒和心理的困擾，雖經修女們多方面的幫助，仍未能投入社會；有很多嘗試出外尋找工作謀生，卻不停地轉職，最後重回孤兒院。這時，修會的兩所醫院成為他們投入社會的踏腳石，他們先在醫院工作，取得經驗及適應後，再重投入社會謀生。



1969 年聖德肋撒醫院護士學校開學

更有一些能與父母相認，領回撫養；有一些則為本港或海外人士所領養，他們被領往美國、英國、澳洲及紐西蘭等地，在疼愛他們的養父母照顧下，開始生命的新一頁。

香港逐漸發展成為經濟穩定的現代大都市，人民的教育水準及生活質素漸漸提高，整個社會的現象不斷改變。生活得到改善，拋棄嬰兒的情況也大為減少。另一社會需要隨而誕生，很多婦女為幫補家計出外工作，留下子女在家中；這類孩子數以千計，四處游蕩，他們居住在擠迫的房間裡，一清早便跑到街上，整天乏人照料，因母親們都往工作去了。因此，日間托兒中心極為需要。

1963 年 2 月，香港省議會申請把孤兒院轉為日間托兒所時，這樣描述：「已沒有孤兒留下了，他們都被送往美國及澳



1964 年 育嬰院照顧在職母親的嬰兒

洲，等待加入領養的家庭。社會福利署很歡迎這個計劃，他們也會來探訪。我們因要提供奶粉，故獲准收取每孩童每月二十元。我們也可給予

免費……不過，我們再不能為嬰兒付洗。我們設法尋找良好的天主教家庭領養我們的孤兒，尤其是政府正建設育嬰院接收被遺棄的嬰兒。」翌年，香港政府在竹園（即現今的黃大仙）為被遺棄的嬰兒開辦了一所「兒童接待所」（Children Reception Centre），所有私立孤兒院都歸社會福利署管轄。為響應父母們因工作而帶來的需求，及更好善用孤兒院的設施，例如操場及花園等，聖保祿育嬰院於 1964 年 9 月，停止接收棄嬰，轉型為一所日間托兒所。由於仍餘下八十九名孤兒及二十名傷殘病弱者，故托兒所命名為「聖保祿孤兒及育嬰院」（St Paul's Orphanage and

Creche)。「育嬰院於上午八時開門，接收嬰兒，他們將給予餵奶、清潔及看顧，下午六時，被接回家中。」

孤兒的人數持續下降，引致孤兒院於十年後的另一改革。1975 年，只有四十二名孤兒需要修女的照顧，對這些孤兒來說，孤兒院就是他們的家，他們唯一熟識的地方，修女們也竭盡所能，繼續照顧他們。1954 至 1961 年間，政府籌劃一龐大的教育方案，創造超過三十萬個新的小學學額；那時，小學教育雖不是免費的，但已有 99.8% 適齡學童入讀小學。⁴³ 家長們非常著意他們的子女能否進入優秀的小學，為此，學前教育成為流行及緊急的需要。

學前教育雖未被劃入正規的教育政策內，但在家長及教師的心中，卻一直是、將來也是，與小學教育緊密並行的。⁴⁴

為配合社會不斷的進步，及對幼兒護理知識不斷提昇的情形下，政府也同時不斷改變社會福利的政策。⁴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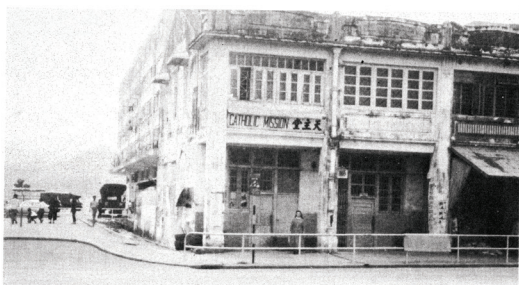
修女決心適應社會的新境況，孤兒院也因此逐漸轉變，1964 年轉為一所日間托兒所，1975 年更轉型為一所幼兒學校，前後歷經一百二十七年的變更。「聖保祿幼兒園」提供全日制的學前教育，準備幼童進入小學教育，仍屬社會福利署管轄。

追溯 1961 年時，貝克維會長於大埔開辦了一會院，名為「天主堂」，屬於教區所有，修女們在那貧困的地區幫助有需要及不幸的人。

43 Wikipedia, "1960s in Hong Ko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60s_in_Hong_Kong

44 Emma Pearson and Nirmala Ra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olicy reform in Hong Kong: challenges in effecting change in practices", CNet Networks,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a3614/is_200601/ai_n17174789

「那半是郊區，半是沿海地區，並排著的舢舨就是居住的地方。修女們首先居住在一曾是店鋪的房間，當『聖母無玷之心堂』（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hurch）落成，神父有了新的居所時，舊



大埔「天主堂」

的神父居所便成了修女的住所。」⁴⁶

修女們猶如始創時的樂維威修女，探訪貧病者。她們帶著和藹的

笑容，慈祥的慰語，探訪居住在木屋區及舢舨裡的貧民。教授他們要理，更開辦了一所細小的診所，名為「海星教理室及診所」（Stella Maris Catechumenate and Dispensary）。

翌年，堂區開辦「聖母聖心小學」（Sacred Heart of Mary Primary School），梁志修修女（Stanislaus Leung）出任校長。前任本堂司鐸、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桑得嵐神父（Narciso Santinon）這樣描述堂區及學校開始的情況。

1962年2月13日，我來到大埔履行司鐸的職務。那時……唯一的通



大埔 一位修女與難民

44 Frederick Cheu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in Hong Ko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Ritsumeikan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Beppu, Oita, Japan: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November 2007, Vol 23), pp. 89–98

46 Bord, 80

路——廣福道，一邊為海旁，另一邊是漁艇及濕漉漉的草地，居民約數萬。在聖堂範圍、聖堂旁及神父宿舍等地，可騰出的空間，是三間形狀不規則的課室及一細小的操場。我就是利用這些地方來開始我們的「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我們獲得教育署的批准，更難得的，是有一位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修女願意出任校長。1962 年 9 月，學校開學，只有十七名一年級學生。在下學期，二年級也開始了，有七位學生。後來，每年增添一新班，直至六年級。

學校首七年是私立小學，學生每月學費八元。教師薪酬微薄；後用社會福利捐贈的麵粉和油製造麵包，每個售賣五仙，藉著所得的微利，才能把教師的薪酬略為提高。但社會福利的捐贈於一九六九年停止，學校也於此時由私校轉為津貼小學。⁴⁷

1971 年，張佩瓊會長在大埔墟買了一所兩層高的房子，修女也由天主堂遷入新址。地下的一層闢作診所，名為「海星診所」（Star of the Sea Clinic）。1975 年 9 月，在眾多需外出工作的母親的懇求下，修女把部份診所地方轉為一日間托兒中心，收納二至四歲的兒童。

香港開埠初期，一直是由私人的慈善機構，推行援助貧苦及有急需服務的工作；至 60 年代末，政府才逐漸肩負為市民提供社會福利服務。隨著私人及政府開辦的診所增多，習慣採用中醫療病的中國人，也漸轉向西醫治病。⁴⁸ 因此，大埔的診所也於 1976 年 4 月結業，整座房舍轉為幼兒園，改名為「天主教聖保祿日間托兒所」，與銅鑼灣的幼兒園相似，同樣為二至六歲的幼兒準備學前教育。

47 Narciso Santinon, "30 Years", *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 No 143, June 1992

48 Robin Gauld and Derek Gould, *The Hong Kong Health Sec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7

由於符合資格的修女不足，1970 年末，兩所小學的行政工作交回教區負責——1976 年退出大埔的聖母聖心小學，1978 年退出堅尼地城的聖嘉祿學校。但在深水埗聖老楞佐堂的牧民工作則繼續至 1979 年，當其中一位修女需要退休，修會在那裡的堂區工作也便結束。陳順金修女（Rosalie Chan）卻仍於每星期日，恆心地由銅鑼灣乘搭巴士往深水埗，探望教友及教授要理，直至 8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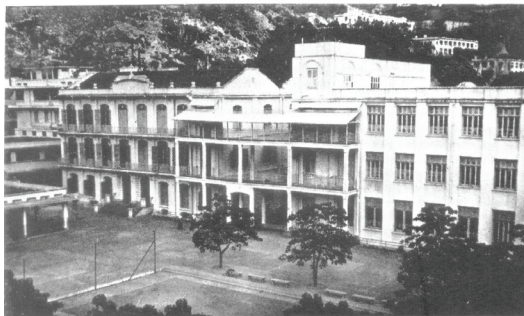
銅鑼灣的變更

貝克維會長一直渴望為修女提供充足的支援，不單為傳教工作，也為修女本身的福利及安康，但這意願卻待至她的繼任人張佩瓊會長才得以實踐。「聖保祿修院」於 1975 年落成，是省會的行政總部，也是年老病弱獲照顧或退休修女的安居之所，更有充足的房間作修女退省之用。這所新建的大樓給予修女更大的空間及寧靜，有助修女投入祈禱的氣氛。修院內有小聖堂，對年長修女的幫助很大，每天的彌撒和早晚祈禱，她們再不需跑往大聖堂，更可免卻風雨天帶來的不便。

多年以來，聖保祿醫院的醫生請求擴充醫院，因太擠迫了；他們也明白，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那是不可能的。四年後，這等待已久的擴建工程終獲羅馬修會總議會的批准。1974 年，聖母產科醫院——醫院的婦產科部門被拆卸，騰出空間建造一幢簇新及現代化的醫院大樓。這是醫院新翼，於 1976 年 9 月 6 日，由港督麥理浩爵士（Murray MacLehose）主持揭幕禮，胡振中主教（John Baptist Wu）祝聖；病床數目由一百八十張激增至四百張。

1976 年，聖保祿學校校長兼校監依撒伯爾·天神修女（Isabel of the Angels）申請並獲准改建校舍。原屬香港棉紡織染公司的兩座舊校舍，是 1899 年的建築物，主要以木建成，現已被白蟻侵蝕，牆壁也出現裂縫。

重建銅鑼灣學校是三項學校重建計劃中的首項，也是張佩瓊會長任內最後批准的工程；繼承她的是高慧儀會長（Lucie Ko），1978 年 2 月，高修女被委任為省會長。新的省會長年輕有為，魄力充沛，她監察這龐大工程的進行，一座現代化的新校舍便在銅鑼灣落成。



於 1979 年被拆卸的舊校舍（20 世紀 50 年代）

1979 年 10 月 16 日，前學校禮堂成為第一座被拆卸的建築物。出席當天拆卸儀式的人士，心中感受良多。港督麥理浩夫人（MacLehose）

主持拆卸儀式，

二十年前，她曾是該校的教師。對那曾在這座超過六十三載歷史的校舍進出的千萬學生眼中，它是神聖摯愛的，它的消失，好像一個朝代的沒落，伴隨著它的歡樂時光，也只好被埋在默默的記憶中了。

1981 年 9 月，新校舍開始啟用，新的使用者——學生與老師們充滿著興奮的心情和期望。修女與學生們儘管對舊校舍仍依依不捨，卻也欣喜能遷進新校舍，因不需再與發聲的地板和帶有裂縫的牆壁為伍了。除了課室外，還有一座樓高三層



於 1951 年建於禮頓道及銅鑼灣道交界處的學校禮堂

的禮堂及一個長二十五公尺的游泳池。

緊接著的是小學部的重建，工程於 1983 年完成，新校舍隨即投入服務。

跟著便是拆卸舊有的孤兒院及幼兒園。新院於 1985 年落成，那是一所七層高的大樓，包括「聖保祿女子宿舍」、聖保祿幼兒園及聖保祿學校的幼稚園部等，幼稚園改名為「聖保祿幼稚園」，各有獨立的校長，兩所學前教育園地都是為學生準備進入小學一年級。聖保祿幼兒園屬社會福利署管轄，是一所四年全日制的學習園地，收錄二至六歲的幼童。聖保祿幼稚園則屬「教育署」管理，是一所三年半日制的學校，收錄三至六歲的兒童。

1986 年，香港政府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建議把兩類學前教育合併。省議會及會院管理層也曾認真考慮其可行性，最後，為符合家長不同的需要，決定維持兩者並行。直至現在，這兩類學前教育仍在香港流行。

兩者的目的.....迥然不同。幼兒中心（日間托兒所）的出現，純粹幫助父母需全日外出工作的家庭，照顧他們的子女.....，幼稚園.....是為了學生應付進入小學的甄別試，家長為幫助子女通過入學試，把子女送進幼稚園.....。雖然這些目標已隨著時間而改變，但兩類學前教育的分別仍存在。⁴⁹

修女在銅鑼灣、跑馬地及大埔所管理的四所學前教育，不論是幼兒園或幼稚園，都達到很高的學前教育水準。跑馬地的幼稚園曾於 1985 年結束，1967 年重開，羅海倫修女（Helena

49 Sylvia Oppen, "Comparison of certain structural and organizational features of Hong Kong kindergartens and nurseries", <http://sunzi.lib.hku.hk/hkjo/view/36/3600007.pdf>

Noronha) 出任校長，她常被暱稱為「海倫姆姆」，她於 1972 年退任。海倫修女在修會內曾肩負多項重要的任務，包括初學導師及省議員。多才多藝的她，從事教育工作的時間雖短，但對學前教育的貢獻卻不少；她富有創意和勇毅，提出兩項反傳統的教學意識：「不要功課，不要考試」，及推行「初級字母教授」(ITA, Initial Teaching Alphabet)；這些都是教授英語的全新模式，在此之前，香港沒有一所幼兒學校作此嘗試。在當時，「初級字母教授」是創舉，卻很成功，深受教師及家長的欣賞和歡迎。

因學校廣受家長愛戴，申請入讀人數眾多。入學申請表格常於指定的日子派發。

1984 年 1 月 28 日，派發表格的日子，一件意想不到的悲慘事發生了！那天，跑馬地聖保祿天主教小學幼稚園部派發入學申請表格，一清早，成人與兒童在跑馬地黃泥涌道列隊等候；瞬息間，一架雙層巴士突衝入人群，引至六人死亡，八人受傷。這悲劇不單震撼了死傷者家人的心靈，對幼稚園的校長和老師也是難以磨滅的創傷。事實上，人們不用列隊等候，因每人都會獲派一份表格。為了減輕死傷者家人的痛苦，他們的子女都被安排入讀銅鑼灣幼稚園，而不在跑馬地幼稚園入學。

60 年代末期，香港進入電腦科技的紀元。最初採用的是私人機構，至 80 年代初期，教育界也開始使用了。跑馬地聖保祿中學首先推行電腦科，是香港教育界電腦教育的先鋒；兩年後，香港教育署才在學校推動電腦的學習。當時聖保祿中學的校長黃金蓮修女 (Margaret Wong)，是熱衷推廣開創新科技的教育者之一。1981 年，她獲得「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 的贊助，設立了學界首個電腦室，為中四學生開設電腦學科。黃修女對推動教育及社會服務的貢獻，獲得讚賞，1997 年，她獲頒發大英帝國勳章；同年，一位聖保祿學校舊生，名導演許鞍華女士 (Ann Hui)，同獲頒發大英帝國勳章 (MBE)，跑馬地聖保祿中學校長黃葉慧瑩女士 (Diana Wong) 也獲頒發

榮譽勳章（Badge of Honour）。⁵⁰ 1973 年，聖保祿學校校長祁玫瑰·瑪利修女（Rose Mary Clifford），於學校服務了十八年，也在獲頒大英帝國勳章（Queen's Honours MBE）之列。另一位多才多藝、在「香港學校音樂節」歷史留下英名的，便是賈美蓮修女（Carmela Santos）。她在聖保祿學校及「藍田聖保祿中學」所培訓的歌詠團，達至很高的水準，在 1950 年至 1980 年間，獲得超卓的聲譽。

成立「聖保祿之友」，是高慧儀修女後期所推動的項目之一。遠在 1916 年，日本省會把修女的親友聚合，組織成一個團體，名為「聖保祿之友」；其他省會未能迅速效法，至六十多年後，加拿大省會才成立自己的小組。在香港，1989 年初，高修女與十三位女士聚會，她們大多是聖保祿機構的成員。她們每年許諾，願意遵守團體的指引及會規。她們每兩個月聚會一次，透過祈禱、分享，加深信仰及對天主的愛，更希望效法聖保祿的精神。她們也組織一些宗教性和服務社區的活動，及參與修女為香港及中國內陸貧困者的外展計劃。

不明朗的明天

修女的宗徒工作一直是獨立的，不是由教區安排；這引來一些本地神職人員的意見，他們感覺修女在牧民工作上與教區的合作不足，當然，這並非事實，因為自 60 年代始，修女便在大埔、堅尼地城、深水埗等地，默默地在堂區服務。無論如何，高修女於 1979 年，決定派遣暫願修女在週末往香港、九龍，甚而遠至新界的多個堂區工作；可惜，十年後，聖召式微，暫願修女人數下降，在週末往堂區協助的工作也減少了。

1989 年，當王德蘭修女被委任為省會長時，便面對這個困難。修女人數雖短缺，她仍讓有意服務堂區的修女，在堂區

50 Josefina Santos, "MBE honour" *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 No 182, February 1997

負起全職牧民的工作。這時，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引起的影響，特別有關神職界及修道團體方面，逐漸浮現出來。1965年大公會議結束，隨後數年，很多天主教信徒都面對極大的危機；全球明顯聖召銳減，神職界及修道團體則出現還俗潮。

在香港，這股衰退的激流，更因 1997 年回歸中國而變得複雜及惡化。自 1984 年 12 月 19 日，簽下「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人便要面對未來的政治動向。自此，事情無論大小、私人性或社會性，都不免與 1997 回歸這問題扯上關係。社會受到極大的震盪，掀起前所未有的移民潮，移民數字高企，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理念也阻遏不了。

本雅明會長在 1859 年面對危機，為修女的將來而作出應變，往澳門及越南尋找新的發展地，這情況再次重演；香港正面臨歷史性的轉捩點，為保障修會的安全，作出了新的措施。1984 年，高會長開始籌劃在澳洲摩士圍（Moss Vale）開辦一所學校。首三位修女於 10 月離港前往新的傳教地。

教會內的改革及香港社會的不穩定，引來混亂不安的情緒，這可從修會聖召及修女數目不斷下降的情形顯現出來。由於加入初學院的人數萎縮，在上水的「聖保祿初學院」也於 1990 年 11 月關閉；五年後才在銅鑼灣重開。

聖召短缺打擊了修女的宗徒工作及傳教活動。因而被關閉的不單是修會的機構，會院團體也未能倖免；一些聖保祿機構的管理層也不能再由修女出任，改由在俗人士擔當，1996 年，聖保祿醫院及聖德肋撒醫院的醫務總監工作，分別由方心讓爵士（Harry Fang）及周寶煌醫生（Christina Chow）接管。方教授在傷殘復康界中享有盛名，是不遺餘力的先驅者；周寶煌醫生則活躍於香港明愛的工作。

不幸被削減的修會服務，包括了跑馬地的幼稚園部、商科部及銅鑼灣的商科部。銅鑼灣聖保祿學校及跑馬地聖保祿中學的商科部，為未能進入大學的中學畢業生提供高等教育，已有

半世紀之久。這兩個享有盛名的商科部，培訓了數以千計能幹、備受讚賞的秘書及辦公室職員，有些更藉此而晉陞管理階層；這成功全賴姬瑪利・聖心修女的努力和功勞。

在各方面衰退的環境下，一個新的服務需求卻逆流誕生。1993 年 1 月，聖保祿學校開辦了「澳州國際書院部」，取錄兩班第七班（Year 7）的學生，共約二十人。這是為幫助我們修會在澳洲摩士圍的「震旦書院」（Aurora College）栽培學生，修女在澳洲開辦了一所只有第十一及十二班的高校。澳州國際部是為移居國外的澳洲籍學生，及準備移民澳洲的香港家庭子弟，故採取了澳洲中學第七至第十班的課程，教師有澳洲籍及華籍。1998 年，校名改為「國際書院部」，課程也加以擴展，包括「國際中學文憑課程」（IGCSE），這是「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局」為中四及中五而設的兩年課程。

喜慶之年

王德蘭省會長任期開始時，香港雖因將回歸中國主權而人心惶惶，對前境感到一片灰暗，但修會在首千禧年最後的十年裡，卻充滿著喜慶歡樂。

1996 年，全球聖保祿修女齊慶祝修會在法國樂維威創會三百週年慶典。在香港整年的慶祝於一月展開，胡振中樞機主教（John Baptist Wu）主持感恩聖祭，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及夫人（Lavender Patten）為「禧年展覽」啟幕。4 月舉辦了三百週年紀念綜藝晚會，蒙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女士（Anson Chan）蒞臨參與，她曾於聖保祿學校修讀中六及中七。六月時，銅鑼灣、跑馬地及藍田三間聖保祿學校的舊生會，籌備了一個慶祝三百週年紀念的晚宴。9 月 12 日為修會抵港紀念日，是日在「聖彌額爾墳場」（St Michael's Cemetery）舉行感恩聖祭，紀念一眾已亡修女，主祭為巴黎外方傳教會香港會長呂德能神父（Emile-Louis Tisserand）。

1998 年，修會慶祝在香港傳教一百五十週年。在 4 月籌備了多項活動，計有感恩聖祭、綜藝晚會及晚宴。修女們喜樂地，感謝天主賜予奉獻的聖召，能在香港以愛心服務一百五十年而感恩。總會長奧安瑪利修女（Anne-Marie Audet）、越南、日本、韓國、泰國及菲律賓等地的省會長，蒞臨分享這慶典的



修會創會三百週年紀念感恩聖祭 胡振中樞機、陳日君主教、湯漢主教及多位神父共祭（1996 年）

喜悅。作為修會的第二個傳教站——香港也是這些地方的發源地。修女多年悉心照顧的孤兒沒有被忘懷，在 6 月為他們安排了感恩聖祭及聚餐，他們攜同家眷近百人出席參與。

1998 年終，舉行了另一大慶典，聖保祿醫院慶祝建院百年誌慶。慶典的開幕禮嘉賓雲集，幸蒙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特首夫人董趙洪聘、胡振中樞機、陳日君主教及湯漢主教的蒞臨。醫院也為醫生及醫務人員們，舉辦了一個名為「邁進新千禧後的治療及護理」科學會議；獲邀的嘉賓講者中，有一位是來自菲律賓聖保祿修會的萬依華修女（Eva Fidela Maamo），她是一位外科醫生，於 1997 年獲頒「麥西西獎」（Magsaysay Award），以表揚她為貧苦者的服務和貢獻。在這次會議中，她的講題是「修道團體在醫療服務的角色」。此外，院方也安排了十二位醫生，為市民大眾舉行免費醫療講座及身體檢查，並推出價值一千元的體檢套票，作為幸運抽獎的獎品。

一百五十年的服務

回顧修女在 1998 年的宗徒工作，發現修女人數雖減少，卻仍能在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及福傳等多個範圍服務市民。修女大部份的愛心工作集中在銅鑼灣，那兒有聖保祿學校的三個部門（小學、中學及國際部），兩所學前教育（聖保祿幼兒園及聖保祿幼稚園），聖保祿醫院及聖保祿女子宿舍（前身是孤兒院，現仍有十一位已高齡的孤兒）。在跑馬地有聖保祿中學及聖保祿天主教小學，在九龍有聖德肋撒醫院及護士學校、藍田聖保祿中學，在大埔則有「天主教聖保祿幼兒園」等。修女們秉承基督的救贖使命，在學校、醫院裡臨在和延續服務，提昇人們的宗教熱忱，不單學生和病人受益，其他職務人員也裨益不淺。滿懷虔誠奉獻的心，她們忠信地培育首四位法國傳教修女在香港土壤所播下的愛德種子。

香港政府曾把聖德肋撒醫院背後，位於露明道的一塊空地給予修會，擴建大樓的工程卻一直延遲，十六年後，這工程才

真正展開。由於當時的經濟資源不足、聖召缺乏等因素，計劃一直擱置，至 1993 年才正式申請使用那塊土地。政府給予的只有兩個選擇：接受或放棄，這使醫院雖面對一很不明朗的未來，也願意接受那風險。修女對香港能跨越 1997 年回歸的挑戰，仍抱有很大的信心，再者，醫院已非常擠迫，全無改善及發展的空間。政府於三年後才正式批准修會的申請，並附帶一條件，在新建的大樓內，須有慈善的服務。

四位法國修女踏足「荒蕪」的香港一百五十年後，仍在香港的外籍傳教修女，只有一位法國及兩位菲律賓籍修女。魯瑪利·奧古斯修女（Marie Auguste Roue）於 1929 年 11 月 20 日抵港，在香港已有六十九年。她對傳教的熱誠，尤其對中國人的愛護，是她恆心堅忍的秘訣。她對首次參加的感恩聖祭，仍有濃烈的惻懷：

那天是獻聖母於主堂紀念日，我懷著極大的喜樂，這是一很清晰的標記，我將偕同聖母在香港奉獻我自己。.....每天在舊的英法學校地下為會院團體奉獻感恩聖祭，銅鑼灣的所有修女在此參與聖祭；基督君王堂剛建成，還未能使用。我們人數眾多，頗擠迫，那時冷氣機仍未出現，這不就是我們全都願意接受的傳教生活嗎？包括一位剛抵步的修女，我們都很快樂！

1991 年，八十八歲的魯修女接受了訪問，有趣地描述一些她在聖德肋撒醫院退休的生活片段。

每天早上八時，即使是星期天，我由一個病房走向另一病房，向每一位病人說：「早晨！」並向他們慰問，臉上掛著的是最美麗的笑容。有些日子，我常常抽空為他們做些微的服務，因為中國籍的病人.....，多不願意為瑣碎的事而按鈴，雖然我已重覆地說那些鈴是為他們而設的。向我說口渴的

人，我為他們送上水，有些則喜歡多一張毛毯，有些卻說棉被太重了……等等……等等。

對那些將要被送往手術室的信徒，……我邀請他們及焦慮的家人與我一同祈禱。若病人願意，我便為他們邀請一位神父或牧師到來。對心裡充滿煩憂的家人，我耐心地聆聽，分擔他們的憂慮，……帶他們往聖堂，……他們可隨意在那兒祈禱。⁵¹

醫院裡有待探訪的病人不下數百，魯修女每天都很多姿多采。

1970 年後仍繼續的工作，1998 年更蓬勃起來。回顧整段悠長的歷史，成就中不免帶著不少的眼淚與辛酸。猶如聖保祿——她們的主保，修女們也經歷了嚴峻的考驗和痛苦：疾病、死亡、誤會、被驅逐的恐懼、破壞等。她們與香港一起，分沾香港的精神，從困難、障礙中站立起來，跨越挑戰。聖保祿的說話是她們最好的寫照：「若是天主偕同我們，誰能反對我們呢？」她們滿懷對天主引領的信賴，邁向未來。天主將指引她們追隨祂的旨意，延續培植先驅修女一百五十年前在香港土壤播種下的仁愛樹苗。

海外的發展

1848 年，在中國眾多的修會中，人數最多的要算是法國傳教士，尤其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會士。自 17 世紀始，他們已是教會在遠東福傳的先驅。⁵² 他們無論走到那一個地方，都邀請聖保祿修女予以協助和服務，因此修會能迅速地在亞洲發展。

51 Josefina Santos, "An Interview", *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 No. 136, July 1991

52 Ryan VII

內心充滿傳揚天主喜訊的熱忱，修女放眼香港以外的世界。早於 1899 年，修女已翻山越海，在中國內陸拓展傳揚福音的工作。可惜的是，全部會院及宗徒工作，都因戰爭及政局的動盪而被迫捨棄。1996 年，與韓國省會合作，嘗試再次進入中國，兩位韓國修女成功進入北京。現在，中國、台灣及澳洲同屬香港省會。

1949 年，期望在較多天主教家庭的澳門找到聖召，及害怕共產勢力進一步控制香港，修女決定在澳門成立一會院。「聖若瑟會院」是一退省及休閒的處所，也是一所孤兒院及難民的藥房。直至 1954 年，一些年輕的修女抵達，在「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的護士學校修讀課程。

其實，這並不是修女第一次嘗試在澳門推進福傳工作，澳門是修女在香港以外的第一個考慮點。修女初抵香港六年後，惡劣的環境及疲勞的工作奪去了兩位修女的生命；那時，第三位院長雷絲·莫斯修女便曾在澳門租賃一房子，那兒因氣候對健康有益而著名，疲累或病後待復原的修女在此休養。1859 年，飽受攻擊的本雅明姆姆害怕修女被逐出香港，被迫跑往澳門，尋找棲身之所。最初開辦的是孤兒院，1864 年，一所免費的寄宿學校也投入服務；很不幸，在澳門的宗徒工作經歷多次的關閉及重開，最後在 1967 年因政治動盪而完全撤離。

本雅明姆姆除了前往澳門，也於 1860 年往赴越南，希望能展開修會羽毛未豐的翅膀，把福傳的工作，帶往香港以外的地方。這真是傳教工作上一項重要的嘗試，奠定了以後更多的努力和成果。越南成為整個修會的福傳樞紐，一批一批的修女被派往各地：1878 年往日本，1888 年往韓國，1898 年往泰國，及 1904 年往菲律賓。而菲律賓的傳教修女，相繼在三大洲開發了不少的傳教站：計有印尼、東帝汶、美國、以色列、秘魯及哥倫比亞；而韓國的修女也於 1996 年在蒙古開始了工作。

修女在香港的成就，不能與香港在修會的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相比。20 世紀初，「這些英勇的修女，全戴著白色的頭巾（coifs），就像軍隊的先鋒。現在，人們可在交趾支那、安南、東京（Tonkin）、中國、日本、韓國、暹羅（Siam）、寮國（Laos）、及菲律賓群島等地看到她們；這支軍隊種下的不是死亡，而是永恆的生命。」

香港是通往各地的樞紐。修女在亞洲的擴展是修會的祝福，因為一百五十年後，大部份的修女已是亞洲人。現在，越南、菲律賓及韓國不斷派出傳教修女，往新的或已建立的傳教地，甚至往法國沙爾德母院。

懷著感恩的心回顧過去，展望將來，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效法她們的前人，繼續散播天國的種子，祈望這些種子茁壯、開花、結出豐盛的果實。聖母常是修女們的典範，特別是她對聖神的順從，對天主完全的交付；共同創會人迪瑪利·安娜姆姆的說話：「把自己獻給天主，為教會的益處及服務人群」，綜合了她的一生，也是修女秉承的精神；這也是修女的神恩，實踐於教導無知者和護理病弱的人身上。

修女的神修是以基督為中心。她們效法聖保祿——她們的主保，與他一起說：「為我，生活原是基督。」（斐 一：21）回溯修會在香港的發展歷程，可以肯定的是，修女所有的成果，是她們以基督為中心的神修的表達，也就是「對基督的摯愛，及對傳佈福音的熱忱」的實踐。

附錄

會院院長

1848-1850	雅芳善・科嘉	Mère Alphonsine Forcade
1850-1854	聖瑪素	Mère Ste Marcelle
1854-1859	雷絲・莫斯	Mère Louise Morse
1859-1861	本雅明・諾爾・古斯	Mère Benjamin le Noel de Grouss *
1861-1863	安博・綺芳	Mère Ambroise Yvon
1863-1872	瑪利・董尼奧	Mère Marie de la Conception Doniau
1872-1891	保祿・十字・庇雅	Mother Paul de la Croix Biard

省會長

1891-1926	菲力斯・佐頓	Mother Félicie Jourdan
1926-1935	瑪加利・聖保祿・盧斯	Marguerite de St Paul Nuss
1935-1947	聖沙勿略・維美斯	Mother St Xavier Vermeersch
1947-1954	保蓮・費格	Mother Pauline Figus
1954-1960	德蘭・聖若瑟・安迪奧	Mère Thérèse de St Joseph Andrieux
1960-1968	納德・貝克維	Mother Bernard de Marie de Broqueville
1969-1978	張佩瓊	Mother Marie Isabelle Tchang
1978-1989	高慧儀	Mother Lucie Marie Ko
1989-2004	王德蘭	Sr Marie Pauline Wong
2004-	何美蘭	Sr Marie Jacqueline Ho

*於 1861 年被委任為首席院長，駐守越南西貢，同時管理越南、香港及澳門。

參考書目

- Bord, Marie Paul. *In China*, trans.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1996.
- Bord, Marie Paul, *Mother Benjamin le Noel de Groussy*, trans.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 Cheung, Frederick,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in Hong Ko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itsumeikan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Vol 23, 2007
- Clarke, NM, *The Governor's daughter takes the veil, Sister Aloysia Emily Bowring, Canossian Daughter of Charity*. Hong Kong: Canossian Missions Historic Archives, 1980.
- Gauld, Robin and Derek Gould, *The Hong Kong health sec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Gheddo, Piero, *Lawrence Bianchi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92.
- Gobillot, Rene, *The Sisters of Saint Paul of Chartres*, trans. Manila, 1956.
- Granelli, A, "The Bumper Harvest", in *Catholic Hong Kong, A Hundred Years of Missionary Activity*. Hong Kong: Catholic Press Bureau, 1958.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inutes of the Meeting." 7 October 1909. <http://www.legco.gov.hk/1909/h091007.pdf>.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inutes of the Meeting." 3 December 1914, <http://www.legco.gov.hk/1914/h141203.pdf>
-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ast and present*. Hong Kong: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1993.
- Huard, Cecilienne. *Give and Take*, No. 2, November 1968
- Le Pichon, Alain. *Bethanie and Nazareth -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2006.
- Opper, Sylvia, "Comparison of certain structural and organisational features of Hong Kong kindergartens and nurseries", <http://sunzi.lib.hku.hk/hkjo/view/36/3600007.pdf>
- Pearson, Emma and Nirmala Ra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olicy reform in Hong Kong: challenges in effecting change in practices", Cnet Networks,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a3614/is_200601/ai_n17174789
- Reuter, James B, *For the young at heart: highligh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Manila, 1965.
- Ryan, Thomas F. (1959),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 Santinon, Narciso. "30 years." *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 No. 143, June 1992.
- Santos, Josefina. "An interview." *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 No. 139, October 1991.
- Santos, Josefina. "MBE honour." *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 No 182, February 1997.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Hong Kong: 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 Chateaudun: Societe Francaise de Phototypie, 1910.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From the notes of Louis David).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trans. 1986.

Smith, Carl T., *A sense of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Ticozzi, Sergio,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1997.

Vaudon, Jea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trans. Hong Kong: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1979.

2.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 (1860–2000)

詹秀璉

引言

這份文件，主要是記敘嘉諾撒仁愛會自 1860 年 4 月至 2000 年間的內部歷史片段。由於篇幅所限，作者無意聲稱它為一份相稱的、有系統的、包攬無遺，足以包羅修會於那個時段在香港以及鄰近地方的一切生活片段及服務細節。這文件記載的，其實都是源自修會會祖，聖女瑪大肋納嘉諾撒的一顆熾熱的福傳心。她回應了耶穌派遣門徒「到.....去宣告『天國已近』」。要治癒病人，復活死人，潔淨癩病人，驅逐魔鬼.....等」號召，並憑着特恩給予她的直覺，成了一顆指導嘉諾撒會工作取向的明星，使駐港澳會省八百多位嘉諾撒修女，因了服務上主，為最有需要的人獻出了自己的性命。

文件的上半部，詳細敘述了首批修女們 1860 年 4 月抵達香港，及如何迅速地發展會務，和怎樣跟本港宗座監牧區緊密合作的事跡；亦提及一批國籍嘉諾撒會第三會會士，即其後成為香港教區第一個國籍修會——耶穌寶血女修會的修女。至於曾參與策劃，以及促修女從意大利東來成事，甚或親自上路，和初期在港作過一定貢獻的主要人物，例如派遣了 16 批修女東來的嘉姆姆（Luigia Grassi），顧姆姆（Lucia Cupis），施姆姆（Maria Stella），第四任港督的千金寶寧姆姆（Aloysia Bowring），甘姆姆（Claudia Compagnotti），以及盧姆姆（M. Teodora Lucian）等，本文都作了適切的介紹。至論在瘟疫、

日軍佔港、神州大陸政權轉移所引發的難民潮期間，作過一定程度貢獻的修女，在本文內也佔了相當的篇幅。

本文重要的資料的來源，多來自香港、澳門、意大利、神州大陸的修會歷史檔案室。於此，謹向曾悉心把文獻從意文譯成英文的前香港修會歷史檔案保管人李修女（Lina Riva）；本會香港歷史三卷著作的作者黎修女（Ida Sala）致以衷心謝意。

聖嘉諾撒瑪大肋納——修會神恩及服務

會祖聖嘉諾撒瑪大肋納（Maddalena di Canossa, 1774–1835）生於意大利韋羅娜（Verona）。當時的歐洲，在拿破崙的霸權統治下，民不聊生，意大利亦不能幸免。瑪大肋納目睹無數貧苦受壓迫者，和一群群的街童，在他們的身上，她看見了被釘十字架的基督。她對主的熱忱，驅使她在 1808 年在韋羅娜開始各項愛德服務，並讓他們認識和愛慕耶穌。她最大的渴望，就是將自己化成微塵，散佈在世界每一角落，來宣講並實現基督的愛。

她十七歲時決定回應天主的召叫，曾兩度入聖衣會（當時的韋羅娜只有隱修院）。可是她對窮苦大眾深厚的愛，使她深感不安。後來她遇上開明的李伯納（L.

Libera）神父，引導她以熱切的祈禱和在生活中與主同行，天主的旨意會逐漸地向她顯示出來。1808 年，她成立了在韋羅娜第一間宗徒服務的女修會。



行動的默觀者與時並進

瑪大肋納的靈修精髓，來自她不斷默觀被釘的基督，祂那無條件、忠信、寬恕和共融的愛。同樣地，她默觀佇立在十字架旁的痛苦聖母，那份勇敢、堅持來分受基督的苦難和參與救贖工程的精神。瑪大肋納讓基督和瑪利亞的精神擁有她，轉化她，催迫她以愛去回應。她常訓勉姊妹們：「我們工作時，是個使徒；但我們的心，是個默觀者。」她是個活在當下的人，常叮囑她的姊妹們要以敏銳的觸覺留意時代的徵兆，以最恰當的方式來回應當時當地人的需要。

外方傳教

1860 年，瑪大肋納的夢想終於實現了。第一批修女開始東來，以香港為傳教站。此後，香港成為往外方傳教的基地：1869 年開拓神州大陸，1874 年拓澳門；亞洲其他國家有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和日本；大洋洲有帝汶和澳洲。

一個修會的故事 (1860–2000)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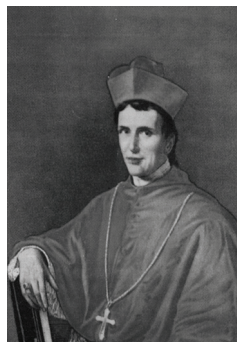
嘉諾撒會在香港的起源，有點跟聖經記載的信德小種子相似；它發自一位



嘉姆姆 M. Luigia Grassi

¹ 節錄 Sr. Ida Sala fdcc 一份未經發佈的手稿。

謙虛的意籍修女，嘉姆姆（M. Luigia Grassi, 1811–1888）²的內心。這位修女 1811 年生於米蘭，1888 年 11 月終於帕維亞（Pavia）。她深信派修女到遠方福傳，讓人人都認識和愛慕天主，絕對符合會祖的心願；所以當昔日的傳教會（San Calocera）、（即現在的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創辦人（Angelo Ramazzotti 神父），激勵她該慎重考慮派修女東來香港，她堅定信心採取了行動。



Angelo Ramazzotti 神父

當時的香港宗座監牧盎神父（Luigi Ambrosi, 1829–1968），本身是傳信會的傳教士，就促成了這項計劃的實現。

2 M. Luigia Grassi：公元 1811 年 9 月 7 日，M. Luigia Grassi 誕生在米蘭的一個平凡的勞工家庭中，1822 年，她開始就讀於堂區附近的嘉諾撒學校，並在每星期參加主日學。有一天，她的老師 M. Margherita Crespi 在她的習作簿上寫著：「Luigia，天主希望你成為一位聖人！」這句話留給她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亦成為她一生的操練。當嘉諾撒瑪大肋納到訪米蘭時，她也能多次與她見面。在她二十二歲那年，聽到了上主的召喚，要求加入嘉諾撒大家庭，當她還是保守生時，她完成了師範的學業，成為一位合資格的老師。在 1834 年進了初學院，但在 1835 年 9 月 15 日當她領會衣時，會祖瑪大肋納已回歸天國了。她在 1836 年 9 月 15 日發了初愿，她的暫愿生活是在學校裡渡過的。1847 年，修會在 Porta Comasina 新開設了一所會院，她便被選為該會院的院長。1850 年她被調派到 Via della Chiusa 做副院長，就在這裡，她認識了 Fr. Angelo Ramazzotti，後來，這位神父被升為帕維亞（Pavia）的主教，邀請修女們在那裡開辦一所女子學校。1852 年，一些嘉諾撒修女從米蘭被派到帕維亞工作，而 Grassi 就當院長。一天晚上，她夢見了被釘的基督站在她面前，她問道：「主，為了安慰你，我能做什麼呢？」祂回答說：「Luigia，輪到你了，輪到你了...」後來，這夢真的變成了事實。Grassi 跟隨了會祖嘉諾撒瑪大肋納先知性的洞察能力，回應了當時威尼斯總主教的緊急邀請，派遣了第一批嘉諾撒修女去香港，於是，1860 年 2 月 27 日，六位嘉諾撒先驅者，由 Grassi 陪同著，親自送她們到了威尼斯，向香港出發。自此以後，直到她於 1888 年 11 月 11 日逝世那年，她親自準備了十八隊修女，共五十五人，並派遣她們去傳教，她亦因此而被稱為「嘉諾撒傳教士之母」。她的其中一位傳記作者講及有關她的事蹟時曾說「她是一位很明智，有清徹及沉著的頭腦；她很真誠、充滿熱忱、慷慨及愛心；她有天賦的審慎力，正義感，剛毅及節制的德能；特別是，她充滿信、望、愛三德，對這一切上主的恩賜，她都都以最大的忠信及堅持不懈的心態去作出回應。

他是韋羅娜（Verona）地方人，認識當地的嘉諾撒會修女，他的兩位年輕助手，更朝夕盼望着修女們能到香港來協助教育西歐及中國女青年的工作。

在香港方面，也有極其珍貴的助手；其中之一是第四任港督寶寧（Bowring, 1792–1872）爵士的千金（Emily Aloysia）。

³寶寧小姐 1833 年生於倫敦，父親卸任回英國時，她選擇獨自留港，其後更加入了嘉諾撒會做修女，為港人服務，最後於 1870 年終於香港。除了



施姆姆



顧姆姆

1860 年的香港



寶寧小姐

3 Sr. Emily Aloysia Bowring: 是香港第四任港督約翰寶靈爵士的女兒，亦是嘉諾撒修女們在香港的第一位初學生；當六位嘉諾撒修女們從意大利到達香港的第一個晚上，她已要求加入她們的傳教行列，當然，修女們很歡迎她，認為她是上主賜給傳教修女們的一份很大的禮物。由於她所受的教育比較高，是所有來華傳福音及為香港人服務的外籍修女們所不及的，所以後來成為堅道意大利修院學校的第一任校長（現在的嘉諾撒聖心學校的前身）。其實，她在靈性上已準備妥當，因為她為了跟隨聖召，曾經歷了很多的艱苦及考驗；她的父親是位很虔誠的英國 Unitarian Christian Church 的信徒，她違背了父親的意願而改信了天主教，當她的父親要回國時，她卻獨自留在香港，並在修女們剛到達兩星期之後，便加入了她們的行列，只有憑著上主的恩寵，她才能適應、接納並堅持不懈，盡忠職守。Emily 生長在一個富有殖民地特色的高尚家庭裡，習慣糾纏於社交活動及知識分子的精練中，她一定完全了解到，如果要加入一個只有六位意大利修女的團體，過著非常貧窮的生活，且要承擔有損健康的相當沉重的使徒工作是怎麼一回事！她雖然沒有學過意大利文而修女們也不懂英文，但她本身的學歷及風土習慣各方面她都佔了優勢，但是，有一樣因素可以幫助她克服一切的障礙，使她勇往直前：那就是她對上主的愛及對天父兒女的關懷。為修女們，這肯定是天主與她們同在並降福她們未來工作的證據。Emily Bowring 是上主從永恒已為修女們準備好的關懷及愛的標記。若 Emily Bowring 沒有在 1860 年與六位嘉諾撒先驅們相遇，那麼，嘉諾撒修女們的傳教歷史就會有不同的寫法了。

寶寧小姐外，還有兩位來自澳門的中國女青年給修會；她們是譚氏堂姊妹；一位叫瑪大肋納，另一位叫亞納。修女們到港不到一個月所開辦的中、英文學校，便是由這三位助手協助開辦的；至於葡文學校，則由幾位熱心的葡籍女士協助開辦起來。這些幼小的苗圃，就是今日港澳兩地嘉諾撒會教育事業的前身。

最先接受挑戰的是六位從意大利遠道東來的年青修女，她們從威尼斯宗主教⁴手中，接受了頒給傳教士的十字架之後，便從威尼斯起程，向着各人心有所繫的香港進發，並於 1860 年 4 月 12 日抵達。可惜當時連落腳的地方也沒有即時找到；這又使我想起了一段聖經故事——基督降生的遭遇。不過，天主的眷顧很快就出現了，一個慷慨的葡籍家族 D'Almada e Castro，把一幢座落堅道的樓房捐贈給修會，修女們便隨即在那裡展開了培育青年，照顧孤兒和服務貧困等慈善工作。也就是會祖希望她們從事的工作。修女們的抵達，確實預示着修會要做點大事的開端，可是修會須經過 106 年時光，才達致有如今天的會省。

八位首席長上

自 1860 至 1937 年，修會由首席長上（Primary Superiors）管轄；她們主管着堅道的會院；那也是修會的搖籃。這段時間一共產生了八位首席長上，她們都是能幹，有堅定信德，專心一意為天主效力的女性，對修會早期的發跡各有貢獻。現將她們的簡介和在位的重要建樹臚列於後：

4 Cagliaroli, Pietro – Vita di Mons. Angelo Ramazzotti p.249: “這是我最後的祝福。去罷！我親愛的修女們，在聽命的指引下開始這航程吧。耶穌是你們的舵手，聖神會以祂的氣息駕駛你們心靈的艦。祂會在成聖的道路上指引你們，帶領你們與祂密切地結合並引領你們歸向你們的永恒的終向 – 天堂。再見罷！再見罷！”他答應默默地在心中繼續為她們祈禱，並依依不捨地含著淚離去了。

(一) 顧姆姆 Lucia Cupis (任期 1860 - 1869) ⁵

她是首任首席長上，於 1820 年生於意大利布雷西亞 (Brescia)，1869 年終於香港。任期內有以下重要建樹：

1860 年率領首批修女從意大利東來香港福傳及服務。

1861 年開始策劃擴建堅道總修院，讓修會在福傳，青年培育、醫療工作，照顧孤寡，扶持老弱，協助貧困各方面，都能提供更多空間，使更多人受惠。

1869 年在灣仔創設總部以外另一間會院，是她意象中的嘉諾撒會的仁愛村——進教園 (St. Francis Yard)，在那紅燈區服務誤入歧途的少女。

1869 年應方濟各神父邀請進駐神州大陸湖北省的漢口市，隨即展開照顧孤兒，服務老弱的工作，並於這中國的第一站奠下日後轉到其他省份工作的基石。

1911 年在漢口創辦了當時首屈一指的聖若瑟英文女子中學。

新中國成立以後，最後一批在中國服務的修女於 1952 年也遭政府飭令離境，最後兩項服務由此結束。

她於 1869 年 10 月 10 日結束了正值壯年的生命。

5 顧姆姆是傳教區修院的第一任院長。她雖然天生有點含蓄，膽小，體弱，但與她一起生活的人都認為她很虔誠、明智、富有審慎的見識及純樸的思想。尤其是她心胸廣闊，是一位熱衷感應並擁有敏銳分辨能力的策劃者。她的「座右銘」是：「主，因你的名，我會放下我的網。」

(二) 施姆姆 Maria Stella (任期 1869–1895)

她是第二任首席長上，1832 年生於意大利米蘭，1917 年終於香港。她是首批來港的先鋒修女之一；能幹，有進取心，是一位具備聖德的領袖。

1876 年在澳門創建仁愛之家 “Casa De Beneficencia” 這個家，見證了一百年在它內做過的愛德工作，今天已不存在並結束了。

1877 年，她遣派了一批修女到中國福建省廈門去工作，這項服務，做了十二個年頭，也結束了。

1878 年，有位葡籍主教請她派修女到帝汶 (Timor) 去服務；一如澳門，地門教區也是隸屬葡國管轄的。

1889 年，該葡籍主教再邀請她派修女到印度的柯枝 (Cochin)。

1891 年，修女們進駐到印度另一個城市貝爾高姆 (Belgaum)。同年又應米蘭外方傳教會邀請到中國陝西去。

1892 年又繼續到另一個地方阿勒皮 (Alleppey) 工作。同年再應米蘭外方傳教會之邀到中國河南省南面服務，這項服務於中國新政權執政前一年結束，而陝西省的服務則在 1952 年結束。

1894 年，施姆姆 (Maria Stella) 任內到香港以外所建的會院，便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地劃上了句號。

可是她在港九各地還有以下的建樹，值得一提的是：

1880 年，她在香島必列者士街為歐亞的混血貧童開設了一所兒童之家，這項服務已在 1912 年結束。

1887 年，她又在九龍設置了一所為修女及宿生的休憩住所，取名厄瑪烏（Emmaus），這於 1900 年更改了用途，變為聖瑪利學校；並在修院內撥地開設診所。

1890 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在九龍紅磡，她也開辦了一所聖德學校；這所學校在大戰期間曾中斷了一段時間，其後，又於 1945 年，為了居民的急需而復開，不過就須暫時和九龍城聖家學校共用校舍，在下午上課，直至 1958 年才遷回紅磡，並易名為天神嘉諾撒學校。

1891 年，她在筲箕灣創建的聖若瑟修院，於 1941 至 45 年香港淪陷期間，曾遭日軍徵用為軍營；戰後，在將用地歸還修會前的 1945 至 51 年間，英兵亦繼日軍之後將它佔用。1981 年，這修院連同其內的學校終於遷離舊址，搬到今天的鰂魚涌，取名（香港）嘉諾撒中、小學。

1893 年，有位熱心人士將薄扶林凌月仙捐贈讓修會展開服務。修女便把它用作孤兒院及嬰兒醫院，其後，更加設了一所幼稚園。

這也是事施姆姆任期內創設的最後一項服務。她於 1895 年卸任時，備受市民愛戴，人們都尊稱她為遠東的嘉諾撒會之母。

(三) 甘姆姆 (Claudia Compagnotti, 任期 1895–1900)

甘姆姆於前任卸任的同年接任成為第三任首席長上，於 1839 年生於意大利帕維亞 (Pavia)，1900 年終於香港。

1896 年，她先在九龍油麻地開辦了一所專為中國兒童的學校，不過，這學校在 1923 年就結束了。

1897 年又在香港仔設立了聖家修院，讓修女照顧當地的漁民，其後又為他們的子女創辦了一所學校，是今天嘉諾撒培德學校的前身。至於嘉諾撒培德書院，是 1975 年才開辦的。

1900 年，她經手將厄瑪烏 (Emmaus) 休憩所改為聖瑪利學校，今日取名為嘉諾撒聖瑪利中、小學。

(四) 盧姆姆 (Teodora [Dorina] Lucian, 任期 1900–1909)

盧姆姆 1855 年生於意大利 Trentino，1915 年終於香港。

1901 年她在澳門的氹仔開辦了一間小學，這間學校其後於 1908 年便停辦了。

1904 年她又在澳門路環開設了一間學校和診所，由於當地土匪猖獗，所以只開設了四年就結束了。在 1952 年路環的修院又重開起來，修女先後在那裡設有孤兒院、診所和聖母聖心學校；今天，修女全情投入服務島上的老人家，院舍瑪大肋納護老院 (Villa Maddalena) 內共有百多位貧困的長者，她們都得到修女們耐心及細心的照顧。

1905 年她開始擴建那直至 70 年代末歷任長上都以此為總部的堅道修院，可惜她只能及時於 1907 年 10 月 24 日見到聖堂揭幕，而無緣看見院內新校

舍的落成，那座校舍就是其後所熟知的嘉諾撒聖心書院。該年回到香港，她在堅道開辦了一間商科學校，這就是今天嘉諾撒聖心商學院的前身。同年，她抱着一股傳教士的熱誠，遣派了些修女到寶安縣的南頭去，在那裡為棄嬰服務並開設了一所診所。

1907 年又在內地汕尾開設了一間孤兒院，專收容遭人遺棄的嬰孩，其內還包括一間診所。同年在澳門望廈開辦的聖方濟各修院，修女們服務的對象也包括着長者、病者和孤兒。

(五) 馬姆姆 (Teresa Martinoia, 任期 1909–1918)

她 1909 年接任成為第五任首席長上，就任一年後，修會慶祝到港金禧，她於 1918 年任滿。

(六) 裴姆姆 (Teresa Pera, 任期 1918–1924)

她擁有卓越的人格，有修養和深度，兼且極具聖德，靈修生活也堅固，是一名出色的女性和天生的領袖。她用整個修道生活的歲月去默想師主篇中有關本性和超性的事理。1923 年，修會在英國 Welwyn Garden City 開辦了一所專為培育到外邦傳教年青修女的會院，她於是被派到那兒去協助工作。那座會院已於 1982 年關閉了。

(七) 彭姆姆 (Regina Pedrotti, 任期 1924–1930)

接下來的六年，她上任成為第七位首席長上。

1926 年，她經手在中國寶安地區的惠州，開設了一間聖若瑟醫院，這醫院在 1941 年遭戰火炸毀。當時在醫院內有數百居民在裏面避難，院長貝姆姆 (Maria Biffi) 與部份的人，也一併罹難。

1929年，香港舊山頂道的嘉諾撒醫院開幕；1917年堅道會院內的小醫院就是在這時遷搬上去的。後來，嘉諾撒醫院也避不過二次大戰的危運，遭戰火摧毀了。直到1960年，修會才將它重建起來。1991年，修會又將醫院的管理權轉讓給香港明愛機構；這醫院今天的新名稱為嘉諾撒醫院（香港明愛）。

(八) 馬姆姆 (Teresa Martinoia, 任期 1930–1937)

1930年，馬姆姆被重選為首席長上，在她第二任期內處理了的特別事項有：

1932年，她在港島摩星嶺開辦了一所專為失明的成年人士而設的院舍，是為摩星嶺弱視者之家。這院舍在1984年改建成香港嘉諾撒修會在港的第一間退省所。

六位會區長上

1937年，嘉諾撒修會於全球大會通過將各地的會院連結，並且直接隸屬羅馬。自此，意大利境外地區的長上，亦隨着地區的轉變（Mission→Region），由首席長上改變為會區長上（Regional Superior）。

(一) 巴姆姆 (Vincenzina Bellocchio, 任期 1937–1947)

是第一任會區長上。由於她代表總會長管轄的地方除了港九還有澳門、帝汶、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神州大陸多個地方，所以人也稱她為會長代表（Delegate）。這個新職位，使她的職責更為繁重。雖則她職務繁重，但在二次大戰前，依舊能繼續發展會務。

1931年，她在澳門興辦了聖心中、小英文學校；粵華女中、小中文學校。

1937 年應意大利帕爾馬 (Parma) 沙勿略修會邀請到河南省西部開設會院。

1940 年，她在短短數週內，在九龍城設聖家修院，在那兒除了開辦聖家小學外，修女們還附帶主理牧靈工作：諸如慕道班、主日學、家訪等。

1941 年，意大利加入戰陣，組成德、意、日協約國攻擊中、英、美；香港因為是英國殖民地，所以也遭牽連；日軍於 1941 年入侵香港，香港淪陷。1945 年 8 月戰事結束，香港才慢慢地、痛苦地回復了原狀。其時，她代表管轄的各地區院長又紛紛群集回來。

(二) 羅姆姆 (Antonietta Novello, 任期 1947–1953)

戰後她上任時，正值國內牽起了政變的風雲，部份在當地服務的修女也奉命向本港遷移或被驅逐出境。她就乘着多了人手的契機，策劃進一步把修會的服務，推展到更多地區去。

1949 年她在澳洲布里斯班 (Brisbane) 開設了一座會院，展示了她的傳教士心火。

1950 年，又把會務推展到日本去，在那兒創下第一間嘉諾撒會院。使修院的服務由近東延展至遠東去。

1953 年，因她當選為修會總會長，便結束了會長代表的身份，離開香港，前往羅馬修會總會院去。

(三) 賈姆姆 (Vittoria Garrè, 任期 1953–1960)

教廷大使鑑於菲律賓當地的人民，雖則幾乎舉國都信奉天主教，可是信仰卻非常薄弱。因此，催請她考慮到那兒設立會院，服務人群，因此，她上任的同年，亦即：

1953 年，便派遣修女到那兒去服務。

1960 年，慶祝修會東到香港來一百週年。

(四) 高姆姆 (Maria Cosma, 任期 1960–1961)

這位可敬的代表會長在任不足兩年，由於身患癌病，任內不治逝世。

(五) 雷姆姆 (Angelina Rivetta, 任期 1961–1965)

這第五任代表會長，也是由於身體健康問題，上任後不久，又卸任了。

(六) 賈姆姆 (Vittoria Garrè, 任期 1965–1966)

原先已出任過第三屆會長代表，其後，她離開了香港一段時間，如今又獲重選擔任原職；可是不久，香港由會區 (Regional) 改為會省 (Province)，因此，她便順理成章地由最後一任(第六任) 會長代表轉為致命者之后會省 (Regina Martyrum Province) 的第一任省會長。

八位會省會長

本港的會省自 1966 年至現今，一共有八位省會長，依次如下：

- (一) 賈姆姆 Vittoria Garre (1966–1973)
- (二) 文修女 Liliana Medina (1973–1979)
- (三) 謝理達修女 Enrica Cereda (1979–1985)
- (四) 李永援修女 Marie Remedios (1985–1991)
- (五) 鄭文玲修女 Dorothy Cheng (1991–1997)
- (六) 王小球修女 Goretti Wong S.K. (1997–2003)
- (七) 關小梅修女 Anna Maria Kwan (2003–2009)
- (八) 陳心意修女 Cynthia Chan (2009–)

第一部份：1860 – 1910

1. 修女們抵港的第一年 1860：

1860 年是嘉諾撒會的一個極重要年份。她們於該年 4 月 12 日抵港時，對本土的教育政策一無所知，對語言亦一竅不通，居然能於抵港後不到一個月內，興辦起英文、葡文、中文學校來，真是不可思議。其實，這完全是拜寶寧女士能人所不能之賜。英文學校的辦學由她解決了。葡文學校也因為獲得善心葡籍女士義助，於 5 月 1 日與英文學校一同興辦起來；幾天後，中文學校也在兩位國籍女青年譚氏堂姊妹努力下，於 5 月 10 日誕生了，取名培貞學校。其後，施姆姆（Maria Stella）和修女（Giuseppina Testera）被安排協助校務，名義上是協助管理英文學校，不過實質上是跟寶寧女士這位年青專家取經。而對學習語文較感興趣的 Giovanna Scotti 則被安排跟那些葡籍女士學習，結果，她不負眾望，進步神速。

從顧姆姆（Cupis）5 月 14 日寄往帕維亞（Pavia）的信中，我們略知一些當時修會在香港工作的點滴。信中說：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共有 32 名學生，其中英文部佔 10 名，其餘多為葡文部的，因為學生多半是葡籍人士的子女，是從澳門移居香港的。此外，也有愛爾蘭士兵的子弟。學校每天從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上課；因為修女也須要有自己的學習時間。施姆姆（Maria Stella）在 1860 年 6 月 5 日寫給嘉姆姆（Grassi）的信給了我們較詳盡的宗徒工作實況，她說：學生的數目不斷增加，這意味着我們必須具備更豐富的學識……有些女童在課後回校學習鋼琴，有些學習圖畫……神父們就不停詢問我們是否懂這懂那；家長一方面樂意把兒女託我們培育，另一方面，又諸多要求……你看，單是這幾個月，我們已預知還有不少新的宗徒工作等着我們去做，因此，對新血的需求也更形迫切。待我們有了新的院舍之後，我們就得開辦一所分開大、小孤兒的孤兒院；一所安置老人家的院舍，神父更表明她們的

數目會相當龐大；此外，又需要為一些比較富裕家庭的女青年開設一所寄宿學校。日校生也得按照年齡和國籍依次分流。最後，修女們還須要探訪醫院病人和做家訪。．．．．．親愛的姆姆，請從速為我們加添人手，而且須要準備些博學和有知識的，因為在這裡，我們什麼都須要懂得一點點，而且還須要體格強健，性情樂觀的，才能挨受得住，否則，很易因氣候影響而陷於自我中心。

在當日，香港會有人竟將嬰兒當貨物交易，為免她們落入心懷不軌者手中，修女都會嘗試把她們買回來。⁶

進入神州大陸福傳的計劃，我們較早時已經提過；所以當那方濟各會余作賓（Vaudagna， 1831–1904））神父準備前往時，施姆姆（Stella）隨即於 1860 年 9 月 24 日寫了一封信給施姆姆（Grassi）說：「這位神父比我們早到大陸去，是為了替我們修會做好福傳工作的準備。」其實，這到神州大陸福傳的意念，我們剛抵達香港時就已潛伏，只是到現在才得以實現。

2. 修會在香港最關鍵的六年 1861–1867：

由於會務發展迅速，顧姆姆（Cupis）不得不懇請帕維亞（Pavia）方面加派人手，並在該如何選拔適當人選方面提供了意見。她在 1861 年 1 月 11 日寫給嘉姆姆（Grassi）的信上說：「這裡天氣炎熱，最易刺激人的情緒，即使是性情溫純又善良的人，稍一不慎，也會挨受不住，一個不具備易於適應，善於妥協的修女，就會在有意無意之間操縱身邊的人。因此，性格太強硬的人，不適宜在這裡生活。神父們也見過這種情況，甚至也見過修女因此而導致精神崩潰。」

6 「上星期我們買了一位女嬰，我們以會祖瑪大肋納的名字給她受了洗，同時，為她請了一位奶媽，但一日之後她已死了。你知道嗎，我們每日都在門前發現「出售」的嬰兒，我們不能買她們，因為我們已沒有地方可以安置她們了，但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可以做到了。（施姆姆寄給嘉姆姆 24.09.1860）

當時，那位對未來懷有非凡抱負的宗座監牧，亟望着在 1860 年初能進行建設「嘉諾撒村」的工程。顧姆姆在一封未具日期，但相信是在這期間寄往帕維亞（Pavia）的信，滙報了有關這項工程進度的細節，信中說：「將來我們這幢龐大的建築物完竣時，又不知有多少工作等着我們了。不過，有時想起由於欠缺地方，迫於要拒絕一些求助的人，的確使人難受。因此，最親愛的姆姆，求求你，趕快給我們加派一些修女來，並且仍要繼續準備更多人，來協助新會院落成後所有的工作。」此外，她在 1861 年初寫給 Lucca 的一封信又說：「可敬的雷納（P. Reina, 1825-1861）神父所要求的三位修女委實不足夠，我們需要更多人手，試想，除了已開辦的三間日校，我們還要開辦寄宿學校、以及現已存在，但仍須擴充的孤兒院、成人中心、幼稚園等等。此外，還有醫院等工作，一切一切，都在等着我們去做。又由於女教友們，一般都極喜歡聽天主聖言，所以每週的教理班及每月的退省，都須要安排較大的課室。總之，每項活動都須要有活動的場地。」

學校辦得成功，並且不斷擴充已是不爭的事；1861 年 8 月，香港天天日報刊登了一篇不尋常的文章，那位未有署名的作者先狠狠地批評本地教育政策要不得，不合條理，把教育弄得一團糟；之後，又對教會辦學給予了最高評價，表示教會走對了路。他說：「要是你造訪過那所在堅道的天主教學校，你必會由衷地給予她們應得的讚譽。在同一篇文章裡，他並提及修女們在其他方面的教育工作。他說：例如修女們在堅道為那些不同社會階層，但卻有意從事教育的女青年開辦的寄宿學校，所提供的教育都非常全面。還有，修女們為教會和社會在那裡悉心培育聽障女孩子。在那裡，甚至假如主婦們希望從日常工作中抽身，去聽幾天道理，尋求多少鼓勵，以便能以更好的狀態面對責任，修院也會為她們妥善作準備等等。」

女棄嬰不斷向我們堆來，有時甚至在深夜，門鐘也會突然響起，我們就知道又有熱心的國籍教友，把垂死的棄嬰給我們抱來。

1862 年，高神父（G. Raimondi, 1827-1894）為了教務要返意國，顧姆姆便託他把一份抵港兩年以來的簡報帶回去，以下是該匯報的片段：「我們抵港後 20 天左右，於 5 月 1 日開辦了兩間女校，一英一葡，並且數天內錄取到不少學生。同月十日，中文學校也相繼誕生了；命名培貞；可惜不久，我們就迫於把後者改建為孤兒院學校，因為要投宿的貧苦女孩實在太多了；不但要給她們提供教育，就連起居飲食都須要一一為她們解決。然而，其中也不乏令人鼓舞的事例：有兩姊妹的父親，便是為了信仰而犧牲的致命者。這是一項預兆，暗示着我們的工作會有進展。第一個入住新院舍的，是一名八歲的視障童，她遭雙親遺棄而成了這裡的第一個孤兒，隨着她進來的，也一一受到修女的歡迎。此外，成人慕道班也大有可為，參加者多半是已婚婦女和寡婦，她們就是喜歡信天主。比較突出的一位是一名遭丈夫遺棄的重病患者，她由一位善心人士引見，我們都視她為修會在港工作的基石，是天主給我們差遣的。⁷失足少女也被納入我們當時的工作範疇；我們剛才提及的那塊基石，如今已成了這些少女的福傳者。有位女青年由於生活放蕩，生命垂危。經過那已成了福傳者的那塊基石多番開解和勸勉，她終於洗心革面，領洗後，成了基督羊棧的一隻乖巧好羊兒。」顧姆姆又記敘了另一個被聖寵救贖了的年青媽媽：她十七歲，竟然向修女兜售自己的女嬰，最後也終於及時悔悟過來。⁸

7 「在她病危時，我們根據信仰的規條給她講了道，但當她病癒之後，我們建議她在一個教友家庭內工作，看看她是否真心願意接受信仰並活出她所信的...最後經過一切的考核，她終於領了洗，並喜悅地漸漸亦領受了其他的聖事.....」

8 修女們給她講述了上主的仁慈，並勸她保留那嬰兒。經歷了很長時間與惡寵抗衡之後，那女子終於回頭了，並開始學道理。但是，在這一段與光抗衡

在此不能不提的，是由顧姆姆一手培育，被她親切地稱為「我們摯愛第三會姊妹」的第三會會員；她們既謙遜，又忠誠而有效地協助修會去完成在欠缺中國語文能力的情況下，無法完成的工作。顧姆姆常說：「學習這語文，亟須時間訓練，我們工作多，人手少，要同時掌握多種語言絕非易事，我們須要這些人在教區協助工作。」其後，她獲得了宗座監牧的盎神父支持和批准，成立在修會屬下的第三會會員並悉心培育他們。

1863 / 4 年可視為我們服務對象的激增年。「我們的工作在上主的祝福下不斷成長。逢星期四，都會有葡文和中文的婦孺教理班，每月又會有專為她們而舉辦的退省，而且數目不斷上升，最重要的，還是見到她們參加了這些活動之後，在行為和道德方面有顯著的進步。至論孩子們，她們再不是一兩個地，而是一打打地擁到這裡來。8 月 10 日聖老楞佐瞻禮，就有十七位小童在我們的小堂領洗。」以上是 1863 年 8 月顧姆姆在信上告訴米蘭外方傳教會會士 **Marioni** 的。她又說：「同年，我們那兩間外語學校，都已有穩固的基礎，今年夏季，學生們將第一次參加公開考試；中文學校——孤兒院，也在發展中，目前有四十名孤兒，如果我們大開門戶，相信半小時內，就會出現二百名之多。可惜，由於能力所限，任憑我們怎樣渴望這都沒有可能。」到了九月，孤兒的數目又增加了，計有中國兒童 48 名，葡籍兒童 25 名；另有 10 名寄宿生。目前我們並無意增添其他服務項目，只是將現有的好好地發展，並把基礎穩固起來就是了。

顧姆姆說：「孤兒的流動性很大，就如現在剛好有 40 名離開了，又立即收回了 40 名，部份是因為去世升天離開的，

的時間內，這年輕的母親已向誘惑投降，把嬰孩賣給外教人的家庭。當修女們建議她時，她曾經想把嬰孩領回，但她必須面對嚴峻的考驗，條件就是她必須重返她以前的罪惡生活。雖然她很心痛，但她拒絕了，並把她的嬰孩完全交托在仁慈的上主手中，希望上主照顧她。後來她說：「那嬰孩患了重病，那外教家庭再不想收留她了，於是他們把那嬰孩交還給她的母親，而這困境得以完全解決了。嬰孩受到很好的照顧，在領洗後才去逝。

但也有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可以獨立工作，面對生活，出外去為一些好教友家庭當家務助理的，還有部份找到了適合的對象而結了婚的。為此種種，都使我們開心不已，並且激勵我們盼望去幫助更多更需要的人。」

「至於我們那小小的醫院所收容的，都是一些最窮困，連基本需要都缺乏的女士，當然有部份接受醫療以後，可以痊癒出院，不過大部份最終都離世升天，可幸的是，人人都領受了聖洗。」顧姆姆又說：「病人中有一位俗稱『妹仔』的少女，被主人虐待毒打，送院時，見到她腿上那灌滿膿的恐怖傷口，真是令人作嘔。可是有位滿懷愛心的英籍醫生（William Kane）卻嘗試悉心醫治她，可惜不幸地，幾個月後，她終於因肺病不治。可是我們相信，天主的這個忍耐力非凡的孩子，早就被她所受的這許多病苦煉淨了。」最後一個較特別的病例，也是使顧姆姆最難堪的病例，要算是那位十五歲的癲病女孩，由於我們沒有將她與其他病人分隔的設施，我們迫於拒絕了她。

我們跟教區的關係不錯。⁹

「在 1865 年裡，共有 434 名嬰兒接受了洗禮，不過，能夠生還的只佔少數，大概是人們太遲把她們送到這裡來吧，救也救不了。……孤兒院今年幾乎住滿 100 人，華裔人士佔 58 名，其餘的 41 名，不是葡籍便是歐亞混血兒，當然其他人種也有。這許多人的教育和起居飲食，全部都落在我們修女身上，況且，她們幾乎全部都是從危機中營救出來的，所以特別須要人家的愛和關注。」

9 這宗座監牧為我們……「他真是像一位父親一樣，他以最大的關愛預先為我們準備好一切，當我們向他要求任何東西時，他總不會讓我們失望的。」至於有關「我們最佳的長上」高神父（Raimondi），他「經常準備好去滿足我們會院裡每一個成員無論是普通的或是特別的需要，他亦不知疲倦地提供給我們靈性上的需求。為這最大的恩惠，我們是不能不向他表達我們最衷心的感激。」（顧姆姆寫給 Marinoni 29.10.1864）

1865年3月15日，施姆姆(Stella)在她寫給嘉姆姆(Grassi)的信上說：「教理班是我負責的工作範疇，目前共有16至18人參加。我的另一項工作是看顧嬰孩和小童，她們的實際數目，有時連我也弄不清（暫時有120名是寄居在奶媽家裡哺養的），其餘18名則從早到晚寸步不離的纏着我們不放，這裡我無意抱怨，只是說明少一點點心血也不成吧了。」

1866年我們的學生人數又增加了，除了走讀生以外，在修院裡也有大約200名宿生。

1867年是修會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在那一年，修會要為打開神州大陸的門戶，進入中國湖北省設立會院做籌備工作，並準備於1868年在那兒照顧被棄的嬰孩及提供其他服務。其時，修會也會考慮從堅道兼顧及到灣仔工作，因為那裡不但是最窮困的地域，臭名遠播，黃毒兼備；因此，修女極希望能到那兒去，好能為窮困的一群建造一道護土牆。這個計劃其後終於在兩年之後得以實現。

耶穌會賴詒恩神父(Thomas Ryan, 1889–1971)在他的「一個百週年的故事」中，也提及修女們在灣仔區開設了一所專為從不羈生活裡營救出來的少女所設的「瑪大肋納院」，以及她們在聖方濟各堂附近的公教醫院為患病的婦女服務的事。這些工作，雖然在開始時不大顯眼，但假以時日，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事實上，那項足以令失足少女重獲身心健康的工作，一直維持到1911年，直至鑑於當時從事中英文學校教育比其他服務有更迫切需要時才告結束。

3. 建立新會院及顧姆姆的去世 1868–1869：

1868 年 8 月，顧姆姆應漢口主教方濟各會士 Zanolli 蒙席的邀請，帶着幾位修女到那邊去工作；例如照顧棄嬰，服務病弱等等。……顧姆姆還得親自監管首座建築物的工程。當她經



灣仔會院的院友

過七個月的辛勞，於 1869 年 3 月 4 日，回港處理籌備工作為在灣仔區開設的另一間會院時，已顯得筋疲力竭。

1869 年 5 月 8 日，當她完成了設立新會院的工作之後，又急於為鞏固中國北方的修女們的生力軍而操勞。其時，她的體力已透支了，有些肩負不了這超重擔子的跡象，身子也一天比一天弱，終於 1869 年 10 月 10 日與世長辭。她逝世前一天，還堅持要起床探望在修院的醫院裡留醫的兩名病人（一名少婦和另一位英籍女士），這也是她所做的最後一件愛德工作。可能過度勞累，她終於陷入昏迷狀態，最後，結束了還不到 50 歲的壽命；其中在港度過了九年零六個月。

4. 澳門設立會院 1869–1876：

1869 年 12 月，施姆姆正式被委為顧姆姆的繼任人。說實話，承接一位備受愛戴及尊崇者的職位，確實不易。不但如此，在施姆姆上任不久，另一宗不幸的事更接踵而來：寶靈姆姆於 1870 年 8 月因急病去世。修會和學校的工作頓時大成問題。

「1870 年是疾病特別多的一個年頭」¹⁰，久旱無雨。香港於 8 月 2 日被宣佈為霍亂疫埠；可幸只是短短十七天，之後又被宣稱為無疫埠，寶寧姆姆在 8 月 20 日過身也沒有被證實死於霍亂。在八月第一週，她只是感到有些不適並有點疲倦，而且微微發熱，須要臥床休息，但情況不算嚴重。8 月 18 日她還可以起床，並於傍晚和我們一起跪着念晚禱。但到了 8 月 19 日，體溫突然上升，修女們心情都異常沉重，知道她大限不遠了。當時，她雖然有點神智不清，但仍能舉心向主，她希望領聖體。欣然地領受了病人傅油聖事之後，又向修女道謝、感激大家對她的殷勤照顧，之後，「老師」之心頓發，向她心愛的學生們遺下了一道訊息說：「告訴學生們只該為主工作，唯獨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可憐的孩子，特別是在這充滿謬誤和邪惡的地方，她們可須走過多少歪曲的路啊！……」本地的群眾和新聞界都為寶寧姆姆之死作出了深切的哀悼。香港年報在 1870 年 8 月 21 日有以下的報導：「亡者寶寧姆姆，遠在父親前港督寶靈爵士於 1859 年卸任返國時已堅決留港服務市民，其後一直在教會(修會)為市民服務；她不但知名度高，而且深受市民愛戴」。¹¹又說：「寶寧姆姆的墓是嘉諾撒會修女們在跑馬地天主教墳場所掘的第六個墳墓。她們六位都死於青年，都是香港這殖民地當時的特殊天氣的犧牲品」。

十月期間，應傳教區神父們的邀請，開辦了一間專為西歐男童而設的學校，由於必須以英葡兩種語文為教學媒介，又須要派兩位修女投入協辦。施姆姆在 1872 年 11 月 25 日致嘉姆姆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要往澳門去設立會院的事，¹²那裡雖然已有一所為法國修女們開辦的學校，可是還有很多窮人仍是未有機會上學。除了學校之外，當然還有其他等着我們去做的

10 HOE, Susanna, op. cit., p. 103。

11 Clarke, Nora 以及 Rivo, Lino, op. cit., p. 206。

12 主要的原因是，葡萄牙人比英國人早在四百年前已定居於澳門，並把天主教帶到那裡。在澳門，很多的青年人極需要接受教育。

事。「我們已找到了一間房屋，並已騰出部份地方，讓身無一物的飢民做安身之所；又把自己的寢室供堂區作廚房之用，我們就搬到樓下的一個相似洞穴多於房間的又潮濕又幽暗的小室。」修會的日誌繼續說：「基於需求，我們一時都變成了護士；每天總有兩位修女馬不停蹄地提着載滿麵包、藥物和其他醫療用品或日常用品的籃子，前去最急需這些東西的地方。那裡有需要食物、有需要醫藥、衣物和其他用品，還有一些動彈不得，發着高燒躺臥在床榻上的病人，個個都是不能自助、亟須協助的一群。文德泉（Texeira, 1912–2003）神父在他的澳門教區歷史冊上告訴我們：「由於修女的會院過於狹窄，Medeiros 神父，在 Rua Horta do Companlia 租得一座比原先那幢好一點點的房舍。稍後，修女們將會在聖老楞座堂為國籍女青年開辦另一所專為國籍女青年的學校。每逢主日，修女便會在那裡跟來自各階層的人士講解福音，恭念玫瑰經，就這樣協助大家聖化主的日子。在那稱為仁慈堂的院舍，本來已收容了 23 名國籍孤兒，部份還是視障的，可是修女仍被要求多收一些，於是房舍又不敷應用了。澳門主教 Medeiros 再購入一座更大的，那就是仁慈堂（Casa de Beneficencia）。Medeiros 主教亦隨即從澳門到香港來，向會長代表 Stella 提請派修女到澳門建立會院的要求。就這樣，於 1876 年，澳門張開了雙臂，熱烈地歡迎這批到天父家去工作的葡萄園新工人。在同一年，無論國籍或葡籍孤兒，都收容了不少。

5. 邁向銀禧紀念，開創遠大將來 1877–1886：

當年教育工作是最需要人手的一環。教會向政府註冊辦學和申請資助，都必須符合申請條件才能獲批，而當時政府所訂定的條件是越來越苛刻。嘉諾撒會的辦學質素是全港數一數二的，這點香港的家長們很快便留意到。不過，該會最終的辦學目的，仍是提高學生的宗教和道德方面的教育。1873 年，香港政府實施學校資助計劃，不論學校屬何宗教，一律可獲資助。最初，資助僅限於官立學校。這措施自然遭到香港的聖公

會教會及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教育界領袖反對。當時的宗座代牧高主教 (Timoleone Raimondi) 為天主教學校據理力爭。結果，雙方同意達成一個折衷辦法，就是容許學校教授宗教科目，但卻只准在課餘時間進行。基督教辦的學校接受了這折衷辦法，但高主教則堅決反對，因為他認為「宗教科目根本就是羅馬天主教教會學校課程的一部份，而非附帶科目，所以不能分割開來。」他知道他所說的話必會受到重視，因為當時羅馬天主教教會已在香港開辦了幾所非常優秀的學校，例如聖救世主書院和意大利嬰堂女校，香港政府不想失去這些好學校。況且，教會已安排了在 1875 年從愛爾蘭派遣一些基督學校修士會 (Brothers of Christian Schools) 來港，這麼一來，宗座代牧的立場便更加堅決，因為那些修士們的態度也很強硬。他們聲言除非學校獲准把宗教科編入課程內，否則便取消行程，不會來港。這就是當時天主教教會的立場，當然也是嘉諾撒會修女和正在聖救世主書院工作的傳教士的立場。

由於天主教教會對香港的教育界有實際貢獻，因此香港政府不想跟這個力量強大的教會作對。高主教就是看穿了這點，所以立定決心繼續爭取下去，不達目的，不肯罷休。可是，以當時情況來說，繼續把宗教科列入學校課程之內，就等如自動放棄政府在 1873 年撥給各校、任由各校自由運用的「補助金」(“Grant”)。接下來的幾年，教會都放棄了這筆政府資助金。因為原則比金錢更重要，所以教會的立場十分堅定。後來，問題解決了。1877 年，香港有一位新任港督。他是一名愛爾蘭天主教教徒。他就是軒尼詩爵士 (John Pope Hennessy)。他到任兩年後，便於 1879 年把這個殖民地的教育制度重新改革，准許所有宗派的學校在課堂裏教授宗教科。結果，全部教會學校都符合資格取得資助。當時，三間嘉諾撒會學校，即意大利嬰堂女校，灣仔的聖方濟各書院以及「必列者士街學校」，都於 1883 年參加了該項計劃，獲得了補助或「資助金」。之後，位於九龍半島、在 1887 年成立的新修院，即後來的聖瑪利，也獲得這筆資助。(聖瑪利學校是於 1900 年才正式成立

的。)而「必列者士街學校」則最終因學校停辦而沒有繼續得到資助。

因此，自 1883 年開始，嘉諾撒會學校便可以教授宗教科，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即是說學校需要更多修女和學校必須遵守政府定下的辦學標準，因為政府會定期派員來校巡查。這麼一來，教會便要加強培訓一些修女來應付需要，因此，派遣修女來港前，便需要更長時間籌備。修會紀事冊（The House Chronicle）亦有提及施姆姆（Stella）參加「補助計劃」的這個重要決定。¹³既然學校接受這項計劃，便意味着學生將要參加公開考試、政府將會定期派員來校巡查、校內設備亦要達到一定水平以符合政府的較高要求。

1883 年，聖母無原罪瞻禮當日，一座新的主教座堂在忌連拿利（Glencaly）奠基興建，今天該堂仍在原址屹立着。¹⁴雖然高主教認為該堂位置「稍嫌偏僻，距離城市太遠」，但修女們居住的修院，就在就近的堅道上，這一來便方便了修女們，讓她們可以更多參與教區的活動和服務。

譚女士（Philomena）是 1873 年加入的另一位第三會成員。她在 1875 年去世，死時才 38 歲。鑒於霍亂猖獗，修女們被迫把孩童們從灣仔搬往九龍半島住了個多月，而原本住在堅道的，便轉送到薄扶林、凌月仙。澳門所受到的影響，比香港更

13 「有人建議院長修女把意大利修院學校納入『政府補助』的方案去運作，因為這樣既可以激勵學生，而且也可以避免我們必須教天主教要理時可能會面對的困難，因為這計劃允許學校有完全的自由去傳教，所以我們很樂意地接納這方案。自此之後，我們發現不但學生的人數增加了，而且，亦加強了競爭力及仿效力，因此，我們覺得決定採取這方案的益處很多，希望上主會繼續在教育事業方面更祝福我們，扶持我們。」

14 舊的已被 1878 年的大火所毀滅，幸好藉著各人慷慨的捐助，又在威靈頓街重建起來，由高主教主持祝聖禮儀，當時的港督及其夫人亦接納了羅馬天主教會的邀請，前來觀禮。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而且各人的思想都漸漸地改變了。

大。仁慈堂的修女和 18 名院友（全部約為 100 人）染上瘧疾，受了數月之苦，幸而沒有人因染病逝世。

同年 12 月，她在一封信中這樣報告說：「聖方濟各的修女們使得整所院校擠滿了人，大家濟濟一堂，好不熱鬧，見到他們真是高興！貧苦兒童學校錄取了不下 80 名學童。最近他們參加了公開考試（因為學校接受了資助的關係），全部成績都很好。視學官還說要在報告中寫入嘉許語呢！大後天起，12 月 9 日和 10 日，我們修院這兒會舉行公開考試。聖誕後，我們定要着手為聖方濟各學校展開加建工程，因為視學官說這兒地方太少了……」¹⁵必列者士街有一所開辦了 6 年的歐亞裔童學校，學生多為男性。就在這條街道上，教會加建一所中文學校，由兩名修士督工。

施姆姆（Stella）很快便留意到即使在九龍區，教會也有很多擴展的機會，所以她決定在該處的油麻地區租下一間小屋子，讓兩名修女和一名第三會會員長期居住。她們的主要任務是照顧那些前來求取醫葯和精神安慰的人。紀事報（The Chronicle）說在短短的 6 個月內，已有超過 300 名「病人」前來這間小小的修院向修女求助和索取葯物；這間小修院已變成了配葯處。修女們都工作得十分辛苦，修院內連一間像樣的聖堂都欠奉，經濟上又得不到援助，即使有亦很少。可是，修女們沒有放棄。最後，一所附屬於修院、專為該區的漁民子弟而辦的中文學校終於落成了，而那幾位對自己的信仰始終如一的第三會會員則獲派全權負責這所學校的運作。

位於九龍的聖瑪利，是從一間平平無奇的居所發展而成的。那時，法律禁止在港島城中飼養豬隻、雞隻等動物；可是，對一個擁有數百名住友的大型社群來說，這些動物非養不可。修女們認為必須繼續飼養牠們，以提供糧食給孤兒、宿友和她們自己，因此決定把所有人搬往九龍半島，因為施姆姆

15 Stella 給 Vercellini 1885 年 12 月 7 日的信。

(Stella) 在九龍區購買了一片海傍地，給修女和女孩子們用來度假休息、恢復元氣。他們在那兒租了一間小屋子，又加建了住房，整套建築群合稱為厄瑪烏分院。¹⁶事實上，這個地點註定了他日必會成為信眾進行教會活動的中心，就如所有的分院一樣，只不過這地點最終變成的是一所學校，是一所專門錄取中國籍和葡國籍女童的學校。該校位於尖沙咀，很多葡萄牙人聚居此處。

6. 過度期的艱辛歲月 1888–1890：

1888 年 1 月的香港，天花肆虐，很多家庭受到牽連，患病人數非常之多。修院的修女和院友暫時沒有遭到波及，但各人難免會擔心假如疫症一旦入侵修院的話，那時怎辦。當時，必列者士街的修女學校已有多名歐亞裔學童病倒了。

1 月的疫情慢慢減退。可是，疫症卻在 6 月捲土重來，而且來勢洶洶。當時霍亂瘋狂肆虐。有家庭的孩童都交回父母照顧，其餘的便分散到別處暫住，這兒幾個、那兒幾個的。7 月尾，香港宣佈不再是疫埠；可是，這時卻輪到澳門受襲，因為有些帝汶士兵受到感染，把疫症帶來。澳門政府要求修女們前往當地，為澳門居民提供服務，（以前亦曾經作過這樣的安排）。兩名偉大的修女自告奮勇，甘願負起此責。她們被調派到一所名為 Villa Flora 的臨時醫院。為了照顧病人，她們毫無保留的付出。文德泉神父曾經在他的著作《澳門的歷史》中，向這兩位無私奉獻的仁愛女修會修女致意。書中說：「澳督高若瑟（Firmino Jose' da Costa）在一封日期為 1888 年 9 月 12 日的信中，就兩名嘉諾撒會修女（Teresina Lucian 和 Giovanna Biancardi）在臨時醫院“Villa Flora”充當護士照顧懷疑染上霍亂症的病人的偉大行為，予以讚許。」

16 在 1886 年 3 月 8 日寫給 M. Vercellini 的信中曾經提到這間房子「是在對岸的」是用來給修女，孤兒及寄宿生們用來休息和療養的。與此同時，在這裡也飼養了豬、牛等牲畜。

從會長代表的 1888 年度週年通告中，可以知道很多關於當年香港信徒生活的細節，並且可以看得出當年若要把使命全部完成，確實需要大量勞工。當時實在嚴重缺乏人手，無法應付香港、澳門……等地的主教所提出的要求。

當時嘉諾撒會需要照顧 224 名孤兒（114 名葡籍，110 名中國籍）、40 名幼稚園學生、45 名宿友、約 100 名外託給其他護士照顧的嬰兒，還有 60 位正在慕道的婦女。所以，即使不計那些外託嬰兒和院內的修女，單是住友已達 369 人之多！而且這只是香港島總院的人數，還未計算其他五所位於灣仔、澳門、九龍半島和中國大陸（即：廈門和漢口）的呢！

7. 在香港進一步擴展 1891–1895：

腺鼠疫在香港 1894, 1898–1914：

1891：於紅磡和筲箕灣成立了兩個分院

1891：香港疫症肆虐，奪去兩名嘉諾撒會修女性命，一位是本地聖召的 Angelica Baretto 修女，60 歲；另一位是 Tommasia Ricci 修女，38 歲。染病的修女共有 14 人。

修女們的忙碌生活和遇到的困難：

施姆姆（Maria Stella）鑒於意大利方面有意見認為香港的修女們寫信太少，身為會長代表的她於是便解釋箇中原因說：「她們太忙碌了！住友達 500 人之多，這還未計算日校的學生呢！她們實在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在深夜時分還忍着睏倦、拖着疲乏身軀、在這樣的天氣下寫信……這兒酷熱難當，使人疲累不堪。」

1881 年 5 月，施姆姆離開香港展開帝汶福傳工作，並探訪帝汶的修女。她的探訪令這班身在偏遠基地的修女們高興得很。¹⁷

聖嬰會 1893：

這年的年尾，施姆姆寫信往法國，向傳信會在里昂（Lyon）支部的負責人，詳細地報告修女們為了棄嬰收養服務，所做的工作。

「.....就在今年，我們照顧的嬰孩便有 970 個。全賴聖嬰會虔誠信徒的慷慨佈施，這些嬰孩才得以獲救。¹⁸她們到了指定年齡，便要轉往孤兒院居住，在那兒學習縫紉和其他手藝。就這樣，經過家庭生活的訓練之後，通常她們都會在 18 歲離開。大致上，這些女孩子們的表現，都能附合修女們的期望。而那些結了婚的，一般都表現得令翁姑一家滿意。」能夠做到這樣，一點也不容易，因為在那個年代的中式家庭社會裏，一切都是以家姑的意見為依歸的。

施姆姆解釋說，警察在晚上巡更時，經常遇見婦女售賣孩子，大多是女嬰，售價只是幾塊錢。見到這情形，警察通常都會自己把孩子要了，然後帶往修院去。女囚犯也會被勸喻把嬰孩交給修女照顧，不要殺害她們。

香港首位宗座代牧高主教，曾經接受政府批出一間位於西環的屋以及與其相連的一片地作慈善用途。1893 年，他把這

17 「但回來時卻不是平坦的航程.....四天之久我都發著高燒，而且沒有一點藥可以幫助我.....除此以外，我們也遇上了颱風，船隨時會下沉的，我們險些就送命了！我把我的靈魂交托了給天主，並擁抱著那些因聽命而陪我的同伴們，為了聽命及愛德，我們都已準備好為主致命了！幸好，這次又沒事了！」

18 「其中大部份都去了天堂，其餘的就留在育嬰堂或幼稚園的課室裡，整天都讓修女們十分的忙碌...比較大的孩子們都十分健康，並且充滿活力。她們已學會了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念經了。」

些物業讓給嘉諾撒修女們使用，好使她們可以開展棄嬰收養工作；在這充滿不幸故事的城西一帶，真的有此需要。而且，這些物業還可以用來開辦一所中文學校和一所寄宿學校給十歲以下歐裔男童就讀。

「很快這地方眾人皆知：大量嬰孩開始陸續來到，而其中很多都是『過客』性質，轉瞬便上了天堂，讓出他們的小床位給輪候名單上正在望穿秋水的其他來客。這項慈善服務，基本上完全免費，並且維持了五十年。期間一共收養過 84,150 名嬰兒。此外，還有五萬人曾經前往相連的一所配藥處治病。

19

紀事報（The House Chronicle）還有補充資料，就是在過去的五十年期間，曾有 107,183 人接受洗禮。醫院的辦事人員，一直都是嘉諾撒會的成員；而資金的來源，則是嘉諾撒會旗下的其他業務所得的收益，以及香港和海外善心人士的慷慨捐助。」中國郵報那篇專欄的作者，在向那些義務為嬰兒醫院提供寶貴服務的醫生表示感激之後，再補充說：「很多嬰孩都能康復過來，返回家裏居住，又或者獲得一些背景不錯的中國家庭收養，把她們視作子女看待，而非女奴。」

女囚犯的牧靈工作：

嘉諾撒修女自 1893 年開始便往女監獄探訪，因為監獄就在奧卑利街，與堅道總部非常接近，根本就在隔鄰。不少女囚犯在出獄後，仍到修院去，繼續與這班在精神和心靈上都一直支持着她們重過新生的修女們保持聯系。

19 在 1943 年 1 月 29 日的中國郵報 (China Mail)。

香港的疫症：

引自：香港嘉諾撒會福傳工作的 “Fragments from Canossian Missions Hong Kong” Part II

施姆姆向帕維亞（Pavia）報告說：「……可怕消息，災難在眼前——香港爆發了腺鼠疫……以前從未見過。它稱為『腺鼠疫』。廣州現時一片混亂。有消息說死亡人數不下七萬五千人！現在，這疫症正在蹂躪香港。偌大的臨時棚屋在遠離民居的西環海旁豎立起來。政府指揮其中一個衛生局醫生。東華醫院負責收容病人。有些棚屋則由一些不贊同西方醫理的中國人指揮。

「現在，高主教和他的代表認為如果我們也能夠向這些苦難中的人伸出援手，救回一些性命（人在這時一般都願意接受別人幫忙），對這殖民地會有啟發作用。另一原因就是由中國人掌管的服務始終不夠穩妥，因為他們可以隨時跑回大陸鄉間。其實，大部份店舖都已關門；城中的富裕人家都全部沒有傭人可用；港口沒有船隻，因為沒有苦力搬運貨物。「我們接獲指令公開祈禱——在主教座堂、在這修院、在街上等地方祈禱。除了這些憂慮之外，我們還提心吊膽，擔心疫症會入侵我們的院舍，因為院舍內老老嫩嫩的住着這麼多人。按上級指示，六名修女被選派往協助疫症病人。她們日夜輪流值班，每班 3 人，每次值班 12 小時，由上午 6 時至下午 6 時，當值時間表由大家協商決定。她們不會返回修院，免得傳染。主教神父們讓我們借用一間屋，就在聖安多尼教堂附近，在西環，在往醫院的半途中。她們就輪流在那兒休息。我們送食物給她們，從修院送往醫院和那間屋。

疫症從其他病源來：

1894 年（5 月至 8 月）的疫症，在 1898 年重來，然後斷斷續續，直至 1914 年……

以下是當時的香港總督羅便臣爵士（William Robinson）
1894 年 6 月 16 日向倫敦匯報腺鼠疫情況時所提交的 官方總
督報告 內容片段：－

截至目前為止的死亡人數：1,900

離港人數約：80,000

受感染樓宇已封閉，採取必需措施

商業及其他行業嚴重受損

職位空缺很少

需要財政協助

「腺鼠疫在中國幾處不同地方爆發。這兒則在
五月初、於數月的乾旱天氣之後開始發生鼠疫。我
們趕忙以臨時醫院應急——在堅尼地城一艘船上、
在堅尼地城一間玻璃工場內、又把病人送往由中國
醫生駐診的東華醫院。人們由於迷信的關係，都不
信任西醫。醫院每天接收 60 至 80 人。24 小時內，
死亡人數已達 109.從受感染樓宇撤出的人，數
目約 7,000。政府搭建棚屋，又租用空置樓宇，以便
隔離病人進行觀察。超過 350 幢樓宇被認定為不適
宜居住，需要封閉。大約 8 萬人離境前往其他省縣，
還帶同一些染上疫症的親人，但親人卻在途中死
去.他們只求能夠離去，任何交通工具都願意
嘗試.」

那份報告還有很長的篇幅。不過上文相信已經足以說出香
港這殖民地慘受腺鼠疫折磨四個月的官方說法.這報告
內的數字還只是疫症最初一個半月的數字。

高主教向米蘭的上級說：「我們損失了 30 多名
天主教徒，而他們的子女，要不是跟修女們一起，

便是已經落入壞人手中：怎樣才能幫助他們、拯救他們？我們的孤兒院已經全部超額，我們的錢箱空空如也——簡直不名一文。……我們真的進入了非常黑暗的時期。超過 8 萬個中國人離開香港避難；街道上沒有行人，水靜鵝飛。……慣常聽到的消息都離不開這句：『你知道嗎？某某人死了呀。……』死亡的人不計其數。有人組織了一個會，到處登門造訪；他們經常見到三、四條屍體交疊地上。……我們密密祈禱，並於主教座堂舉行一連三天的嚴肅祈禱儀式。我最欣賞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的傳教士和嘉諾撒修女很快便在和主教（Luigi Piazzoli, 1845 - 1904）帶領之下，到疫症病人床邊，為他們服務了數小時。這批心地善良的嘉諾撒修女在短短兩個月內便為 50 名異教徒施了洗，得到很大滿足感。這些異教徒獲主赦免罪過，真是天主的重大恩典。那六位負責照顧垂死病人的修女，還要把死者屍體洗淨和入棺，從朝到晚都呼吸着惡臭空氣。」²⁰

歷史背景資料——節錄自意大利修院金禧紀念備忘錄

1896 年。……疫症帶走了我們其中兩人：Elisa Guidali 修女和 Luigia Frigerio 修女；前者死於 4 月 29 日，終年 28 歲；後者死於 5 月 2 日，終年 52 歲。²¹

20 1894 年刊登於“Le Missioni Cattoliche”的傳教士來信——關於腺鼠疫。

21 復活節通告：由 Sr. Claudia Compagnotti F.D.C.C. 發出 7-5-1896 (H.K.)
親愛的姊妹們：

我們給在意大利嘉諾撒會院的復活節通告中，懇請她們熱切祈禱，求主保護我們的團體，以及那很多在我們同一屋簷下生活的人，免受那可怕瘟疫的襲擊，因它正在破損這多災多難的香港。

但是，上主的計劃實在神妙莫測，帶來我們劇痛的順從和接受。這幾天的苦爵就是我們兩位親愛的姊妹，因染上恐怖的瘟疫而離開了我們，她們就是 Sr.

為她祈禱的人多得很；這麼多的禱告，即使未能為她求得康復，亦肯定可以為她求得恩典，令她不致於好像多數的其他腺鼠疫病人一樣精神恍惚、胡言亂語。她曾經自言自語，以流利中文說一些關於她的孩子們的事；不過，經別人喚醒後，她神志便回復正常，並且在其他修女帶領下一同祈禱。死後她葬在堅尼地城的小山丘上，這兒也正是我們的偉大第三會成員入土為安之處；她也是這次疫症的犧牲者。

就在當晚，我們親愛的 *M. Luigia Frigerio* (52)，上級的得力助手，院舍的中流砥柱，一位天使般的修女，開始了她的痛苦經歷。她發高燒兼嘔吐。醫生帶同另一位同事來看她，經過細心檢查後，認為沒有疫症病徵，但她舌頭的顏色卻使人起疑。可憐的她由於病徵不明朗，並沒有被送往檢疫醫院（“*lazaretto*”）。我們惟有把她送到一般公立醫院（*Civil Hospital*）去，直至她的病情得到明確診斷為止。

「在醫院，數小時後，他們發覺她出現了這致命傳染病的病徵。三日後，她便與世長辭了。」²²

Eliza Guidali，年 28 歲，於 4 月 29 日逝世。另一位是 *Sr. Luigia Frigerio*，52 歲於同年 5 月 2 日逝世。

第一位因實踐仁愛而犧牲了生命的修女，相信是因抱着一個已染有瘟疫的嬰兒接受洗禮，那嬰兒很快便死去了，這慷慨大方的修女，繼續在自己的工作崗位，就是照顧「聖嬰院」的兒童工作。幾天後，突發高燒，經醫生檢定，要立即被隔離到公共的 *lazar-house*。*Sr. Eliza* 全然接受一切。……我們獲准派兩位姊妹守候她。……由兩位醫生隨時應，他們已盡了所能，另一位英籍護士也在床旁照顧，加上我們兩位姊妹的臨在，確實給她很大的安慰。她曾一度似有起色，但於 4 月 28 日下午 7 時突然進入危急狀態。至翌日晨早，接受了病人付油聖事後，安然離開這世界。主教也在旁支持著她直至生命的終結。

22 書〈1860–1910〉摘自嘉諾撒會記錄：“*Fragments*：第 2A/2B 部”。

8. 甘姆姆 (Claudia Compagnotti, 1895–1900) :

甘姆姆 1860 年六先驅之一，於 1895 年 2 月獲選為會長。作為施姆姆 (Stella) 的助理，她曾與 Stella 一同經歷嘉諾撒會的喜與悲；而且，由於她單純又虔誠，整個社群的人都愛護她、尊敬她。她為人謙虛而處事得體。她有自己一套面對難題的方式；解決問題時，她會用一個低調而效果不差的辦法。她寫的第一份週年通告函件日期是 1895 年 4 月 16 日。以一份屬於歷史性質的文件來說，這封函件頗為有趣，因為它告訴了我們嘉諾撒會當時正在做着什麼事。

甘姆姆在函件中提過 1894 年的疫症，六位修女的服務，以及其中一人 (Anna Pereira 第三會成員) 染病逝世之後，再補充說，在檢疫醫院，即仁愛女修會修女工作的那間醫院，在兩個月內，有 58 名成人和一些小孩接受了洗禮。「其中只有 4 人生存下來，其餘的全部往天堂去了。」在信中，就像其他寫往意大利的信一樣，甘姆姆特別強調葡萄園的工人不夠用。事實上，工作多得使人驚訝修女們如何應付得來。單是堅道便已經有 216 名孩童在葡籍孤兒院和 129 名在中國籍孤兒院。那間所謂「葡籍」孤兒院其實是國際性的。「這兒什麼國籍都有.....在這兒耶穌聖心找到喜悅。這些女孩子，大部份都是從罪惡邊緣搶救回來的；我們讓她們接受教育，使她們做回正常人，引導她們向善，長大後可以服務教會、服務社會、服務家庭。」²³

甘姆姆所說的兩間孤兒院，並非就是全部修女們需要關顧的。其實，她們還要兼顧很多其他嬰兒。甘姆姆向意大利的上級和修女報告說，幼稚園有 30 名嬰兒，這還未計算交託給修院外的奶媽們照顧的數目。她又說：「宿友有 54 人。全部日校都已爆滿。簡單說，就是所有部門都擠滿了人，修女們根本沒有可能全部兼顧到。而且，還有幾位修女感到身體不適。」

23 Compagnotti 的 1895 年通告函件〈Circular Letter〉。

甘姆姆又提及一些最新成立的善會：聖母孝女會有 45 名年青女子報名參加；聖類斯會有 89 名；天神會有會員超過 100 名；全部都致力於「防止青少年墮入危險和陷阱，因為這世界佈滿陷阱。」

我們的第三會成員大部份是中國人。她們一直向教會提供非常寶貴的服務，直至 1924 年。沒有她們，慈善工作便沒法擴展，因為外方傳教士不懂本地語言，起碼他們說得不夠地道，這點對他們的服務來說構成很大的障礙。甘姆姆繼續說：「是她們努力考取了政府要求的教師資格，然後幫忙在我們遍佈香港九龍的八間中文學校任教。她們的表現，令視學官非常滿意呢！」

堅道的院舍，住了差不多 250 名孤兒，（加上宿友，加上嬰兒，當然還要加上修女們），膳宿必然是一個大問題了！「我們靠着微薄的收入養起這樣龐大的一群人！」能夠真的使全部都吃得飽，「這點足以令人深受感動、由衷欽佩。一闕感謝上主的禱文禁不住悠然心生：主，感謝祢！因為祢在我們的工作中，給予我們莫大的恩賜！」

在同一封 1896 年通告函件中，甘姆姆亦有提及 1883 年展開的探訪女囚犯的事，說她們仍在繼續探訪這些住在修院隔鄰奧卑利街監獄的女囚犯。「我們定期每星期向那些住在附近域多利監獄的女囚犯講授宗教知識.這些可憐婦女很歡迎我們的嘉諾撒修女和第三會成員，一見到她們便十分高興和歡欣。嬰兒們當然每天都會被集合在一起，我們以最溫柔的呵護和母親一樣的愛照顧他們。」可惜由於他們「曾遭不仁生母虐待，所以很多都夭折了。大約有 50 名嬰兒與我們同住，另有差不多同樣數目的嬰兒給了院外的奶媽照料，待至適當時候才歸還我們。」

「我們每星期兩次到公立醫院探望病人。病人如果因為身體長期殘障而在出院後找不到工作，我們便教他們去我們灣仔

的醫院；那兒有住宿、膳食，最重要還是有靈糧；更希望他們可以找到永生。」

1896 年夏天，又來了一場新的疫症。修女們一想到「超過 500 人住在同一屋簷下」，一旦爆發疫症，後果不堪想像，自然憂心忡忡。疫症真的爆發了，而且修女之中也有人染上這病，其中兩人還因病逝世，她們是 Eliza Guidali 修女和 Luiga Frigerio 修女。Eliza 修女才只有 28 歲，Luiga 則 52 歲。首位染病的修女是在不知情下抱起一名小孩因而感染到病毒。按照衛生局的指令，這位修女必須移送到檢疫醫院去。醫院一如處理 Anna Pereira 個案時那樣，容許兩位修女留下陪伴她，但必須做足應有預防措施。醫生對修女們兩年前為疫症病人所做的一切，仍然心存感激，所以特別加倍細心治理她們，但是始終無能為力。

嘉諾撒會的紀事報提及 1897 年在香港仔成立的嘉諾撒社群：香港島的東南角有一漁村名香港仔，正在不斷發展。這區的人大部份住在漁船或小艇上；海面風平浪靜，他們才可以安居樂業。海，可以提供豐富資源，但怒哮起來，卻是極為可怕。所以這些單純的漁民大多崇拜偶像求保平安；他們的海上之家全都放滿了這些神像。即使在這區，嘉諾撒修女們仍然希望可以開設一所中文小學。甘姆姆派了兩名第三會成員往該區開了一間幼稚園。很快，幼稚園的名額已嫌太少了。八年後，到了 1905 年，修女們才獲政府撥地興建一間屋和一所學校。學校與屋相連，有學生 50 人。她們又開設了一間配藥室，以便派藥給那些窮苦的漁民。

在 1899 年聖誕的通告函件中，甘姆姆這樣描述剛剛過去的 18 個月：「已有超過 1170 人接受洗禮，女性（成人和女孩）共 90 人。．．．．孤兒院住了 300 人。大約 100 名婦女身體有殘障，例如失明、失聰、智障、精神錯亂。．．．．棄嬰收養服務收養了大約 100 名兒童，宿友 70 名，日校兒童 200 名。修院是全港島人口最稠密的場所——除了這兒的監獄之外！」政府規

定我們堅道的樓宇不能居住超過 550 人，所以「我們迫不得已要停止接受申請了。同時我們向天主祈禱：如果祂仍想我們繼續收留多些人的話，祈望祂賜資源給我們擴建。我們物資短缺，人口眾多，然而有人向我們提供很好的工作機會。 這一切一切都使來訪者和外國人欣賞和稱讚。」

9. 堅道會院的擴展；聖瑪利學校；南頭及汕尾分院的成立；慶祝金禧 1900 - 1910：

在 1900 年 2 月 9 日，即甘姆姆死後一星期多，她的助理盧姆姆（Teodora Lucian）以「大比數選票」獲選出任會長職位。她的親姊妹其中一位，盧姆姆也是澳門一位嘉諾撒會會士。²⁴鑒於她為澳門所作出的無私貢獻，澳門葡國政府在 1897 年頒授一項榮譽勳章給她，以表揚她在腺鼠疫期間為貧苦大眾和為澳門年青人的教育所作出的一切。她接受榮譽勳章時表示：『我寧可領取一包米，拿回去給我那兒的窮人吃。』澳門市政廳把一條街以她的名字命名，街名還一直沿用至今呢！這條街就是『爹利仙拿姑娘街』（Rua de Madre Teresina）。

盧姆姆很有愛心，很關心別人，懂得感恩，懂得欣賞他人，而且處事甚有技巧。她在出任會長期間，幾經艱辛，終於買下一所房子，位於修院隔鄰，面積比修院大一倍，可以擴建學校、宿舍和孤兒院。她深信天主會從中幫忙，所以放膽下令動工興建所需的建築物。」（見紀事報）。聖依肋施（St. Agnes）寄宿院運作至 1960 年關閉，全幢樓宇改作日校用途，以應付日校學生數目劇增之需要。學生數目劇增的原因，是 50 年代有大量難民從中國大陸湧入香港，使香港人口暴升，所以政府和修女們都不得不改變政策，多點關注青年人的教育問題。盧姆

24 由於她忘我地服務於澳門，在 1897 年，澳門葡國政府給予她一個勳章，以表示認許她在瘟疫時，為澳門的貧民和為年青人教育所作的一切貢獻。當她接到勳章時，她說：「我真寧願他們贈賜我一袋米，好分給貧苦人家呢！」澳門市政廳給了 M. Teresina Lucian 一條街，定名為“Rua de Madre Teresina”（德肋撒修女街），留傳到現在。

姆所關心的不只是「大修院」(“Casa Primaria”)的事務，1900 年在九龍厄瑪烏分院的舊址興建聖瑪利學校的人正是她。她又在中國大陸興建了兩所分院：一所在南頭(1905)，另一所在汕尾(1907)。設立這兩個「基地」是師多敏主教(D. Pozzoni, 1861–1924)的意思。基地之內通常都會住着兩位修女和一位第三會成員；她們生活清貧，跟當地的窮困鄉民一起捱苦。其實，這兩所房子主要是為棄嬰而設的，因為在那個年代的中國，新生女嬰往往遭到遺棄甚至殺害，棄嬰隨處可見，所以需要這些基地，以便把她們拾回來好好照顧。嬰兒長大後，便會送到香港去，由修女安排她們入學。

1907 年，對嘉諾撒會來說，是一個大喜之年。嘉諾撒會的修女，不論是香港的或是別處的，向來都清楚知道是誰為她們打下強心針，是誰使她們在福傳工作中這麼有幹勁。盧姆姆在罕有的第三任期中，專心處理小教堂的事。她把整個教堂於 1907 年重建，這次是「建立在各座的中央」，就如盧姆姆清清楚楚地表示她希望見到的那樣——在正正的中央。「由於修院的(傳教)工作發展得很快，而且正在擴展，原本的小教堂已不敷應用，因為人實在太多了。盧姆姆於是產生了(後來還實現了)一個大膽的夢想，就是為這教堂的主人籌建一所與祂相襯的居所，而祂的居所應該位於所有建築物的中央；這樣，即使以實體來說，我們的主都會居於她的眾多女兒的中間，而萬物都會歸向祂。」(紀事報)這所名為 M. Dorina(是 Theodora 的匿稱)的小教堂如今仍在，仍然位於一切的中心；它讓我們永遠懷念著這位曾經為香港的福傳工作盡心盡力的偉大傳教士。

1910 年 4 月 12 日是嘉諾撒修女來港 50 週年金禧紀念日，負責籌備慶典的人是盧姆姆的接班人，馬姆姆(Teresa Martinoia)。1861 年，即修女們來港一年後，有修女 7 名，學生 80 名，孤兒 9 名；但到了 1910 年，已有「修女 67 名，學生 1180 名(其中有 646 名中國人)以及孤兒 349 名，」另外

還有總共 857 名「住友」。「他們大部份人的生活都是主要倚靠學校的『工業』部來維持，其次是倚靠修院募捐得來的善款……」這次的慶典，本地報章都有報導，其中 4 月 11 日的「中國郵報」這樣寫：「明天是這間意大利修院歷史上的大日子——一個稱為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組織慶祝該會來港 50 週年金禧紀念；嘉諾撒這名字，是從該會會祖嘉諾撒女侯爵（The Marchioness of Canossa）的名字而來。該會與本港一同成長，並創出輝煌成績，使人津津樂道。但我們都知道，在連串的成功事績背後，是痛苦的眼淚；只有堅定的信念，才能替人把淚抹乾，才能使人有能力支撐下去。」金禧之慶標誌着嘉諾撒會歷史上一個紀元的結束。顧姆姆（Lucia Cupis）為嘉諾撒會奠定最早的基礎，她憑着信念和對天主的信賴，披荊斬棘，排除萬難，在香港和漢口成立了嘉諾撒會，實現了本來看似沒有可能實現的夢想。她，固然功勞不少，但是在這首個紀元中，另外還有兩位積極分子也是功不可沒的，她們就是施姆姆（Maria Stella）和盧姆姆（Teodora Lucian）。她們兩人各有千秋，兩位都是嘉諾撒會的重要人物，有如一幢高樓的基石。兩位都有卓越成就，為亞洲地區的嘉諾撒會的將來打下良好基礎。

第二部份：1910 – 1960

1. 光明與陰暗 1910–1920：

在 1905 年 4 月 15 日——嘉諾撒修女慶祝來港傳教金禧紀念的五年前，修女在宗座代牧師主教的請求下，在廣東寶安縣的南頭開辦了一所孤兒院。在 1907 年 10 月 4 日，同在師主教的請求下，另一間孤兒院在海豐縣的汕尾開辦。當被收容的孤兒到了某年歲，他們就被轉送到香港堅道會院的孤兒院。在汕尾，修女又為當地的年輕婦女設立縫紉學校，訓練她們一技之長。這兩所在 1910 年設於中國內地的會院，屬香港嘉諾撒修會的「子院」。

1914 年修會的副總會長 (Felicita Codeleoncini) 的探訪紀錄這樣記載：南頭是被圍牆和士兵守護着的小城，我們的小會院收容了被遺棄的孤兒。三千人曾在這兒被照顧，當中的 2960 人已回歸天鄉。從女孩到婦人，還有幾位修女仍棲身於此。一位曾被活埋的華人太太被一位信徒救回，後在我們的會院得到底護.....

汕尾有九千名居民，其中五百人為教友。

1910 年，修會在香港所辦的英文學校水平首次達到政府教育部的標準。嘉諾撒修會學校的學生以往參加牛津考試，隨着香港大學的成立，學生開始參加本地各級的公開試：初中、高中及預科程度會考。當年百分之百學生會考合格及獲得優等級別，九龍聖瑪利書院也得到優異成績。

在 1911 年，建於灣仔的嘉諾撒會院在宗座代牧師主教的請求下，讓出空間來開辦學校。這間灣仔會院在 1869 年建立，推行最富嘉諾撒精神的使徒工作，就是照顧在灣仔紅燈區內的娼妓和歧途少女。好些熱心的在俗婦女，協助修女從那不道德場所中，救出那些被黑社會操控的少女及年青婦人。

根據修會的編年史所載，從 1869 年始，約 2000 名貧困者曾在灣仔會院接受修女的照顧，當中也包括老人。在 1950 年，那古老會院建築物須被拆卸重建，以便擴充學校，增加學額。據當時主教所言，將修女的服務焦點轉移到教育確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但在當時的局勢來看，培育年青一代比照顧娼妓和老人更適切。

當年修女另一項重大捨割，就是結束為貧窮男童而設的「必列者士街學校」。這學校是於 1880 年在被視為城中最悲慘區域開設的。修女每日往返這兒，教導學童，同時為他們及其家庭提供糧食及衣物。當時因政府計劃重建該區以改善環境，修女再次應主教請求結束該校。

在 1913 年韋羅娜的修會會長訪問後，香港修會獲宗座的批准，建立培育本地嘉諾撒修女的初學院。當時已流行着一個謠言，指主教有意把本地的中國嘉諾撒修女，即第三會分割出來，成立一個教區性的國籍女修會，這逼使修會面對培育本地修會聖召的問題。那時本港首三位初學生已被遣送到在意大利米蘭剛成立的初學院接受培育，香港的初學院足足花了約十年才正式成立。

根據耶穌會的香港歷史學者賴詒恩所述，1915 年為香港是災難的一年。中國內地有騷動和內亂，多個地區發生飢荒和傳染病。廣東發生嚴重水災，農作物失收，很多在港華人把物資帶回內地救濟親人，很多內地難民則湧入香港。

在 1917 年，八十五歲的施姆姆（Maria Stella）去世，她是 1860 年到港的六位嘉諾撒海外傳教先鋒修女之一，也是六位中最後一位去世的。顧姆姆（Lucia Cupis）在 1869 年去世後，她一直承擔修會的領導，直到她在 1895 年退休。她退休後還被視為修會的「母親」及顧問，貢獻修會。修會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所有事工，都在她的領導下奠定基礎。在她掌舵期間，傳教事業拓展到澳門、帝汶、印度、新加坡和馬六甲等地。

2. 新挑戰 1920–1930：

第三會——在 1919 年，當 Pera 擔任首席長上時，師主教開始提及他的意念，就是把修會的第三會，即本地華人修女從嘉諾撒修會分割出來，成立一個屬本地教區的國籍女修會，直接隸屬主教，並稱為寶血女修會。這是因為在 1911 辛亥革命後，羅馬方面考慮培植一個由當地人領導的中國教會，包括神職班及女修會。這個想法逼使嘉諾撒修會面臨一個重大問題。自嘉諾撒修會來港傳教，很多本地華人婦女加入她們的行列，並作出獨特的貢獻。她們在孤兒院、小學、診所、家庭及醫院探訪、鄉村福傳等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現。那些在香港和南中國的「子院」都交托給她們管理。由於她們熟悉當地的方言和習

俗，她們可以深入外籍修女不能到達的地方，做到修女不能做到的使徒工作。

主教把第三會的華人修女分割出來，給予她們會院和初學院，成立以本地為基礎的寶血女修會。這不單只是名稱的改變，而是基本身份的改變。在 1922 年至 1924 年間，修會的華籍修女逐漸流失。根據記錄，在 1923 年 8 月 20 日，修會退還原屬仍在生的華人修女的嫁妝總值 2210 元。在 1924 年 2 月 2 日，所有華人修女已離開嘉諾撒修會。寶血女修會在 1929 年 7 月 19 日正式成立，譚加辣為新修會首任會長，而 Barbara 王修女為首任初學院院長。

1922 年至 1924 年的華人修女流失潮為修會造成嚴重問題，因為修會失去寶貴的人才推動各種事工，因此香港修會急切需要：

a) 從意大利修會的國際初學院遣派更多傳教修女²⁵

b) 在香港正式開啟初學院培育本地的修會聖召。理論上，這已在 1913 年修會副總會長 Felicità Codeleonecini 到訪時已提出的，其實此後十年很多渴求修道生活的女青年被收納，但須往意大利接受培育，但現在她們可正式在本地的初學院接受培育。這提供了機會，讓更多女青年正式成為修女，不只屬於第三會。然而，少數受培育的女青年因種種原因，仍繼續屬於第三會。她們有不同的會規，跟修

25 為解決第一個困難，即從歐洲徵募傳教士，需要在英國設立一所學習語言的會院，以培育將來在英聯邦各地區從事教育工作。香港為把握良機，遂於 1923 年，即與中國籍修女分開後，M. Teresa Pera 開始行動。她先教導 M. Teresa Martinoia 和 M. Natalina Corni，跟着為會務前往意大利，再到英國購買了一所房子。得 Cardinal Bourne Archbishop of Westminster 的准許，開設一所為傳教士作教育準備的學習語言修院。第一位被派去的學生正是後來在修會佔重要職責的 M. Antonietta Novello，修會第三任的總會長。

女有不同的會衣，但仍與修女們一起投身同樣的使徒事工，有時更負責一些修女不便履行的工作，與修女們過同一的團體生活並被視為修會的一份子。

在這十年間，另一項重要事件就是於 1921 年在堅道會院開設了一間接待女青年的宿舍。那些女青年以前是修會學校的寄宿生，畢業後她們或升學，或就業，在香港無處容身。這些女青年中有些後來成為修女，有些結了婚，組織了幸福的家庭。

在 1922 年，天主教傳教會把灣仔一幅土地割讓給修會作推行慈善工作之用，修會在那地興建了醫院。該院運作至 1960 年，當年嘉諾撒啟明學校在該處開辦。

在 1926 年，恩理覺神父成為宗座代牧。在他的請求下，修院派遣修女到惠州天主教聖約瑟醫院服務。當時一位在德國受訓的中國醫生每天都來看顧眾多病人，香港嘉諾撒修會負擔全醫院的開支，包括支付醫生的薪酬，因為恩主教提出教區有財政困難。修女提供藥物，照顧貧窮的病人，及駐守和途經當地的傷兵。在那兒也有一些人皈依受洗，其中有偶然到醫院服務的中國醫生。

1929 年，一位恩人 (Stephens) 把一幅位於舊山頂道的土地遺贈給修會，嘉諾撒醫院就在那處開辦。²⁶

26 除了堅道以外，還有：

- 灣仔聖方濟各：有一所英文和一所中文學校，一間小型醫院，一所像 (Cottolengo) 的臨終安養院和主日學。
- 九龍聖瑪利，有英文初中及高中，公教青年行動組 (Catholic Action)。
- 香港仔的聖家修院，有一中文小學，一間診所和探訪艇上人家的工作。
- 嘉諾撒醫院在堅道設有分支，專為療養用。
- 西環的聖心修院，專為無人照顧的嬰兒。
- 紅磡設有一間中文小學及一間醫務診所。
- 筲箕灣聖若瑟修院約有 60 多名少年女童的孤兒院。
- 摩星嶺有盲人院約 30 - 40 人。

1929 年為全球嘉諾撒修會是重要的一年。早在 1913 年後，意大利會區局部統一，無論在意大利境內或傳教地的會院，都感到中央管理的需要。意大利會區完全統一後，教宗庇護十一世委任 Maria Cipolla 為全球嘉諾撒修會總會長，Teresa Pera 為中國南部區會長，而 Natalina Corni 仍為中國北部區會長。

最初修女在高主教的鼓勵下，也照顧失明女孩。她們在 20 年代後期遷往灣仔。修會的編年史這樣解釋：很不幸，失明在這些國家很普遍。有些兒童先天失明，有些是因後天感染。自 1863 年我們的修會收容失明兒童及婦女，過往四十年或更久，那些失明兒童留在我們的孤兒院裏，與健全的兒童一起共處。



在摩星嶺孤兒院裏教授失明兒童縫紉

在 1924 年，我們把他們集中安置在紅磡會院。那兒還有一間中文小學和一間診所。其後，她們遷往筲箕灣，在 1929 年遷往灣仔。在 30 年代初期，她們遷往摩星嶺。

一位出色的嘉諾撒傳教修女 Emilia de Figueredo 被派往於 1925 在香港仔開設的會院。²⁷雖然她當時已年過六十，且患有關節炎，但她仍欣然接納派遣。她懷着熱切的宗徒傳教的心火，在這兒種植草藥，製成藥物，在診所派發。她期望接觸漁民，但苦無門路，無從入手。後來一位漁民太太到診所求藥時，

— 廣東省南頭有被社會遺棄的嬰兒及一間中文小學。

惠州，聖若瑟修院，有一間天主教醫院，醫務診所和慕道班。

27 恩理覺主教 (Mgr. Valtorta) 表示很高興修女們所開的一間新會院，名為「聖家」，他慶賀修女們明白在那如此貧窮地區服務的重要性。

認出 Emilia 修女曾在灣仔醫院照顧她，還在她瀕死時給她付洗。後來她康服了，返回自己的漁船，繼續忠於信仰。當時，她樂意成為傳教修女的嚮導和翻譯，把修女帶到漁船，漁民探訪就這樣開始了。

3. 修會的重組 1930–1940：

戰爭萌芽 1940–6–10 至 1941–12–7：

1935 年是慶祝會祖逝世百週年及修會來港傳教 75 週年，那時修會的仁愛事工蓬勃發展。

在 1937 年 7 月 10 日，恩主教致函香港的嘉諾撒修會，表達他重大的期望，就是所有嘉諾撒會院，都為附近的貧苦街坊開設學校，即使不能開辦日校，至少也開辦夜校；也不管街坊是否教友，為他們開辦主日學。恩主教高度讚揚修會在堅道的事工，並期望若情況許可，那些工作可加以發展。恩主教經常呼求協助，也許他不知道修女所承受的負擔已超過她們的能力。在 1938 年 3 月，他向區會長 V. Bellocchio 抱怨香港修女對他的請求全予負面回應，他對此深感遺憾，因為他認為每人應為整個傳教事業設想，不只考慮自己的修會。他要求嘉諾撒修女照顧問題男童，但修女似乎未能提供協助。主教又提議邀請嘉諾撒仁愛會男修會會士到粉嶺開辦天主教慈善及支援中心，幫助包括盲人的傷殘人士。主教說若對方應允，他會盡一切辦法實現計劃。奈何計劃最終不能落實，因為男修會缺乏人手。

在 1940 年 6 月 5 日，首三位修女在聖家會院安頓妥當，開始福傳事工，後又增加兩位修女管理診所，並計劃在 8 月為附近的窮人開辦學校。

1939 年澳門嘉諾撒聖心學校奠下基礎。一間火柴廠被拆卸，留下的地方可發展為學校。保姆姆（Erminia Perissinotto）為學校發展埋下種子，後成為學校第一任校長。學校開始時有

29 位學生，她們不久就在香港大學入學試取得優異成績。在 1941 年，日軍佔領香港，大批難民湧到澳門，適齡學童人口大增，導致學校迅速發展。1939 年一封修會往來書信描述國內殘酷戰爭的慘況。1940 年 6 月 10 日，意大利跟德國及日本結盟，令在英國殖民地的傳教士陷入困境。意大利國民在香港的處境一夜間轉變——他們被視為敵人，令神職人員及大多數是意大利人的嘉諾撒修會承受惡果。

在此局勢下，港英政府下令所有學校的校監及校長必須為非意大利人。本地的蔣介石夫人孤兒院（Madame Chang Kai Shek's Orphanage）結束營辦，七十位六歲以下的孤兒被送到堅道會院的孤兒院。

4. 香港被圍困的日子 1941：

香港被佔領的日子 1941-12-25 至 1945-8-15：

這是香港真正經歷過的日子。修院當時的苦況，在港九兩所主要的會院的修院日誌上記述得最清楚；九龍的日誌由沙修女（Luigia Sardorin）執筆，香港這邊由鮑修女（Angelica De Piazza）主理，兩位修女都給了我們一個清晰的報導。

修女們清楚知道，不出幾個星期，她們自己以及修院養活着的人的糧食就會耗盡，主教在 1 月 27 日致日本主腦的信中，除了提及修院被炸的事，還呼籲他們必須關顧修女要養活的無依靠的人，勸他們切勿囤積米糧，盡快開倉救人。

日軍佔領香港不久，我們的英文學校就全部被封閉，這也增加了我們在財政上的困難，因為修會只能靠這類學校獲得一點點收入。幸而其後中文學校卻獲准開辦。所以總算有多少可做的工作。那日本政府更請求我們在九龍聖瑪利開辦一所國際學校。結果，所取錄的 198 名學生之中，包括了葡、印、德、法、俄、瑞典、挪威、南美、菲律賓、歐亞、意大利、西班牙等十多個不同的國籍。

解決一眾要照顧的人的口糧，始終是個問題，恩理覺主教在 1944 年 3 月 14 日寫給日本主管的信中，就再次催請他們要讓修女照顧的人好好地活下去。

1942 年 1 月，英軍降服後約一個月，港島總修院在日誌上知會各人關於修院在香港的情況，其中報導了一些傷亡的消息：

香港灣仔聖方濟各堂兩次神奇地獲救；當時修院裡塞滿了難民，一個炸彈在牆壁炸開了一個大洞，然後落在站滿兒童的房裡而沒有被引爆。另一次又有個炸彈落到會客室前面的果園裡，炸開一個大洞而沒有造成損失。

在 12 月 16 日那天，在筲箕灣修院的一場大火中，使修院損毀得不能再住。英政府就安排修女帶着孤兒，到赤柱加爾默羅隱修院的修女那裡暫住。她們也因此避過被日軍徵拿修院作軍用，因為認為在那裡沒有慈善工作。然而現在卻因孤兒的原故獲得物資的發放，因此對我們滿懷感激。修女們遷離了筲箕灣後，英軍卻搬進去修院居住。可是他們向日軍降服前一週，他們又迫於要遷離它。此後，強盜就把修院、學校、診所裡的一切搶掠一空，只剩下四堵牆，內無一物。之後，日軍又把它佔用。從此，筲箕灣再沒有修女的足跡了。

香港仔這邊，由於修院受過日軍進佔以及盜賊的劫掠，雖然我們仍是修院的業主，但是仍然決定遷往華南總修院去暫避。

西營盤的凌月仙（聖心修院），乃是天真無邪的嬰兒之家，保持着完整的形狀，連一扇玻璃窗也沒遭破壞，因為英軍認為這裡不安全，沒有徵用。

嘉諾撒醫院在日軍圍困香港之初，即被英廷徵用，由於意大利是協約國一份子，被英廷視為敵國，所以他們把它交給一

位英籍女醫生 H. Carnaval 主管，由於她對環境不熟識，給醫院製造了不少問題，她把醫院的職員四處調動，傢俬和用具也遭同樣的命運，結果，不少用具到最後就不知所終了。在聖誕前的一段日子裡，醫院一共遭到十六次的襲擊，最後，一枚燃燒彈擊中醫院的頂部，一樓全層遭到破壞。當我們和一眾女服務員、婦女跟女孩子們回到那裡，希望可以拾回一些甚麼時，發現裡面的東西，已幾乎被搶掠一空了。只剩下四幅破爛的圍牆。

摩星嶺又如何？那裡被炸之後，修女就帶着那群視障的兒童到堅道暫住，聖誕過後，即香港向日軍投降後，她們為了防止搶掠，又遷了回去；不幸的是，某天黑夜，闖進了六條大漢，把屋裡的米和其他糧食全部搶走，把修女和視障童嚇個死活。其後，修女把 30 名較幼年的再帶回堅道去，其餘的就跟部份的修女留守在原地。

南頭那邊，由於神父擔心修女的安危，乘一位日本軍官驅車到香港之便，安排了裴修女（Ester Pizzi）和林修女（Laura Lam）從速隨車回港，僅留着湯修女（Giulietta Tommasetto）獨自在那兒看守修院。湯修女的勇氣，使恩主教也稱她為「勇者中之勇者」。

惠州的意大利神父和修女，就有傳說謂他們被監禁在集中營，因為中日畢竟是敵國，所以那裡的情況一點也不安全。

香港紅磡的會院又是另一間被掠得一掃而空的會院。在修院的記事冊上，也記錄下修女在該段日子的慘痛經驗。下列是九龍總修院記載着的一些片段：

*1 月 4 日被指派往東院（東華東）擔任護士的
嘉諾撒醫院修女已經返回修院去了。12 月 9 日同樣
被指派去擔任護士工作的曾玉卿修女和梅修女
（Anna Murray）也已經回到修院來。*

1 月 18 日，初次有修女從九龍到訪，我們終於獲知一點點關於修女的消息，知道各人平安，感謝天主！聖瑪利並無遭炸毀，可是，在那裡投宿的難民，卻遭人偷光他們的一切。修女宿舍也幾乎遭人強闖進去，最後都被趕到的日軍嚇退，大家都為此捏了一把汗。

九龍城修院的修女雖然也遇到危險和困難，可是還可勉強在原處守着。

1 月 25 日，就是日軍進佔香港後一個月，在我們修院裡，連同修女在內，一共住下了 900 多人。總之，宿生、孤兒、視障童、難民、義工等等，甚麼人都有。其後，葡籍宿生逐漸離開，英文教室亦不管用，我們就把宿生宿舍和她們上課用的教室，全部撥給難民使用。給 900 人提供伙食可真不易。當時，修女也開始五、六人一組輪替着作週年退省。

2 月至 4 月期間，裴修女（Esterino Pizzi），姬修女（Pierino Cruz）和彭愛金修女（Caterina Pan）陸續返回南頭，而湯修女（Giulietta Tommasetto）也暫時回到香港去。視障童和婦女都返回摩星嶺去，免得屋內的物件進一步被奪掠。5 月間，物價繼續上漲，伙食問題日益嚴重。香港每天平均有 700 人餓死。

另一方面，修女開始每天學日語，嘉修女（Giuseppina Casati）在香港仔開了一間診療所給那裡的人民，日本人很尊重那位「洋醫生」。在修會記事冊上又記載說：培貞因為是中文學校，未被封殺。由於港幣貶值，所以香港情況每況愈下。物價繼續無了期地上漲，飢荒使香港每天都產生令人傷痛的景象，甚至傳說有人吃人肉。無數香港居民逃奔大陸去。我們回應這些慘痛的暗淡日子的不二法門是對上主的眷顧懷着最堅強的信心。不但在食物方面，即使在其他事上，我們也是學着將一切交託給天主。我們可敬的主教要求修會每天要派兩位修

女到住在政府公地的難民那裡，好能在必要時給垂死的人有條件的付洗。這種情況平均每天約有十宗。由於錢幣貶值，不少培貞學生須要退學，只剩下約 80 人。然而上主卻繼續照顧着我們，時而有善心人士捐錢，時而又有熱心人士給我們捐贈食物，從未間斷。

8 月 9 日，粉嶺 Isidoro 修院揭幕。同月 20 日，天主對我們特別關顧，我們收到政府當局送來 34 袋砂糖（每袋 200 斤），雖有少許瑕疵，但為我們卻非常寶貴，是送給我們和凌月仙育嬰院的（聖心）。真的感謝主！祂沒有離棄我們，不斷向我們提供協助。

9 月份，培貞學校將會復課，目前已有 180 名學生報讀。至於那被日軍佔用了的嘉諾撒醫院，早前已被夷為平地，他們就用這塊地建造一個壯麗之墓去安葬陣亡的士兵。到了 10 月，我們再一次體會到天主的眷顧，善款和食物都不時有人送到。由於學生的數目增加到 200 之多，所以這些捐贈都是解決眾多學生膳食的及時雨，而且還須繼續傷腦筋去開源，才可以維持開支，所以我們就須做些刺繡及編織等工作去賺點收入來幫補開支，又可以避免賦閒（因為宿生和英語學校都沒有了）。粉嶺那邊，修女就經常地把由菜田種得的蔬菜送到總修院去，天天如是。幸而我們有免費的乘車票，否則，即使有菜，也未必這麼容易拿到市區去跟人分享。真的要感謝天主的照顧。²⁸

1 月 29 日是西營盤凌月仙（聖心）揭幕 50 週年紀念日，自開辦以來，這裡總共收容了 84,150 名嬰孩，其中 70,000 名領了洗。

28 政府委託我們管理何東診所，那裡設施準備就妥，包括床、椅、衣櫃等。M. Ida Tambulini 和 M. Caterina Macca，得到准許接收它。我們希望這所房子，毗連我們的地方，能容許我們顧及那塊田地，便能供應食物給我們修會團體和幾百位在我們會省內住宿的人。

撇除偶爾收到的捐贈，我們和我們供養着的人群，都是靠培貞學校徵收的象徵性學費，以及從刺繡、裁剪等手工業賺得的微薄收入維生。這些手工業是本地的一些大廠批給我們做的。除了上述的工作，主教也懇請我們探望那些死於戰亂者的家人，把梵蒂岡頒給他們的津貼及食物帶給他們。

1943 年 7 月 25 日，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說，意大利的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經過 21 年長的獨裁統治終於垮台了；這意味着意大利不再是日本的協約伙伴；意籍修女們的處境在一夜之間變得非常嚴峻，日軍的官兵以懷疑目光看待她們。

1945 年初，發生了一連串空襲，氣氛沉重而恐怖。1 月 21 日，一系列美國轟炸機空襲灣仔，兩秒鐘內，炸毀了 500 幢樓房，死傷慘重，據說約萬五至二萬人罹難。我們聖方濟各分院卻奇蹟地幸免於這次災禍。修女們雖然嚇得要死，但仍勉強保持鎮定，慷慨地張開她們的心和學校的大閘，去幫助那些喪失了家園的難民。

5 月 20 日我們的處境更為複雜，物價不斷上漲，我們還得接待 20 位法國醫院修女。繼續依靠天主的眷顧，是我們尋求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於是我們低調地、融洽地去跟剛住進我們修院的修女相處，大家簡簡樸樸，真誠相對。這為雙方都得教益。

6 月 8 日，奇蹟出現了！耶穌聖心（西營盤凌月仙育嬰院主保），為了祂的孩子，親自出手相助了；那裡的經濟狀況並不樂觀，須要 84,000 日元糴入食米，大家苦無對策，就向聖心做個九日敬禮。果然，在聖心瞻禮日，祂明顯地表示俯聽我們的祈求，那天，突然有人給我們贈送了一筆 10,000 日元的捐款。這向我們暗示了祂會繼續照顧自己的家。8 月 15 日聖母升天瞻禮，日皇終於向全世界宣佈投降，即時生效。這真是一個天大的世界和平喜訊，全球各地都在廣播這個消息。雖然在執政府「打道回朝」之前，日軍依然留在香港，然而我們已

在高唱謝主詞（Te Deum Laudamus），並開始計劃如何重整服務市民的工作。

5. 戰後惡夢和中國大逃亡期 1945–1950：

1945 年 8 月中旬，遠東正處於休戰期，一切一切都開始漸漸改變，再無貧困和飢荒，大家都不論身份地位，工作範疇，只是專注地工作，希望把長期以來遭到戰火摧毀了的東西重建起來。修女們也積極參與社會建設，希望協助大家面對重建之初所可能遇到的問題。

最初顯示出嚴峻的考驗已成過去的，莫過於那本修院紀事錄在 8 月 27 日那活潑生動的記載上：「驚訝的上天眷顧！一輛盛滿鮮肉和蔬菜的貨車，停泊在聖瑪利門前，那是我們這幾個世紀以來久違了的！鮮肉！隊長 Leo d' Almada e Castro 和四位加拿大軍官按着門鈴，他們是從軍營那邊來的，他們獲發給這許多的食物，一時也不知怎樣處理，最後決定把它們分施給安貧小姊妹女修會和嘉諾撒會修女。我們從來都沒有享用過如此豐盛的美物。我們把這好消息知會了本堂韓崇禮神父（Horace De Angelis, 1905–1988），他親臨指揮着把禮物分成九份，分發給堂區的窮苦家庭和附近的一所孤兒院，他們有些人已經四年沒有嘗過肉味。

嘉諾撒修女在日軍佔領香港期間為市民所做的事，香港人永誌不忘。難民、志願接納囚犯的家庭、一度返國而戰後又回流的英籍人士等等，人人都明認從修女處獲得的支援。如今，生活又回復正常，市面上又復見糧食，各人一想到修女亦曾經捱餓，就紛紛向她們報以仁慈的心，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慷慨地答謝修女。例如：有人給她們送上要緊的食物以期使她們恢復健康，於是一箱箱牛奶、砂糖、麵粉、肉類等都源源送到。修女因為不必操心孤兒和自己的糧食，自可專注於重整戰時被破壞或中斷了的仁愛工作。8 月期間，撤離的日軍還把大量從本地的一個補給站得來的米糧、咸魚等送給修女的孤兒院。英

兵也給她們送上大量煤炭。日本的戰俘則為修女砍柴和修樹等。

10 月 8 日，已跟培貞學校合併的聖心學校開始復課，灣仔聖方濟各學校亦然。經過戰爭的艱苦歲月，在大家百倍努力之下，萬事開始復甦。可以說這是一個原始時代。在這時代，我們真的不知要如何面對各種冒起的問題，或怎樣回應這許多的需求。香港那邊的總修院，無數活動正在戰後重生中努力掙扎；接着的幾個月，要復課的中、英文學校的學生，將會滿佈修院的每一個角落，她們的總人數，高達 1,200。宿生預期也很樂觀，無奈，由於欠缺地方和人手，我們只得酌量擴充。孤兒院已住滿了 140 人，再無空缺。安老院內約有 30 名老人家；青年宿舍總共住了 45 名女青年。完全被戰火摧毀了的嘉諾撒醫院，在總修院內暫時給她們闢了一幢小樓房，讓醫護人員繼續他們的愛德工作。那樓房稱之為嘉諾撒樓。除了嘉諾撒醫院的醫療服務，修女也探望公立醫院的病人，給她們傳福音，有必要時還為她們施予帶條件的領洗（就是如果她們願意的話，因為病人有時根本不省人事）。從 1941 年 12 月至 46 年 12 月期間，共有 22,596 人在臨終時接受了聖洗。這為修女們實在是一項極具催迫感的工作。

5 月 4 日，在九龍漆咸道聖瑪利英文中學，為貧童開辦的夜校也開課了；她們由下午四時半至六時半上課，是在日校生放學後，把課室借給她們用的。1946 年 8 月，總會長在香港巡視會務期間，我們收到一封從英國 Welwyn Garden City 發過來的電報，預報有四位修女會被派到香港，到港九規範較大的兩間學校任教。是歐洲給我們派遣的首批工作支援隊。並且這還是香港政府和教育署主動介人才獲得的成果。與此同時，中國教會史亦在同年（1946）到達了一個里程碑：1946 年 11 月 11 日，教會聖統制在中國建立，香港也隨着由代牧區升格為聖統制主教區。其時，修會亦正在計劃從長期的戰鬥和破壞中轉過身來，邁向亞洲未來的光輝。但人算不如天算，那時烏雲

正籠罩着中國，內戰蔓延了數十載以後，如今又有共產主義冒起，要推翻腐敗的國民政府。1947 年開始，傳教士們遭勒令離境，這悲哀的開始，一直持續到 1952 年。其時中國早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神州大地也再見不到外籍的嘉諾撒會修女了。

回望「中國出谷紀」，或可說成是上主的安排。祂為修女開創了另一新天地。1952 年 2 月 27 日，會長代表修女暨她的司庫譚修女 Ida Tamburlin 應澳洲墨爾本天主教邀請到他的教區去創立會院，那兒去找葡萄園的工人？從大陸南下的一批修女正是；於是同時也可為她們尋獲到另一項宗徒工作。

被逐離中國的其他修會的修女們，在獲得安排到她們自己的其他會院或返回祖國之前，都暫時寄居在我們的香港總修院；為了安頓這許多客席修女，我們只得暫時把女青年宿舍關閉，好能款待她們。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這事件不但影響到香港，也影響着全世界。

1949 年在香港總修會的紀事錄上，我們可見「聖母軍」（Legion of Mary）這麼一個新名目，這是一個非神職人員的公教組織，這組織很快便在香港奠定了基礎。愛爾蘭籍的聖高隆龐傳教會（St. Columban）會士莫克勒神父（McGrath, 1906–2000）便是在國內建立這組織的代表人物；他到我們修院舉辦了一次講座，講述這教友組織怎樣在世界委身於宗徒工作。代表會長表示她非常希望能在學校成立聖母軍，結果，1 月 18 日，第一支聖母軍便在聖瑪利英文中學成立起來；接着，在 1 月 19 日，中文部第一支聖母軍亦相繼成立。這些學生聖母軍，在這幾十年間，於協助修女不論在人性或牧靈方面，服務不斷湧入香港的難民，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意義。香港恩理覺主教呼籲全港從事教育工作的修會，無論在仁愛或宗徒事業上，都必須不遺餘力地協助不斷從大陸湧進香港的難民。這也

是戰後部份重建工作的目的。1949 年，修會決定重建那座在紅磡，於戰時被炸毀的學校。建成後錄取了 250 名學生，她們都來自貧困家庭，我們給她們介紹了天主。學校復課不久，我們又在那兒開設了一間小小的診療所，還不時探望那窮困地區的居民。如果懂得當地語言，加上一點點心火，對那許多聚居其間的難民必定更有幫助，亦能為主爭取到上千的靈魂，其實，那些中國人，雖然受着無神主義的洗禮，但比從前更易於向真理開放。

6. 「難民潮」和「房屋建設」的十年 1950–1960：

這十個年頭，香港變成了一個難民港。成千上萬的難民，不斷地從大陸湧進來。白英奇主教急忙跑回歐洲去，為這些不幸者求助。西歐的報章都以「全球最龐大的難民中心的主教」為題，刊載在頭版上，特別矚目。

這邊廂，人群仍是不斷向港澳擁來；不少還是冒着生命危險，渡海泳來的。抵埗後，身無一物，他們只是希望能夠把過去的恐怖經驗遺忘，重過新生活。當時，祖國的教會可被喻為「苦難教會」。到了 1959 年 9 月，教友的數目激增至 146,464 人，慕道者共 12,870 名。公教學校 152 間，學生總數合共 74,466 名，其中 27,710 名為公教生。

出谷紀：從大陸擁入的人群一直沒有減退。．．．．．另一方面，在大陸工作的修女，亦每次三兩人，或甚至六七人。．．．．．分批遭大陸新政權勒令離境。其時，傳教活動在中國再沒有生存的空間，是顯而易見的事，面對這現實，修會也得悲痛地採取相應措施。1950 年（救恩之年）11 月 29 日，總會長宣佈把修會行政區重整，中國的會區將包括大陸、香港、澳門。由羅姆姆（Antonietta Novello）擔任代表會長一職，其總部也由香港堅道遷往九龍聖瑪利。大陸那邊，修女們繼續遭驅逐出境，由湖北向香港南遷，經過羅湖橋，就是俗稱的「嘆息橋」抵達香港。倫姆姆（Angelina Ranzani）是最後撤離中國的一位修女。

大陸官員自 1952 年 5 月 4 日至 9 月 4 日，把她獨自軟禁在陝西的古路霸，直至 9 月 4 日才將她遣返。

中國政權轉移不久，港澳人口就因人潮的湧現而直線上升，愛德工作的需求也自然激增。因此，港澳的修女便得加快和擴大仁愛的工作。逢星期日，她們都會探望麻瘋病患者，給那群不幸者帶來一點慰藉。在紅磡地區有一塊政府公地，是難民聚居的地方，那裡地小人多，雜物也多，最易引起火災，火警屢見不鮮。那地區也是我們最喜愛帶同學生去探訪的地方，學生們都非常慷慨，經常把籌募所得，帶給那些身無一物的貧苦家庭。此外，探望醫院病人，也是我們的常務；當時，醫院的情況差得不能置信，單是床位距離也可見一斑；通常床榻之間，窄得站不下一個人，所以探病時，人人都要站到床尾去跟病人交談。

關於我們的寄宿學校，一切尚算正常。至於孤兒的數目，就因新中國觸發的移民潮不斷增加了。日校每日則有上千學生上課。

恩主教亟望重開筲箕灣區的小學：1951 年 1 月 29 日，在主教的策勵下，終於把停辦了十年的那所小學重開，該筲箕灣小學，首先因為在 1941 年 12 月 16 日遭大火摧毀得無法使用，接着又在香港淪陷時，遭日軍佔用了一段時間；戰後，英兵復把它改作監獄；以至從 1941 年聖誕開始，修女便要帶着孤兒到赤柱的苦修院暫住。及至該處重建工程完竣後，本來按照原先的計劃，是希望能在其間首先安頓好較年幼的孤兒；不過其後鑑於當地亟須一間學校，恩主教亦非常盼望能開辦一間中文學校供貧童就讀，於是就此決定將落成的新樓，重開關閉了十年的筲箕灣小學。

當時還有一類成人的學校，就是那些在正規學校上課時間以外才開始授課的學校。是專為收錄那些日間須要上班，沒有機會讀日校的貧苦青年而設的；好讓她／他們下班後也有學習

的機會。這類學校，雖然未獲政府任何經濟上的津貼，但它卻不阻止我們借用日校的校舍，而且在課程上比較有彈性，所以也給了我們在福傳方面很大的方便，讓我們享有更大的空間去宣講天主的聖言。筲箕灣區窮人特別多，不少是水上艇家，我們租用一艘小艇，就可以經常探望他們。

恩理覺主教之去世及白英奇主教的接任：

1951 年 3 月 5 日，恩主教在灣仔聖方濟各醫院安逝。他逝世後，白英奇主教接任為香港主教，由於當時他仍處身惠州，戴霞齡 (Riganti, 1893–1965) 蒙席就暫時出任為代理主教。其實，當白主教於 1949 年 10 月 9 日被祝聖為香港輔理主教時，他身處中國何地，我們在香港也不得知。

1952 年 10 月 17 日，白主教在中國海豐度過了 14 個月的鐵窗生涯之後，終於獲釋。那天，他偕同幾位受着同一考驗的神父從深圳乘搭火車於晚上八時五十分抵港。這位為港人期待已久的主教露面時，穿着一身苦力衣服，顯得瘦削而憔悴，站在那兒，受到港人熱烈地鼓掌歡迎；之後，就在同一火車上，給他披上了主教袍，並高唱「基督得勝」(Christus Vincit)；隨後，就接他到主教座堂去。在那裡，他向港人頒發了第一個主教的祝福。

五十年代的香港社會：

(1) 中國的政局慘遭韓戰破壞。由於中國捲入了戰鬥的漩渦，遂遭到聯合國的制裁，禁止與中國通商，不論商品或軍用品，一概不得輸入港口。這些措施，最終都會為香港的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香港受着經濟猛然下滑的威脅，只得透過本土和地方性的資源去維繫經濟的命脈。須知香港能在嘗試中成功，實在有賴多方面的因素：港人的奮鬥精神，廉價的勞動力，政府大量資金的投放，自由競爭的政策，都吸引了不少外商到本港投資，使香港在幾年之內，就成了一個興旺的商業中心。

(2) 對香港來說，1952 是個難民年。由於大陸為紅潮波動，觸發起移民潮，兼且香港好客、當時來者不拒。所以難民就不斷地從地面擁進這片殖民地；抵達的人雖然身無分文，但勝在鬥志十足，經常準備從頭開始，重整人生，所以我們都會協助他們找工作，為他們的孩子找學校，又向他們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

(3) 1953 年是香港紀錄上比較乾旱的一年。當時，成千上萬的難民，大都住在利用政府公地搭建成的小屋子裡，地狹人多，經常引發火災。²⁹自 1949 年以來，加速為難民建設房舍，就成了當務之急的事；此外，學童的教育，成年人的就業，以及各項醫療和社會問題等，都有待解決。香港土地狹隘，向上發展，建造多層屋宇，便成了別無選擇，且具備香港特色的解決住屋辦法。待屋宇建成後，政府就把暫住於公地的難民徙置到這裡來；這些稱為徙置大廈的廉租七層建築物，旨在向難民提供遮頭之瓦，其他如舒適的設施和私隱保障就欠奉了，那些徙置區經常是引致社會弊病發生的源頭。

(4) 向難民的子女提供教育是迫切的問題——嘉諾撒修會擴建學校

給難民的子女提供教育是急不容緩的問題，政府卻苦無足夠的合格老師和校舍，只得向辦學團體求援。主教積極地響應了政府的呼求，嘉諾撒修會也秉承會祖昔日扶助窮苦人家，協助他們在促進子女人格發展上不遺餘力的精神，深信如果會祖再世，定會配合主教的呼籲，這正好說明了為什麼修會會突然加速了擴校的舉措。

29 編年紀事冊記載：那劣質不結實，有如蜂窩般，在山邊懸崖受狂風吹襲的建築物，只要有星星之火，已能引起一場無水足以救援的大火災。

就在那年的聖誕夜，竟發生了一場大火，以致 40,000 多人無家可歸，一夜之間增加了幾十萬赤貧，而極需要救助的人。(1954 香港年鑑)

遭大陸驅逐出境的修女們，此時正大派用場，她們中有不少是從事教育的，正好舒緩我們當前的急需。當其時，香港很多小學，包括嘉諾撒會的學校，為了使更多兒童有機會享受正規教育，都紛紛實施上下午班的學制。除了上下午班，還有一類由下午三時卅分開始上課的另類學校。她們都是來自那些無能力支付正規日校學費的家庭。（其時香港並未實施免費教育）。這類學校的教師，通常是由部份日校老師於課後義務任教，也有部份「義務教師」是高年級的中學生。此外，夜校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學生都是日間必須上班工作的女青年和少婦。這類夜校，我們在筲箕灣，香港仔和尖沙咀都有開辦。校舍和義工教師當然也是向日校徵用的，部份能力所及的學生，也有些加入了義工隊。最令我們這些義工老師感欣慰的，莫過於見到一些接受過我們協助的學生，一朝成才之後，除了投身教育工作或社會其他專業服務之餘，自己又抽身做義工。這真是不枉我們花費了這許多心血和時間去從事「心的培育」工作。

1955 年 3 月 2 日，在九龍城出現了一間新的聖家小學。其實，遠在 1940 年 6 月 5 日至 9 月間，曾經有幾位修女在那地區服務；她們在那裡開辦了一間規範不大的學校以及一間診療所。是按恩理覺主教的意思成立的。按修會紀事錄記載：「1955 年白英奇主教在舉行彌撒後，把聖體留在小堂，以確保在那裡工作的修女獲得天主的祝福。這地區人口稠密，目前，我們已錄取了 300 名學童。」

該年，住在紅磡的修女也開辦了一間小學，一間診所，還有一間像營房的聖堂。那小學原名聖德，其後改稱天神學校。在新校舍尚未落成之前，這所原先在紅磡，於 1942 年遭戰火毀滅的聖德小學，就是借用聖家小學上課的。新校址離原校址不遠，在它尚未借用聖家以前，曾被遷徙到一所鋅鐵的大屋去，那座像穀倉似的東西距離舊校不遠，可是只供暫住而已，因為政府有意把此地夷平，為難民興建廉價屋邨。1958 年紅磡新校舍落成，借聖家小學上課的聖德遷回新校，改名天神學

校，分上下午班上課，共有學生 1,400 名；聖家小學亦因為不必借出校舍而自成上下午班小學。

1956 年 2 月 1 日，香港仔培德新校舍落成，取代了為期已久的兵營般的校舍；除了小學以外，那裡還開設了一間診所和一間慕道中心；此外，修女們又會週期性地探望住在艇上的無數漁民。英國意識到這片殖民地處境的脆弱，因此，它就第一個去跟中國中央政府搞關係。與此同時，香港亦繼續在「借用的時空」裡生活下去。再者，香港也是共產主義的中國跟其他國家之間，通商的主要接觸點。

1957 年終，香港的人口已升上到 2,600,000，其中 700,000，是從中國進入的難民。當時教友總數共 118,600 人，在這些年內歸化的計有 16,000 名。修女的服務擴大了，教會及修會的體積亦隨之增長起來。

譚修女 (Ida Tamburlini) 在日軍佔領香港期間，不遺餘力地四出，去幫助移民、失業者 and 貧困的人，她簡直是當代的一位傑出社會工作者。³⁰

30 協助有困難者天使的逝世：Sr. Ida Tambulini，是當時香港有名的「貧人救星」於 3 月 12 日逝世。因為凡有求於她的，她都會協助到底。例如：為貧困者找房子；為病者求的醫院一床位；為貧窮孩子取得學籍；為難民求得出生證明書……等等，當她每次在中區過馬路時，交通警察便會暫停所有車輛，讓她先通過。當她進入政府部門辦事處辦愛德的差事時，所有的人都會立即注意這位嘉諾撒仁愛會修女。她以幾句廣東話和不完善的英語，別人便會明白和聆聽她這最有效的愛德語言，所以，她總獲得她所需求的一切。

教區週報 Sunday Examiner 有這樣的記載：問及她這樣上了年紀，怎能如此非凡地去應付所有不同的人，不論男與女，貧與富，友與敵。她解釋說，幼兒時，她與 14 位兄弟姊妹一起成長和遊戲，現在只是改換了場合，她只是重演她在家庭時的角色——與人相處吧了。

M. Ida 50 年來工作如一日，從不知疲倦，無私慷慨地去協助向她求助的人，數目真是多得勝數！能給他們物質和精神支持，是她最大的喜樂和報酬，沒有什麼能阻撓她去協助別人，一切她總找到辦法，使貧者及有需要者喜悅，成了她生命的呼吸。

初期她在香港聖心學校服務，培育了很多女青年，她們都沒有忘記她。在寄宿舍做舍監時，則相當嚴謹，但很明事理和有愛心如母親。不過，是另一項

逢星期日，我們都會在修院為兒童開辦主日學，參加者非常踴躍，堅道約為 800 名，聖瑪利 700 名以上，香港仔 400 名，筲箕灣 200 名，那些難民的孩子都樂意湧到修院來聽聽天主的道，在那兒度過一個快樂的下午。

1958 年，按華僑日報 8 月 3 日報導，全港學生總數升至 400,000 人，其中 10,000 名以上就讀於嘉諾撒會主辦的學校。那時，教會和修會的體積也相繼膨脹起來，74,466 名學生之中，27,710 位是天主教徒。



嘉諾撒培德書院

甚麼都阻止不了修女們為她們服務的人效勞；她們跟隨會祖聖女瑪大肋納的精神，學會無論在甚麼景況下，都只以天主為靠山的。

在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嘉諾撒醫院被夷為平地，為了服務市民，必須重建，我們打算建成一幢四層高的美輪美奐的醫院。計劃好是好了，建築費呢？我們已經為它投放了二百萬港元，可是尚欠二百萬，錢從那裡來？.....此外，聖方濟各學

事業使她出眾和不容忘掉的。1938 年，她成為修會的財政會計，直至逝世為止。這項工作使她有機會接觸很廣泛，各不同階層的人，特別是政府各部門的公僕以及四年由日軍佔領的香港政府。那些年來，她要肩負養育自己修會的修女和幾百多個住在同一屋簷下的人。M. Ida 常常要從一辦事處跑到另一辦事處，直至得到所需為止。這通常都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但她總以恆心、技巧和爭取，而獲得最後勝利。

有一有趣軼事至今在會省仍流傳著，就是有關她在日軍佔領香港時，如何應付日本的權威而向他們取得食物的供應。她告訴他們她要為許多人餬口，除了難民外，還有她的很多姊妹 (Daughters of Charity)，大約 70 人。如果需要照顧幾百個嬰兒、孤兒、老婦人和傷殘人士，她們一定要有飯吃。那日本軍官定睛看她而不相信，以他不大流利的語言問：「誰是這位仁愛先生，他竟有 70 多個女兒？」他查問了她，她怎樣回答，我們不得而知，只知她獲得了她的所求。

校的學生數目亦不斷增加，中小學都須要考慮擴建校舍；目前純粹由於欠缺地方，嚴格地說，校舍正式懸吊在山坡上。

筲箕灣學校和相連的修院的重建工程都已完竣；共有 34 班小學，1,502 名學生；中學由於剛剛開始；暫時只有兩班，學生 98 名。目前在那兒服務的修女共有 7 位。

第三部份：1960 – 2000

1. 百週年慶典——繁忙的年代 1960–1966：

1960 年是嘉諾撒仁愛會抵港一百週年。與 1860 年嘉諾撒修女初抵此「不毛的山頭」作比較，香港的人口由 90,000 躍升至令人難以置信的 3,200,000，理由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以下兩項，一是 1937 年日本侵佔中國，令大量的廣東省難民南下托庇於英國殖民政府之下，二是 1950 年初因中國政府政權轉變而引致的大量難民湧入。

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1941–45），人口由 1,500,000 下跌至 600,000，主因是日軍大量逐放本土華人，其次是大量市民選擇逃難返回大陸；直至 1946 年底局面穩定後，人口恢復至 1,600,000，至 1956 年，人口已升至 2,500,000。人口急增意味着拓展天國的工作有待展開，嘉諾撒仁愛會的修女正以其服務和慷慨面對此挑戰。

香港和澳門同樣面對大量的中國移民湧入的嚴峻問題。修會 1960 年的年報指出成千上萬的家庭越過竹幕，湧進香港，危機始自五零年代早期，從未間斷，且因中國獨有的困難而加劇，數以百計的移民如潮水般湧入港澳這兩處殖民地，他們用盡千方百計，更多的是非法入境，在晚上，從邊境潛入香港，在日間，則在中國海游泳進入澳門。短時間劇增的人口衍生了巨大的住屋、就業、健康護理和教育等問題，香港政府雖傾全力加快興建廉租屋、學校和醫院以應付所需，但仍是杯水車

薪，醫院的擁擠常出現三個病人共用一張牀。就學人口數量猛漲至接近一百萬，五分之四的需求是小學，其餘是中學。每個徙置屋邨皆有天台學校的設立，學童每天往返皆須走過無數的梯級；我們在香港仔田灣區也有一所天台學校，這類學校多分為上下午校，以利多收學生。在這情況下，政府要倚賴志願機構的協助，而天主教教會是最早響應的，這令在香港教區的修會團體——無論男女修會——皆感到壓力，迫令他們親力親為，投入工作。由於嘉諾撒修女人數眾多，而且本地聖召也多；白英奇主教遂要求修女鼎力協助，據修會的檔案記錄：「1961年9月1日：得到會長的允許，我們接受管理一所由白英奇主教提議。位處於香港仔的職業學校的運作，這所學校照顧 12 至 15 歲完成小學而未能升讀主流學校的女孩子，按她們的愛好和能力，教導她們英文、中文、針黹、編織、打字和速記。學校樓高四層，由德國天主教福利會捐贈給香港明愛，其實中心在前一年的 7 月 6 日已開辦，三位居住在香港仔培德會院的修女每天往返中心，管理一間診所和一間廚房，為約 500 名貧童提供免費膳食。中心獲得香港天主教婦女聯會捐贈一架寬敞的小型巴士。除了獲得免費膳食外，為中心工作的學生還可收取港幣壹圓的酬金。此牧職是極為需要的：「香港仔擠滿住家艇或緊靠山邊的舢舨，很容易受火災和風災波及。這項牧職為女孩子提供一所職業學校，它由慷慨的德國人民提供資助，接收了一所舊的化學實驗室，香港明愛亦提供各類的機器——縫紉機、編織機、打字機及烹飪器具等。早前設於培德學校的診所亦遷至此中心。由於地方大了，一位負責廚房的修女要為多達 2,000 名貧苦者提供及分派膳食。三個提供資助的機構為：德國天主教福利機構（Misereor），香港明愛及美國天主教福利服務組。在地面樓層開設教導船隻修理，教導殘障人士學懂用機器製造麵條及樽裝牛奶。在一樓設有不同部門：牙科及放射科、康樂室和圖書館，亦有急救班和攝影班的開設。在二樓設有毛紡織機及手工藝室、小教堂及社區總部。在三樓設有各

類特別室，適合教授打字、縫紉、裁剪、刺繡和家政，全部托交修女管理。」

1961 年 9 月白英奇主教為設於羅便臣道的聖心小學新校舍祝聖。新校舍樓高 6 層共 36 個課室，附設有蓋操場及特別室。

在為回應時代急切需要而召開的代表大會期間，樓宇改善及興建工程亦同時展開，計有：擴建位於灣仔的聖方濟各學校、九龍聖家小學和澳門聖心學校。大量的難民湧入衍生另一問題——孤兒的出現。「在香港有這樣的做法，就是將孤兒托付給家庭養育，以便將來給本地甚或海外人士領養，但在當前大量難民湧入情況下，我們接收有家人的孩童，以應付特別的需要。」事實上，有許多個案是涉及孩童被性侵犯和被父母或男性的親屬所虐待。他們大多是住在木屋中，沒有個人空間或基本的需要。

其他類型的服務包括在九龍聖瑪利，港島的赤柱和堅道照顧那些愛爾蘭籍的天主教軍兵家庭，教導孩子們要理，探訪醫院及香港仔漁民。

至此，嘉諾撒修會已穩定地發展。修會紀事錄：本區會共有十個團體，以教育為主要服務，此外，有嘉諾撒醫院，及正在籌備中的明愛醫院（Caritas Medical Center），後者位於九龍蘇屋邨，是一所為貧苦者的醫院，尚在建築中。雖然這所醫院是屬於明愛的，但白英奇主教堅持修女負責該院的管理及牧民。

在香港的嘉諾撒會學校學生數目不斷增加。以下是修會的統計（1960 年）：

學校	小學	中學
聖心（香港）	2538	1755
聖瑪利（九龍）	1402	1420
聖方濟各（香港）	1086	600
筲箕灣嘉諾撒修院（香港）	1924	237
培德（香港仔）	1080	—
聖家（九龍）	1288	—
天神（九龍）	1523	—
菲律賓	1066	—
日本	1650 (在小學和 中學，幼稚園有 220)	

以上的統計不包括商科學校、夜校及正規學校下課以後的義學。

在澳門，有聖心英文部及中文部（又稱粵華），有數千名學生的培貞。在路環，有一所規模較小，為當地貧苦村民而開辦的聖母聖心學校。

除了醫院和學校外，修女還有五所孤兒院，兩所在香港（堅道及西環），三所在澳門（望廈、培貞及路環）。在港澳尚有殘障人士宿舍，善終服務，為社會上最卑微弱小者服務，正如會祖一樣。

診所和藥房也是當時迫切的需要，嘉諾撒修女在香港仔設有三個診所。一個在西環，另一個在筲箕灣。澳門則在望廈及路環。這些診所通常擠滿了數以千計的難民。

60 年代初，香港最大的需要是救濟工作，同時也是拓展天國的好時機。修女們透過探訪醫院，為很多病人及垂死者給予牧民工作，陪伴他們走過病苦或甚至絕望的路途。很多病人要求臨終領洗。於是，修女們為數千垂死嬰兒及數百成人付洗。

學校方面，這年代是宗教善會的全盛時期。在修會的記錄中，計有：聖母軍、聖母孝女會，聖體軍，耶穌小朋友，痛苦聖母會，玫瑰軍，聖母無玷聖心御衛團，天神會，綠洲，依肋斯會，祈禱宗會。

主日學方面，各會院都有無數的高中生協助修女辦主日學，學生退省，成人退省，每月靜修等等。

慈幼會神父在西環薄扶林開辦了聖安多尼學校，他們邀請嘉諾撒徐倩玲修女為小學校長負責女校部。當時有 24 班，共 600 名學生。

至 1968 年，剛開辦了四年的香港仔（田灣）明愛社區服務不斷拓展，幼稚園有 90 個小孩，一個為弱能兒童服務的部門，一個診所，一個牙科診所，放射綫部門。此外，修女們常常探訪家庭。

1964 年 12 月，總會長修女到香港巡視，她被這許多的宗徒服務所感動，建議在省會院的小聖堂有長期朝拜明供聖體，藉此支持宗徒服務。於是修女們，學生們，孤兒，老人等輪流朝拜明供聖體。

到 1965 年，修女們的工作不斷增加。8 月 23 日，在田灣徙置區天台的瑪大肋納嘉諾撒學校正式開課。那是一間男女小學，分上、下午班。這是嘉諾撒修女接受教區邀請的第三個計劃，包括 1961 年在香港仔（田灣）的聖高佛烈職業學校，1964 年在九龍蘇屋邨的明愛醫院。³¹這所學校的收生條件是貧窮，正如會祖所要求的。

31 樞機 Frings 指出：這醫院定名為「明愛醫院」有三個理由：

- 1) 因它以愛心為出發點和目的：目標是照顧 500 多窮人，而在兩年內，如是上主的旨意，將會增多 300 床位。這些都是貧苦而有需要被照顧的人。她們會用基督的愛去照顧他們。
- 2) 因為它的特徵是仁愛的施予 — 這中心是仁愛中心，以內外的協助窮人為基礎。

根據香港政府年報，1965 年的香港已習慣了每月湧進來數以千計的難民，生活水平也有改善。「不幸地，不是所有人的生活豐足了，還有不少人需要經濟的援助及支持。這一年來，大家也感到需要一個較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來改善那些不幸者的生活。適齡入學的數目大增至九十萬，政府計劃津貼所有小學。至 1968 年，將小學從五年制改為六年制，銀行和商行提供獎學金來鼓勵教師接受培訓。

修女們不論在教育，社會和牧民工作都忙到透不過氣來。政府的報告道出「香港是一個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社會背景，接近四百萬人口的社會，共同分受困難、渴望和成就的社會。二十層高的酒店陸續興起，這個城市逐漸爬起來。雖然大多數市民都是近 16 年來的大陸移民，現在已十分有自信，愈來愈多家庭擁有汽車，穿着入時，生活更舒適。但還不是值得自滿的時候。」當然這話不是指天主教會或嘉諾撒修會，因為他們仍要照顧數目龐大的貧苦者，需要教育的孩子，需要照顧的患病者和流離失所的家庭。

60 年代末期，香港的情況已逐漸穩定下來，棄嬰逐漸減少，西環的聖心孤兒院地下一層變為托兒所，照顧 30 多名 3 至 6 歲的小孩，讓他們的母親可以出外工作。

2. 文化大革命對香港造成的衝擊 1966–1970：

直至 1966 年春天，香港人安享了十年的太平日子；惟是到了那年的 4 月，九龍突然發生暴動。歷史証明了九龍的騷亂只屬冰山一角，是暗病的徵兆，是一連串更嚴重事故的開端。這些嚴重事故就在接着的那年發生了，香港人十分擔心，嘉諾撒修會的人也十分擔心。1967 年夏天，形勢更趨惡化，對人的威脅更趨明顯和實在。這次動盪，是中國剛開始的文化大革

3) 因為它將以行動表達仁愛 — 我們不能服務病人而缺乏深厚的人性，即使如此，我們仍以基督無限的愛去服務他們。

命帶來的。澳門則在 1966 年 12 月 6 日開始發生騷亂。鑒於情況惡劣，意大利領事向修會的省會長承諾，如果情況危急，他會提供船隻把修女們疏散到香港去。而在香港這邊，竹簾無法阻擋強風攝入，修會很憂慮甚至很驚怕；萬一文化大革命「漏」到這個英國殖民地來，那怎麼辦？這兒的教會正在教育着成千上萬的年青人，他們會怎樣？教會這時明白到必須盡快以天主教的道理去教育年青人，加強他們的信仰，為他們作好準備，以應付將來可能遇到的一切事情。教會的擔心是有理由的。

「香港會區——1966 年的週年通告函件這樣寫着——在這殖民地上辦了四間大型中學：會區座院 (Delegation House) 的聖心，學生逾五千人；九龍半島的聖瑪利，學生三千人；灣仔聖方濟各，學生接近二千人；還有一所全中文學校在筲箕灣，剛逾二千人。」這些學校一旦被無神論的觀念滲透的話便會造成很大的破壞，而當時情況正存在這危險。香港有些官立學校已經出現了這類滲透現象，甚至連一些聲譽極好的學校也有此情形。眼前的緊張氣氛令修女們不得不認真地檢討她們辦教育到底所為何事。將來會怎樣，無人能預知。既然中國有可能會收回這塊殖民地（畢竟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那麼，加強天主教學校學生的信仰便成了當務之急。

就這樣，政治局勢的不穩定，便促使了教會認真地全面檢討旗下的一切工作，尤其是教育工作。情況絕對不容他們「自滿」。「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數量不及質素那麼重要。受洗的人少了，沒錯，還少了些令人感到欣喜的機會。可是，那些已經接受了天主教教義的人，其心志之堅決卻令人十分欣慰。除了中學教育之外，我們又辦小學和幼稚園，在堅道、香港仔、灣仔；還有九龍的聖瑪利、聖家和天神。以上的小學每間都有超過一千名學生。由

於全部都設有上下午班，所以每間便等如有大約二千人。我們又替明愛管理一所職業訓練學校，是位於香港仔的明愛服務中心。香港仔還有一間由我們開辦的一所徙置區天台小學，專收區內貧苦學生。這真是一所充滿我們會祖精神的學校啊！」此外，當然還有澳門。我們負責兩間醫院，私立的嘉諾撒醫院有病床二百張，其中一間病房是預留給貧窮人士用的，以體現我們的真正仁愛精神。九龍的明愛醫院則有病床超過五百張分佈於各個不同部門，全部都是預留給窮人，所以我們有很多機會做好事，不論在物質方面還是心靈方面。修女們從事行政工作和牧靈工作。凌月仙和香港仔都設有配藥處，後者附設於明愛，專為一所名叫“Madonna”的水上診所配藥。「我們在堅道開辦了一所專門收容中國女孩子的孤兒院，入住的人越來越多。聖方濟各收容了 76 名失明女童」，其中 40 人是宿友。成年失明婦人則住在摩星嶺的嘉諾撒修院。為了幫助勞工階級，我們設立了數間夜校。我們為年幼天主教徒開辦主日學，我們做家訪，我們探望囚犯。簡單的說，我們是以極少量的人手做了極大量的工作。我們的初學院是修會將來希望的泉源。」

就這樣，竹簾外的強風正從簾縫吹進來，形勢十分危急。假如局勢再不穩定下來，我們的損失將會很大。目前看來，實在一切都很難說，香港澳門都一樣。1967 年初，澳門形勢突然急轉直下，天意安排了當時新上任的總會長 Giovannina Zambelli 來訪。她堅持要去探訪一下那裏的修女。訪問雖然只是短短一天的行程，但卻對那兒的四個分院團體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促使修女們堅定勇敢地留下來繼續完成她們的使命。

1967 年 5 月，香港開始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罷工示威，無日無之。主教囑咐省會長把所有的文件好好整理，妥

為保存，特別是關於中國修女的文件，以防形勢進一步惡化。他建議在有需要時把年老的和初學的修女送往別處暫避。總會長給我們的省會長高度自由去決定採取什麼行動，但聲言她已作好準備，隨時可以接收任何數目的修女前往意大利，還說如果有修女希望留居東方之話，她們可以前往澳洲。意大利駐港領事問我們可否在情況危急時，向 60 名現時住在香港的意大利人提供食宿。我們把新落成的那座大樓的三樓給了他用，因為那層樓還未有人入住。他非常感激我們，又向我們保證會負責這些難民的一切生活費。這計劃始終沒有實行，我們無須接待任何難民。

1967 年的週年通告函件雖然也有提及香港發生騷亂，但卻所述不多。寫這份函件的目的，是為了消除意大利方面的恐懼，因為他們恐怕中共會立刻收回香港。

「這幾個月來，我們在香港像是運氣也透不過來似的：新界和九龍都有人肆意破壞公物，我們有三間院所就位於那邊……罷工示威……導致人命傷亡，有人無辜受到牽連，甚至連小孩子也不能幸免。我們作為一間傳教機構，怎會不明白這些行為背後的用意？我們那些被中國驅逐出境的修女便有親身經歷：這些都是共產黨慣用的技倆，用以消磨人的意志。香港是一所「傳教士工廠」，同時又是開向中國的一個窗戶；所以，縱然發生了這些劇變，我們仍然生活如常，每天仍然有一群一群的年青人踏進我們的校園來接受教育。我們的修女面對此棘手情形，都處變不驚，以平常心對待，並把一切宗教事宜交予天主，永遠信任天主，相信天主會施加援手。但願天主聖母都會保佑她們。」

修女們的確是勇者無懼；她們勇往直前，如常工作，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似的。事實上，很多不尋常的事正在發生，局面完全不是通告所描述的那樣平靜。

多謝天主！修女之中沒有人受害；她們所照顧的人之中，也沒有人受害。不過，修會決定了把部份新加入的初學生送往歐洲繼續接受訓練，一些送往意大利北部，其他送往英國。省會長在 1967 年秋天往意大利參加修會全體代表大會特別會議時，帶了四名中國初學生一同前往，讓她們在外國完成培訓。

6 月 23 日，教區各男女修會會長應白英奇主教之邀請，齊集於明愛禮堂，與教廷駐華大使高理耀蒙席（G Caprio, 1914–2005）會面。高理耀蒙席專程從台灣來港親身了解形勢，以決定情況危急時該怎樣做。他力勸各位會士毋須驚恐，並且激勵他們繼續抱着對主的信仰和信任如常地工作。他又說天主教教會和屬下的傳教士將會留守原地，直至真的遭到正式驅逐出境為止。情況惡化的話，最早離開的將會是中國修女、年老的、年幼的、和有病的。所有文件都應該妥為整理保存，以防萬一。天主教教會將會與基督教教會聯成同一陣綫。教會學校、醫院、社會服務組織等等，都實在太重要了，如果無人繼續辦理，那便太可惜了！

1969 年灣仔會址慶祝成立一百週年，這所會址是英年早逝的顧姆姆（Lucia Cupis）離世前在香港成立的第二間。

「這所房子初時十分簡陋，（由於沒有住處，修女們曾經有一段時間需要搭車往還，後來有地方居住時，居所亦十分簡陋。）如今，它已是一座使人引以為榮的大型學校，連失明女孩子的教育它也照顧到呢！」

同年，總會長連同一位參議員再次訪港，並且帶來了一份重新制定的憲章。那次特別代表會議之後，重組了我們的會省：日本和菲律賓從前是我們這個會省的一部份，但現在成為了獨立會區，稱為 the Delegation of St. Michael the Archangel（日本）和 the Delegation of San Pablo（菲律賓）。日本會區

是 1951 年成立的；而菲律賓則是 1954 年成立的。現在兩者都已「長大成人」，可以自立了。

在這同一年間，又一次按主教的要求，開辦了一所新學校，位於黃大仙（九龍市區的一個衛星城市）。它是為了照顧警察子弟而設立的。

十年未過，這會省已有 16 座院所：香港九龍 11 座，澳門 4 座，台灣 1 座。港澳的學校教育工作繼續蓬勃，但是香港的孤兒院發展則停滯不前。由於香港社會福利署的政策是讓人領養兒童，因此我們收養的兒童數目便越來越少。澳門情況不同，因為澳門政府暫時未有加以干預。香港的修女很珍惜這項能夠發揮典型的「嘉諾撒精神」的事工，於是逐步以殘障兒童取代原有的孤兒。這些殘障兒童多數來自破碎家庭。

60 年代末期的另一個現象就是修女們更多參與堂區的牧民工作和社會工作。有些修女全部時間都在堂區工作，有些則出任教區不同的委員會委員或教區牧民議會委員。有 15 人曾經參與由當時新上任的徐誠斌主教（Francis Hsu, 1920–1973）召集的教區會議。

3. 十年的評估期 1970–1980：

60 年代是學校、醫院、社會服務中心的發展期。接着的十年着重質素而非量數。有關建立分院，新服務及承擔，再沒有新的需求。此時，會省方面開始感到沉重的擔子。50–60 年代，基於中國大陸政策改變，從「大躍進」及接着的「文化大革命」導致實際的大飢荒，引發難民從中國湧來。其後殖民地一切漸趨正常。由於本地聖召數字下降，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亦減少，還有其他內在問題，導致會省要放棄一些現存的服務，關閉一些分院。

1970 年 2 月，香港首任國籍主教徐誠斌主教，正式召開教區會議；從 1968 年 11 月開始籌劃，延伸至 1971 整個年度。

有關我們會省方面的情況：1972 年，嘉諾撒聖家書院落成；1973 年 9 月，在灣仔開辦的嘉諾撒達言學校是基於教育司署邀請仍在社會福利署主持的「聾童會」內學齡兒童提供正規教育而設。那是香港教區唯一的這類學校，班級包括：學前、幼稚園、小學、中學。1974 年，位於香港仔的嘉諾撒培德書院相繼投入服務。同年，新任省會長（Lily Ann Medina）在她首封聖誕通告指出，我們會省共有十八個會院，分佈在香港、澳門、台灣。主要服務的地區，教友人數少於百份之五。因此我們在會省的教育、醫療、社會工作.....服務，可算是，「福音前導」，比「真正福傳」更貼切。

部份修女全職投入堂區牧民工作，或兼職教慕道班。同時修會也安排修女參與教區牧民議會、教理中心及教區聖召委員會.....等等。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教會內引發了一股革新潮。而嘉諾撒修會團體在教會引導下，立即全力以赴，去配合整個教會的更新。

隨着梵二及「修會生活革新法令」，會省以「試驗」性質，開始一些小團體，其目的是簡化生活方式，務求團結及集中某項服務。如此，從 1975 年開始，一些「先鋒團體」出現。

該年 2 月 2 日，筲箕灣發生一場大火，剛好在我們會院後面。結果，3,098 位貧窮人士失去家園。慈幼會和我們的修會臨時招待了許多無住處的家庭。

1977 年 1 月 30 日，總會長去信胡振中主教，說明：鑑於我們修女在九龍明愛醫院負責了十六年行政工作，現因應香港省會長的要求，希望能辭去醫院裡負責行政的職務：「這十六年來，本會修女在明愛醫院竭盡所能地服務着。現本修會懇請可敬的主教批准本會修女退出在院內負責管理行政的職務，原因如下：

讓修女們能在院內推行更多牧靈性質的工作

醫院的規模已發展為頗龐大的機構，我們沒有合適的修女去應付，這也不是我們修會的慣例。如醫院方面仍需修女們負責院內某些部門，以作支援，我們亦樂意盡量去配合。」

經過與總會長、省會長及負責醫院行政管理的修女商討後，胡主教於同年 5 月 20 日的回信中，接受了修會的請求。

4. 香港廿年多事之秋 1980–2000：

1981 年 5 月 4 日，是我們慶祝筭灣會院創立 90 週年之際，亦是我們與這所會院告別的日子。這是由於城市規劃，政府須要取回這塊用地，該會院因此而要關閉。三年後（1984），前筭灣嘉諾撒修院學校遷移到鰂魚涌海澤街去，成為兩所獨立註冊的學校，稱中學為嘉諾撒書院，小學為香港嘉諾撒學校。

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的前途問題在北京簽署了聯合聲明，聲言香港將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中國。修會方面也因着未來的不明朗局勢重新審慎評估本身的實際情況；面對人力持續減退的狀況，深知再不能如以前一般慷慨地委身於大量的服務。隨着本地聖召的短缺，修女年齡上升，兼且再沒有從總部派遣的新血支援，修會再不能像 50 年代，國內人潮湧入香港之時一樣地不斷擴充服務，還須懷着沉重的心情，減去一些宗徒事業，並關閉部份會院，以便集中力量去面對轉變中的社會需求。在這期間，雖則修女們依然繼續如常地生活，可是對修會來說，那確實是一個每事必須按重要性重新調整的艱苦時期。一切都不能不從中國要向英政府收回香港的事實去思考問題。1961 年間，難民依然不斷由大陸湧入；「明愛」鑑於他們亟須支援，在香港仔田灣設立了一個明愛社區中心，邀請修女前往服務，並委任四位修女留居該中心。隨着歲月的消逝，難民潮停止了，一切回復正常。

1985 年省會長李永援修女（Marie Remedios）以下列為由，向主教以及香港明愛總裁提請，讓修女撤離田灣中心宿舍和肩負的眾多職務：

該中心宿舍並非修會物業；

修女肩負太多職務難於跟團體生活的要求取得協調；

院長在中心肩負的眾多重任，跟她本身為修院院長的主要任務；即給予會員精神鼓勵與支援的任務有所抵觸；

修會缺乏接替她的人，同時在修院內最終亦無修女有調任的需求。

省會長亦向主教保證，如果明愛須要修女為中心的學員提供靈性方面的服務，修女樂意隨時效勞。主教胡樞機以及香港明愛總裁力理得神父（F. Lerda, 1926–2003）接納了省會長修女的提請，讓修女遷離明愛社區中心宿舍。

1986 年，修會亦結束了自 1960 年 9 月在灣仔為視障學生創立的嘉諾撒啟明學校。這是香港唯一一所為弱視學童而設的公教學校。這當然是一個傷痛的決定。可是，迫於某些環境因素，修會亦別無選擇。在省會長致總會長議會的一封信寫着：為了這項決定，教署和修會之間，經過了一段漫長的討論，說明過去幾年所經歷的困難，最後才作出這決定。

以下便是教署和修會雙方討論的重點和結論：

修會表示近幾年弱視兒童的報讀率偏低；

政府建議並堅持修會最好兼收各類殘障兒童；而修會則認為由於欠缺專業訓練人才是個重大困難，不宜輕率答應；

經過漫長的辯論，政府終於決定於 1987 年 9 月把該校關閉；

校方於停辦前一年把決定分別向主教滙報和知會有關家長；其中必會遭到家長抗拒是我們的意料中事，不過問題最終都獲得了解決。

8 月後，香港仔培德幼稚園亦已停辦。省會長致總會長的信說：經過三年的部署，讓幼稚園在學的學生全部畢業以後，今年暑假後，幼稚園即將停辦。以下是省會長所列的停辦理由：

校舍殘舊，不適宜作辦學之用（它其實是我們在香港仔的那座極舊的會院）；屋頂嚴重破壞，維修費用龐大；

香港仔區有足夠的幼稚園學位為那裡的兒童；孩子幼稚園畢業後，大體上都能獲政府派位入讀小學，特別是公教兒童更有機會入讀我們有質素的培德津貼小學；

省區的修女人手短缺，難以繼續開辦。

1986 年，服務了當地青年約 20 年的筲箕灣夜校也相繼結束。

培德夜中學亦於 1989 年 8 月關閉。

以上兩間夜校停辦的理由除了因為修女人手短缺外，就是：

今天的香港青年都享有 9 年免費兼強制性的教育，直至 15 歲（中三）；

香港明愛機構和教署，在港九各區亦開辦了專為那些修畢中三以後，不再繼續入讀正規學校，而轉讀自己興趣較濃厚的專科日、夜校。

1988 年 6 月，教區胡振中主教榮升樞機，同年 10 月 2 日，會祖在羅馬被冊封為聖女瑪大肋納嘉諾撒，兩件喜事都使我們非常振奮。

同年 11 月 19 日，Asia Focus 報刊登了一篇報導，標題為：「香港回歸後嘉諾撒修女依然留守香港」。省會長接受該報章訪問時說：「將來要發生甚麼，沒有誰會知道；我認為比停留在恐懼中更重要的，是實事求是。我們嘉諾撒修女，在港澳一共有 29 間學校，學生超越 25,000 人，在學校內，修女都是積極投入的分子，如果將來有甚麼風吹草動，她們必定會首當其衝！除了教育，修女在醫療、社會服務和牧靈方面，都非常活躍。在港澳服務的修女，一共 170 位，其中半數是國籍修女，她們決不會放棄為這廣大的市民服務。可以肯定的是，她們必會繼續慷慨地忠於過去 130 年來所做的工作。在這修道人手不斷下滑的同時，按 1989 年 2 月 23 日的統計，香港人口的總數卻攀升到 5,017,000 人，比兩年前增加了 296,800 人。」

按照會祖的「必須跟着時代的需要走」的指示，修會於 1989 年 2 月 23 日，在西貢堂區附近設立了一個三人的小團體，在堂區從事牧靈工作。修院的紀事冊有這麼一頁記載：「這裡有很多菲籍家務助理，主日上午九時，堂區會為她們主持一台菲律賓語的彌撒，她們邀請我們參與。這些離鄉別井的女青年，亟須要一點點溫暖和照顧。．．．．．我們樂意為此效勞。．．．．．此外，堂區還有些日籍教友，據說，Annetta Nicoluzzi 被中國驅逐出境後，就轉到日本執教，那些日籍教友，便是在日本認識她的，那時，修女是他們女兒的老師。」

1997 年一天比一天接近，市民也一天比一天焦慮，教會也不能倖免。1984 年夏，香港主教胡振中樞機給香港教會頒發了一道名為「邁向光輝十年」的牧函。1990 年嘉諾撒在香港的省區，為了回應主教的牧函，宣佈會按照修會的特恩（Charisma），和福音精神，在 97 年以後，依然留守本地，為服務本地教會和市民。

1989 年 6 月間，當中英雙方就所擬的聯合聲明向港人諮詢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之間，北京正值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學生以及他們的聲援者，數目不斷增多，政府的反應也越演越烈，最終演變成悲劇。香港人對這事件的反應非常震憾、無數學生和市民都集結起來聲援天安門的學生，並對祖國向港人承諾的「一國兩制」原則產生了徹底的疑惑和震盪。同時有更多人尋求移居海外。

從那時起，直至香港回歸中國，香港教會和修會又繼續如常生活。1991 年 9 月，修會把培德書院委託一位天主教平信徒掌舵，隨後又把昔日的修院宿舍轉作學校用途，原居的修女則跟另一個附近的會院合併。會院的數目從此再遞減了一個。同年，修會復將嘉諾撒醫院的管治權讓給了明愛，修女則繼續在醫院擔任一般護理和牧職工作。

同年 9 月，灣仔的弱聽兒童特殊學校亦由香港明愛機構承辦；到 1993 年 1 月 31 日西營盤凌月仙聖心修院，慶祝了在該區服務 101 年紀念之後，光榮引退，在其內的幼稚園與羅便臣道的嘉諾撒聖心幼稚園合併。修會把該院舍讓給了香港教區。如是，在短短三年內，連續減少了兩間會院；最後，九龍明愛醫院的小團體，亦於 1999 年 7 月遷離了醫院修女宿舍。只是日間仍留在其中服務。以上都是因人手遞減而作的折衷安排。

5. 新發展

自從 1980 年代，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本會數位修女透過香港明愛及澳門天主教福利會，被邀請到國內作短暫式的專業服務。所涉及範圍如下：特殊學校，大專學院的校長，老師，學生，家長培訓班（聽障，智障），孤兒院，護老院工作人員的行政管理課程，英語老師暑期英語課程及在農村，市鎮地區的醫療服務、設施，作出評估及講學。

第一次的服務是 1986 年 7 月在廣州市為廣州市聾人學校老師、幹部們舉辦的一個短暫工作場。直至現今，服務範圍更涉及廣東、深圳市、福建、海南省、四川、雲南、上海市、浙江、安徽、江蘇、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市、內蒙等地。

1990 年度，修會會省大會一致通過支持並鼓勵修女們繼續為祖國作出這貢獻。1991 年，會省成立了「中國大陸服務小組」，為這類服務作出協調。小組職責包括推動會省姊妹們加強意識及放眼看國內兄弟姊妹們的需要，學習普通話及為祖國各方面的需要作出禱告。與此同時，會省大會鼓勵修女們帶動港澳青少年在假期中回祖國作短暫的服務。

會省內修女們並訂下每星期五為祖國及港澳前途作出犧牲及祈禱。期望有一天，這些短暫式的服務能更進一步，成為永久性的愛德服務。

總結

港澳區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所展開的各種服務，主要是配合天主教普世教會，特別是香港教區，去回應當地社會民生的各種需要。修會在這接近 150 年的服務範圍包括：中文、英文、葡文學校、義學、夜校、寄宿學校、特殊學校（視障、聽障）、孤兒院、診所、醫院、社會福利、堂區牧民、福傳。修女們盼望能透過這些服務能提升婦孺的尊嚴及自信，並讓肉身及靈性上貧乏的兄弟姊妹也能具體地親自體驗慈愛的天父對每人的愛護和眷顧。這接近 150 年頭裡，是那無限仁慈的上主編織了這修會在華的歷史，祝福了它在這地區所獻出愛心與服務。但願修會每位成員，能常懷感恩的心，繼續去向每一個人宣揚上主的無限仁慈和大愛。

在此公元第三世紀的開端，尚有無數的人們生活在赤貧的境域。同時亦有不少物質富裕者在心靈上感到極度的空虛與貧

乏。但願每一位嘉諾撒仁愛會修女能成為會祖的「微塵」，在人群中「與時並進」地，去傳揚基督的大愛。

早期的嘉諾撒修女在港澳除了開辦中英文學校外，還設有孤兒院、弱能人士的教育和住宿、義學、夜校、免費診所等等。修女們從照顧他們生活上的需要開始，讓他們經驗到天主的慈愛，是那麼實在的。

21 世紀的今天，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日益增加；至於那些生活富足的人，他們的精神和心靈卻是如此乾涸空虛。他們或以行動，或在心靈裏不斷大聲疾呼：「需要體驗真正的愛！需要基督的救恩！」這黑夜的吶喊，觸動了基督的慈悲心，也觸動了瑪大肋納的慈母心。唯願遍佈五大洲的嘉諾撒女兒，都成為會祖的粉末，與時並進，以最恰當的方式，宣揚基督的愛；也願會祖感召更多青年人，來實現基督的救恩計劃。

嘉諾撒修女二百年來默默地耕耘，以愛去完成當下的工作；上主卻以慈愛和大能編織修會的歷史。願所有嘉諾撒修女常懷念上主的恩德，並將這滿溢的恩德流到所有接觸到她們的人身上。願所有貧苦者，透過修女的服務，經歷上主的慈愛。

附錄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大事年表：

- 1795 天主給瑪大肋納明白自己的使命。
- 1801 瑪大肋納租了一所房子後便開始召集那些流浪的女孩子。
- 5 月 8 日瑪大肋納及她的同伴在韋羅娜的聖若瑟修院開始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服務。
- 1812 瑪大肋納開始在威尼斯的服務。
- 1816 嘉諾撒修女正式在米蘭展開服務。
- 1821 瑪大肋納開始在 Bergamo 發展修會的仁愛工作。
- 1823 羅馬教會正式批准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第三會」。
- 1828 教宗良十二世批准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會規。
- 1828 嘉諾撒修女在脫利騰展開服務。
- 1860 第一批六位修女被派遣東來，她們於 4 月 12 日抵港，接著開辦意大利修院學校（嘉諾撒聖心書院前身）及培青中文學校。
- 1868 湖北主教邀請嘉諾撒修女到他的教區照顧那些被遺棄的兒童及教育貧苦的女孩。嘉諾撒修女正式在湖北展開服務。
- 1874 澳門蘇主教租了一所房子給嘉諾撒修女。嘉諾撒修會便開始在澳門的服務。
- 1877 福建省主教得悉嘉諾撒修女在漢口的熱誠服務後，便邀請修女到他的教區工作。4 月 4 日，嘉諾撒修女正式在廈門展開服務。
- 1891 陝西南部，漢中主教邀請修女來助他一臂之力。
- 1892 河南省南部主教請嘉諾撒修女到的他教區服務。

- 1902 一直以來修會各會院行政獨立。此時，意大利東北部威尼斯地區的會院聯繫起來，韋羅娜的院長成為區會長。
- 1905 香港主教師多敏請嘉諾撒修女到廣東省南頭服務，1907年拓展到汕頭。
- 1912 所有在傳教區的會院也隸屬於威尼斯區會長的管轄。
- 1921 河南省西部孔維鐸主教邀請嘉諾撒修女到鄭州照顧孤兒、學童、老人，並到醫院及堂區工作。
- 1927 意大利及傳教區所有會院聯繫起來，同屬一個嘉諾撒大家庭，由教宗比約十一世指派 Maria Cipolla 出任總會長。
- 1928 恩理覺主教請嘉諾撒修女到惠州工作。
- 1988 10 月 2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策封嘉諾撒瑪大肋納為聖品，特別彰顯她的仁愛與謙遜。
- 2000 10 月 1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策封柏姬達·約瑟芬為聖品，尊稱她為「眾人的姊妹」。

嘉諾撒修女來華

1859 年 7 月，香港宗座監牧盎神父寄信給米蘭外方傳教會會長，懇請他邀請嘉諾撒修女來港傳教。帕維亞（Pavia）修院的修女知道這消息後，都十分雀躍。當修會尚在慎重考慮時，教宗比約十世積極支持這傳教活動，並協助安排事宜。

1860 年 2 月 23 日，威尼斯宗主教 Angelo Ramazzotti 祝福六位年輕而心懷壯志的修女，給她們傳教的十字架，派遣並祝福她們：「我親愛的孩子們，去吧！耶穌是你們的導航，聖神是你們心中的掌舵。」翌日，六位先鋒修女從威尼斯乘船出發，46 天在海上顛簸，多次險被狂風巨浪吞噬，好不容易在 4 月 12 日上午十一時半抵達維多利亞港。

修女們驀然醒覺已踏足預許的福地。她們滿懷興奮與熱誠，撐着疲憊的身體，滿以為神父們會在岸上迎接，誰知等呀

等的，同船的人早已各散東西；六個穿着奇裝異服、言語不通、不知所措的修女，在滂沱大雨下立着，引來不少好奇的圍觀者。

「上主自會照料」，一位同船的義籍商人跑到砵典乍街的聖堂（前天主教總堂），告訴神父有六位意籍修女到港。神父們以為那商人開玩笑，因為他們一直在等候修女從意大利寄來的信。高神父立即跑到碼頭去看過究竟。只見六位濕淋淋、一臉茫然的嘉諾撒修女。他立即帶她們到神父寓所午膳，那時已是下午三時。

與此同時，其他神父四出奔跑，希望在附近找到房子給修女暫住。終於入夜前在堅道租了一所房子，並張羅了四張破舊的床和三張搖晃的椅子。修女們用衣物裹着鞋子當枕頭，在床上安睡。可不是嗎？她們的主沒有枕首之地，她們的會祖也是自願選擇貧窮。想着想着，主耶穌及會祖恍惚就在那小房子裏，與她們同在，翻開了救恩史新的一頁。

第二天醒來，修女們開始面對陌生的語言和風俗習慣；另一方面，盎神父寄望修女能在教育、教授要理和照顧老弱方面助他一臂之力。這個衝擊，比離鄉別井、與風浪搏鬥還要大。但「上主自會照料」。神父陪同前港督寶寧爵士的女兒到來，申請成為嘉諾撒修女。數天後，譚瑪大肋納來叩門，自薦成為中文學校的義務教師。上主又安排了一個善心的葡籍家庭，借出一所小房子給修女們開始會務。這樣，修女們於 5 月 1 日開設意大利修院學校（嘉諾撒聖心學校前身），5 月 10 日開辦培青中文學校及孤兒院。

嘉諾撒修女來華是個「零」的開始，只有一顆完全信賴的心，讓上主去安排，去工作；她們就默默地見證上主的慈愛，並讓這慈愛流溢到貧苦無依的人身上。

1868 年 湖北省

1868 年 7 月 28 日是嘉諾撒修會歷史上的重大日子，因為天主透過湖北的主教，邀請她們到大陸撒播愛德的種子。

七位修女乘搭的舢舨，於 8 月 2 日抵達漢口。修女們下船後，渴望見到主教或神父來接船。很快她們就知道，修女們初抵港的經歷，如今又在她們身上重現了。原來由於當時郵遞緩慢，神父還未接到修女的信。修女們不知所措，又不懂語言，唯有全心信賴上主。不久，一些善心的人見到這些意籍修女們，便帶她們到教堂去。恰巧當時主教外巡，神父們狼狽地四出找房子。最後找到一所頗大的「危樓」，讓修女們暫住。

修女們很快便經驗到漢口是中國的火爐，加上連年河水氾濫兩個月，河水淹蓋農地和房屋。水災後，痢疾、霍亂等各種瘟疫接踵而來，令本來貧苦的百姓雪上加霜。人們將棄置在河堤上、火車站的嬰孩都送到修院來。有些年頭，有 400 多個乳母在自己的家為修女照顧嬰兒，每月來修院取薪酬。嬰孩稍大後，便送回修女的孤兒院。那時修院主要的經濟來自母會，可是中國內戰、世界大戰等此起彼落，令財政來源短缺的日子居多，修女怎樣為這數百人糊口？諷刺的是，往往在最困難的日子裏，連通訊系統也切斷，我們無法知道修女們如何渡過那些艱苦的歲月，待一切過後，才接到她們報「平安」的訊息。只有天主知道她們怎樣渡過那些黑暗的日子，也只是天主的照料，她們才「保全」了生命，繼續為天國以愛作見證。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1. Canossian Historical Archives (Rome, Verona, Venice, Pavia, Hong Kong)
2. Giacon, Modesto. *Magdalene of Canossa—Humility in Charity, Charity in Humility*.
3. Airoidi, Marina and Tuniz, Dorino. *Madgalene of Canossa : Charity is a fire that ever spreads out*. (Translation from Italian by Wang, Janet, English Edition. Printed in Singapore, 2008)
4. “Basic Guidelines for the Ministries of Charity of the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 – “orientations for interpreting the “branches” of charity today. Post-Chapter document of XII General Chapter of the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 February 1996
5. Riva, Lina, Fdccc *Fragments from Canossian Missions*, Part I and II (for internal circulation). Hong Kong Canossian Missions Archives, 1979–1990.
6. Clarke, Nora M. and Riva, Lina Fdccc. *The Governor’s Daughter Takes The Veil : Sister Aloysia Emily Bowring, Canossian Daughter of Charity, 1860–1870*. Hong Kong :Canossian Missions Historic Archives, 1980.
7. Padre Manuel Teixeira *As Canossianas Na Diocese De Macau –cem anos de apostolado (1874–1974)*. Macau :Tipografia Da Missao Do Padroado, 1974–5–12.
8. Sala, Ida Fdccc.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s—Hong Kong 1860–1910*. Volume One. Hong Kong: Canossian Missions, 1997.
9. Dagnino, Maria Luisa. *Maria Stella*, Profile Series, Canossian Institute, Rome 1987.
10. Encyclical Letter of Pope John Paul II dated 7th December 1990: REDEMPTORIS MISSIO on “The Permanent Validity of the Church’s Missionary Mandate”—Daughters of St. Paul, Philippines, third printing November 1992 (Proclamation a natural right, a Divine command, Christian values.)
11. Ticozzi, Sergio PIM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1997–

12. Ryan, Thomas F. Ryan S.J.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Foreign Missions, (PIME), in Hong Kong (1858–1958)*.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9.
13. Lazzarotto, A. (ed). *Catholic Hong Kong : A Hundred years of Missionary Activit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ntenary Year Arrival in Hong Kong of the Pontifical Foreign Missions Institute*. Hong Kong: Catholic Press Bureau, 1958.
14. Ryan, Thomas F. S.J.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62.
15.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 Annual Report – 1991”—Published by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November 1993. (*re.Canossians: pg.136 –144*)
16. Endacott, G.B.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7. Hoe, Susanna.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Western women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1–194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8. *The Hong Kong Guide—1893*.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g. 67 – Christmas day 1978 conflagration. . .)

3. 香港的耶穌會士 (1926–1991)¹

張學明

The work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was substantially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ina (Project no. CUHK441709)

引言

香港的耶穌會士，從 1926 以來，除了他們核心的宗教活動，如傳教之外，對香港社會亦作出獨特的貢獻；如教育及社會福利等方面。

教育方面：（1）高等教育—耶穌會士在港島的香港大學建立他們的總部：利瑪竇宿舍（Ricci Hall），並於稍後在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學建立湯若望宿舍（Adam Schall Hall）；（2）天主教教育—耶穌會士獲授權教授在香港仔（Aberdeen）當時稱為華南修院（South China Regional Seminary）〔現在的聖神修院神哲學院（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即使數十年後，他們把教授權交回香港天主教教區，其中一些耶穌會士仍積極參與其教授及行政事務；及（3）中學教育—耶穌會士十分成功地把愛爾蘭的中學教育模

1 筆者對能為本書編寫《香港的耶穌會士（1926–1991）》一章深感榮幸。於此特別感謝各位神父的支持：耶穌會香港省會長狄恒神父（Fr. Alfred Deignan, SJ）：精神上與實際上對筆者給予支持，借出關於香港耶穌會士的寶貴罕藏書藏及一手資料（如只供香港耶穌會會內傳閱的通訊與狄神父本人的著作，包括未出版的文章）；徐志忠神父（Fr. George Zee, SJ）：贈予整套香港華仁書院校刊 *The Star* (1933–1988) 並介紹魏志立神父（Fr. Harold Naylor, SJ）予筆者認識；魏志立神父：接受過筆者數次的訪問，於訪問中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更透過電郵與信件為筆者提供了不少香港耶穌會士的生平傳記；勞伯壩神父（Fr. William Lo, SJ）：詳閱並改正本文草稿，並常於重要問題上給予筆者提示，如在世的耶穌會士的出生日期等隱私等；余理謙神父（Fr. James Hurley, SJ）：接受了筆者訪問並提供其文章 “*A Novice Master at Work in a Factory*” 的複本，並與筆者分享了於社會教育上的經驗；施惠淳神父（Fr. Bernard Shields）：詳閱並改正筆者的筆記，並給予珍貴的意見與建議。最後筆者還要感謝昔日於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時的博士生導師，Prof. Jeffrey Russell 無時無刻的支持與鼓勵，並為筆者審閱與改正草稿。

式帶來香港，並建立兩所極負盛名的中學：香港華仁書院和九龍華仁書院；這兩所中學培育出很多本地精英，包括政府高官如現在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及成功的商家、國際知名的學者 and 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

社會福利：一些耶穌會士參與了很多扶助貧窮、弱少的香港華人，建立互助社；例如：郭樂賢神父（John Collins）首創及推動香港的儲蓄互助運動（Credit Union Movement）；而其他耶穌會士亦參與社會關懷和社會公義的福利事務。

總而言之，香港的耶穌會士自 1926 年以來，對香港成功地作出獨特及重要的貢獻。筆者編寫這一章²希望它能成為研究香港的耶穌會士對香港貢獻之參考或資料庫。儘管這是編年史，本文卻並不只是史實，因筆者會極小心於文字的選擇及表達的方式；所以，請小心閱讀，在字裏行間（包括註釋，因筆者會盡量採用不同來源的不同版本），而讀者會發現一些鮮為人知的訊息。³ 當然，筆者亦會在每一段時間，如十年，作一小結，顯示香港的耶穌會士在該段時間的貢獻，指出一些重點，尤其是香港耶穌會士對教育及社會福利的貢獻。

由 1926 年始之香港耶穌會士編年史

1926 年 12 月 2 日：

為趕及慶祝耶穌會傳教主保（Patron of the Missions）聖方濟·沙勿略（薩威）節（Feast of St. Francis Xavier），⁴ 首批

2 因筆者的主要參考資料《香港耶穌會士通訊》（先後改稱《香港耶穌會副省會通訊》與《香港耶穌會省區通訊》；只供內部傳閱）於 1991 年停刊，所以筆者決定以 1991 年為終結。

3 中國最受尊重與享負盛名的編年史著是《資治通鑑》。該書以其著述目的與作者精於選擇歷史事件的能力見稱，特別是其精煉與謹慎的選詞用字與對史事所作的精闢獨到的創見。

4 Fr. Thomas Martin, SJ,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Hong Kong Jesuits Mission (1926 - 1976)*”, p.1.（此文章由狄恒神父贈予筆者）；另見 Fr. Alfred Deignan: *The Jesuits in Hong Kong*, p. 1.（此文章尚未出版）。

派遣香港的愛爾蘭耶穌會士，Fr. George Byrne, SJ 與 Fr. John Neary, SJ，於 12 月 2 日抵達香港。

賴詒恩神父（Fr. Thomas Ryan, SJ）於其著作《中國的耶穌會士》（*Jesuits in China*）中述到：新獲任命的香港代牧區主教⁵ 請求派遣能說英語的耶穌會士到香港，以協助在這個英國殖民地（香港）的教育工作，所以數名愛爾蘭耶穌會士被委派至香港。⁶ 他們於 1926 年底到達香港。兩年後，應廣州代牧區的要求，部份愛爾蘭耶穌會士離開香港，前往廣州協助教學工作。在緊接的數年間，耶穌會士先後於香港大學設立一所天主教宿舍—利瑪竇宿舍（Ricci Hall），接辦由華南主教團成立的香港仔華南修院（South China Regional Seminary），及於香港島與九龍興辦中學。」⁷

隨著 John Neary 神父 與 George Byrne 神父到達香港，耶穌會正式展開於香港的傳教工作，並透過許多重要社會貢獻，終對本土文化造成重要的影響。據麥健泰神父（Thomas

5 根據魏志立神父（Fr. Harold Naylor, SJ）所言：「當恩主教於三月份獲任命為第四任代牧區主教後，他即前往羅馬，並於同年的 6 月 23 日進行祝聖主教儀式. 於恩主教的請求中，其中一項即為（希望教庭派遣）能說英語的耶穌會士（到香港）。」，見於魏神父於 1993 年 12 月出席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所舉辦的香港教會發展史的研討會上發表的文章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ir Life in Hong Kong, 1926 – 1993*”。

6 這裡尚有一個備受爭議的觀點，據魏志立神父（Fr. Harold Naylor, S.J.）所述（由狄恒神父修正）：「Mr. Periera 已於 1924 年提供了一筆可觀數額的資金（或是遺產）予他的前任者，以交給師多敏主教（Mgr. Dominic Pozzoni）。這筆款項的用途為興辦「天主教教育」，. 部份人聲稱這筆資金應用於一所耶穌會士學校，一所如英格蘭斯托尼赫斯特學院（Stonyhurst College）般的天主教貴族（男生）學校。事實上喇沙修士會（The La Salle Brothers）於 1932 年在九龍開辦喇沙書院（La Salle College）。這筆款項或者投放在喇沙書院，而葡萄牙人社區的子弟確實在那裡接受了極佳的教育」，Fr. H. Naylor, SJ.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ir Life in Hong Kong, 1926 – 1993*” , p. 1.

7 Fr. Thomas F. Ryan, SJ. (1964). *The Jesuits in China*. Hong Kong : Catholic True Society. pp. 102 – 103.

McIntyre)⁸所說，耶穌會士於香港的傳教工作，乃世界各地回應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⁹於1891年在通諭《新事》(*Rerum Novarum*)¹⁰中，呼籲於世界各地全面展開天主教的社會服務運動的其中一項體現。

1926至193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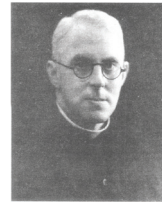
Fr. George Bryne 獲任命為耶穌會香港省會長。

1927年2月：

范達賢神父(Dan Finn)由澳洲抵港。范達賢神父因患病而到澳大利亞休養，康復後他自願前往日本繼續傳教工作，但最後則被派遣到香港。當他到達香港後，即獲委任為香港大學的教育系教授(香港大學乃當時香港的唯一一所大學，第二所大學即香港中文大學至1964年方始成立)。¹¹

1927年10月：

嘉利華神父(Richard Gallagher)、蔡伯德神父(Patrick Joy)與麥當奴神父(Daniel MacDonald)抵達香港。嘉利華神父為準備基督普世君王節的慶典而舉行了三日典禮(Triduum)。蔡伯德神父重新刊發天主教《磐石》月刊(*The Rock*)，直至1941年12月日本



嘉利華神父

8 感謝現居於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的香港耶穌會士麥健泰神父(Fr. Thomas McIntyre)於接受筆訪問期間，解釋了1891年《新事》通諭對世界(包括香港)的天主教社會運動的重要性。

9 See Gerald P. Fogarty, SJ. (1994). "Leo XIII," in Judith A. Dwyer, ed., *The New Dictionary of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pp. 546 – 548; and Edward T. Gargan, ed. (1961). *Leo XIII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heed & Ward.

10 See John Coleman and Gregory Baum, eds. (1991). *Rerum Novarum: a Hundre Years of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London: SCM Press, 1991; John Coleman, ed., *One Hundred Years of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Celebration and Challenge*. New York: Orbis.; and Ronald F. Duska, ed. (1991). *Rerum Novarum: a Symposium Celebrating 100 Years of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New York: Edwain Mellen Press.

11 Fr. Thomas Martin, SJ,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Hong Kong Jesuit Mission(1926 – 1976).



狄恒神父

佔領香港為止。據狄恒神父（Alfred Deignan）所說，《磐石》乃是「一本包含文學與時事文章的天主教月刊，（重刊後）很快就捲入與理性主義者（Rationalists）的論戰之中」。¹²蔡伯德神父亦於華南修院內任教（先是執教哲學，後改授神學）。麥當奴神父則開始他對中文的研究，並成為一名傑出的學者。¹³

1928年5月：

范達賢神父於香港大學完成為期一年的署任教育系教授職務後，前往上海學習中文。同年九月返港後，范神父應當時廣州教區宗座代牧（Antoine Fourquet, MEP, 1872–1952）¹⁴的邀請，與麥當奴神父同往廣州聖心學校工作。

1928至1932年：

部份於香港的愛爾蘭耶穌會士應當時教區主教的邀請，前往廣州聖心學校任教。

1929年：

當時香港教區主教，擔心教徒於就讀香港大學期間，可能迷失信仰。所以耶穌會士於1929年在香港大學成立利瑪竇宿舍，向香港大學男生提供六十個宿位；¹⁵利瑪竇宿舍的成立除

12 Fr. Alfred Deignan, “*The Jesuit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aper), p. 1.

13 Ibid.

14 Ibid.

15 根據魏志立神父（Fr. Harold Naylor, SJ）所言：「紐曼樞機（Cardinal J.H. Newman）曾嘗試於愛爾蘭創辦一所天主教大學，當時的耶穌會士竭力協助；最終成立了愛爾蘭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部份會士於校內教授愛爾蘭歷史、教育或數學；而大部份會士皆是愛爾蘭國立大學校友。耶穌會士亦於 Hatch Street 為大學內來自普通階層的學生成立了一所天主教學生宿舍，他們當中大部份來自耶穌會的中學。所以 Fr. Byrne 在香港（成立宿舍）的動機是不難理解的。但這卻是亞洲地區第一所設於非教會大學的天主教學生宿舍！」參魏志立神父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ir Life in Hong Kong, 1926 – 1993*”, pp. 1–2；另根據狄恒神父（Fr. Alfred Deignan, SJ）所言：「利瑪竇宿舍於1929年提供六十個宿位，重建後的宿舍於2007年時擁有120個宿位。」（see *The Jesuits in Hong Kong*, p. 2.）

作為香港大學其中一所宿舍外，亦是耶穌會在香港的傳教總部。麥當奴神父則出任宿舍的首任舍監，部份耶穌會士亦於大學內授課。當時的授課語言為英語，而學生主要為葡萄牙籍、海外華僑與操英語的本地華人。

耶穌會士與理性主義者於 1929 年爆了一場論戰。後者於大眾報章中，對基督信仰教義進行了逐步升溫的惡意攻擊。當時的香港教區恩理覺主教（Henry Valtorta）急切希望耶穌會士作出回應。所以嘉利華神父與蔡伯德神父以「科學與宗教」（Science and Religion）為主題，在聖約瑟教堂附近的 St. Patrick's Club 舉辦多場演講，題目包括「進化」（Evolution）、「聖經」（Bible）、「神蹟」（Miracles）等，吸引了大批群眾。當時的報章皆詳細報導，剩餘的中間兩版則為對演講的書信往來等；正式終止了理性主義者的攻擊。¹⁶

1931 年：

中國主教團會議授權耶穌會士，教授位於香港島南部香港仔（Aberdeen）的、由教廷駐中國宗座代表剛恒毅總主教（Celso Costantini）所主持興建的華南修院（South China Seminary）。當時大約有六名來自愛爾蘭的耶穌會士在院內任教。曾於香港大學任教電子工程的古寧神父（Thomas Cooney）獲任命為首任院長。蔡伯德神父則出任倫理神學與教會法教授，同時兼授教義神學（Dogmatic Theology）達數年之久。蔡伯德神父於 1934 年，見證了修院首三位神父晉鐸；他們分別是馮德堯神父（Luke Fung）、劉榮耀神父（Paul Lau）與葉蔭芸神父（Joseph Yip）。¹⁷當時院內的學生一般來自華南地區，其中以廣東人居多數。

¹⁶ Ibid.

¹⁷ Ibid.

1932 年 12 月 12 日：

耶穌會士接辦由兩名教徒——徐仁壽先生（Peter Tsui）與林海瀾先生（Lim）成立的華仁書院。華仁書院乃一所享負盛名的中學，其後並成為獲得政府補助津貼（Grant in Aid）¹⁸資格的第一所華人學校。華仁書院培育出很多本地精英，包括政府高官、國際知名的學者、成功的商家和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Fr. Nearly 是首批與當時校址尚在羅便臣道的華仁書院結緣的耶穌會士。他把愛爾蘭的耶穌會學校的文化傳統帶到華仁書院，並關注到愛爾蘭耶穌會士可以如何對香港中學教育作出貢獻。當時華仁書院以英語授課，耶穌會士並教授當時最現代化的科學教育。」¹⁹據魏志立神父（Harold Naylor）所說：「首任校長嘉利華神父於上任後即贏得一眾教師的忠誠，……



魏志立神父

這個快樂的男人在中學教育界極受歡迎，他亦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成立的背後精神推動者之一。」²⁰

1932 年雖是愛爾蘭聖體大會年，但同時亦是（在香港與中國的）耶穌會士承受巨大損失的一年。Fr. Michael Saul 與 Fr. McCullogh 同於六月因罹患霍亂病而於廣州辭世；這個重大

18 Fr. Naylor,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ir Life in Hong Kong, 1926 – 1993*, p. 2.

19 *On the Jesuit and Catholic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lease see Dr. John Ta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d some of his articles (listed in the Selected Bibliography at the end).

20 Fr. Naylor,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ir Life in Hong Kong, 1926 – 1993*, p. 2.

的打擊加上於香港隨日漸增的工作量，逼使廣州教區的傳教工作暫停，直至二次大戰後方得繼續。另一重大損失為傑出學者范達賢神父的離開。醉心中文的范達賢曾於香港大學署任教育系教授與教授地理學，又曾於廣州擔任教務主任，同時亦是華南修院的精神領袖，更是一名傑出的考古學家。於奧斯陸（Oslo）出席一個人類學者會議後，范神父留在大英博物館進行了數項研究。范神父亦於此時開始得病，終於數年後的 1936 年 11 月 1 日於倫敦病逝。²¹

1933 年：

香港華仁書院出版第一本校刊《The Star》。

1935–1941 年：

古寧神父獲任命為耶穌會香港省會長。

1936 年：

位於九龍青山公路 18 號的語言學校成立，為新抵香港的愛爾蘭耶穌會士提供語言培訓。

1926—1936：

賴詒恩神父以「初始」（Beginnings）為這段期間命名，據他說：「在這段期間末期，約有十五名（耶穌會）神父在此（香港）工作。同時有二十名仍在修習中的、較年輕的會士來到香港，接受為期三年的中文學習與學校教育工作；他們不少人在成為神父後，仍然留在這裏（香港）。雖然耶穌會的《磐石》月刊未能長期繼續編刊下去，然今日（1976 年）耶穌會士所在的主要工作機構，卻多數是在這段時間成立的。范達賢神父作為先驅於南丫島（Lamma Island）展開其考古工作，其部份發現成為了香港博物館的館藏展品。部份耶穌會士於港大

21 Fr. Thomas Martin, SJ,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Hong Kong Jesuits Mission (1926 – 1976)”.

短暫教學；而公開的演講與討論，則使蔡伯德神父、Fr. George Byrne 與嘉利華神父的名字廣為人知。」²²

1938 年 10 月：

日軍佔領廣州後，大批難民湧入香港，麥當奴神父與簡力達「醫生」神父（Gerald Kennedy）乘坐一救援船前往協助。簡力達神父於加入耶穌會前，曾於愛爾蘭行醫，他的醫學專業於廣州得到了充份的應用，並成為廣州一所醫院（Fong Ping Hospital）其中一名主管。在他的帶領下，醫院的環境衛生與食物素質得到改善。他並發明了一種藥物，成功救助罹患傷寒的病人。²³

同年，賴詒恩神父成為《磐石》月刊的主編，並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更成立國難籌賑會（War-Relief Association）以協助戰爭中的受害者，包括難民。賴詒恩神父並聯合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Ronald Owen Hall），成立房屋協會（Housing Society）的前身，興建屋村以為香港貧苦大眾提供安身之所。

1940 年：

鄧乃理神父（Dan Donnelly）於 Loyola House 成立一青年修院，以為有志成為耶穌會士的青少年提供教育與培訓的機會。鄧乃理神父早期的學生之一戴雨谷神父（Joe Tai）；後來成為長洲思維靜院〔Xavier Retreat House〕的院長，曾伴同鄧神父於戰時前往印度。陳福偉神父（Frank Chan）是第一名加入耶穌會的華仁書院學生。他曾先被遣至馬尼拉與都柏林，並於 1953 年在都柏林領授神職。陳神父於七十年代在九龍華仁書院任教，並主持學校的聖依納爵小堂（St. Ignatius Chapel）。

22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71(December, 1976), p. 3.

23 Fr. Thomas Martin, S.J.,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Hong Kong Jesuits Mission (1926 – 1976)”.

1941 年 12 月聖誕節：

香港淪陷。所有學校於日佔初期被逼停課。其後，所有已註冊的華人學校獲准重開。當時部份華仁書院的高年級學生協助 Fr. Ned Sullivan 與郭樂賢神父（John Collins）救助難民。其後部份華仁書院學生後來成立了一所華人學校，向貧困學童提供教育。他們於第二次大戰期間工作未曾間斷，乃至將近光復和平方止。

1941 至 1947 年：

蔡伯德神父獲任命為耶穌會香港省會長。

1945 年：

戰爭結束，華仁書院重開。李神父（Brian Kelly）亦重修並重開港大利瑪竇宿舍。華南修院重新運作，會士從澳門返回香港繼續工作。同時，港督任命賴詒恩神父署任農業署主管（Acting Superintendent of Agriculture），負責組織重新發展農林業務、成立蔬菜批發統營市場與漁業合作社。賴神父亦寫了 *Jesuits under Fire, in the Siege of Hong Kong 1941*（London：Burns Oates & Washbourne, 1945）一書，詳述日治時期（1941 至 1945 年）耶穌會士在香港的艱辛工作歲月。

1936 至 1945 年：

賴詒恩神父稱這段時期為「被間斷的成長」（Growth Interrupted），他說：「在第二段時期的末段，是香港耶穌會為重建香港這個城市與教會而努力的時間。．．．．．而耶穌會士的所有教育工作很快就回復正常．．．．．港府邀請賴詒恩神父出任公職，協助重啟漁、農、林等多個相關部門，負責組織重新農林漁業，成立蔬菜市場協會與漁業合作社。他亦是房屋協會的創會與活躍成員，並是推動成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的重要精神領袖之一。²⁴

24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71(December, 1976), p. 4.

1946年3月：

七名新被遣派來香港的耶穌會士抵達香港。

1946年11月15日：

侯奕純神父（Joe Howatson）成立擦鞋童會（the Shoeshine Boys' Club），別稱華仁貧童會（the Wah Yan Poor Boys' Club）；這是一個關注街邊擦鞋童的協會，即今日仍非常活躍的小童群益會（Boys and Girls Clubs Association）前身。

1947年：

廣州一所語言學校成立。當時約有 19 名耶穌會士在廣州工作，其中兩名於中山大學任教，又另四名在聖心學校任教，還有五名神父與八名修士（為成為耶穌會神父而在修院修讀神學者）在語言學校中。

1947至1950年：

賴詒恩神父獲任命為耶穌會香港省會長。

1948年：

侯奕純神父展開照顧與關懷在街頭擦鞋的貧困孩子與其他街童的工作，奠定了日後小童群益會的成立基礎。侯神父同時亦是香港社會工作的先驅與提倡者，他與數之不盡的社會工作項目皆有連繫，並贏得社會的認同。

1949年10月1日：

以北京為首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至1957年：

夏禮士神父（Richard Harris）獲任命為耶穌會香港省會長。

1950年：

彭光雄神父（Alan Birmingham）於香港大學教授哲學，而龔樂年神父（Fergus Cronin）則教授邏輯與歷史。

1951 年：

耶穌會士展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工作。曹魄神父（Paddy Joy）是這個新區域的首任會長。愛爾蘭耶穌會士於新加坡、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va）、馬來西亞等地設立教堂與學生宿舍。

1952 年 12 月 12 日：

港督葛量洪爵士（Alexander Grantham）為位於九龍窩打老道 56 號的九龍華仁書院校舍主持啟用儀式。

1953 年 9 月 16：

香港華仁書院現址所在的地盤地基合約正式簽署。

1954 年 10 月 7 日：

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 281 號的香港華仁書院地盤奠基，並獲祝聖。

1955 年 9 月 27 日：

香港華仁書院的校舍由中環羅便臣道遷至現址皇后大道東，並由港督葛量洪爵士主持啟用儀式（當然，現校址已經數次翻新，其後亦有新的大樓落成）。

1945 至 1955 年：

賴詒恩神父稱這第三段時期為「擴張」（Expansions）年代，他稱：「在耶穌會士工作的第三個十年的後期，大約有三十名神父在港工作，展開在教育、傳道與社會等項目的多元化發展。同時兼有為數不少的、仍在接受訓練中的神父（在香港或外地）準備加入這裏的工作。雖然香港已大體上恢復元氣，但仍須面對因大量來自中國的新增人口與難民所帶來的問題。新近信教的教徒人數很多，耶穌會在不少擴充中的堂區提供協助。」²⁵

25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71(December, 1976), p. 6.

1957 至 1960 年：

潘多默神父(Thomas Byrne)獲任命為耶穌會香港省會長。

1958 年：

長洲思維靜院成為初學修士的實習地。馬良神父(John O'Meara)出任初學導師(Master of Novices)。

1960 年：

孟家華神父(Patrick McGovern)鑑於本港工會勢力微弱，所以成立勞資關係協進會(Industrial Relations Institute)以培訓本地工會領袖；此機構至今仍扮演著重要角色。

1960 至 1965 年：

Fr. Herbert Dragan 獲任命為耶穌會香港省會長。

1960 年 8 月：

侯奕純神父代表香港參加於日本上智大學(Sophia University)舉行的會議。會議提出於教省內成立一個關注社會事務委員會(Consilium Sociale)及一個社會行動組織(Social Action Organization)。侯神父建議該新組織名為 Commit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Economic Life in Asia(簡稱 SELA)。

1962 年 7 月：

第一期《香港耶穌會士通訊》(*Hong Kong Mission Letter*；只供內部傳閱)出版(至 1991 年停刊)。編輯指出：「這是一份純供香港耶穌會成員保持聯繫之用的通訊，以使各成員間清楚現時之工作進展。」²⁶

1962 年 11 月：

在賴詒恩神父主持下，《香港天主教指南》(*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正式出版，以為香港的天主教會組織提供綜合的指引。《香港天主教指南》並包含天主教會在香港的發展歷

26 *Hong Kong Mission Letter* No. 1(July, 1962), p. 1.

史，又描述香港各教堂、教會學校或女修道會的歷史，與有關他們現時工作與未來計劃。

1962 年：

郭樂賢神父在香港發起儲蓄互助計劃，並取得顯著的成就。郭樂賢神父與侯奕純神父更成為 SELA 的香港的代表。SELA 主要關注亞洲的社會經濟民生問題，成員代表來自各個有耶穌會士工作的亞洲地區。其宗旨乃在有組織地推動遠東地區的社會運動。根據《香港耶穌會士通訊》稱述：「這意念主要是透過合作與參與以推動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在當時（1962 年），SELA 的代表成員來自日本、香港、馬尼亞、新加坡、印尼、泰國、和菲律賓。於去年（1961 年）10 月，Fr. Walter Hogan 獲任命為 SELA 執行秘書，並以香港為總部。」²⁷

同時，余理謙神父（James Hurley）與新成立的學生組織—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Hong Kong Federation of Catholic Students）緊密聯繫。後來更成為校牧，關心學生事務。



余理謙神父

1963 年：

郭樂賢神父前往菲律賓研究儲蓄互助運動。儲蓄互助社是一個相互協助組織，由「一群擁有相同背景，如同堂區或同村者，甚至是受僱於同一公司的人」所組成，「（儲蓄互助社）鼓勵成員儲蓄，並投入一個共同基金，他們可以以低息向基金借款，而亦可運用基金以用在會員間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互助社在東方國家有協助人民擺脫高利貸的壓迫特殊的功效。經驗已顯示香港人對此類計劃有很大的需求。他（郭樂賢神父）……發現儲蓄互助運動於小販、三輪車車伕、窮困漁

27 *Hong Kong Mission Letter* No. 6(December, 1962), p. 6.

民、可口可樂公司僱員、教區弟兄姊妹與同村村民間的團體特別成功，而其他見到運動好處的人士，亦紛紛申請加入運動。」

28

1963 年：

董樹德神父（Frank Doyle）成為在香港晉鐸的耶穌會士。

1964 年 3 月：

香港大學頒發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予賴詒恩神父，以確認賴神父對香港社會作出的貢獻。

1964 年 7 月 20 日：

香港仔華南修院（耶穌會士自 1931 年始於此授課）成為一所教區修院。不過，耶穌會士於修院內仍扮演著重要角色（如任教授職）。

據《香港耶穌會士通訊》記載：「於一份交予在背後支持香港儲蓄互助運動的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的報告中，郭樂賢神父就儲蓄互助運動現階段發展提出了數項意見。基本上所有（關於運動的）必須的中文教材皆由郭神父的辦公室準備與刊發，其中包括小冊子、戶口表格、銀行存摺與申請表格……另與各行各业舉行共三十七次會議，以引起他們對儲蓄互助運動的興趣。另向包括護士、小輪公司員工、大學生、工廠工人等不同團體放影五套相關的電影。當時共有三個互助社正在籌辦：1）於深水埗區的基督徒間發起的聖方濟各堂儲蓄互助社；2）油麻地小輪公司員工；3）護士與律敦治療養院（Ruttonjee Sanatorium）員工。另外亦與的士（計程車）司機、文華酒店（the Mandarin Hotel）員工進行初步會面，以探討成立互助社。另外還有一個堂區與數間學校要求提供關於成立儲蓄互助社的指引。又亦安排領袖訓練予一群來自荃灣的工廠工人與大學的社工組的成員。郭神父並接受了香港電台一個

28 *Hong Kong Mission Letter* No. 9(March, 1962), p. 3.

有關儲蓄互助社的訪問。他亦向一群小眾的專業人士舉辦了一場演講，出席者包括一名法官與一名知名的新聞記者。」²⁹

1964 年：

郭年士神父（Edward Collins）參與了香港天主教護士會（Catholic Nurse Guild）的工作，並為麻瘋病病人服務超過十年。

同年，賴詒恩神父發表著作《中國的耶穌會士》（*Jesuits in China*）；此著作包含從聖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時代至 1964 年間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工作，並特別關注到耶穌會神職人員的吸納與培訓。

1965 至 1972 年：

龔樂年神父出任耶穌會香港省會長。

1965 年：

郭年士神父成立簡稱 CMAC 的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the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³⁰至今仍提供婚前、輔導、愛與人生等課程，並於教區內倡導家庭計劃。

1965 年 8 月：

Fr. Walter Hogan 在 SELA 下，組織一個向神父提供推動亞洲社會運動的課程。此課程旨在讓神父更具能力以探索亞洲社會經濟問題，並尋找解決方案。通過這樣一個共同努力，以加強神父於協助大眾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大眾能活出完整人生。參與者受到教宗於通諭《慈母與導師》（*Mater et Magistra*）中的指令的引導。

根據《香港耶穌會士通訊》第 34 期（1965 年 4 月）中記述：「課程中心主題在於：基督徒價值與其對亞洲社會經濟民

29 Hong Kong Mission Letter No. 29(November, 1964), p. 3.

30 感謝勞伯壠神父（Fr. William Lo, SJ）為筆者查證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的成立年份為 1965 年。

生的意義。最主要的三個部份分別為：探討基本現狀與構建穩固的社會經濟生活之原則、審視將這些原則化為行動所需的經濟工具與政策、及應用所揀選的原則以解決亞洲人民的問題。

第二個部份主要關於具以重視兄弟情誼的、基於自救而非倚賴的、曾經過實踐而獲得成功的社會組織。例子包括：1) 儲蓄互助社：以提供應急金錢或作適度的生產用途；2) 合作運動：令更多的人成為業主，以使他們更能控制自己的經濟狀況。另外，將研究不同類型的合作社，其中包括消費者、市場推廣、生產者與服務合作社等，涵蓋多個工業、農業的社會範疇；3) 社區發展：透過最少的理論而輔以個案研究，展示一個由一名神父負責在韓國展開的廣泛社區發展計劃；4) 工業勞顧關係：參與者會分別扮演僱主與工會代表，訓練以促使達成對顧主、工人、管理層與社會而言皆公平的協議的技巧。

第三部份主要處理與社會經濟秩序緊密相關的問題：1) 亞洲人口上升的現實與其對地區的社會與經濟的重要性。基於此問題廣泛涉及個人、家庭與社會，人口統計學家與經濟學者的觀點亦被考慮；2) 提高糧食生產量的方法：專家向參與者講解在此領域上一些成功的機構與方法；3) 大眾傳媒：討論報章、電台、電視的影響，及探討如何更有建設性地使用大眾傳媒。」³¹

除 Fr. Walter Hogan 任組織委員會執行秘書外，侯奕純神父與郭樂賢神父亦是委員會的成員。

1966 年：

狄恒神父 (Alfred Deignan) 出席銀禧會議與第九屆菲律賓天主教教育協會全國大會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Catholic Education Association)。狄恒神父並在二月中探訪位於馬尼拉及其附近的教育機構。當時有一個綜合行程，包括參

31 *Hong Kong Mission Letter* No. 34(April, 1965), pp. 1 - 2.

觀當地的課堂、教育電視的播放、就中小學與高等教育的不同科目的演講。狄恒神父特別被 Fr. Reuter 的學校電視節目與學生輔導方法吸引。

1966 年 12 月 3 日：

香港耶穌會成為一個獨立的耶穌會副會省區，龔樂年神父出任第一任會省首長。香港耶穌會副會省區包含位於四個分離的政治體的社區，即香港、澳門、新加坡與馬來西亞。Fr. Herbert Dargan 於 1965 年成為新當選的耶穌會總會長的其中一個助理，特別負責東亞會務。

1955 至 1966 年：

賴詒恩神父稱這段時間為「鞏固期」（Consolidation），他說：「在第四個十年的後期，已沒有新的會士由愛爾蘭來香港，香港耶穌會開始依靠本地招募，以應付將來的工作。這時，於新成立的香港副會省區大約有四份之一的耶穌會士是亞洲人，部份來自香港，亦有來自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³²

1967 年：

香港耶穌會副會省區的就職典禮慶典於香港九龍華仁書院舉行。當時香港教區白英奇主教（Lorenzo Bianchi）與一眾副會省區的會長及會士，包括巴烈德神父（Cyril Barret）、馬良神父、郭年士、科利神父（Fr. Joe Foley）與 Fr. Tarpey 皆有出席。龔樂年神父就職省會長。《香港耶穌會士通訊》亦改稱《香港耶穌會副省區通訊》（*Hong Kong Vice-Province Letter*）。³³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於一月註冊為有限公司。這是要避免成為社團的複雜法律程序與延誤。四月十日的第一次年度大會上，發表了由輔導會主席郭年士神父撰寫的報告。據 1967 年 5 月出版的第 58 期《香港耶穌會副省區通訊》中說：「其雙

32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71(December, 1976), p. 7.

33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54(January, 1967), p. 1.

重目的為提供基督徒婚姻教育與協助對在婚姻生活中實踐基督信仰教義感到困難的基督徒。除醫療顧問服務外，輔導會亦計劃成立一項輔導服務。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於成立的第一年主要致力於設立醫療顧問中心，在過去一年則更為注重於教育方面的工作。在過去一年，舉辦了不少次關於基督徒婚姻演講與座談會。其中包括以中英文進行的婚前課程；三個為不同組別的年輕人舉辦的、為期一天的婚前準備介紹；在六間中學舉辦婚姻座談並得到熱烈反應；參加以「婚姻與家庭的尊嚴」為主題的討論會；龔樂年神父亦以相同的主題向一群大學生進行演說；公教婚姻輔導會的成員亦出席了數個由其他團體舉辦的小組討論會。 醫療顧問中心最受歡迎的服務是提供計劃生育的資訊。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心訪客希望避免或延遲生育。而小部份則因缺乏生殖能力或因其他種種的婚姻問題而來到中心。中心訪客主要以低收入人士為主，他們有逼切的需要，控制家庭成員數目以適應過份擠迫的香港。節育方法的道德問題成為當時辣手可熱的議題。公教婚姻輔導會中心建議訪客透過基礎體溫法（Basal Temperature Method）檢測排卵期（Fertile Period），並避免於該段時間行房。訪客很快地明白了這個方法。雖然當時尚有其他可行方法，他們當中卻大部份因沒有固定信仰而對這方法感興趣。他們有時會對使用醫療器材表示憂慮，並滿意基礎體溫法並不含藥物與醫療器械，可以避免不良反應。³⁴

同年，冀世安神父（Ciaran Kane）接替科利神父於英語宗教節目廣播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Religious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的職務。冀神父於10月1日（星期日）的轉播彌撒中首次領經。

Fr. Jim Tarpey 於彌撒中向青少年推廣現代音樂。他灌錄了一隻收有多首彌撒聖詩的錄音帶，並受到世界其他地方的青少

34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58(May, 1967), pp. 1 – 2.

年歡迎。得到這隻錄音帶的協助，華仁書院的天主教同學會（Catholic Sodality）籌備了一個以吉他伴奏的現代音樂聖詩（Modern Hymns）節目。

1968 年：

Fr. Walter Hogan 於三月份在新加坡組織了一個亞洲工作坊(Asian Workshop)，以探討「社會的公義與人類發展」(Justice and Human Progress in Society)；此工作坊由 SELA 贊助。SELA 成員，包括郭樂賢神父與身為 SELA 執行秘書的 Fr. Hogan 皆有出席是次工作坊。據《香港耶穌會副省區通訊》所說：「這工作坊是一個個案測試，以檢視根據通諭《和平於世》(Pacem in Terris) 與《民族發展》(Populorum Progressio) 執行教會服務的可行性。同時亦緊遵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 (Pontifical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的目標，以擴展與世界基督教協進會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屬下類似的機構間的合作。工作坊的用途在於探索與評估現時對提倡人類發展與公允的工作與潮流。部份要處理的問題包括：適應對農村的發展的而非對城市工作的教育、區域經濟合作、資訊交流、發展能被主要宗教接受而可代替革命性民族主義、美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發展健全的工會制度以穩定只有少數中產階級的社會與協助經濟發展、透過不同宗教團體的力量以拉近政府與大眾市民間的距離、職業訓練、倚賴法律以外的機關與程序以維繫公義、政府於經濟發展上的職責、工業化過程中衍生的人力問題。」³⁵

1968 年 2 月：

UNDA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on for Catholic Broadcasters in East Asia) 邀請冀世安神父出席一個在日本舉行的工作委員會會議。

35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69(April, 1968), p. 1.

1968年4月：

東亞耶穌會士大會（The East Asian Jesuit Secretariat Conference）在香港召開。據《香港耶穌會副省區通訊》記述：「會議旨在討論東亞地區現時的變化，及根據其變化重估二千名東亞耶穌會士的牧職，以回應大會對耶穌會士職務適應時代改變的要求。．．．．會議中討論了以下的議題：宣教神學、東亞地區改變、教會本土化、傳教與牧靈工作、傳教與教育、社會經濟發展、傳教士應於一個小的天主教社區中扮演一個核心的角色，然後這個社區應擔起向其國人傳播福音的工作。．．．．對於本土化的問題，一般認為外國人是永不可能被認同為本地居民。學習本地語言與習俗、穿著本地人的衣飾對本土化的過程中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對原居民的真正關懷與尊重。．．．．這需從學校與社會工作兩個層面同時努力——這是必須的。應加緊學校的社會教育，而不單只是學術上的教育。學生應投入於實在的工作，關懷他們身在地區的低下階層人士。雖然他們經常顯現出仁慈與關懷，但卻未能體會他們那些身處低下階層的同胞，所面對的痛苦與不公平環境。我們必須感動他們的心靈。」³⁶

1968年6月：

孟家華神父成立的勞資關係協進會（Industrial Relations Institute）獲得政府允許，成為註冊社團。協進會的宗旨乃在培訓工人積極參與，在香港建設一自由的、有力的、負責任的工會文化。協進會會關注其自身與其他方面的勞資關係事宜，並歡迎與管理階層間的合作。

根據《香港耶穌會副省區通訊》記述：「香港中文大學於1963年成立，耶穌會提出向中文文學提供服務——為大學的男生建立了一所宿舍並派遣會士駐宿。這建議雖然被中文大學拒絕了，但聯合書院（大學的其中一間成員書院）其後接受會方

36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70(May, 1968), pp. 1 – 3.

的提議，並達成協議——聯合書院將於其於沙田的新校舍撥地予會方，而會方則負責籌募經費以興建宿舍大樓（籌款額須及得上大學資助委員會提供的資助額）並遣派會士駐宿及管理建議興建的學生中心.總成本估計高達十五至二十萬美元。建議興建的學生中心與宿舍，會向大學大約五百名學生提供圖書館、影視音響與體育設施服務；並於學生中心的兩翼興建宿舍，為男生與女生分別提供一百二十五個宿位。瑪利諾女修會會負責女生宿舍部份，並負責籌款以支持宿舍的運作。宿舍除為聯合書院學生提供宿位外，亦負責書院四份之一的學生的膳食.因為聯合書院與新亞書院將於 1970 年遷入沙田，宿舍發展計劃變得緊逼，以肯定於遷校時宿舍已準備就緒。³⁷

1968 年 9 月：

第四屆泛太平洋康復會議（Pan-Pacific Rehabilitation Conference）於香港舉辦，出席者包括來自全球超過一千名來自亞太區的醫療與社會專家。郭樂賢神父出任組織委員會的執行秘書，為籌辦會議準備達兩年之久。

同年，許禮仁神父（Mairt Cyran）編寫了一本切合中四課程生物科課的課堂筆記小冊子。祁祖堯神父（Gerry Casey）出版了由他以中文改編自 E. Lacoste 著作 *History of the Popes* 的第一冊。祁祖堯神父的擴充版中文字典將近出版。白禮達神父（Peter Brady）出版了中六程度的倫理科筆記的第二冊，取名 *On General and Social Ethics*。

1969 年 11 月：

耶穌會香港副省會會長龔樂年神父與余理謙神父出席了一個於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4 日期間在新德里舉辦的國際天主教大學生聯合會地區會議（Regional Conference of Pax Romana）；與會者包括亞洲地區的主教。該會議的主題為「大

37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73(August, 1968), p. 1.

學生與在他們眼中教會該做的事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what the Church should be doing in their regard)。會議邀請香港教區徐誠斌主教 (Francis Hsu) 出席會議，但徐主教認為耶穌會是最積極參與本港大學工作的天主教團體，所以要求龔樂年神父代表他出席會議。

同年，穆家田神父 (Dick McCarthy) 投入香港的數學教育工作，除了在華仁書院任教數學科外，他亦是香港會考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的數學科科目委員會成員，兼為關注中學數學教育的課程與教科書委員會的成員。

同時，巴烈德神父出任會考的聖經科目委員會 (Biblical Knowledge Subject Committee) 委員，巴神父亦是香港國際音樂節協會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Society) 的創會成員。巴神父主要負責吸引本地學校參與聯會活動，以向青少年提供一個接觸優質音樂表演的機會。

1969 年 12 月 16：

香港華仁書院慶祝五十週年 (金禧) 校慶。香港華仁書院與耶穌會的聯繫可追溯至 1932 年，當年第一批耶穌會士開始在書院的羅便臣道舊址授課。次年，耶穌會更應創校人徐仁壽先生 (Peter Tsui) 的要求接辦華仁書院。

1970 年 3 月：

耶穌會副省區於香港華仁書院舉行大會，省會長龔樂年神父於開幕致辭中說：「現時的政策，是給予仍在學習中的年青人得到機會，去挑戰他們能力應能所及的極限，以使他們將來能成為.....更能應付這裡工作的利器.....我們也該問問年輕一輩能否得到他們的工作所需.....我們正在損失為數不少的修士，工作職位亦在減少；這或許是我們的錯，因為我們未能表現一個能吸引和挽留他們的形象.....我們所在的香港是進入中國大陸的門檻。仍有耶穌會士在內地，於我們的工作計劃中，香港絕不可能與中國分離；應該銘記此點。我們與中國的交流於未來或更緊密，我們要加緊工作，令福音於內地

更為流傳。今時今日，我們對自身形象與工作計劃等有著多而不同的意見。我們亦必須小心或會影響本會的信仰危機。現時須要可靠的依納爵靈修（Ignatian Spirituality）以協助我們進行傳教，以誠心及完整對主奉獻我們在教會中作為使徒的工作，及於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中得到啟發。³⁸

1970 年 3 月：

港府委任龔樂年神父出任非官守太平紳士（龔神父是香港第一位被委任此職的神父）。

1970 年 8 月：

郭年士神父領導下的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舉辦一主題為「兩性的人際關係」（Human Relations between the Sexes）的研討會，共有十名社工、二十九名來自不同學校的教師和三名護士出席。針對當時社會對兩性關係問題的紊亂狀況，研究會成功為與會者帶來對兩性關係與性教育觀念更為全面的認知。

1970 年 12 月：

教宗保祿六世（Paul VI）於 12 月 4 日短暫訪問香港。這對香港教區言，乃是非常重要的事件。省會長龔樂年神父成為三十個參與共祭的神父之一，同時以香港修會會長聯會（Association of Major Religious Superiors）主席的身份出任是次訪問的組織委員會的成員。當時全港四個電台與電視台皆有耶穌會士協助訪問：霍理義神父協助香港電台、駱顯慈（Hal McLoughlin）協助商業電台、穆家田神父協助麗的電視與冀世安神父協助香港無綫電視。黎烈德神父（Derek Reid）於彌撒中以英文領經，並主持公開演說。於教宗訪問的前夕，彭光雄神父以嘉賓身份出席了香港電台的深宵電話節目。

1970 年：

香港教區主教於 1970 年聯合耶穌會、慈幼會與澳門教區，於香港仔成立聖神修院神哲學院（the Holy Spirit Seminary

38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93(April, 1970), p. 1.

College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以培訓神職人員的神學與哲學能力。學院更於 1973 年接受在俗教友為學生。學院於今天已成為羅馬宗座傳信大學（Pontifical Urbaniana University）的成員書院。自 1970 年始，共有七名愛爾蘭耶穌會士曾於院內授業；2007 年時共有三名本地的耶穌會士於院內任教。³⁹

1971 年：

香港耶穌會士接辦番禺小學（Pun U Primary School）並改名番禺會所華仁小學（Pun U Association Wah Yan Primary School）。

1971 年 3 月：

西德駐港領事為位於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的湯若望宿舍主持奠基儀式。耶穌會與瑪利諾女修會在得到德國天主教會的支持下達到籌款目標，因此以來自德國科隆（Cologne）、於 17 世紀清初來華工作的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神父（Adam Schall Von Bell）的名字為新宿舍命名。耶穌會與瑪利諾女修會於首十年共同管理宿舍，雙方同意第一任舍監由耶穌會士冀世安神父出任。

同時，一個以余理謙神父為首的附屬委員會（Sub-Commission）就專上教育問題舉行了數次會議。該委員會的成員主要來自大學的修士與部份大學的神父。探討的問題包括 1）於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一個聯校的天主教同學會（Joint Catholic Society），當時中文大學的三間成員書院擁有各自的天主教同學會；2）學生不穩情緒，尤其是受到當時港府新公布的薪金水平問題困擾的多所師範學校的學生；3）香港中文大學的校牧職務（Chaplaincy）與湯若望宿舍於中文大學基督徒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39 感謝勞伯壠神父（Fr. William Lo, SJ）提供資料。

香港耶穌會士更於 1970 年成立超過十個儲蓄互助社，令互助社的總數達到四十一個；整個儲蓄互助運動已確立。

1971 年 4 月：

耶穌會總會長雅魯伯神父（Pedro Arrupe）於 Fr. Herbert Dargan 的陪同下訪問香港。雅魯伯神父在致省區辭中，觸及到數個耶穌會在現代社會中特別關注的問題，尤其強調祈禱（Prayer）的重要性。據《香港耶穌會副省區通訊》記述：「他（雅神父）總結道，耶穌會士有三項事須做，以向世界宣揚我們的訊息：第一是傳揚基督的愛，『一份對基督本身的個人的愛』；第二，『透過基督去觀察世界——此為辨別神類；藉此我們將與聖依納爵那就是最真實的聖依納爵精神；經常懷有一份對聖神開放的心……內心自由，以求得到聖神力量，因為聖神是透過服從與個人醒悟以進入我們體內』；第三，『the *Magis*，進步與發展……但這裡說的 *Magis* 必須是符合基督的標準』。雅魯伯神父認為對今日耶穌會而言，最重要的三大特徵，『乃是基督、辨識、與 the *Magis*；經此三項，才能為一現代人，對改變常常抱著一份開放的態度，並準備好、完全地準備好去接受改變冷漠的心，這是聖神的說話。』他並建議和要求我們為耶穌會去學習、研讀與祈禱作為他的總結：『我們仍能（對今天的世界）作出貢獻，對賜予我們這份無可挑剔的聖職的主，縱不說感到自豪，我們亦理應懷著一份至高的崇敬感恩之意。』他亦公開呼籲，面對問題，我們應抱著誠意與開放的態度去面對，而非置諸不理、埋藏心底。」⁴⁰

雅魯伯神父於另一場演講中說道：「我們面對問題，是因為我們在此刻理應要面對問題；沒有問題則耶穌會士便形同死屍。」遵循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與耶穌會第三十一屆大會的指引，耶穌會抱著一份適應時局的希望之心，這意味著須先從外作反思（*reflectio ad extra*）以觀察教會與世界；耶穌會的目

40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06(May, 1971), p. 1.

的旨在服務，但服務不是為私己，而為世人、為世界、為教會，所以我們必先了解四周，明白服務所為者所需，才能提供服務。．．．．．「我們尚有一至為緊要的推廣工作，那就是宣傳基督、弘揚信仰。但推廣員必須完全了解市場，正如我們必須認清世界；再嘗試適應世界。」我們正處於一個世俗化的世界，所以於傳教工作的方法與途徑上作出世俗化改變，以適時需。．．．．．但問題正在於我們能變到甚麼程度，會內對此意見分歧。我們須作一內部反思（*refectio ad intra*），去觀察我們能因世局之變而自變至何等程度，變其一切能變者。．．．．．「我們須求一平衡。．．．．．既要使改變具成效，亦須確保改變能救贖世人。．．．．．這需要我們有時在表面形態與內在態度上作調整。．．．．．我們正處於一個改變中的世界。」⁴¹

雅魯伯神父引用教宗保祿六世的說話，指教會今日需要耶穌會：「我們為世界帶來了（聖依納爵的）意念——以主耶穌的目光觀察世界。．．．．．若要對世界、教會之外開放我們的工作與態度，我們必須先對內開放，以求與基督聯結盛行的禱告風氣；．．．．．故此我們須要這樣的禱告風氣，去與基督結合。」．．．．．當談到耶穌會作為使徒傳教生活中神修的產物時，雅魯伯神父強烈推薦 Fr. Ganss 新近完成的英譯《會憲》（*The Constitutions*），認為該譯本乃是歷來最精確而兼具註釋的譯本，值得詳閱。《耶穌會會憲》闡述了應如何在不求單一化的情況下以適應變局；《會憲》表現了於文化改變問題上的多元主義精神，以使耶穌會士能適應不同洲份與國家的文化差異，在其所在地對使徒生活作適應性的調整。「我們能作出巨大的影響——只要我們能真正與基督結合。．．．．．我們須培養這份對基督的愛。．．．．．如果我們忘記愛是甚麼時，我們將不再是耶穌會士——一群為基督完全奉獻的人。」⁴²

41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06(May, 1971), p. 2.

42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06(May, 1971), p. 2.

1971 年夏季：

余理謙神父出席了兩個關於學生與校牧的國際會議：第一個是已有五十年歷史的國際公教大學會議（the International General Assembly of *Pax Romana*），是次會議是七月上旬於瑞士弗里堡（Fribourg）舉行。余理謙神父當時是以公教聯合會亞洲秘書處專任校牧（Chaplain to the *Pax Romana* Asian Secretariat）身份出席會議。是次會議主題為「解放：如何？」（Liberation：How？）以探討當時學生對社會政治議題的投入。其後余理謙神父於印度參加了一個專為亞洲校牧提供培訓的課程。天主教學生對社會政治運動愈趨熱衷的表現再次受到關注。⁴³

1971 年 12 月：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湯若望宿舍於 12 月 23 日正式啟用。香港教區徐誠斌主教在談到湯若望時，強調其忠誠與包容不但為 17 世紀的北京所需，20 世紀的學生宿舍亦需這樣的美德。

1972 至 1978 年：

劉勝義神父（John Russell）出任耶穌會香港省會長。



劉義勝神父

1972 年：

魏志立神父出任長春社（Hong Kong Conservancy Association）的終身會員與委員會主席，並於六月出席於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舉行的聯合國環境會議。

同年，香港教區徐誠斌主教要求孟家華神父（孟神父現時被視為天主教社會教育的倡議者與專家）於香港仔聖神修院神哲學院，開設一個有關教會社會訓導的課程。

43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12(November, 1971), p. 2.

1972 年 8 月：

耶穌會總會長雅魯伯神父參與第二次研討大會（Colloquium Two）。於其結辭中，雅魯伯神父建議道：「這次研討會特別關注文化及其他衝突的體驗，此類體驗教會現時於不同範疇的生活中皆能感受到。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尤如水中之石，水碰撞石塊而產生衝突；我們該嘗試令自己似船而非石，從而更能於水流中控馭自身，乘流而進，更取其利。於這個變幻的大時代，我們未能足夠裝備自己，這次研討會正能協助我們適應變局。我們須如對基督開放那樣對世界開放；否則對世界，我們只能受不能予……當於回答問題時，雅魯伯神父再次觸及聖召的問題，討論了耶穌會的弟兄在這個劇變中的時代，所面對的問題與應處的定位；又論及將耶穌會的靈修處於聖體中心，探及神學位置的多元化所帶來的問題；又論及耶穌會士有時會經歷的個人信仰與聖召問題，及其所需的協助、諒解與尊重。」⁴⁴

同年，孟家華神父成為新成立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顧問，該協會擁有超過一千名會員，主要關注聯合其他認同世界勞工聯盟的原則的團體，如公務專業人員協會（Professional Civil Servants）。

197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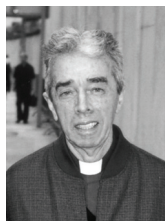
香港過海隧道開通，兩間華仁間的車程縮短至二十分鐘，其中一條巴士線經過利瑪竇宿舍與九龍華仁書院。

1972 年 12 月：

徐志忠神父（George Zee）於 12 月 3 日於九龍華仁書院的聖依納爵小堂（St. Ignatius Chapel）晉鐸。署任省會長狄恒神父與院長谷紀賢神父



徐志忠神父



谷紀賢神父

⁴⁴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21(August, 1972), pp. 1 – 3.

（Sean Coghlan）伴同香港教區徐誠斌主教出席了晉鐸彌撒。徐志忠神父乃是第一個在香港領受神職的華人會士。

197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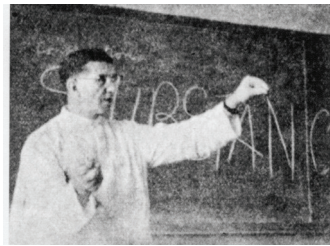
勞達一神父（Laszlo Ladany）與《中國消息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辦公室聯合出版新月刊 *Letters from Asia*。月刊首期於五月出版。其主旨是為西方人士提供一個以亞洲人的觀點出發、關於亞洲地區的時事評論。

1973 年 5 月：

香港教區徐誠斌主教於 5 月 23 日突然去世。其逝世對耶穌會士而言，是損失了一名重要的朋友與仰慕者；徐主教私下亦與多名會士工作關係密切。

1973 年 8 月：

谷紀賢神父、范育倫神父（Anthony Farren）、麥健泰神父於 8 月 20 至 25 日，代表省區出席於馬尼拉舉辦的首屆國際耶穌會高校宗教教育工作坊。是次工作坊重點乃是「基於於學校內進行社區建設的信念與耶穌會教育的主要



1960 年，范育倫神父在授課中

目的，以傳揚福音，持續努力地在態度與價值上作出改變。耶穌會士與教友職員間，須建立一份基於互信、互愛、尊重、內心平靜與公平意志的兄弟情誼，當與我們的學生與學生家長分享時，便能建立起一個發展基督徒教育與個人成長的必要環境。⁴⁵

同年，孟家華神父的勞資關係協進會在年輕的天主教工作者所在的不同堂區為他們舉辦講座，解釋協進會的作用在於宣傳和諧的勞資關係，協助解決工人問題，為他們提供一個強而有力的工人組織與提倡工人的持續教育。勞資關係協進會是一

45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35(October, 1973), p. 3.

獨立的非謀利機構，其主要的財政支持來自世界勞工聯盟（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1973 年 9 月：

一個關於儲蓄互助運動的大型會議於香港耶穌會的利瑪竇宿舍舉行。超過一百名來自亞洲、非洲及其他地方的代表出席了是次會議。

1974 年 7 月：

香港教區李宏基主教(Peter Lei)於 7 月 23 日突然逝世(前任徐誠斌主教逝世後的十四個月)。

1975 年：

港府委任孟家華神父出任社區關係市民諮詢委員會（Citizens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mmunity Relations）的成員，以協助廉政公署的工作。該委員會成員來自工會組織、傳媒、家庭主婦、教育界與市民團體的代表，又包括政府與福利機構的高級成員。

1975 年 7 月：

新任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主教（John Baptist Wu）的晉牧暨就職典禮於 7 月 25 日，於天主教主教座堂舉行。

1975 年 9 月：

余理謙神父於一份英文日報發表了一份關於「折磨」的長篇文章。

同年，孟家華神父於香港大學講授了一個題為「勞顧關係」的校外課程，主要論及關於勞工管理、工人運動與勞顧關係。

同時，徐志忠神父主持了一個關於「透過自我認知而成長」的研討會，並獲得成功。這次研討會在香港文教人員社會改進協會（Educators' Social Action Council）於該學年中，為喚起大眾對教育的關注，而計劃舉辦的一連串研討會的第一個。

1975年11月：

余理謙神父於九龍一成衣工廠擔任剪裁工作。他初時覺得工廠工作是苦悶與骯髒的，即使他所在的工廠已不是同業中環境最惡劣的。余神父並以英文寫了一篇文章 “*A Novice Master at Work in a Factory*”，並後來在一本德國雜誌中刊登。

1976年2月：

Fr. Sean Turner 翻譯了一百二十一首中國詩詞，並輯於 *A Golden Treasure of Chinese Poetry* 一書中，並由香港中文大學的翻譯中心出版（由 Jack Deeney 主編）。

1976年4月：

省區的香港與澳門地區於四月舉行會議。會議後設立了五個工作小組：1）白敏慈神父（Marciano Baptista）、郭樂賢神父、龔樂年神父、戴雨谷神父、徐志忠神父與馮耀聰修士（Antonio Fung）、郭春慶修士（Gregory Koay）、梁宗溢修士（Thomas Leung）、吳智勳修士（Robert Ng）會「認真考慮計劃成立一個試驗性的耶穌會士團體；」⁴⁶ 2）巴烈德神父、白禮達神父、陳福偉神父、馮耀聰修士與歐陽理神父（Francis McGaley）會嘗試釐清對兩間華仁書院的天主教宗教指引的含糊處；3）許禮仁神父、狄恒神父、連民安神父（Joseph Mallin）、黎烈德神父及達樂義神父（Donald Taylor）處理耶穌會士學校關於人力資源的議題以及為現職的教徒同事設計在職培訓。4）白敏慈神父、龔樂年神父、科利神父、戴雨谷神父以及梁宗溢修士探討如何可以更有效的運用靈修，以提供最基本的信仰服務以及提倡公義。陳有海修士（Wilfred Chan）、郭年士神父、郭樂賢神父及孟家華神父成立省區新的社會委員會（*Concilium*



連民安神父

46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64(May, 1976), p. 6.

Sociale)，他們的首要目標是建構一個基督教義的意識形態。

47

1976年8月：

港督委任孟家華神父為非官守（不隸屬政府的）立法會成員。他是首位被委任為政府重要機構成員的天主教神父。由於已有足夠的富商代表商界，孟家華神父最關注的是勞工法例以及工人與廠商的關係，成為工人的發言人。他亦繼續擔任於九年前由他成立的勞資關係協進會的顧問。期間，他又被任命為廉政公署顧問委員會（ICAC Advisory Council）的工商業的附屬委員會（Commerce and Industry Sub-committee）的會議召集人，兼任會員。

1976年12月3日：

堅道座堂舉行耶穌會的金禧慶祝會，大約四十名神父與胡振中主教共祭，會眾佈滿整個座堂。共祭者還包括林焯焯副主教（Gabriel Lam；香港華仁書院的舊生）以及會友，及來自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的神父。

1966至1977年：

賴詒恩神父稱這段時期為「茫茫不肯定的時期」（the Uncertain Years），他說：「鑑於數名傑出會士的逝世，又部份成員，尤其是年輕會士，離開本會與部份會士離開香港前往其他地方工作，令這個年代見證了耶穌會士人數的下降。」⁴⁸

1977年：

余理謙神父帶領一群中學教師進行靜修。

同年，孟家華神父成為新成立的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其中兩位神父成員之一。

47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64(May, 1976), pp. 1 - 6.

48 *Hong Kong Vice - Province Letter* No. 171(December, 1976), p. 6.

1977 年 8 月：

余理謙神父代表香港出席於曼谷舉行的 SELA 的會議。他對協助貧窮及被排斥的人民生活的計劃尤其滿意，因為可以親身體驗他們的經歷。他又遇到一些泰國學生。SELA 同意將焦點放在建設基督徒團體上，成員亦願意於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嘗試，感化與他們一起工作的人。在香港，余理謙神父於長洲思維靜院，指導一個進行為期五日的密集靜修小組。

1978 年 4 月：

余理謙神父於長洲慈幼靜修院（Salesian Retreat House）舉辦了一個為期一週的退省，並特別重視禱告與公義（Justices）。

1978 年 8 月：

孟家華神父於英國女王生日榮譽名單中被授予官佐勳章（OBE）。

1978 年 9 月 12 日：

谷紀賢神父在法律年的正式開始，於聖約瑟教堂向一群裁判官、法官、律師與大律師講道。是項活動其後輪流每年於聖約瑟教堂與聖約翰座堂舉行。

1978 年 10 月中旬：

孟家華神父香港仔主持抗毒週的正式開幕禮時，並以廣東話致辭。

1978 至 1985 年：

顏愛群神父（Liam Egan）出任耶穌會香港省會長。

1979 年 1 月：

余理謙神父接替孟家華神父，出任 SELA 的香港代表。

1979 年 4 月：

第六屆泛太平洋康復會議（Pan-Pacific Rehabilitation Conference）於南韓漢城（現時首爾）舉行，郭樂賢神父成為超過七十名成員的香港代表團的團長。於會議後，郭樂賢神父

於漢城逗留了三天，與一名處理儲蓄互助的事宜的長老會教士（Presbyterian Minister）商討互助運動事項。郭樂賢神父亦訪問了一座位於日本別府市（Beppu）、為傷疾人士開設的大型工場（當年 St. Francis Xavier 於別府市登陸日本）。

1979 年 5 月：

余理謙神父代表香港完成了一份關於信仰與意識形態的報告，作為一項輔助計劃的一部份。在他這份九千字的報告中，包括了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與教會對其回應。

1979 年 9 月 2 日：

郭樂賢神父慶祝了他在耶穌會中的第五十年慶誌。省會長顏愛群神父，代表傷殘人士、低下階層、聲音不受重視者及窮人讚揚郭樂賢神父為鬥士（Fighter）。郭樂賢神父被授予員佐勳章（MBE）榮譽，以確認郭神父於促進傷殘人士福利的工作之貢獻，例如：郭樂賢神父於 1958 年為傷殘人士發起一個工作坊，並於 1959 年協助成立香港復康會（Hong Kong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他於 1964 年開始成立儲蓄互助社，並協助起草 1968 年的儲蓄互助社條例；他又於 1975 年成立 Committee of Access for Disabled Persons，並出任主席。他亦於香港復康聯會（Joint Council for th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Disabled）的成立背後，付出努力。

1980 年：

余理謙神父應教區主教要求，正式獲任為天主教職工青年會（Young Christian Workers）的專職司鐸（Chaplain）。當時教區主教能為社工提供更多的協助。余理謙神父負責香港公教青年工人運動的工作。

1980 年 9 月：

白禮達神父完成並刊發為中學倫理科編寫的課本。對中一與中二程度而言，此書較諸之前的倫理、個人與人際關係和宗教科的教科書，是擴充與修訂版本。

1981 年：

因為郭樂賢神父嘗試協助香港公務人員的債務問題（貸款通常來自高利貸），香港的儲蓄互助社得到了香港政府的認可。一個公務人員緊急貸款計劃（Emergency Civil Service Loan Scheme）成立，以為公務員償還巨額欠款。

同年，港府教育司署邀請白禮達神父參加一個道德教育的研討會。

1982 年 5 月：

陳綸緒神父完成著作 *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並由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出版社（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出版。

1982 年：

麥健泰神父獲任命為 SELA 的香港代表。

1983 年 3 月 29 日：

香港大學授予巴烈德神父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以示確認巴烈德神父對香港教育的長期服務——兩度出任香港華仁書院校長、多年來出任多個政府與大學組織的職務，並積極參與於教育政策事宜。於香港大學學位頒授典禮致辭中，巴烈德神父建議了一個應急計劃，將大學學位於五年內增加一倍。

1983 年 11 月：

《香港耶穌會副省區通訊》改名《香港耶穌會省區通訊》（*Province Letter*）。⁴⁹

1984 年 4 月 25 日：

五十一名耶穌會士就議題 *Documentum Unicum* 於九龍華仁書院舉行反思會。麥健泰神父以一精湛的簡報總括了這份文件與詳列香港耶穌會於傳教工作上可能面對的個人與環境問題。他將簡報分序列於三個組別：1）文件的方向；2）反映在

49 *Province Letter (Macau-Hong Kong Province SJ)* No. 252(November, 1983), p. 1.

香港與澳門的「耶穌的同伴」情況；3) 對耶穌會士被派遣所至的地區之反映。麥健泰神父建議將文件方向置於尼西亞信經 (Nicean Creed) 的主要部份之下，以示遵循總會長雅魯伯神父 (Fr. Arrupe) 寄予香港耶穌會的信件中所宣示的聖依納爵神恩中的三位一體說。據《香港耶穌會省區通訊》記述：「這種方能被證明是一種審視與總結會士工作的方法。當觸及香港與澳門的耶穌會工作困難與人事問題等議題時，他能有效地藉助一順時序的名單，指出超過四份之三的會士是於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完結前晉鐸，皆早於該會議展示其態度之改變之前。當論及我們被遣往的香港與澳門地區，麥健泰神父強調了現時的不少擔憂，並以輪盤比喻兩個城市的生活，並探討了部份關於九七回歸的問題；當然還有耶穌會士面對現時與將來的問題該如何回應。狄恒神父於回應麥健泰神父時，亦反映了我們需要探討該如何回應神恩感召。教宗指示耶穌會須有效地回應求救的呼叫：執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中關於與教會緊密合作與無神論的問題上的決定.....欠缺反思，則發展與成長無從可言。他認為第三十三屆信徒大會所提出的團結是特別重要的，從會議中與前三次的集會中，我們得到啟視——該學習與觀察些甚麼.....於隨後提出的問題、觀點與交流中，主要圍繞著教區、召叫、辨別神類 (discernment)、本地化與本土化、靜修感恩等問題.....鄧以明總主教分享了修會於本世紀早期在澳門的經驗，與突發事件如何影響後來使徒工作的價值。」

50

1985年2月13日：

耶穌會總會長柯文伯神父 (Peter-Hans Kolvenbach) 訪問香港。據柯文伯神父指出，教宗與蘇南斯樞機 (Leo Jozef Suenens) 於羅馬曾向他說：「我們須要耶穌會士拯救神恩運動 (Charismatic Movement)，因為它現時處於兩極端之間.....」

50 *Province Letter (Macau-Hong Kong Province SJ)* No. 258(May, 1984), pp. 1 – 2.

我們需要聖神辨識的能力，而你們耶穌會一直有進行靈修，這份神恩是應送給教會的（而非為你們自身的）.....第二項來自教宗的要求.....耶穌會該遵循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決定，『我希望耶穌會，能如聖依納爵與他的同伴當年協助執行脫利騰會議（Council of Trent）決定般執行這工作。』.....但事實是，他反映拉辛格樞機主教（Josef Ratzinger；即現在的教宗本篤十六世）曾非常堅決與批判地就會議發表意見，他所用的「復古」（Restoration）一詞，起碼於意大利文與法文中，具有返回至少一個世紀之前的古代政權（Ancien Regime）的意思；但樞機主教本人則否認他有這個意思；他覺得會議過度樂觀。關於下一次的教會會議，我們必須知道它將會處理甚麼，因為教宗已給予我們完成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決定的任務.....（最後，總會長發表了已準備好的訓誡）：.....經文告訴我們主身處於我們當中，即使我們對港澳的前途有所疑惑，但我們無須恐懼。主的計劃與我們的難盡相同。祂正以張力與困苦、衝突與誤解，為中國耶穌會編寫一段新的歷史。」

⁵¹ 除此之外，根據《香港耶穌會省區通訊》記述：「第三十三屆大會要求我們於日常生活中，緊抱持恆的辨識態度，與此同時，以透過團體分辨（Communal Discernment）持續更新牧靈工作。鑑於香港的特殊環境，全體信徒大會所提出的這些建議，尤顯深遠意義與重要性。我們需要開放性、可用性，以準備根據聖神於此時此刻所言以作出改變與適應。在「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這個使命中，我們需要彼此合作——先是聯合耶穌會士、亞洲與歐洲人——澳門香港省區、中華使徒省區（Province of the Chinese Apostolate）與其他省區的成員。我們耶穌會士必先被視為一個從內在、於心靈與思想上緊密結合的單一團體，再以同樣的方式與外在的志同道合者結合。藉此結合，我們故能深入本地教會之中；參與教區於香港

51 *Province Letter (Macau-Hong Kong Province SJ)* No. 268(March, 1985), pp. 1 - 8.

的生活，並為建立一個宗教與教區華籍與外籍神職人員融合的氣氛。此外，我們亦急須與在俗教徒合作與於中國文化的研習上達到一定的學術水平。」⁵²

1985 年：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地區脫離澳門-香港省區，成立一個區。

1985 至 1991 年：

吳智勳神父〔Robert (Chi-fun) Ng〕出任耶穌會香港省會長。

1985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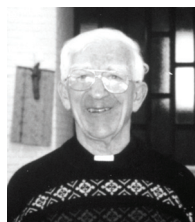
麥健泰神父代香港出席於吉隆坡舉行的 SELA 會議。

1986 年 1 月 5 日：

長洲思維靜院重開初學院，郭年士神父出任初學導師（Master of Novices），麥健泰神父出任導師助理，而徐志忠神父與余理謙神父則任顧問。

1986 年 1 月：

SELA 刊物一月號專題介紹香港。內容包括由麥健泰神父執筆的（論中英聯合聲明）與（長征到 1997）（*The Long March to 1997*）、由施惠淳神父（Joseph Shields）執筆的（論 1997 協議與香港天主普世教會）（*On the 1997 Agreement and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由 Fr. Louis Robert 執筆的（論難民）（*On Refugess*）與以天主教職工青年會名義發表的（論工業勞工）。同時，古理明神父（Pierfilippo Guglielminetti）亦就香港前途問題於意大利文的傳教月刊 *Popoli e Missione* 中刊登了兩篇文章。



施惠淳神父

52 Ibid.

1986 年夏季：

狄恒神父出席了一個在六月份於美國波士頓學院舉行教育人員會議。其主題為「與教友間的合作」。其重點放於在俗教友因其洗禮將會負起教會的教學傳教工作，以宣揚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訓導。狄恒神父並出席了另一個由三藩市大學天主教教育及領袖中心（Institute for Catholic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舉辦的、關於在千禧年代天主教教育角色的會議。

1987 年 4 月 21 至 23 日：

省區會議於香港華仁書院舉行，期間通過三項主張：1）耶穌會須擴大其於推廣在俗的男女（包括已結婚者）之列入福品與封聖，藉此以展示修會願意先於在俗教徒方面工作，然後才為會士謀求列福品與封聖；2）修會被要求查看的組織、歸屬、証明、申請及其他省區臨時居留區域，並於需要時進行修正；3）省區在有效地組織宣揚公平與人權的問題上給予修會更高的優先權；另須設立一些能令修會就重要社會與人道問題發表意見的機制。」⁵³

1987 年 6 月：

勞達一神父的新書，*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由美國紐約的 Freedom Press 出版。

1987 年 8 月 16 至 20 日：

魏志立神父、徐志忠神父與董樹德神父出席一個由民族發展中心（Centre of Progress of Peoples）舉辦的「公義與和平」研討會。會議旨在成立一個公義與和平組織以代表男女修會會士向教區與其他組織的教徒發表意見。

1987 年 8 月 28 日：

七十三名天主教會神父與新教牧師於一份刊登於全港報章的公開聲明中，聯署支持立法局直選，其中包括魏志立神父與余理謙神父。

53 *Province Letter (Macau-Hong Kong Province SJ)* No. 293(April, 1987), p. 1.

1987 年 9 月 12 日：

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於教區中心的禮堂，籌辦了一個支持直選的論壇。余理謙神父、魏志立神父、郭年士神父與董樹德神父皆有出席是次論壇。

1987 年 9 月 27 日：

余理謙神父、陳有海神父與董樹德神父參與了一個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萬人支持 1988 年立法會直選的集會。公教報主編夏其龍神父（Louis Keloan Ha）亦是該次集會的十二個講者其中之一。

1988 年 2 月：

勞達一神父撰寫的新書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A Self Portrait* 分別由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及倫敦 Christopher Hurst 出版。

1988 年 5 月 28 日：

余理謙神父接受電視節目時事追擊（Newsline）的訪問。該節目探討香港教區新近公佈的一份關於未來十年計劃的政策綱要諮詢文件，而余理謙神父則為起草該文件的委員會成員之一。

1988 年 5 月：

麥健泰神父撰寫並出版了一期 *SELA News* 的特別號。其中廣泛地包含了香港於當時的新近發展議題，如（九七後的基本法）、（越南船民之湧入）及（人材外流）。

1989 年 4 月 14 日：

九龍華仁書院舉辦家長日。狄恒神父於當日講解主題——「耶穌會教育的兩項特點——追求服務之卓越與見證服務之卓越」。

1989 年 4 月 14 日（羅馬）：

勞伯壩神父（William Lo）成功通過博士考核，其論文題目為 *Conversion and Salvation*：



勞伯壩神父

a Narrative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f Judges 6–7.（勞伯壠神父數月後在羅馬宗座聖經學院正式取得聖經博士學位）。

1989年8月：

狄恒神父出席了一個由東亞區耶穌會（East Asian Jesuit Conference, EAJEC）贊助的教育界會議。

1989年6月下旬：

耶穌會出版一本以神學及靈修為主題的新期刊——《神思》。一期以培育為主題。

1989年11月10日：

施惠淳神父英文版公教報 *Sunday Examiner* 中發表文章（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稿）（On the Draft of the Basic Law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施惠淳神父於文章內論述：「1989年2月的基本法草稿確有不少優點，但它對宗教信仰者與全港市民的基本人權保障並不足夠，必須強化。」

54

1989年11月：

麥健泰神父（Fr Thomas McIntyre）、周守仁修士（Stephen Chow）與董樹德神父（Frank Doyle）出席了公義與和平宗教論壇的首屆周年大會。

1989年12月底：

耶穌會愛爾蘭省會長 Fr. Philip Harnett 與其秘書 Fr. John Humphreys 訪問香港。根據《1990年1月11日愛爾蘭會長會見澳門、香港省會士的報告》（The Report of the Meeting of the Irish Provincial Fr. Philip Harnett with members of the Macau-Hong Kong Province on 11 January 1990）記載：「……這是一個令人感到安慰的省區。這裡具有無私的精神與活力，

54 *Province Letter (Macau-Hong Kong Province SJ)* No. 323(November, 1989), p. 9.

並紀錄了一段偉大的愛爾蘭耶穌會士長年工作史，特別是在兩所華仁書院的工作。愛爾蘭回應了成立華仁書院的確切需要，並且完全履行。.....我確對省區內數之不盡的其他服務感到驚喜，如靜修院與修會對教區神哲學院的投入。修會與本地教會緊密合作，你們的會長更是廣為人知。若然令人慰藉能被視為一項運動，那這裡的一切確實令人感到安慰。.....當然，這裡亦受到 1997 的不明朗因素干擾。最好與最差的願景的落差使前景規劃變得困難。.....面對困惑與憂心，我們更需要令人安慰的與正面的樂觀態度。依納爵特別團結。這份精神將到臨愛爾蘭省區。.....我們可以設立工作坊，進行靈修與探訪耶穌會學校。同時，我們須要以真誠的態度面對老師們，以免給他們硬銷的感覺。現時的組織正向由教徒管理的方向變遷。.....我們藉著對貧困者不離不棄的信仰視野以建構與大眾間的關係。經驗告訴我們與貧困者接觸才能帶來真正快樂。與富有者接觸，我們或獲尊重，但更傾向於被利用。.....愛爾蘭對香港所發生的一切深感自豪。.....當愛爾蘭省區到達它最窮困時，亦是其迅速成長期。」⁵⁵

1989 年 3 月至 1989 年 10 月：

七位耶穌會士先後於香港辭世：莊禮思神父（Seamus Doris）於 1988 年 3 月、江之和神父（Matthew Corbally）於 1989 年 1 月、祁祖堯神父（Gerard Casey）於 1989 年 2 月、杜達明神父（Timothy Doody）於 1989 年 3 月、巴烈德神父（Cyril Barrett）於 1989 年 7 月、方學良神父（Patrick Finneran）與 Fr. Paul Jenkins 於 1989 年 10 月；他們皆對香省區與社會作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1989 年 5 月 12 至 19 日：

麥健泰神父以 SELA 香港代表的身份出席 SELA 於泰國進行的會議。耶穌會總會長傳信問候：「SELA 於過去三十年的

55 *Province Letter (Macau-Hong Kong Province SJ)* No. 325(Jan., 1990), pp. 11 - 18.

發展將曾一度重視本土的視野擴闊至國際社會問題層面。比起以前，這寬闊的視野更為今日所需。現時我們皆了解到，對公義的提倡已成為耶穌會士的培訓的重要一環，藉此你們該重新釐定自己的職責。更希望你們能具有更強的神光、更高的領導能力，以對造成大眾困苦的原因作更深層的探討，例如對造成難民運動的根本原因的探討。．．．．．雖然你們的研討會的主要議程，乃為商討於參贊區建構一個密集的社區中心網絡，從參與者會自不同界別一點得知，現時確實需要透過合作，以更有效地處理現亞洲地區面對的主要挑戰。．．．．．所以你們會議所觸及的範圍是積極參與地區內執行信仰與公義之使命關係密切。」⁵⁶ 根據《香港耶穌會會省通訊》記述：「（會議中）作出了兩項建議：《新事》與移民勞工。1）《新事》：此通諭於 1891 年發表，明年〔1991 年〕我們將慶祝百週年紀念。部份社區中心已準備藉此機會，更清晰地宣揚教會的社會訓導。SELA 的各地地方分會可舉行會議，以探討可以於地方進行甚麼工作。2）移民勞工：有建議指出，各省區的修士可製作一套半小時長、關於移民勞工權益的視訊。該視訊可於 1991 年 12 月的修士工作坊中播放。SELA 分會可以協助修士們進行資料蒐集與研究。」

1990 年 4 月 17 至 19 日：

省區會議於香港華仁書院舉行。省會長吳智勳神父向會上弟兄講到現時省區的情況：「．．．．．九七將至，省區無時不將香港與澳門的前途問題掛在心中。於六四北京天安門事件後，香港與澳門兩地的市民皆對北京徹底失卻信心。去年共有超過五萬名港人決定離開此地，今年將會有更多人跟隨。我們已處於一極危險的處境，若然情況再見惡化，經濟與教育制度則隨時崩塌。基督的希望與會士的傳道工作對這裡的市民更見重要。我們必須公開表明我們將留在這裡繼續服務香港與澳門。」

56 *Province Letter (Macau-Hong Kong Province SJ)* No. 329(May, 1990), pp. 1 - 2.

我視此為『與窮困者的團結』（Solidarity with the Poor），因為只有窮困者才無可選擇地留下來。我向主禱告，希望我們的決志能為其他人帶來希望。」⁵⁷

1990 年 5 月至 6 月：

白禮達神父，〔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的倫理學講師〕，就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性教育課程的內容發表評論（分兩部份於 5 月 16 日與 6 月 16 日於《百姓》月刊刊登）。

1991 年 1 月：

耶穌會總會長（與其助理）訪問澳門—香港省區。總會長說：「耶穌會一直非常重視於中國的傳教事業。其他的修會亦有志於中國的傳教事業，但耶穌會對中國的感情是特別的，因為耶穌會士已在這裡持續工作了很長的時間。」⁵⁸

1991 年 4 月 22 日：

耶穌會中華省區成立。省區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澳門與香港地區。本來屬於中國省區的泰國與越南地區和本屬於澳門—香港省區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地區，並未有納入新的中華省區。泰國與馬來西亞—新加坡地區被納入印尼省區，而越南則成為一個獨立的地區。

1991 年 5 月：

最新一期《神思》出版（《神思》季刊由吳智勳神父於 1989 年 5 月創辦，主要探討耶穌會的神學與靈修；這一期的主編是嘉理陵神父〔Sean O' Cearbhallain〕）。這一期主要探討《新事》通諭的公義問題。信仰與公義委員會（Faith and Justice Commission）的成員郭年士神父、麥健泰神父、余理謙神父、周守仁修士皆發表了文章。

57 *Province Letter (Macau-Hong Kong Province SJ)* No. 328(April, 1990), p. 3.

58 *Province Letter (Macau-Hong Kong Province SJ)* No. 337(January, 1991), p.3.

1991 年 6 月：

《耶穌會港澳省通訊》第 343 期（1991 年 6 月出版）為（香港耶穌會士會訊）的最後一期。

1991 至 1996 年：

勞伯壩神父出任耶穌會港澳區會長。

1996 年至現時：

狄恒神父擔任耶穌會香港省會長。

1997 年 7 月 1 日：

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

總結

筆者於此引用狄恒神父一篇未發表的文章《香港耶穌會士》的數項重點以作總結：

「於 1926 年 6 月，時任宗座代牧恩理覺主教邀請能說英語的耶穌會來到香港協助辦學。恩主教特別關注到香港天主教中學與對香港大學教徒學生的牧靈工作嚴重缺乏的問題。愛爾蘭耶穌會士省區正面回應恩主教的邀請，即使當時修會正計劃於南京南方的江蘇省展開傳教工作。耶穌會士正式參與香港的傳教工作。首兩名耶穌會神父，Fr. George Byrne 與 Fr. John Neary 於 1926 年 12 月 2 日抵達香港。兩位神父趕及於 12 月 3 日在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主持聖方濟·沙勿略（薩威）節彌撒。當時愛爾蘭已派遣為數不少的耶穌會士前往澳洲，而香港則成為愛爾蘭省區的第二個傳教地。1926 至 1964 年間，愛爾蘭省區慷慨地向香港派遣了一百零七名會士。今日仍有七名愛爾蘭耶穌會士留在香港工作，而華籍會士則有十三名。

於 1927 年抵達香港後，展開第一個計劃是出版《磐石》（The Rock）月刊，一份包含文學與時事的天主教月刊。月刊很快捲入了與理性主義者的論戰。這份刊物一直出版至 1941 年。

緊接的計劃是於教育方面的工作。應恩主教的呼籲，修會於 1929 年與香港大學商議後，租得土地以興建一所天主教學生宿舍，取名利瑪竇宿舍（Ricci Hall）。利瑪竇宿舍提供六十個宿位，並擁有自己的小教堂。耶穌會士現時仍然管理重建後的利瑪竇宿舍，新宿舍有一百二十名宿生，但當中只有七或八名天主教教徒。

耶穌會士的第三個項目是在 1931 年接辦新建的香港仔華南修院，華南主教團遣派修士至院內修習哲學與神學。首三名神父於 1934 年晉鐸。共產黨於 1949 年統治中國後，再沒有修士能到香港，耶穌會士因此於 1964 年將修院交回香港教區，並改稱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現仍有三名耶穌會士於校內任教。

第四項計劃為中學教育。隨著派遣香港的愛爾蘭耶穌會士的數目的增加，我們（耶穌會士）展開了中學教育的發展。耶穌會於 1932 年 12 月 22 日接辦由天主教教徒徐仁壽先生於香港島羅便臣道創立的華仁書院。書院於 1955 年遷至新址——香港島灣仔皇后大道東 281 號。巧合的是，同樣是這位徐仁壽先生，於 1924 年在對岸的九龍半島創立了華仁書院的分校；於九年後的 1932 年，徐先生亦將九龍華仁書院交予耶穌會士。所以我們最後負責了兩所華人學生學校的運作，直至今天。

香港的耶穌會士對這座城市的社會與文化生活皆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賴詒恩神父於 1938 年成

立了國難籌賑會（*War Relief Association*），以協助戰爭受難者，包括難民。港督於1945年任命賴詒恩神父署任農業主管，負責組織重新造林、成立蔬菜批發市場與漁業合作社。除出任公職外，賴神父亦曾出席電台的音樂節目及於南華早報任音評人。Fr. Terry Sheridan 監制了數齣公演的舞台劇，並於數名教師的協助下，把粵劇以英文搬上舞台。

1941至1945年間乃香港的日治時期。賴詒恩神父於其著作仁者無懼（*Jesuits Under Fire*）中詳述了耶穌會士於該段時期的艱困工作。耶穌會士成立數個至今仍在運作的組織。侯奕純神父於1946年成擦鞋童會，即今日仍非常活躍的小童群益會前身。郭樂賢神父發起儲蓄互助運動，並取得顯著成績；郭樂賢神父並與其弟郭年士神父創辦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此組織至今仍在教區內提供婚前課程、個人輔導、愛與人生課程與提倡家庭計劃等服務。孟家華神父鑑於本港工會勢力微弱，所以於1960年成立勞資關係協進會以培訓本地工會領袖；此機構至今仍扮演著一重要角色。

現時香港耶穌會內共有二十三名神父與三名修士。九七回歸後，香港已成為中國的一部份；惟我們的傳教事業未有受到阻礙。現時我們仍在營辦兩所各有約一千名學生的中學。現時香港的行政長官曾蔭權（Donald Tsang）亦是香港華仁書院校友，而於最近特首選舉中挑戰曾特首的梁家傑（Alan Leong）則為九龍華仁書院校友；兩人皆為天主教徒。我們於澳洲、加拿大、美國、英格蘭與新加坡皆擁有很強的校友組織。最近我們組織了一個步行籌款活動。除得到了海外的慷慨支持外，在香港亦有超過三千名人士於2007年10月7日當天參與了

步行。是次活動取名華仁一家親基金步行籌款(*Wah Yan One Family Foundation Walkathon*)，並取得巨大的成功。

乘坐高速小輪，約三十分鐘可到達長洲的聖方濟各沙勿略靈修中心(*St. Francis Xavier Spirituality Centre*)是香港耶穌會的另一成就。這所靜院環境優美，倚山面海；現時共有三名耶穌會士與一名在俗教徒——趙汪宗奇女士(*Joanna Chao*)在此工作。他們負責靜院舉辦的三十天、七天或週末退省。他們亦定期到中國培訓靈修培育員、退省指導師、修女與修士。靜院提供的靈修服務廣受歡迎。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現時院長為勞伯壠神父，教員有教授倫理神學的吳智勳神父與教授聖經的白敏慈神父(*Marciano Baptista*)。他們現時主要協助修士的培育與參與院內課程的教徒。

香港的基督生活團(*Christian Life Community*)正在茁壯成長。其輔導一職現由嘉理陵神父出任，並得到吳智勳神父與哈國平神父(*Greg Hyde*)的協助。基督生活團現時已成立一所小學與一所中學，部份團員更已被訓練為退省指導師，亦有其他於主日學上教授要理。

耶穌會會士現時於五座處於活躍社區的小教堂工作：兩所學校的小教堂、公教進行社小堂、香港中文大學湯若望宿舍小教堂與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小教堂。

隨著與中國的趨於開放，為香港耶穌會士與內地的交往提供條件；其中如利瑪竇團體，於省區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其中一小部份上，如教育、出版與靈修培育，作出了貢獻。香港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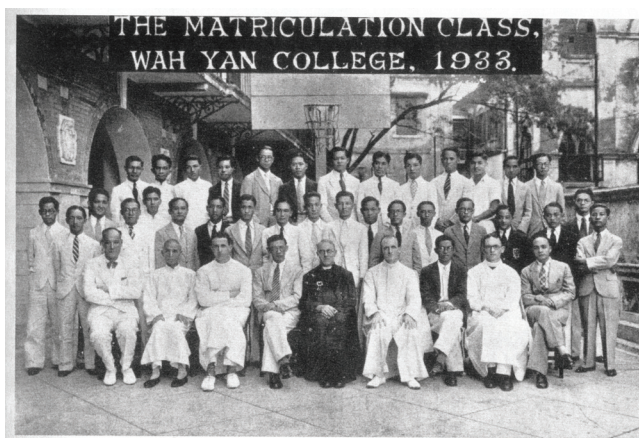
國正趨於融合，將來定必為我們耶穌會與華南於眾多的領域上
架構通迅橋樑。」⁵⁹



二零零三年，狄恆神父獲香港
大學頒發名譽社會學博士學
位，並於陸祐堂發表演說



徐志忠神父在一九
五八年曾擔任九龍
華仁書院總學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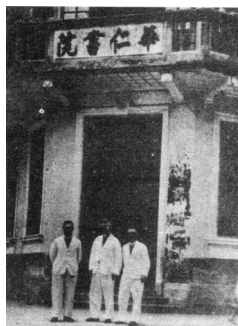


1933 年大學入學試班

59 Fr. Alfred Deignan, SJ, *The Jesuits in Hong Kong*, (an unpublished article, Hong Kong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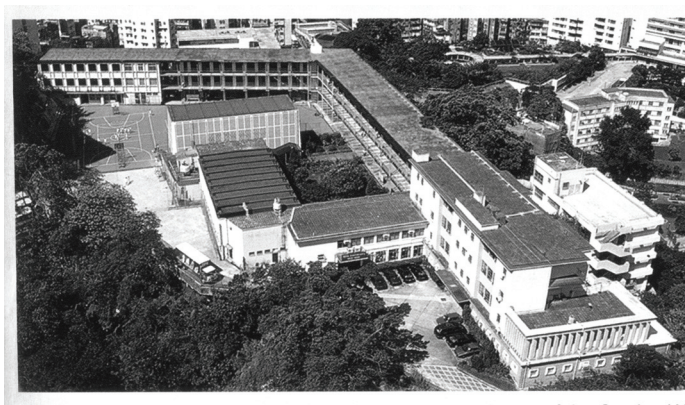
早期華仁書院在羅便臣道之校舍



1928 年於奶路臣街
之分校



1969 年香港華仁書院



2000 年香港華仁書院

參考書目

Primary Sources

- Hong Kong Mission/Vice Province/Province Newsletter*
(1962—1991)
“Obituaries of the Hong Kong Jesuits” in *Vice Province/Province/Hong Kong Mission News letter, Sunday Examiner, Kung Kao Po,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Hong Kong Standard, Hong Kong Who’s Who, 1958–1960 & 1970–1973.*
The Star (School Magazine of Wah Yan College, Hong Kong)
The Shield (School Magazine of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Irish Jesuit Yearbook
Irish Province News
The Irish Province Newsletter (100 issues up to Feb., 2004)
Interfuse
Tsing Nin Man Yau
San Sze (Spirit: A Review for Theology and Spirituality)
The Rock (1920 – 1941)
Outlook (1952 – 1954)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Hong Kong Jesuit Mission, 1926 – 1976”
by Fr. Thomas Martin, S.J.
Irish Jesuits Go East (Part 1, Readings from Early Documents.
Compiled in 1986 by Fr. Thomas McIntyre, S.J., given by Fr. Alfred Diegnan, S.J.
“The War Years of Wah Yan, 1941 – 1945” by Fr. E. Bourke, S.J.
Irish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50th Anniversary
Irish Jesuits in South China: 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 (1952)
“Provincial List of Jesuits who Worked in Hong Kong since 1926”
and unpublished papers provided by Fr. Alfred J. Deignan, S.J.

Secondary Sources

- Bays, Daniel H. “Christian Revivalism in China, 1900–1937.” In
Edith L Blumhofer and Randall Balmer, eds., *Modern
Christian Revival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and Grant Wacker, eds. *The Foreign Missionary Enterprise at Home*.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3.
- , "Chinese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oday," *The China Quarterly*, 174(June, 2003), pp. 488–504.
- , "Foreign Missions and Indigenous Protestant Leaders in China, 1920–1955," in B. Stanley, ed., *Missions, Nationalism, and the End of Empire*.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2003, pp. 144–64.
- , "A Tradition of State Dominance," in J. Kindopp and C. Hamrins, eds., *God and Caesar in Chin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04, pp. 25–39.
- Catholic Diocese Centre. *The Special Bulletin for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Centre, 1991.
-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Hong Kong: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78.
- Chan, Albert, S.J. (a late Jesuit in Hong Kong)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New York: M.E. Sharpe, 2002.
- , *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Norman: U. of Oklahoma Press, 1982.
- Chapple, Christopher, ed. *The Jesuit Tradition in Education and Missions: a 450-Year Perspective*. Scranton: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 1993.
- Chu, Cindy Yik-yi.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9: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Criveller, Gianni. (an PIME in Hong Kong) *Preaching Christ in Late Ming China: The Jesuits Presentation of Christ from Matteo Ricci to Giulio Alen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1997.
- Daly, Charles, S.J. (a late Jesuit in Hong Kong). *Cantonese Missionary Handbook*. Hong Kong: n.a., n.a.
-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Diocese (1894–1974): a Brief History and the 1974 List of Church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ocial Welfare Centres*. Hong Kong: Diocesan Office, 1975.
- Endacott, G.B., and She, Dorothy E.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 Hundred Years of Church History (1849–1949)*.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949.
- Finn, Dan J., S.J. (a late Jesuit in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Finds on Lamma Island near Hong Kong*. Ed. By Thomas

- F. Ryan (a late Jesuit in Hong Kong and once the Superior). Hong Kong: Ricci Hall, 1958.
- Ha, Seong-kwong Louis Edward Keloon. (Archivist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Hong Kong (1841–1994)*. PhD Disser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 Hoe, Susanna.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Kung Kao Pao (*Chinese Catholic Weekly*). Hong Kong.
- Ladany, Laszlo. (a late Jesuit in Hong Kong)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New York: Freedom Press, 1987.
-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A Self-Portrait*.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88.
- , *Law and Legality in China: The Testament of a China-Watcher*. London: Hurst, 1992.
- Leung, Philip Yuen-sang. “In Search of ACCS: A Cross-cultural and Multi-archival Endeavor,” in Ng Tse-ming Peter, ed.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o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Pre-1949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55–569.
- Maestrini, Nicholas. *China: the Lost Mission?* Detroit: PIME World Press, 1992.
- Mungello, David E.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 ,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 ,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F.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1985.
- Naylor, Harold, S.J. (a Jesuit in Hong Kong).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ir Life in Hong Kong, 1926–1993”,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Church History of Hong Kong at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September, 1993.
- , “Biographical Notes on various Jesuit in Hong Kong”.
- O’Malley, John W. *The First Jesui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 et al., eds. *The Jesuits: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 Padberg, John. *The Jesuit Tradition and Medicine*.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Ricci, Matteo.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Tr. by Louis J. Gallagher, with a Foreword by Richard J. Cushing, Archbishop of Bost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 ,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Tr. with Intro. By Douglas Lancashire and Peter Hu Kuo-chen. Ed. by Edward J. Malaesta. Taipei: Ricci Institute, 1985.
- Ronan, Charles E., and Oh, Bonnie B.C., eds.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1582–1773*.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Ryan, Thomas F. (a late Jesuit in Hong Kong, and once the Superior) *Jesuits in China*.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64.
- ,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62.
- , *Jesuits under Fire, in the Siege of Hong Kong 1941*.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1945.
- ,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Foreign Mission, (PIME) in Hong Kong, 1858–1958*.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9.
- Sinn, 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 Smith, Carl.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The Body of Christ in Kowloon Tong: the History of the Kowloon Tong Anglican Church (1933–1983)*. Hong Kong: Christ Church Jubilee Committee, 1983.
- , *A Sense of History –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5.
- Spence, Jonathan D.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New York: Penguin, 1984.
- Standaert, Nicolas.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Late Ming China.” In Jan M. de Meyer, and Peter M. Engelfriet, eds. *Linked Faiths: Essays on Chinese Religion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onour of Kristofer Schipper*.
- , “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17th Century,” CSRCS

- Occasional Paper No. 11* (Dec., 2002)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
- , et al., eds.,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Leiden: Brill, 2000.
- Tan, John Kang. (an alumnus of Wah Yan Colleg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Missionary Education under Colonialism: The Case of Jesuit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in 1995.
- , *Church, State and Education during Decolonization: Catholic Education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pre-1997 Political Transition*. PhD Thesis,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 , “A History of Timeless Bonding: Recollection of Wah Yan – Alumni Ties since 1919”, a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5th Anniversary of the Wah Yan College, 2005.
- Tang, Dominic. (a late Jesuit in Hong Kong and once an Archbishop) *How Inscrutable His Ways!* Hong Kong: Aidan Publicities & Printing, 1987
- Ticozzi, Sergio. (an PIME in Hong Kong)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1997.
- Wiest, Jean-Paul. “Bringing Christ to the Nations: Shifting Models of Missions in China.”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 1997).
- , *Maryknoll in China: A History, 1918–1955*. New York: M.E. Sharpe, 1988.
- , “Ma Xiangbo, Pioneer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In *CSRCS Occasional Paper (No.9)*, Hong Kong: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
- , and Tang, Edmond, ed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Orbis, 1993.
- , and Bamat, Thomas, eds. *Popular Catholicism in a World Church*. New York: Orbis, 1999.
- Wu, Xiaoxin, and Stephen Uhalley Jr., eds. *China and Christianity: Burdened Past, Hopeful Future*. New York: M.E. Sharpe, 2001.
- Yip, Ka-che.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1927*. 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0.
- ,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 1928–1937.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 “China and Christianity: Perspectives on Missions,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1912–1949,” in Brian Stanley, ed. *Missions, Nationalism, and the End of Empire*.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2003, pp. 132–143.
- Zürcher, Erik.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Religiosity in Late Ming China.”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83 (1997).
- Giulio Aleni’s Chinese Biography.” In Tiziana Lippiello and Roman Malek, eds.,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 “In the Beginning: 17th Century Chinese Reactions to Christian Creationism.” In Huang Chun-chieh and Erik Zürcher, eds.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
-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Imperative.” In D.E. Mungello,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 “The Jesuit Mission in Fukien in Late Ming Times: Levels of Response.” In E.B. Vermeer, ed.,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Leiden: Brill, 1990.
- , Standaert, Nicolas, and Dudink, Adrianus, eds. *Bibliograph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ca. 1580–ca.1680*. Leiden: Centre of Non-Western Studies, 1991.

4.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 在香港的貢獻 (1947–2008)

張學明

The work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was substantially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ina [Project no. CUHK441709]

歷史背景：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簡史¹

1. 十九世紀的天主教教會及其傳教事業

天主教的女修會於 19 世紀中葉來到香港傳教，第一個從法國來的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她們於 1848 年來到香港島灣仔區開展她們的孤兒院、育嬰堂及其他服務。² 第二個女修會是從意大利來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Daughters of Charity of the Canossian Institutes），她們亦於 1860 年來到香港展開傳教活動。

1 筆者首先要感謝聖羅撒書院的前校監馮瑞芬修女（Sr. Margaret Fung, FMM），她不但提供很多香港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 [F. M. M.] in Hong Kong）的一手、二手資料及論文給我，亦鼓勵、支持我寫這篇文章，並替我向省會長林玉珍修女（Sr. Magdalene Lam, FMM）提出，而林修女也欣然答允支持我這個研究計劃，再三感謝她們的鼓勵和支持。本文亦常常參考阮秀美修女（Sr. Teresa Yuen, FMM）的幾篇論文，尤其是《瑪利亞方濟傳教修會在華之傳教事業》（香港：香港大學碩士論文，1994），及《瑪利亞方濟傳教修會在華之傳教事業，1950–1980》（香港：FMM，1997），又得到林玉珍省會長的協助，請到劉淑珍修女（Sr. Victoria Lau, FMM）與黃鳳儀修女（Sr. Emily Wong, FMM）補充資料和校訂；並得到趙鍾維同學協助整理資料及打字工作，在此亦一併衷心致謝。

2 請參看張學明〈香港聖保祿修會的慈善服務〉，《歷史上的慈善動動與社會動力》張學明、梁元生編，（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5），頁 237–258；及 Cheung Hok-ming Frederick,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isters of the St. Paul de Chartres in Hong Ko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itsumeikan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23(Nov., 2007), pp. 89–98.

19 世紀的中國固然有很多政治、社會、經濟及宗教的原因，吸引天主教傳教會東來；不過，當時歐洲天主教的發展狀況及政治形勢，都是值得關注的。

根據海令脫在他的《天主教史》之分析：「19 世紀時許多國家都走著同一路線：當極端自由主義份子掌握政權時，教會財產即被沒收，主教受迫害，教友自由權被剝奪。待一個較為緩和政權建立時，便將某些利益歸還教會，與宗座訂立協定，但另一個自由主義政府又破壞這個協定。」³

這些政治形勢、壓力和挑戰，令天主教教廷與教會振作起來，在幾位教宗的努力推動下，天主教傳教事業由 19 世紀約 1830 年代開始至現在，都積極關注社會服務，尤其是教育及其他傳教活動。

19 世紀致力推廣傳教服務的教宗包括：教宗額我略十六世（Gregory XVI, 1836–1846），〔他被譽為「傳教者」的教宗，對推動傳教服務，不遺餘力〕⁴；他在天主教教會內整頓修會，並晉升了一些積極參與、活躍於社會事務的主教，及孕育了很多新修會。⁵

另一位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 1878–1903）更帶領天主教教會走向世界，他亦致力關注世界事務及各地所需，要求修會推廣社會公義等。⁶ 教宗良十三世於 1891 年的《新事》（*Rerum Novarum*）通諭關注到工人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和社會公義等問題：「毫無保障地任由不人道的廠主們主配，成了貪得無厭的

3 海令脫著，王維賢譯：《天主教史》下冊（香港：真理學會，1965）頁 496。

4 請參看阮秀美《瑪利亞方濟各教修會在華之傳教事業》。（香港：香港大學碩士論，1994），頁 38。

5 請參看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pp. 265 – 266.

6 筆者要特別感謝香港的耶穌會麥健泰神父（Fr. Thomas McIntyre, S.J.），他在一次接受筆者訪問時，詳細解釋教宗良十三世及其 1891 年《新事》通諭對世界（包括香港）的天主教社會運動的重要性。

競爭的犧牲品；吃人的高利貸，工商業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經營，這一切都給勞苦大眾加上了奴隸般桎梏。」⁷ 教宗良十三世因此而被譽為「工人教宗」，而他的《新事》通諭既針對時弊，又顧及勞工和公義問題，則譽為「勞工大憲章」(*The Magna Carta of the Workingmen*)，令工人福利獲得關注。

穆啟蒙於《天主教史》中指出：19 世紀的國家，以法國最為積極；例如：1900 年，全球約有六千多位傳教士，法國籍的約佔四千多位，並有二千多位修士與一萬多位修女。⁸

而其他天主教國家，如比利時、愛爾蘭、西班牙、及意大利等都積極派遣傳教士東來傳教，這亦是近兩百年天主教傳教事業興盛蓬勃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2.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之成立、宗旨及傳教理想

可以說，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正是 19 世紀天主教教會改革、復興運動下的結晶品之一。這個修會創於 1877 年，第一所會院建於印度的武大加蒙 (Octacamund)；不過，其會祖和創會核心成員都是歐洲人，本來都是聖母補辱會 (Society of Marie Reparatrice) 的修女，會祖苦難瑪利亞修女原名叫夏波登的海倫 (Helene de Chappotin)；她在 1839 年生於一個法國貴族家庭，自幼便秉承家庭忠君愛主的教導；1864 年，她接受耶穌會士伯諦神父 (Petit, S.J.) 的建議，加入補辱會。⁹



Blessed Mary of the Passion
Foundres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

FMM 會祖：苦難瑪利亞修女

7 節譯自《新事件通諭》，見穆啟蒙編，侯景文譯《天主教史》四卷（台北：光啟，1969 再版），卷四，頁 81。

8 請參看穆啟蒙《天主教史》，卷四，頁 187。

1866 年，苦難瑪利亞獲派到印度馬杜拉（Madura）傳教，並於當年 5 月 3 日發初願。其後便出掌院長，更於三年後升為該地的區會長，負責當地的各項事務。這地區的傳教事務一向由耶穌會神父負責，¹⁰ 現在邀請補辱會的修女來幫忙教會事務，並協助培訓當地修會；苦難瑪利亞修女的首要任務，便是培訓屈列金諾色利（Trichinogoli）的本籍修女。¹¹

不過，在培訓本地修女的工作卻引起衝突和紛爭，再加上當時歐洲與印度的通信延誤，最後於 1876 年，苦難瑪利亞和其他十九位修女集體離開補辱會。¹² 在巴都主教（Bardou, Bishop of Coimbatore）的鼓勵和安排下，苦難瑪利亞修女與其他三位修女（無玷聖心修女〔M. de Coeur Immacule〕、聖若望修女〔M. de St. Jean〕、和諸天神修女〔M. des Ste. Anges〕）同往羅馬覲見教宗比約九世，並獲批准成立新修會，名為「瑪利亞傳教修會」（Missionaries of Mary）¹³。跟著，她們便草擬新修會的生活規章，內中言明，該會修女按教宗旨願、教會的需要接受派遣到任何地方傳教，就算是最危險和最遙遠的地方。

苦難瑪利亞確定了這個修會應是一個普世性的、在不認識基督的民族中傳教，往世界各地傳播福音的修會。這個修會的精神是：仿效基督承行天父的旨意，熱愛世人，自我奉獻，並

9 這個修會於 1855 年在巴黎創立，宗旨是實行苦身補贖以拯救人類的心靈，並遵行聖依納爵神修；請看 Pilar La Orden, *A Woman and A Message* (Rome: FMM, 1976), p. 27; 亦請參看中譯版：周佩玉譯：《超越時代的女性》（台北：FMM，1990），頁 23。

10 請參看 K.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Vol. VI.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4), p. 79.

11 請參看 Marie-Bernard Hygonet, *A Great Soul, A Great Book* 之譯本：《瑪利亞巴西奧奈傳》（澳門：FMM，1955）頁 25；及 Anne-Marie Foujois 著，李碧圓譯《心路》（台北：FMM，1976），頁 24。

12 請參看周佩玉譯《超越時代的女性》（台北：FMM，1990），頁 25。

13 因為當時修會剛成立，仍未加入「方濟會」，其後於 1882 年加入，才有現在的名字：「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

如聖母瑪利亞和聖方濟一樣，以簡樸的生活，實踐福音，將基督帶到所到之處。¹⁴

而這個修會的宗旨則為：

- 1) 追隨藉降生，救贖和聖體奧蹟中獻於天父以救贖世界的基督
- 2) 以聖母承行主旨的基本態度，參與上主愛人的計劃
- 3) 如方濟一樣，在世界中生活，活出福音
- 4) 接受派遣往各地宣顯救贖的喜訊
- 5) 度一種既默觀亦福傳的生活，在一切人事中默觀上主的臨在，尋找祂的話語，亦在生活中呈顯上主的臨在。¹⁵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的歷史與貢獻

1. 歷史背景：香港天主教教會簡史¹⁶

1841 年，天主教教廷在香港成立宗座監牧區（*Prefecture Apostolic*），¹⁷ 1848 年，法國的女修會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首先來到香港，開設育嬰院、孤兒院、學校、及醫療服務等，當時香港的天主教信徒約三千，而香港的人口約七萬。其後，於 1860 年，意大利的女修會：嘉諾撒仁愛女修會（*Canossian Sisters*）及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前身米蘭外方傳教會（*MEM*）亦相繼來到香港展開傳教事務。

14 “This religious order had the charism of the self-offering of Christ, following the models of Mother Mary and St. Francis of Assisi, to bring Jesus wherever they are through their life and service.” By Sr. Margaret Fung. （由馮瑞芬修女提供，並由劉淑珍修女補充）。

15 感謝劉淑珍修女的補充。

16 香港天主教教區歷史，最詳盡而深入分析的，請參看夏其龍神父的博士論文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Hong Kong (1841–1894)*. PhD Disser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此外，亦可參看《香港天主教教會——一百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等文章。

17 請參看《香港天主教教會一百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1874 年，香港宗座監牧區獲升格為宗座代牧區（Vicariate Apostolic），並由高主教（Timoleon Raimondi〔1874–1894〕）、和主教（Louis Pizaoli〔1885–1904〕）、師主教（Dominic Pozzoni〔1904–1924〕）及恩主教（Henry Valtorta〔1926–1951〕）相繼出掌教區教務。1900 年，香港人口約三十萬，天主教教徒約八千。¹⁸

1926 年，來自愛爾蘭的耶穌會神父開始在香港傳教；天主教的本地傳教培訓亦同時開始，負責傳教培訓的機構包括成立於 1922 年的寶血會，及成立於 1931 年的華南修院。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淪陷於日本統治，香港的天主教教會亦受到衝擊，教友由戰前的二萬多人，減至戰後的三千。

1946 年，天主教教廷把中國所有代牧區升格為教區（Diocese），香港亦因此成為其中一個教區。1947 年，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亦來香港開展她們的傳教事務。1949 年，中國政權易手，大批內地難民湧來香港，其中亦有天主教教士和教徒；所以，至 60 年代，香港的人口急增至三百五十萬，而天主教教友亦急升至三十萬。在白英奇主教（Lawrence Bianchi，〔1951–1969〕）的領導下，香港天主教教區在教育、社會、及醫療各方面，都發揮著天主教的傳教精神，服務社群。

1966 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議決推行改革，尤其是本地化方面；因此，香港天主教教區亦出現首位華人主教：徐誠斌主教（Francis Hsu，〔1969–1973〕）。徐主教不但積極推展「梵二」的改革精神，亦努力推動教育及社會公義等事務；可惜，徐主教因心勞力竭、鞠躬盡瘁，於 1973 年突然離世，繼任的李宏基主教（Peter Lei，〔1973–1974〕），亦於繼任翌年辭世。

18 同上註，頁 37。

1975 年，胡振中主教（John Baptist Wu，〔1975–2002〕）獲委任為香港天主教教區主教，並於 1988 年獲委任為樞機。期間，香港社會繁榮，經濟蓬勃；天主教教友超過二十六萬，佔香港人口的二十分之一。¹⁹ 2002 年胡振中樞機病逝，由陳日君主教接任，並於 2006 年擢升為樞機，2009 年退休後，由湯漢主教擔任，香港天主教教區又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

2.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的傳教與貢獻

1949 年，中國政權的轉變，很多外籍傳教士被遣離內地。香港和澳門便成為他們的新傳教地區。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女早於三零年代已有興趣來香港開設會院。1938 年，金正中修女（M. Conleth）來香港拜訪恩理覺主教，嘗試探討來香港傳教的可能性；可惜，不久中日戰爭伸延到南中國，以至香港，傳教計劃只好暫時擱置。戰後，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終於 1947 年抵達香港，隨著內地難民潮湧入香港，該修會在香港及澳門（該會早於 1903 年即在澳門成立會院）的工作範圍亦之而擴充。

該修會在香港的會院分佈及貢獻如下：

（一）愛明修院（Hermine），1947–

據該會於 1977 年的一份報告中，載愛明修院建立經過如下：²⁰

愛明修院是省區在香港的第一間會院，建於 1947 年；時適值香港出現難民潮。建院的目的，主要為開辦一所小學和一所職業學校，亦作接待到訪修女之用。據一位修女回憶說，她們原意是要開設一所小學和一間繡花房，以解決當時婦女的生

19 請參看阮秀美《瑪利亞方濟傳教修會在華之傳教事業（1950 – 1980）》，頁 53–56。

20 同上註，頁 53–56。

活問題。後來和靈導神父（Carmelo Orlando）建議修女開辦幼兒園，以為當時適齡、但尚未入學的新移民兒童提供教育；同時亦為協助需外出工作的母親照顧孩子。於是修女開設了聖羅撒小學及幼稚園。會院開設初期只有五位外籍修女。

（二）聖母聖心會院（馬鞍山山頂），（*N.D. du Sacré—Coeur, Ma On Shan*），1954–1980

位於新界的馬鞍山原本為礦場，居民都是礦工。當時馬鞍山位置偏僻，遠離市區，交通不便，居民出入都要倚靠街渡，故此一般居民都是在當地工作。1954 年，四位修女在馬鞍山山頂建立會院，並開辦一所小學、一所幼稚園和一間診所。早於 1951 年，方濟會神父（Fr. Eleuthere）便曾要求修女到馬鞍



FMM 早期在馬鞍山

山服務；他在山上管理的一座小教堂，初期並沒有教友，經過二十年的福傳發展，當地教友數目增加至一千多名。六十年代後期，當地居民開始移

居九龍，教會工作因人口的遷離而縮減。至 1980 年，因為當時山頂上的大部份居民已遷離，修會決定結束該處工作，把修女轉移到九龍。

（三）聖方濟會院（馬鞍山山腳），（*St. Francis du Port, Ma On Shan*），1964–1986

這是一所回應方濟會神父的邀請而建立、位於馬鞍山碼頭的會院，並為當時山下的居民開設一所包括留產所的診所。診

所有兩位醫務修女不分晝夜駐診；一所幼稚園亦應需求而成立。此外，亦有修女在鄰近的小學內任教。

會院開設時只有五位修女，後增至八位。1967 年澳門發生「一二三」事變，聖嘉俾額爾初學院的十五名初學生逃離澳門，暫居於這所會院內；當時小小的會院竟住上二十多人。1979 年，香港政府計劃發展馬鞍山為新市鎮，把該地原有物業、學校、房屋進行重組，因而很多居民都遷離馬鞍山。修女曾遷至距離馬鞍山不遠的烏溪沙，開設小團體，直至 1986 年才正式結束她們在馬鞍山的傳教及社會服務。



FMM 在馬鞍山的天主堂

(四) 海星會院(何文田)(*Etoile de la Mer*, Homantin)，1969-1989

五十年代的何文田本來是一處丘陵墓地，後來政府將墓地遷移，在原址改建房屋，以安置無家可歸的災民。後來人口日增而成為新的徙置區。政府為災民解決居住問題，而天主教教會則為當地的小孩提供教育。當時區內有不少適齡學童，教會為他們興建了兩所小學：第一所小學是樂德小學，交由瑪利諾修女管理，第二所是海星小學，則交由方濟會修女負責。兩校均座落於何文田區內，為當地居民提供服務。

1958 年修女接辦海星小學時，愛明修院的兩位修女每天往返會院與學校之間。1969 年，為方便修女節省往來時間，修會於鄰近學校的窩打老山租用了一個單位，並由四位在學校工作的修女於此組成團體。至 1972 年，學校把一些空置的房間改為宿舍，修女便搬進校內居住。

1989 年，由於學校學生人數不斷遞減，修會有意退出該區的服務。先是結束了會院的團體，將人手調往其他地方服務。而海星學校則於 1992 年，最後一班學生畢業後正式結束服務。

(五) 沙田聖言小團體 (*Verbum Dei*, Shatin)，1976–

1976 年內，修女在香港共開設了三個新團體，以回應梵二大公會議的改革。聖言小團體於 1 月 29 日誕生，開始時成員只有三位。該會院成立的目的，是投入沙田社區當中，與居民一起生活。可惜其中兩位成員都在九龍服務，只有一位外籍修女留居沙田區，由於言語的隔閡，無法深入當地社群。後來這位外籍修女開設外語補習班，特別為當地人提供一點外語服務。

聖言小團體於 1985 年成為該會準初學院，除了培育準初學外，更接待與照顧年青人。1987 年小團體遷至沙田區內的另一所較大的房舍，使原來可容四人的團體增加至十多人。1994 年，更由於中國省一分為二之故，聖言小團體更成為港澳區的初學院。

(六) 梨木樹斯德望小團體 (St. Stephen's, Lei Muk Shue)， 1976–1982

「梵二」對修會生活的改革，推動該會致力建立一個徹底投入社區服務的友愛小團體，為能度真正的簡樸和祈禱的生活，這就是梨木樹的斯德望小團體。該小團體設於梨木樹政府屋邨一個附屬於明愛中心的單位，起初由三位修女組成，其中一位在明愛中心服務，其餘兩位則分別從事牧民和醫療的工作。這個團體後遷往土瓜灣，並在成立六年後，於 1982 年因成員工作調動，沒有修女在中心提供服務而結束。

(七) 慈雲山小團體，1976–

慈雲山是政府公共房屋中，位於九龍區的第二大屋邨。方濟會神父在該區主理聖文德堂區。1976 年新堂建成，神父遷進新堂，把原有的住宅賣給方濟會修女，並邀請修女到聖文德堂服務。

1976 年的 9 月 24 日，四位修女搬進，成立一個真正在該區服務的團體。當時，有兩位修女在堂區擔任全職工作，其餘兩位亦幫助探訪教友、協助堂區的牧民工作。這個團體的居住面積只有五百平方呎，只能容納四位修女居住其中。

(八) 堅尼地城臨恩小團體 (Incarnation, Kennedy Town) ， 1981–2001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於 80 年代共創立了兩個小團體：「臨恩」和「天主之母」，前者位於港島，是該會於香港眾多會院中唯一設在港島區的。此會院於 1981 年 12 月 25 日成立。四位修女分別服務於不同的牧民工作：一位修女在堂區內擔任牧民職務，另一位修女在鄰舍明愛中心服務，另有一位修女在教區中心的教友總會內從事教友培育的工作，第四位修女則從事教育工作。可見此會院的大部分成員都是投入社區服務的。後因人手調動，修女們的工作有所改變，該會院亦於 2001 年結束。

(九) 天主之母 (省中心) (Mater Dei) ，1981–1998

天主之母省會院於 1981 年 12 月 26 日成立。沈曼玲修女出任省會長時，為了交通及行政往來的方便，將原本在澳門、附於聖嘉辣修院的省中心遷移至香港。會址設在愛明修會內，把二樓原有的聖堂改建成團體，團體成員共六人，除省長外尚有五位修女，都是服務省區的行政工作。後由於人手調動，省中心天主之母團體融合到愛明團體內。

(十) 聖體團體，1990–

進入 90 年代，香港社會新的轉變，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也作了一些新的回應。首先是位於九龍界限街聖羅撒書院，因現代教育設施的需要，中小幼一起的校舍已不敷應用，後得到政府將沙田銀城街一幅土地，作聖羅撒中學部之用，1999 年新校舍落成之後，修女們亦在該校內設立一個新團體，名為聖體團體。

(十一) 中華聖母團體，2003–

自港島西環區的臨恩小團體關閉之後，修會覺得需要在港島區有修女的臨在；終於於 2003 年在柴灣住宅區的一個單位內建立了中華聖母小團體，團體內有四位修女，都在港島區服務：一位修女在教區工作，一位修女在港島區——明愛中心從事家庭服務的工作，一位從事教育工作，另一位則在柴灣海星堂服務。²¹

一、教育事業：

香港的傳教事業與澳門不同，沒有自己的大機構事業，修女多在外從事不同的服務。1947 年初，為回應當時社會的需求，而提供以教育為主的服務。修女應天主教教區的邀請，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而興辦學校。修會在香港的教育機構貴精不貴多，除了聖羅撒學校與書院之外，還有座落於何文田徙置區、專收取窮困家庭孩子的海星小學。

1. 聖羅撒學校 1948–

1948 年，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於九龍基堤道成立聖羅撒學校，至今已創校逾六十載。學校開辦的主要目的，乃為香港社會上有需要的女生提供一個具家庭溫暖的學習環境，同時

21 感謝劉淑珍修女補充（10）聖體團體及（11）中華聖母團體的資料。

向學生宣揚對天主、人類與自然的博愛的精神。²² 聖羅撒學校的校訓為 *Per Caritatem ad Veritate* (Through Charity to Truth；中譯為忠誠仁愛，即是透過仁愛達至真誠)；修會務求帶引著聖羅撒整個大家庭，令修女、教職員與學生在不同領域上精益求精及對學校與社會作出重要貢獻。

自從 1948 年 7 月開學以來，學校的規模不斷壯大：最初時只有兩班幼稚園班、七班小學班和幾班英語班（為中學部的雛型），共六百三十三名學生（大部份為女生，但幼稚園與小學亦有少量男生，學校至今則只於幼稚園招收男生）。

香港於 50 年代經歷了大陸移民潮，大批難民湧入香港。在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的帶領下，聖羅撒學校進行了擴張，擔負起了為難民群中的女生提供教育的重任。



聖羅撒學校的校訓：
Per Caritatem ad Veritate



聖羅撒學校於 1950 年代在九龍的校舍

學校後來得到教育署的資助，成為一所天主教英文津貼學校；幼稚園則屬私立，有學生二百多人。另一備受歡迎的是專科教育培訓秘書專業人士的商科學校，全盛時期有學生五百

22 同註 17，「於一九四七年的八月，購置了一幢位於基堤道私人樓宇…在最初的半年，愛爾蘭籍的 Mother Columcille 擔任學校的校監，以協助當時的省會長，Mother Mary of St. Conleth。」

多人。不過，1980 年代香港社會的生活已較為安定繁榮，亦有很多的正規文法學校，所以商科學校的人數逐漸減少，修會於 1988 年決定停辦商科學校。據 1977 年的一份報告指出，當時聖羅撒學生總數達二千五百多人。

隨著時代的發展，聖羅撒學校亦隨而繼續擴展。幼稚園亦曾經

多次遷址及重建，新校舍於 1997 年落成，為幼童提供一個更為理想的學習環境。而為配合學校轉為全日制，中小學部於 1979 年先後擴充中小學部的課室與實驗室數目與設施。中學校舍後來於 1999 年遷至位於沙田區銀城街 29 號的現址；仍留守基堤道的小學部現亦進行重建工程，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育環境。



聖羅撒學校在九龍基堤道的舊校舍



聖羅撒書院在沙田的新校舍

聖羅撒學校一直以來著重學生的全人發展，兼重其德、智、體、思的健康發展；其中亦重視學生的語文能力（尤其是英語），為香港培育了不少深諳兩文三語的社會精英，在香

港政府與不同領域的私人機構提供服務。²³

2. 海星學校 1958-1992

1958 年開辦的海星學校，座落於何文田區內，專照顧家境清貧的學生。第一任校長是金正中修女（M. Conleth）。校舍共有十



聖羅撒書院前校監 馮瑞芬修女

二個課室，以半日制分上午班和下午班授課。因為學生都來自窮苦家庭，所以修女除辦學外，亦常接觸家長以了解他們生活上的困難。因此，海星學校在何文田區備受居民愛戴；而該校的畢業生組成的校友會，多年來一直發揮著互助互愛的精神。



聖羅撒學校幼稚園畢業照

隨著香港經濟於 70 年代的急速發展，市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政府決定將何文田區重新規劃，把原有的平房改建為屋邨。改建期間居民遷離

23 據 Sister Cecile Deraspe 所說：「在一九四七年的一月，恩主教在參與中國二十九位殉道者的列聖品儀式後，在羅馬會見了當時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的會長；當時會長要求在香港成立一女修院與學校，並得到主教的允許。當時修會的修女，早於 1903 年已於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Colegio Santa Rosa de Lima*）工作，在當地廣為人熟悉」，請參看 Sister Cecile Deraspe 著：50 Years – A Golden Jubilee! 載 *Golden Jubilee: Rosaliam, 1948 – 1998*. (Hong Kong: St. Rose of Lima's School, 1998, p.77.)

何文田區，令區內學童流失，修會修女在考慮過海星學校存在的必要性後，決定逐漸引退，並於 1992 年，最後一屆的學生畢業後，正式停辦學校，而校舍則交給香港政府的教育部門。

二、牧民工作

牧民事業是傳播福音的直接工作。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的牧民事業在她們到達香港之後即隨即展開。梵二大公



聖羅撒學校高小畢業照

會議後，教會及修會的改革展開，該會在 70 年代即開始走進群眾裏建立小團體，並開始有全職的牧職修女。慈雲山小團體的開設，正是其中一項反映，80 年代堅尼地城的小團體，現時柴灣中華聖母小團體等，亦承繼著這個信念。此外，還有一些修女在教區機構內從事直接的牧民工作，或參予教區內的工作委員會，更有不少修女，在週末或週日到堂區內協助教授慕道班、主日學等義務使徒工作。



FMM 修女在何文田海星學校的歷史照片

三、社會服務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沒有屬於自己的社會服務機構，只有一兩位修女加入明愛中心，在社會中服務。早期的馬鞍山碼頭會院，設有一間亞松大診療所，為當地居民提供重要服務。因為馬鞍山交通不便，遇有病痛、分娩等急事，修女便能為無助的居民提供急需的治療。根據當時一位修女說，負責診所的兩位修女不分晝夜，二十四小時隨傳隨到地伺候著當時的居民。因此，當地的居民都十分尊敬修女並視她們如同家人。

距離馬鞍山不遠的十四鄉，住著不少教友。由於該地處於另一山腳，當時又沒有公共交通可抵達，前往該地傳教只能步行。當時修女每週或每月進行一次傳教，大清早便需要起行，翻山越嶺後，抵達村口已是上午十一時；抵達後便立即給孩子講道、做家訪，午膳後便需要起程回馬鞍山，返回會院時已是黃昏時分。

踏入 80 年代，市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精神生活卻相對地更趨貧乏，所以修會發起另一項旨在改善香港人精神生活及個人心境的服務——醫院牧民工作；對象主要為垂危的病患者，服務為病人與其家屬均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一位修女在香港天主教教區內推廣此種服務，並培訓相關的人員，這都是具體的社會服務。

21 世紀的今天，按社會的需要，修女們亦從事家庭服務（明愛家庭服務中心）。為有需要的少女設立的「關愛之家」、監獄採訪、傳道、青年牧民等工作。

總結

自 1947 年起，至今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已服務了超過六十年，期間該會的服務因應著社會及教會的發展而不斷作出不同的回應。這也是該會的特有精神：查實該修會沒有

一種特定的工作，按其精神，修女們無論在何種環境，不管於任何時刻，都尋找可行及適合時代的方式將基督帶到所在之處，甚至有時是甚麼都不能作，亦以其存在為基督作証。

因此概觀這六十年，該會也隨著時代的轉變，為了更好地履行福傳的使命，而將服務的重心轉移：來港初期，正值 50 年代，中國內地難民湧入香港的時候，該會即投身教育工作，特別是為貧苦大眾服務：聖羅撒、海星小學、職業學校等成立都是為了回應當時龐大的難民潮的需要：在馬鞍山為礦工家庭子女提供教育及醫療的照顧亦是回應當時香港礦業發展的需要。進入七十年代，教會的革新，香港社會服務的發展，修女們亦進行了修院制度的改革，建立一些深入民居的小團體，滲入民生，與民同住，亦開始參與一些機構的社會服務工作：並在一些堂區內建立小團體，實行 24 小時靠近教友，團體亦為教友開放，這時許多修女投入堂區服務。進入 21 世紀，教育的改革、大眾傳媒的發展，令修女們意識到無論在社會或在教會內，任何的服務都不能由單獨團體獨自承擔，合作及網絡式的運作似乎是必行之道，因為，在這 21 世紀之初，該會修女都投入各個服務網絡之中，加入教區、堂區、社會服務機構內工作，與教區、堂區、社會服務機構內其他工作人員一起合作；就算是在該會主辦的聖羅撒學校中小幼各校部中，亦強調與校內各教職員工、家教會等合作，務求與各界人士（即不單與同會修女）以團隊形式回應各種需要。實在地建立團體或團隊正是天國的標記。²⁴

24 感謝劉淑珍修女的補充與整理。



FMM 的總會長：
Sr. Christiane Megarbane



FMM 省會長：
林玉珍修女

5.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的神恩與使命

追隨納匝肋人耶穌

耶穌嘉麗小姊妹著 耶穌麗芳小姊妹編譯

「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 1：14）

「祂將稱為納匝肋人」（瑪 2：23）

「她們將努力追隨這納匝肋人謙卑的境況，

這正是祂所選擇作為降生成人的途徑。」

（會規第 3 題）

聖子選擇了白冷作為祂降生之地，而納匝肋則是祂成長的地方。三十年之久，祂由幼及長，在這寂寂無聞的小村，度着一個貧窮工人的生活。這正應驗了先知所預言：「祂將稱為納匝肋人。」（瑪 2：23）耶穌一生都以貧窮人的身份，完全拒絕運用權勢的方法，直至在十字架上無助地死亡，和復活的光榮事蹟，都彰顯天主是愛。這便是耶穌小姊妹友愛會的神恩與使命的依據和泉源。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簡史

當有人問及耶穌小姊妹友愛會的歷史時，會祖耶穌瑪大肋納小姊妹便會很自然而又簡括地說：「上主牽着我的手，我便盲目地跟隨了祂。」她



真福嘉祿·富高兄弟
(1858-1916)

還會這樣說：「創立這個修會的不是我，而是耶穌嘉祿小兄弟。是他透過懇禱、自我宰祭、死亡、自我聖化、最終以對主的愛建立了我們。我只不過是以全心的愛，竭盡綿力去收集和傳達他的思想而已。」¹

1. 誕生在沙漠的納匝肋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的誕生是這樣的：天主教在芸芸眾生中選擇了一個看似弱不禁風的女子、瑪大肋納·余丹（Magdeleine Hutin）。1898年4月26日她生於法國巴黎，自幼年時上主便透過她的家庭，尤其她的父親，導引她對非洲的嚮往和對弱小者、貧乏者和被遺棄者的關懷及眷顧，為令她追隨嘉祿·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² 的後塵，前往人煙渺杳的撒哈拉沙漠，創立一個



耶穌瑪大肋納小姊妹
(1898-1989)

嶄新的修會。即使她身罹重病，舉步維艱，為人看來是一個極大的阻礙，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但為天主卻不然。因為祂願意召叫誰便召叫誰，而且祂是無事不可能的主。聖保祿說：「天主的愚妄總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總比人堅強。」（格前 1：25）而且在舊約的時代，上主藉依撒意亞先知讓我們明白：「因為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就如天離地有多高，我的行徑離你們的行徑，我的思念離你們的思念也有多高。」（依 55：8-9）

在經過了重重的困難後，於 1939 年 9 月 8 日聖母聖誕的瞻禮日，瑪大肋納·余丹終於與她的同伴亞納（Anne）在亞爾及爾主教的代表手中宣發了聖願。她們放棄了自己原有的姓

1 *Petite Soeur Magdeleine de Jésus. Du Sahara au Monde Entier. (Paris, Nouvelle Cité, 1981), p. 7.*

2 耶穌安妮小姊妹,《主牽我手》（香港：香港真理學會，1998），頁 4-6。

氏，取而代之的是「耶穌」，以示耶穌為她們一家之主。這個日子也就成為耶穌小姊妹友愛會的誕辰了。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這名稱，顧名思義：「耶穌」是她們唯一的模範。「小姊妹」，在姊妹前加個小字，是提醒成員



嬰孩耶穌—耶穌小姊妹唯一的模範



普世的主母瑪利亞賜給我們小耶穌

們：在馬槽中小耶穌的光照下，嬰孩精神

正標誌着她們的靈修，她們當謙卑自下，以微小自居，常懷赤子之心。姊妹：為追隨耶穌嘉祿小兄弟的芳蹤，她們彼此固然互為姊妹，也切願成為全人類的姊妹。「友愛會」，是她們得以手足之情，彼此相愛，善度團體生活；同時，她們當接待一切來到她們面前的人，如同兄弟姊妹一般，並在每個人身上發現上主的臨在，藉此為基督的愛作証。³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的會徽，是一個被十字架穿越的心，象徵愛與犧牲二者的結合；也是象徵小姊妹對為愛眾人而被釘死的基督的信仰。

恭放在每個友愛之家的嬰孩耶穌聖像，笑容可掬，兩手空空，象徵耶穌對父全然的交付，及平易近人地迎接所有的人；而聖母俯身交付她手中的嬰孩耶穌的聖像，會祖稱之為普世的主母像，並衷心訓勸小姊妹說：「請妳從童貞聖母手中接受嬰孩耶穌，保存祂在妳心中；並把祂帶到普世各地，宣揚祂的謙虛、信任、交付自己、簡樸、貧乏、溫良、平安、喜樂與仁愛的訊息。」⁴ 箇中所蘊含的深意，默然地導引小姊妹們，如聖

3 參閱《友愛會生活細則》，題3。

4 綠色小冊子 42 頁

母一般，把耶穌送給所接觸的每個人。這都是她們宣揚福音的方式之一。

2. 由撒哈拉至普世各地

友愛會成立初時，瑪大肋納小姊妹原想它只是一個很小的團體，保留於回教國家中生活，尤其是為撒哈拉沙漠的游牧民族而奉獻的。然而 1946 年 7 月 26 日在她往法國南部聖邦姆(Ste Baume)朝聖的回程中，突然受到光照，驅使她把友愛會伸展至全球各地。她感到十分震撼，但馬上把這直覺向母院所在地的普旺舍主教(de Provençhères)和她的神師懷雍神父(René Voillaume)呈報，並得到他們的同意，友愛會便由撒哈拉擴展至普世各地。⁵

「整個世界都在召喚我！」這是瑪大肋納小姊妹從心坎裡深深感受到的。「為回應這呼召，於 1953 年 8 月她便和珍妮小姊妹展開了整整一年的『環球之旅』。她們穿越五大洲；走遍了尼日爾、喀麥隆、剛果、肯雅、南非；再從西非乘船往南美各地和墨西哥。經馬丁尼、古巴、海地、以至北美。由加拿大而至亞拉斯加，並從那裡到亞洲去。她們踏遍日本、韓國、臺灣、香港、澳門和越南。隨後逕往澳洲、巴布亞斯，轉往印尼、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甚至深入阿富汗——在當時仍禁止其他宗教臨現的一個依斯蘭教國家。最後，在 1954 年 8 月底，她們由伊朗和土耳其回到法國脫璧母院，結束了這漫長而感人的旅程。」⁶

瑪大肋納小姊妹所途經的國家，她總是去追尋那些被人遺棄的少數民族、那些無人關心的弱小部落，或社會的邊緣族群，設法讓小姊妹們生活在他們中間，與他們為伍。她帶着普

5 Petite Soeur Magdeleine de Jésus. *Du Sahara au Monde Entier*. (Paris, Nouvelle Cité, 1981), p. 217。

6 耶穌安妮小姊妹，《主牽我手》（香港：香港真理學會，1998），頁 35 - 36。

旺舍主教的介紹信，前往拜會當地的主教，表達來意。如果該地的主教明白並接納友愛會的聖召的話，她便会進一步落實計劃，盡快派遣小姊妹到這個地方建設友愛之家。如此小姊妹三三兩兩，置身於許多大都會的貧民窟，或居於篷車裡，好隨着吉普賽人到處遷移；有在馬戲團與走江湖者為伍，亦有志願在監獄內分享囚犯的生涯；或在市集、在工廠、在田莊等與鄰人情同手足，天下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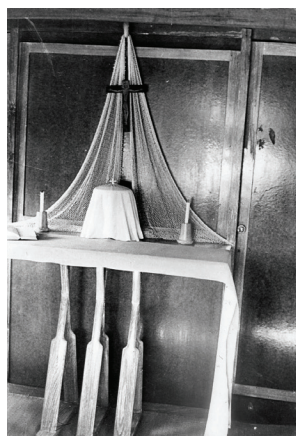
3. 鬧市中的納匝肋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最終的理想，是為了耶穌和祂的福音，跟隨祂在人群中度默觀的生活。無論是在沙漠或在鬧市，納匝肋始終是她們的核心。她們每到一個地方便建立一個團體，稱之為「友愛之家」，洋溢手足之情。一如納匝肋的耶穌，以雙手操勞，維持日常所需。體驗普羅大眾的生活。讓耶穌聖體臨現在他們中間，並以默觀的祈禱相伴。

耶穌小姊妹所度的默觀生活是以聖體為中心，並居於人群中，尤其是在貧苦的人群中的祈禱生活。

她們以每天參與感恩聖祭和以朝拜聖體作為祈禱的中心，表達她們

承受自嘉祿兄弟的使命基本的態度。耶穌在聖體內的臨在，與祂在祂弟兄內，尤其在那最弱小者身上的臨在，二者是分不開的。這份直覺震撼了嘉祿兄弟的一生，也該深深銘刻在小姊妹的生命裡。⁷



香港仔艇戶友愛之家小堂
(1956-1977)

⁷ 參閱《友愛會會規》，題 19。

無論友愛之家的地方如何狹小，恭存聖體的小堂便是友愛之家的中心。小姊妹在聖體前為她們的默觀生活求取所需的光明和力量。她們把周圍鄰居和人世間的喜樂與痛苦，尤其託她們轉禱者的意向，都納於她們的朝拜、代禱和感恩的禱告中。

至論默觀生活，當想到耶穌、這位最卓越的默觀者。福音給人類們顯示耶穌身處人群中，度着與父至密切關係的生活；無論在納匝肋，一如在路上，並直至死在十字架上。為耶穌而言，默觀就是不斷地觀瞻父，和以父的眼光觀看萬事萬物的真相，事事處處滿全祂的旨意。在耶穌內，對父的凝視、聆聽、和服從都以愛融會為一。

耶穌瑪大肋納小姊妹給小姊妹寫下：「在人群中，基本上妳當成為一個默觀者，就如酵母摻在麵團中。為此，妳得充盈基督，直至滿溢的地步。是祂在妳內，透過妳去發放祂的光華。無論在工作裡，一如在路上和在人群中，妳要努力嘗試很單純地高舉妳心靈的眼目，瞻仰耶穌，與祂談話，就如與世上妳最親愛的人談話一樣。因此，妳便不會在群眾中分心走意了。」

8

4. 羅馬總會的成立

1957年2月羅馬熙篤會（La Trappe）總會長慷慨地把他們在城郊三泉（Tre Fontane）隱院的一部份土地送給友愛會，讓她們建立一個國際性的初學院。自此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初學小姊妹便在這裡接受培育。這三泉相傳是聖保祿使徒當年為主致命、被斬首的地方。

1964年3月25日，友愛會正式成為直屬宗座的修會；使友愛會的固有的精神，在教會的鑒察下，奠定穩固的基礎。二十年前，當會祖抵達羅馬首次謁見教宗庇護十二世時，即把這

8《友愛會綠色小冊》，頁30。

新生的團體和她對這團體最深切的願望，都呈稟教宗，並謙誠地懇求教宗批准，予以實現。⁹ 對其後的歷任教宗，會祖偕同小姊妹們都視之為慈父，是基督在世的代表。在日新月異的社會中，她們更需要靈敏地聆聽教會的訓導。這一年，她們的總會就由法國南部的脫壁 (Le Tubet) 遷址於羅馬三泉了。而三泉也逐漸成為這個大家庭的核心，不獨是行政的，也是靈修的。無數的小姊妹都先後到這裡來，如回到泉源汲水。

小姊妹們常銘記於心的就是：她們是在教會內、被教會所派遣的；為與那些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和被排斥的人在一起；也設法到教會還沒有明顯臨現的地方；並不是為感化他們，而是透過一份不索償的愛和手足之情，見證天主對每一個人的慈愛。

5. 會祖逝世

1989 年友愛會成立五十周年，當時分佈全球各地有二百八十多個友愛之家，小姊妹人數有一千三百多人，來自六十四個國家。9 月 8 日在羅馬三泉總會舉行了感恩祭，由懷雍神父主祭。她們感謝上主在過去五十年來的恩賜，且讓會祖一直陪伴她們，與她們同行，以言以行為她們作証上主對友愛會的慈愛。可惜，此刻會祖只能躺在牀上參與這金禧大典；因為在九月初她往東歐探訪的回程中，意外摔倒，股骨裂了，使她動彈不得。在整整兩個月裡，她游移於生死之間；但她毫無怨言，安心默然地接受一切。在領受病人傅油禮後，且謙誠地請求各位小姊妹的寬恕。¹⁰

11 月 6 日晚上，小姊妹給她重新包紮繃帶時，她垂低了頭，就如此簡單、平安地回歸天父的懷抱。11 月 10 日友愛會

9 *Petite Soeur Magdeleine de Jésus. Du Sahara au Monde Entier.* (Paris, Nouvelle Cité, 1981), pp. 183 - 187.

10 《主牽我手》，頁 74 - 75。

為會祖舉行惜別的感恩祭，由懷雍神父主禮；共祭的有八十位來自不同洲陸、不同國籍的神父。教宗聖父派遣了瑪丁樞機（Cardinal Martin）前來弔唁。還有許多不同宗教的朋友，也前來參禮，見證了會祖一生為大公合一的努力。會祖的遺體下葬三泉地窖。¹¹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在香港的歷史和使命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在香港的歷史，當從會祖耶穌瑪大肋納小姊妹於 1954 年訪港開始。是她與當時的總會長、耶穌珍妮小姊妹（Jeanne de Jesus）在 53 至 54 年「環球之旅」中探訪亞洲的一程。當時已在印度服務的耶穌安妮小姊妹（Annie de Jesus）和她們會合；她們先到日本、韓國、台灣，才到香港和澳門來。從 4 月 11 日至 14 日，她們拜會了香港的白英奇主教（Lorenzo Bianchi）和澳門的高德華主教（P. da Costa Vaz）。他倆都不約而同地接納了這位遠道而來的小姊妹，讓她的友愛會到這兩個分別屬於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又是華人聚居的教區來建設她們的友愛之家，參與教會宣揚福音的使命。

「4 月 11 日，我們在飛機上鳥瞰香港時，即被它四周綿延起伏的山嶺和曲折美麗的海灣所吸引，而感到香港之被譽為『東方之珠』，確是名不虛傳的。抵港後我們拜會了香港的白英奇主教，他是米蘭外方傳教會會士。他馬上便明白我們的期望，並同意我們在艇戶中建立我們的友愛之家。隨後在美國天主教福利會的主任鄭濟民神父（Duchesne, MM.）的陪同下，我們探望了兩個避風塘，其中那大的一個是在香港仔。在那裡有百多艘船一排排地並列着。當我們看到好些婦女在搖櫓或掌

¹¹ 《主牽我手》，頁 76 - 77。

舵，有的且做着很操重的工作，便想到將來我們的小姊妹在她們中間也這樣做，當是很平常的吧。」¹²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在香港，從一開始便標誌着與最貧困者的友誼。她們與鄰居確實度着「同行的生活」。與鄰人在一起，她們經常見證聖神早在她們到來之先，已撒播下的、那隱藏在鄰人心中的福音的種子，並從他們默然接受艱苦生活的態度，幫助她們更具體明瞭福音的價值。耶穌小姊妹在教會內的使命，不在於要做什麼，而在於她們的為人的態度；亦由此表達她們宣揚福音的特色。

1.窮人中的窮人：友愛之家的建立和早期二十年的生活

為耶穌而言，成為納匝肋人這項選擇，不獨是指物質方面而言，更包含身份的認同、與卑小者、貧窮者、被蔑視者的認同；祂遂成為一個生活在窮人中間的窮人，好成為世人的弟兄和救主。祂選擇了納匝肋人這個身份和所採取的生活方式，去顯示在祂身上的聖父的容貌，和宣布天國臨現人間的喜訊。括言之，祂把日常平凡的生活，作為與聖父會晤之所。小姊妹在教會內負有特殊的使命，就是以她們整個生活為白冷和納匝肋這深長的含意作証。¹³

香港仔艇戶友愛之家（1956 年至 1977 年）

1956 年春，即會祖耶穌瑪大肋納小姊妹訪港後兩年，友愛會終於派遣了耶穌莫尼加小姊妹（Geneviève Monique de Jesus）和另外幾位小姊妹東來，實施設置友愛之家的計劃。為友愛會而言，香港和澳門是同屬中華區會；是以莫尼加小姊妹常來往於港澳之間。澳門友愛之家始於三月，而香港則始於八月。為築船的事宜，襄助她的是耶穌瑪利芳小姊妹，（Maryvonne

12 *Petite Soeur Magdeleine de Jésus. D'un Bout du Monde à l'autre . (Paris, Nouvelle Cité, 1983), pp.364 - 365.*

13 參閱《友愛會會規》，題 7。

de Jesus) 也是法國人。且聽莫尼加小姊妹為我們講述築船的故事：

「我們八月抵港，白主教非常明白我們的聖召，同意我們生活在漁民中間。然而我們首先還得建一條船。我們只想到瑪利諾會的鄭濟民神父。兩年前會祖過港時曾與他談及這個計劃，但遭他極力反對；可是人地生疏，除了他，我們又可找誰去呢？我們鼓起勇氣，怯怯地重申我們的想法。神父毫不客氣地說：『你們真的愚不可及！你們年紀又輕，一點經驗也沒有，半句中文都不懂，竟膽敢要生活在那毫無保障的住家艇上。.....』我們只默默地低着頭；一會兒神父再說：『如果你們堅持，那我也沒辦法，唯有建一艘堅固安全的大船，但絕非你們所想的住家艇。如果你們認為可以的話，一個星期後再來見我吧！』

一個星期後我們硬著頭皮，有點顫抖，又回到鄭神父跟前。『怎麼樣？大船可以嗎？』『不！神父，我們仍然只要一艘住家艇，就如其他艇戶所住的一樣；不要比他們的大，也不要比他們的高。』雙方都沉默，沒有半點聲響。我們但在心裡默默祈求：上主請幫助我們.....

神父終於開腔：『這是我一生首次付出金錢，而竟有人說太多！.....噫，你們想什麼時候開始呢？』『愈快愈好！』我們喜出望外，不約而同地回答。

只一個月的時間，船已建成，神父滿意地給它拍照。臨走時，他掏出一個小盒子說：『這個聖體盅是我母親在我往外傳教時送給我的。.....』我們

萬分感動，直至神父去世，這份深摯的友誼常存在我們之間。

聖伯多祿堂本堂、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理雅各神父 (Giacomo Zilioli) 也當仁不讓，把他多年帶在身邊常用的聖爵，送給我們。」¹⁴

在船還未造好之前，小姊妹們一直住在嘉諾撒仁愛女修會香港仔培德學校，修女們熱誠接待她們，使她們就如在自己的家中無異。

原訂於 10 月 20 日下午六時舉行友愛之家新船下水禮；由於退潮的關係，改在 10 月 22 日下午五時。白主教親自主持這簡單而又隆重的祝聖禮，並為這水上友愛之家升起教會黃白兩色的旗幟，一如其他教友艇戶一樣。白主教表達他看到小姊妹們置身於漁民中間，代表着教會的臨在，他的內心是多麼的高興；而他的喜樂更流溢在他的眉宇間。鄭濟民神父也滿懷喜悅地為這個新家庭奉獻了首台感恩祭。從此以後，耶穌聖體便常存在這小艇的聖龕中，讓小姊妹們日夕在祂面前為她們的鄰居作個恆常的代禱者。在這個歷史性的日子裡，友愛會當時負責亞洲區的總參議員耶穌瑪利·嘉俾小姊妹 (Marie Gabrielle de Jesus) 也代表總會前來參加。¹⁵

14 〈築船的故事〉，《香港：公教報》，1996 年 9 月 6 日，友愛會特輯。

15 《香港仔友愛之家日記》，1956 年 10 月份。

艇戶友愛之家成立翌日，便是日常生活的開始。小姊妹剛從歐洲來到，固然不懂本地言語，起居生活習慣，又與這裡完全迥異。尤其是居於避風塘漁民的特殊環境中，萬事都得從零開始。箇中的困難，真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但天無絕人之路，「耶穌是無事不可能的主」，從第一天開始，祂便派遣祂的使者——她們的鄰居，作為她們的導師，事無大小，都讓她們好好地學習。香港仔聖伯多祿小學的葉艷桃老師利用課餘時間，成了小姊妹的中文老師。



香港白英奇主教祝聖耶穌小姊妹在香港仔的艇戶友愛之家(1956)

從做保守生開始便在香港生活的思華小姊妹（Dominica Pascale de Jesus），給我們細細分享她美麗的回憶。

「與我們最接近的鄰戶，就是瑪利亞和她收養的有點智障的兒子若瑟，還有根孀和她八個兒女，他們都是教友，他們也都是我們生活的啟蒙師。打從開始他們便接受了我們，對待我們親如家人。他們很耐心教導我們在艇上生活必須具備的知識和技能。諸如划船、搖櫓、清理船身、保養舢舨、上岸取水、艇內炊烟……等等，這只是日常的事宜；他們也教導我們在風雨來臨之際，尤其風球懸掛的日子，如何小心自處，察看天氣，紮繩綁纜，收起帳篷，拋下船錨……樣樣都是學問！我

們就如一個學步的孩童，在大人的提攜下，日復一日地學習和成長。同時透過我們的貧乏和鄰人所締結的友誼，便陪伴我們度過了三十年的水上生活。」

在香港仔避風塘的另一體驗，便是隨鄰艇的漁民出海捕魚。在小姊妹的日記中寫下這一頁：「1956年11月5日，（即她們在船上住下還不到半個月）清晨三時，我們便起床，為跟瑪利亞出海捕魚。在她撒網之前，首先給我們領經，把這一天全信靠天主。通常捕獲的魚都很少，但她卻每次都衷心向天主稱謝。」¹⁶

鮑斯高慈幼會香港仔工業學校的神長們常垂顧弱小，對小姊妹也是慈愛有加。小姊妹開始在艇上生活時，十分窮困；每個星期一次到他們的學校去，神父或修士便把一籃裝得滿滿的瓜菜和雞蛋，送給小姊妹。他們的另一位會士，法籍的張子壽神父（Henri Changeat），更關切她們的靈魂；許多年裡，每個主日專程到她們的艇上，隨後到大埔友愛之家去，為聽小姊妹的告解，並給她們講道。

為糊口維持生計，小姊妹們也一如她們的鄰居，上岸工作。她們慶幸得白主教大力支持，准許她們到工廠工作，置身於勞苦大眾行列，以雙手賺取生活所需，開啟修道人走入工廠的先河。廿餘年裡，一直在香港仔、黃竹坑附近的涼菓廠、眼鏡廠、汽油燈廠、蠟燭廠，多位小姊妹在那裡做包裝、清潔或雜工，甚至也在鋸木廠如苦力一樣地搬運木頭，汗流浹背，以賺取微薄的薪金，就如她們的鄰人一樣，具體明白「手停口停」的意思，正是草根階層生活的奮鬥和辛酸。這一切也幫助小姊妹更深瞭解到「聖子降生的奧蹟」。¹⁷

16 2007年9月8日耶穌思華小姊妹在水圍友愛之家接受筆者訪問。

17 《香港仔友愛之家日記》，1958年12月份。

1983 年 2 月法國一份名為「新城」的雜誌社訪問會祖，為什麼當年她會想到「環球之旅」呢？會祖答覆他們說：「我往各地旅行，是為把嘉祿小兄弟的訊息帶到普世去，並在那裡建立友愛之家——它們將成為天主對人類愛的見證。同時它們也要在那些最貧窮和被遺棄的人們中間，帶去一線的希望。我亦為使友愛會盡快成為普世性的，使它能見證這個與一般人的想法相反的事實：在各個國籍和種族的小姊妹之間，彼此喜樂地生活在一起，並為一個共同的事工衷誠合作是可能的。」¹⁸

香港仔艇戶友愛之家可說是會祖這一席話的注腳。在友愛之家剛成立的那年，公教報於 12 月 14 日刊登了方濟會李智義神父的一篇文章：《我對「耶穌小姊妹會」的認識》。¹⁹ 有位女青年陳麗清讀了這篇特稿，在她的神師慈幼會薛理覺神父（Thomas Szeliga）的鼓勵下，帶着這份公教報，逕往香港仔友愛之家的住艇探望小姊妹，並要求馬上入會；在嘉諾撒會修女的協助翻譯下，幾經探討；這女青年稍後終於入了會，且成為第一位中國小姊妹——耶穌瑪大肋納麗清小姊妹。²⁰

1976 年 10 月當時本港的胡振中主教到香港仔友愛之家來，為本港友愛之家成立二十周年奉獻感恩祭。共祭的還有耶穌會的郭年士神父（Edward Collins），香港仔聖伯多祿堂本堂梁祐忠神父和副本堂關俊棠神父。小姊妹深感教區對她們的扶持和接納，對她們是一個極大的鼓勵。

1977 年 11 月法國泰澤團體的創辦人羅哲兄弟（Roger de Taizé）和他的數位兄弟訪港期間，住在香港仔海旁的棚屋，就是離小姊妹的住家艇不遠的地方；當時的負責人耶穌德蘭小姊妹（Thérèse Blandine de Jesus）樂盡地主之誼，親自搖櫓，

18 《主牽我手》，頁 37 - 38。

19 〈我對耶穌小姊妹會的認識〉，《香港：公教報》，1956 年 12 月 14 日，特輯。

20 〈懷念耶穌麗清小姊妹〉，《香港：公教報》，2003 年 9 月 14 日。

陪羅哲兄弟等人去探視附近的艇戶，表達對他們的關懷。在這些日子裡，兄弟姊妹一起祈禱，與貧苦的艇戶並肩生活，同為合一共融見證，這也是小姊妹們在香港仔生活極珍貴的拾影。



香港胡振中主教為本港耶穌小姊妹友愛會成立二十周年獻感恩祭(1976)

大埔區會友愛之家暨初學院（1957年至1977年）

耶穌小姊妹在香港仔避風塘建築了她們的住家艇，便有了棲身之所；但為培育聖召，她們還需要一間初學院。白主教建議把大埔錦山忠信里那座棄置的聖堂給她們使用。1956年底，小姊妹們便往看是否適用。小姊妹的日記中如此記下：

「這是獨立的一座石築樓房，矗立在大埔錦山的小山岡上，遙望吐露港，景色怡人。房屋四周的土地，既可開墾種菜，又可飼養家禽。房子本身顯得頗殘舊，需要相當大的工程予以修葺。但還是值得的，因為房子够大，可以有寬敞的聖堂。」²¹

經過了數個月的準備和修葺工程，這房子煥然一新；1957年8月30日友愛會在香港的初學院終於竣工。9月6日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本堂、宗座外方傳教會的海澤黎神父

21 《大埔友愛之家日記》，1956年12月份。

（Domenico Maringelli）為小姊妹送來了耶穌聖體。這個晚上小姊妹舉行了午夜朝拜明供聖體，徹夜祈禱。夜深人靜，山腳下不時傳來北上神州隆隆的火車聲，使小姊妹倍感與中國如斯的接近。

9月8日聖母誕辰瞻禮，也是友愛會的會慶。小姊妹選擇這一天作為初學院開幕的日子。麗清小姊妹開始保守生的階段；而思華小姊妹和則濟·蕾敏小姊妹（Cécile Raymonde）則領受會衣，進入初學期。白主教蒞臨主持盛典，獻祭前他親自祝聖了整座房子。在感恩祭中，耶穌道微小姊妹（Dominique de Jesus）復發聖願。是日參禮的嘉賓如雲，除了大埔的本堂神父和他同會的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幾位神長外，還有方濟會國籍李智義神父、耶穌會愛爾蘭籍郭年士神父；修女方面則有：本教區的耶穌寶血女修會、美國瑪利諾女修會、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和法國巴黎外方傳教女修會等。天下一家，濟濟一堂。他們的蒞臨，表達了教會普世性和手足的情誼，給予小姊妹們無言的鼓舞。²²

她們的鄰居也擠滿了這個房子，為「新屋」的落成入伙，照中國人的慣例，燃放了長長的鞭炮，更增添了慶日的氣氛。從澳門專程來道賀的朋友，特別為大家預備了美點，細膩的愛心，流露無遺。

當日港澳全區總共有八位小姊妹，她們都掩不住內心的喜樂，偕同聖母異口同聲詠讚上主：「上主在我們身上行了大事，祂的名字是聖的。」（路 1：49）

初學院的日程表是以祈禱和工作二者互相配合的。共唸日課之餘，小姊妹盡量編配，讓輪流朝拜明供聖體的時間延長。她們深深意識到她們所以在這裡，尤其是為中國的教會祈禱，讓基督的福音遍佈全個國土。

22 同上，1957年9月份。

房屋外面一片荒蕪。幸得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賴法禹神父（Ambrogio Poletti）帶了一班哢喀兵在友愛之家四周築起鐵絲網。另外有位客家婦人，鄰居習慣稱她為「亞娘」的，也來幫助小姊妹墾荒，開闢園地，並教導小姊妹如何種菜。這位亞娘便是唯一在友愛之家的小堂領洗入教的。她們在附近的工廠領取手工業，如鎖匙扣的加工，以幫補家計。工資雖微薄，卻也是與鄰人接觸，並與之同甘共苦的途徑。開始的時候，這山上並沒有自來水，也未有電力供應。就如她們的鄰居，小姊妹也得下山到附近的山泉挑水，以供食用。稍後小姊妹幸得嘉道理農場的家禽專家、陳天爵先生的指導，開始飼養雞和白鴿。她們既住在山上，一切食糧和日常用品，都得下山採購，再背上山去；還有雞鴿的飼料，可謂「百上加斤」；但小姊妹體驗到這就是「生活」，尤其是勞苦大眾的生活，也就甘之如飴了。當要販賣家禽時，小姊妹也如這裡的村婦一樣，用長長的擔挑，前後挑起兩籠雞，擔到大埔靠近海邊販賣；天氣炎熱時，小姊妹固然滿頭大汗，這是小事；她卻要格外留神，不時給這些可憐的小東西灑點清水，以免牠們在路上中暑，而使自己血本無歸！²³

從 1960 年至 65 年在本區生活的耶穌伯以納德小姊妹（Bernadette de Jesus）最近來信，追憶說：

「初學院成立後不久，經常有好些女青年來探望我們。她們喜歡我們周圍環境的清靜，尤其是我們小堂寧謐的氣氛。她們有時會在園中的樹下沉思祈禱，也會和我們交談……這時期的女青年當中，有一個留下，並求入會的，就是日後的耶穌安玲小姊妹。而耶穌嘉賢小姊妹當時剛完成中學階

23 同上，1960 年 12 月份。

段，在她隨家人移民海外之前，也上大埔來與我們接觸。」²⁴

耶穌嘉賢小姊妹（Gwendolyn de Jesus）在羅馬宣發永願後，被派遣到香港來。且聽她對大埔友愛之家的感受：

「1972 年底我到香港，大部份的歲月是在大埔度過的。我印象最深刻，莫過於生活的簡樸。當時除了耶穌則濟·珍妮小姊妹（Cécile Jeanne de Jesus）在明愛醫院服務外，並沒有小姊妹在外工作的。我們為維持生活而養雞養鴿，做園藝，和取鑰匙扣在家中加工，其他便是款待。友愛之家對款待十分開放和重視。我記得有許多女青年來祈禱和探望我們。整個生活可說是簡樸的納匝肋生活。」²⁵

當時小姊妹的經濟實在拮据，莫尼加小姊妹只好例外地，每周抽空一天替人家補習法文，以增加一點收入。

1976 年 5 月友愛會應菲律賓馬尼拉主教辛海棉樞機（Jaime Sin）的邀請，前往該教區設立友愛之家。友愛會遂委派三位已在亞洲生活多年的小姊妹前往。港澳區會很高興能參與此事，由香港選派了法籍的耶穌瑪嘉烈·露儀小姊妹（Marguerite Louise de Jésus）和德籍的瑪蓮·佳蘭小姊妹（Marlene Carla de Jésus）會同日本的耶穌德蘭·杜子小姊妹（Teresia Toshiko de Jésus）一起前往馬尼拉成立友愛之家。

白主教滿懷善牧的心，每年至少探望友愛會一兩次，他噓寒問暖，慈愛有加。有時天氣委實太熱了，他也不辭勞苦，親自上山來；到了山頂的時候，他所穿的長袍沾濕了汗水，宛如從水裡取出來的一樣。臨走時，他總給小姊妹們留下禮物的。

24 耶穌伯以納德小姊妹於 2008 年 6 月 8 日自羅馬來信。

25 耶穌嘉賢小姊妹於 2008 年 6 月 10 日自加拿大來信。

耶穌小姊妹在大埔一如在香港仔，同樣都得到堂區神長和教友們的愛護和關心，自開始便與堂區結下了血脈相連的關係。歷任的本堂神父都很明瞭她們的聖召，從不要求她們教要理或負責什麼組織的事宜。但小姊妹視堂區為自己的家庭，全情投入。如納匝肋的工人耶穌，她們也以微末的工人自居，從一開始，便自動負起每周清洗聖堂的工作，教友們以廖太和呂姑娘為首，也很高興地參與其中。直至她們離開大埔，數十年來如一日，大家樂也融融，與其他的牧職兄弟姊妹異曲同工地一起宣揚主耶穌的福音，見證上主的慈愛與救恩已臨現人間。

2. 工人中的工人：友愛之家的發展

效法納匝肋工人耶穌度福音性的貧窮，為友愛會而言，也是一個選擇。有如嘉祿兄弟被納匝肋的耶穌所吸引而終身努力效法祂；同樣，小姊妹們也被召喚深入窮苦大眾，與他們團結一致。為了謀生，她們要靠雙手工作，在平凡單調的操作中，分沾勞動工人卑下的地位，並努力謙虛地成為他們的小姊妹，和一切人的小姊妹。²⁶

艇戶友愛之家及其延伸（1978 年至 2005 年）

由於政府填海造地的計劃，遂使友愛之家一次又一次地遷徙至不同的避風塘。首先她們由香港仔遷至青衣；五年後再遷徙至油麻地。而於 1986 年再基於上述同樣的原因，耶穌小姊妹終於結束她們三十年海上艇戶的生涯。

青衣艇戶友愛之家（1978 年至 1983 年）

這個避風塘遠比香港仔的小，但艇戶人家的生活，到處都是那麼的貧寒和樸實，是以小姊妹雖初次到來，插置其中，卻也很快便消除了陌生的感覺，安樂自如。早上她們往荃灣葛達

26 參閱《友愛會會規》，題 2, 84。

二聖堂參與感恩祭，然後各自上班。這地區工廠林立，一般人很容易找到工作。但由於初到埗的小姊妹，語言不通，找工作也不無困難。她們找到的往往是最低下，最不受歡迎的工作。如她們在避風塘附近的牛皮廠上班，這工作十分吃力又髒。工人得洗刷清理那又重又臭的牛皮，再把它們鋪放在棚架上曬乾.....然後還有其他許多繁重的加工步驟。

其後，有的小姊妹也曾在紗廠、手袋廠、塑膠玩具廠等工作。船上的友愛之家，最多同時住着四個小姊妹。有段時期，住在船上四個小姊妹分屬四個不同的國家：法國、越南、意大利和中國。這樣的組合也是為實踐友愛會那普世博愛和手足之情的神恩。

有一次颱風襲港，船上只有兩位小姊妹，其中的一位是越南的耶穌明燕小姊妹，（Maria Y de Jesus）給我們講述她們的際遇：

「1978 年夏天，我們的住艇遷徙到青衣不久，一切都很陌生的。我們什麼都不懂，可說是『生手的學徒』。慶幸我們的鄰居都很良善，生活經驗又豐富；十分有耐性地教導我們如何過『水上人』的生活。

早期只有雅蓮小姊妹（Madalêna Liên de Jesus）和我。兩人都在牛皮廠工作。她上午上班，我則下午上班。這樣總有一人留在艇中祈禱、做家务和接待鄰人。

有一天，天氣大變，宣佈將有颱風。我們想應該去買些纜繩，以防萬一。但風勢非常強勁，使我們寸步難移。加上傾盆大雨，天色已晚，只好困守船艙內。我們相對坐着，點亮一盞汽油燈，中間放着一台收音機，嘗試收聽電台廣播有關颱風的消息。雅蓮小姊妹僅懂得一點點英語，而我的廣東話

卻是非常有限。我們試聽聽英文，又試聽聽中文，想着如果我們所明白的是同樣的事，那可能是對的了。這時天空打雷閃電，風雨交加，我們的船顛簸不已。一次又一次我們聽到：『八號風球仍然懸掛。』但我們卻不明白『仍然懸掛』到底是什麼意思？究竟颱風到了嗎？還是走了呢？所以我們一直不敢入睡。突然間，『嘖、嘖、嘖』，有人大力打我們的窗戶，我們都嚇了一跳，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也許我們做錯了什麼，令鄰居不高興吧。原來我們的鄰居、那位平日一臉嚴肅的盧叔和他的大女兒，頭戴着帽，身穿雨衣，高聲喊說：『小姊妹不用掛心，我和亞娟（他的大女兒）已用大纜把妳們的船牢牢地綁好了；妳們安心睡罷。』

我們這才放下心頭大石，感謝天主，在這重要的關頭，給我們遣來祂的天使，解除我們的困厄。同時也讓我們上了什麼是『無償的友誼』的一課。」

27

油麻地艇戶友愛之家（1983 年至 1986 年）

1983 年 5 月，香港政府由於填海造地，要求青衣的艇戶遷徙到別處，而小姊妹的住艇泊於青衣已有六年，當然捨不得離去，更不忍就此草草結束水上的生活。她們在大埔友愛家開會商討，卻苦無良策。

「門鈴一響，一位名為百勝的青年站在門前，他是我們香港仔艇戶鄰居的長子，小時候，由於健康的問題，曾好幾次在醫院留醫。」

27 2008 年 5 月 1 日耶穌明燕小姊妹在水圍友愛之家接受筆者訪問。

有朋相訪，小姊妹自然暫停開會，招待百勝。在言談間他知道小姊妹的住艇苦無停泊之處，馬上說：『小姊妹，別擔心！妳們何不到油麻地我叔父那裡呢？我來給妳們介紹。』

約見的日子到了，百勝果然依約到來；帶引我們與他的叔父會面。在他大力推介下，他叔父欣然接納我們靠泊住艇。

兩星期後，遷移的那天，仍然是百勝幫忙。他獨坐在電動小艇上，神態自若，乘風破浪，從青衣橫過整個海港，避過無數來往穿梭的大小船隻，安全把我們的家拖到油麻地避風塘來，讓聖龕中的耶穌聖體繼續臨在祂所特愛的漁民中，默然地降福他們。

小姊妹又一次體驗到上主藉卑微弱小者的手，大施奇能，帶引、眷顧她們。並且很巧合的，當天感恩祭的第一篇讀經的最後一段聖言，是上主顯現給保祿說：『你放心吧！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證，也該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證。』（宗 21：11）這段聖言啟發了那兩個要到工廠上班，而不能隨船搬遷的初學生，順手在她們地圖的木板下，節錄了這段經文，只是改為：『你放心吧！你怎樣在青衣為我作證，也該怎樣在油麻地為我作證。』²⁸

這年五月下旬，在油麻地避風塘那密密麻麻、一行一行的住家艇中，多置了一條船，便是小姊妹的友愛之家。自此以後人們經常會見到她們來往於油麻地和大角咀之間。每當她們搖着舢舨外出時，她們的鄰居，尤其是那些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們，在老遠的地方便提高嗓子，不停地喊着：「小姊妹，小姊

28 〈遷移的故事〉，《香港：公教報》，1996年9月6日，友愛會特輯。

妹……」這些充滿了稚情的招呼，且伴着喜悅的笑容，往往是她們晨早所接到的第一份珍貴的禮物。它有如熹微的朝陽，發出溫柔的光芒，使整個海面都閃爍着金光。²⁹

這裡和荃灣一樣，都有很多工廠。除了負責的小姊妹外，前後有過四位第二年的初學生在這個友愛之家生活。兩個是韓國人，兩個是本地人。她們分別在不同的製衣廠工作，有縫衣的、有剪線頭的、有做雜工的。

耶穌思華小姊妹為我們分享：

「宗座外方傳教會士甘浩望神父（*Francesco Mella*），即大家都熟識的「甘仔」，有一天到艇上來探我們。言談間我隨意說：『在教區中竟沒有半個神父來關心這裡船民的福傳，是多麼的可惜啊！』誰知聖神竟透過這句話去施行祂的計劃！沒多久，甘仔便與他同會的宋啟文神父（*Franco Cumbo*）一起搬到避風塘來居住。他們的艇離友愛之家不遠。如此也給我們一個美妙合作的良機。有時他們到我們家來獻感恩祭，分享福音；有時也邀請鄰居來一起祈禱。有時候我們也參與他們為船民的權益所作的努力；例如為『無證媽媽』，為『新移民子女』的居留權等。藉這一切使我們更了解並關心社會弱勢的一群。」³⁰

1983 年夏季，是颱風襲港後的一天傍晚，這避風塘的友愛之家竟接待了宗座外方傳教會的恩保德神父（*Gianni Giampietro*）和他從意大利來的哥哥和嫂嫂；他們很有創意地選擇小姊妹的住艇，來慶祝兄嫂的銀婚，和恩神父晉鐸廿五周年的慶典。幸好颱風已遠去，海面一片平靜，感恩祭順利進行。

29 《大角咀中華聖母堂區通訊》，1983 年 5 月份

30 2008 年 5 月 1 日耶穌思華小姊妹在水圍友愛之家接受筆者訪問。

前來參禮的鑽石山青年朋友興高彩烈地同聲歡唱，又十分開心地吃着早已準備好的銀慶蛋糕。

在油麻地避風塘小姊妹也度過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聖誕節。鄰近百餘位小朋友乘坐他們的小艇，齊集在她們住艇前面。大家一起唱聖誕歌，一起玩遊戲。堂區幾位教友已籌備了送給小朋友各式各樣的禮物。小姊妹用大型的發泡膠板，刻劃了一幅聖母抱聖嬰的圖像，高高掛在船頭上，伴着「聖誕快樂」四個大字，通傳降生成人的天主聖子居住在他們之中，並深深愛了他們的這個喜訊。³¹

小姊妹們在油麻地避風塘度過了三年平靜愉快的生活，卻由於政府一再填海造地的計劃，結果在 1986 年的夏天，不得不給她們三十年的水上生涯劃上了句號。

西貢沙角尾臨時屋友愛之家（1986 年至 1998 年）

1986 年夏季，與大部份的艇戶一樣，耶穌小姊妹亦隨之上岸。政府讓她們遷址於九龍西貢沙角尾臨時房屋區。顧名思義，那原是政府為臨時安置因天災人禍的受害者而設的。住在這裡的差不多全部都是由中國內地或別處來港的、未符合上樓居住的新移民。所有的房子都是以很薄的木板所建成，真個價廉物賤，非常簡陋，而且十分細小。以一家三口為例，所得的單位便是七呎乘七呎的面積，加上一個小閣樓。門前小小的一隅，便是所謂的廚房。沒有私人的衛生間，有的只是公廁而已。全區總共有五十三個大小不一的單位，視每戶人口多寡



耶穌小姊妹在幼稚園工作

31 《油麻地艇戶友愛之家日記》，1983 年 7 月份。



耶穌秀霞小姊妹在紙杯廠工作
(1997)

而分配。可笑的是，這稱為「臨時房屋」的，竟讓大家一住就是十二年。小姊妹在這區開始興建時入住，直至它遷拆時才搬出。

十二年間先後住進這「迷你」友愛之家的小姊妹共有十一位。友愛之家所居住的單位是屬於三口一家的。小姊妹們分別在油漆廠、紙杯廠、護老院、幼稚園、快餐店、便利店和天主教明愛中心工作過。這裡工作的機會也不俗，有選擇的餘地，按個別小姊妹的能力、體力和傾向而定。

來自寶島的耶穌秀霞小姊妹在這裡生活了數年，曾給這社區描繪出它的輪廓來。

「區內一般居民大都在工廠、酒樓或地盤等從事勞力的工作以謀生。小姊妹們也不例外，在外打工以賺取我們的日用糧。我們的家，『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看似一無所有，卻也一無所缺。在閣樓中更擁有天地的主宰——我們摯愛的主、耶穌聖體的臨在。」

由於每個單位的空間都極之有限，所以一到夏天，大家便搬出桌椅，置於自家門前；有做功課的學生，搓麻將的成人，玩遊戲的小孩，



鬧市中的納匝肋：耶穌小姊妹置身於西貢沙角尾臨屋區(1986-1998)

閒話家常的婦女和休憩乘涼的老人……構成一幅祥和美妙動感的圖畫。晚上，在炎熱的天氣下，常舉行『露天晚餐』，一家人共享天倫之樂。小姊妹有時也會與他們在一起，品嚐各家的美食。日常生活快樂的共享，憂苦的分擔，增進了彼此的友誼，讓小姊妹見證了這純樸、刻苦、同舟共濟的徙置區生活。」³²

將軍澳厚德村友愛之家（1998 年至 2004 年）

再由於政府為實施有關興建公共房屋的計劃，港九各地區的臨時房屋區，在九十年代末都先後被拆掉。小姊妹便再度與鄰居一起搬遷，一起「上樓」，進住將軍澳公共屋村。當小姊妹搬到將軍澳厚德村時，她們以前沙角尾徙置區的好幾家鄰居，都先她們而至，歡天喜地等候她們的到臨。甚至有些就住在她們的樓上，怎不教人衷心讚美上主奇妙的安排呢！

小姊妹往外的的工作，便是護老院，布廠和快餐店。如在沙角尾一樣，這裡的友愛之家也是一個三人住的單位。面積雖有限，卻也有一個固定的小堂，可供奉耶穌聖體——這正是她們生活的核心。



將軍澳聖安德肋堂厚德基基團到訪大埔友愛之家
(2003)

友愛之家搬來這裡之初，這堂區的聖安德肋堂尚未興建。主日和平日的感恩祭都在將軍澳天主教小學那裡舉行的。教友們每月一次，以友愛

32 《沙角尾臨屋區友愛之家日記》，1997 年 10 月份。

之家作為他們厚德基基團聚會之所。從一位團友、鍾陳婉貞姊妹追悼耶穌安玲小姊妹的文章中，即使只節錄其中一兩段，也可一窺這個友愛之家臨在人群中意義的一斑。

「我是在將軍澳友愛之家認識安玲小姊妹，一位平凡生活在公共屋村的修道人。多年來小姊妹友愛之家接待聖安德肋堂區厚德基基團，在友愛之家每月一次祈禱聚會，給這個信仰小團體留在主的道路上。

在四月十日上班前的彌撒，基基團的新舊成員為此共聚在主內的時間，說來實在是非凡的回憶；或許我們能平淡自然地坐在自己人的中間，是多年來受自耶穌小姊妹友愛會默觀生活的感染。與安玲小姊妹一起的日子，她只是以友愛接待，無論在將軍澳、大埔、天水圍的友愛之家，在我們的祈禱聚會中，她從沒有以家主的身分自居，而只是平淡自然的座上客。」³³

由於小姊妹人手不足，將軍澳友愛之家在 2004 年終告結束。

民居友愛之家（1981 年至 2004 年）

由 80 年代初至 2004 年期間，耶穌小姊妹友愛會在港澳區會中經常有十多位小姊妹。為能更普遍深入人群，實踐她們宣揚福音的使命，小姊妹先後在不同的地區設置她們的友愛之家。因客觀環境的因素，這些友愛之家的壽命長短不一。計有堅尼地城友愛之家（1981 年至 1983 年），摩星嶺友愛之家（1984 年）和鴨脷洲友愛之家（1993 年至 2004 年）。其中鴨脷洲友愛之家維持最長。工作方面，上述三個友愛之家的小姊妹均先

33 〈懷念安玲小姊妹〉，《香港：公教報》，2008 年 6 月 22 日

後工作於洗衣廠、印刷廠、快餐店和老人院等；也有領取手錶帶在家中加工。

教區應小姊妹的需要，把鴨脷洲大街一層原是幼稚園的，而已空置的樓房，無償地借給小姊妹使用。香港仔聖伯多祿堂本堂麥景鴻神父，且以善牧心腸，着人先把這樓房清理粉飾一番，讓小姊妹到來時較易於處理。小姊妹能重返香港仔居住，為早期生活在艇上多年的元老小姊妹之一的耶穌道微小姊妹尤為高興。因為這裡可說是她的「初戀」之地，有許多老朋友，也有許多甜蜜的回憶。她坦白承認，今日的環境與過去的，確有很大的分別。現在的人回家，隨即把門關上，與鄰居並不容易認識，彼此很少打交道。但她也說：「即使如此，我的心依然為愛他們而來。」

其他年輕的小姊妹雖未有住艇的生活經驗，但每遇到小姊妹昔日的艇戶鄰居時，都感受到友誼的延續。無論小姊妹是來自何方，或屬於那個國家的人，只要是「小姊妹」，這些舊鄰居便會視她如親人。所以小姊妹真的體味「前人種樹後人收」，滿懷感激，細嚐前輩小姊妹所種下的友誼的碩果！

1996 年 9 月小姊妹便是在香港仔堂區，與她們的老朋友們一起慶祝友愛之家來港四十周年誌慶的。她們恭請了當時的湯漢副主教奉獻感恩祭。共祭的神父比全部的小姊妹還要多！在聖堂門口的兩側，小姊妹寫了下面這副對聯，以表達她們生活在人群中的默觀聖召：

「面對面心連心兩情相悅凝視上主
手牽手肩並肩甘苦與共友愛鄰人」³⁴

34 《鴨脷洲友愛之家日記》，1996 年 9 月份。

在鴨脷洲生活了數年的耶穌嘉麗小姊妹（Claudia Elisabetta de Jesus）給大家敘述她身為工人的心得：

「我在黃竹坑的一所印刷廠工作了四年，是我工人生涯中最長的一份工。在那些日子裡，我與工友們合作愉快，同甘共苦，團結一致。結果我們也成為好朋友。我記得當我告訴她們，我是一個小姊妹時，她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仍然如常叫我『嘉麗』；我並不介意，也不會強求她們改變什麼。然而過了一段頗長的日子，有一天，她們很自然地開始叫我『小姊妹』，並



耶穌嘉麗小姊妹在印刷廠工作(1994)

給我說：『現在我們真正感到妳是我們的姊妹了。』其後也不時以開玩笑的口吻叫我『大姊妹』。（因為我委實很高大哩）這事也令我反省：要成為姊妹/兄弟，是一條路，一條頗長的路。

我也曾在快餐店工作過；透過這個工作，讓我接觸、和認識到另一個世界。直至到這快餐店工作之前，我一直在些極小型的工廠工作。但這店卻是跨國的大機構，是以讓我突然置身於十分密集又熙來攘往的人群中。我前後到過數個不同的分店上班。首先是在天后，繼而在時代廣場，最後在將軍澳。我多數是收銀員。工作的節奏非常快速，尤其是時代廣場的期間，當顧客如雲時，直使我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我的同事差不多都是年青人，大部份還在求學的階段，只是在課餘為求取得幾個錢。我們的薪水非常微薄，但工作的要求卻非常高；所

以員工的流動性極大。我記得有一次，有位女士來到我的面前對我說：『我喜歡到妳的櫃台來！因為妳的笑容幫助我開始一天的工作……』這令我十分驚訝，同時讓我想起會祖常提醒我們的一句話：『在人世間成為一個微笑。』」³⁵

大埔區會友愛之家暨初學院（1978 年至 2005 年）

基於它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使大埔這個家同時成為多類型的友愛之家，發展它多方面的用途。諸如培育聖召，團體聚會，靜修祈禱，款待過客等。

這個初學院，先後栽培了不少的初學生。一般宣發初願的禮儀是在友愛之家內舉行的；至於宣發永願則在堂區舉行。在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友愛會為小姊妹舉行過三次永願的典禮。最近的一次是 1995 年 12 月 2 日為耶穌賽香小姊妹舉行，敦請了當時的主教、胡振中樞機主禮。共祭的神長和參加禮儀的親朋、教友坐滿了聖堂，極一時之盛況；那已是十三年前的事了。友愛會在堂區每次舉行的典禮，幸得堂區全體成員上上下下鼎力的幫忙和協助，每次都得圓滿喜樂的祝福。

工作方面，由於人手增加了，小姊妹擴大了種植蔬菜的園地，並且也有小姊妹出外工作，如到製衣廠、食品廠、汽車零件廠、火車站和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等。

受僱於火車站做清潔工的是耶穌雅蓮小姊妹，一做就



耶穌雅蓮小姊妹在火車站工作(2000)

35 2008 年 5 月 1 日耶穌嘉麗小姊妹在水圍友愛之家接受筆者訪問。

是十八年！首先在大埔，接着是在羅湖。小姊妹默默地辛勤工作，除了給來往的乘客提供一個光潔衛生的場所外，也給他們獻上她無言的微笑。

而耶穌麗清小姊妹和耶穌富美小姊妹（Maria Fumi de Jesus）則前後受僱於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也是做清潔工。透過這服務，讓小姊妹和基督教內的牧師、兄弟、姊妹們有了更多來往的機會，促進彼此探訪，一同祈禱，加深交流。有一次該叢林的院長、由挪威來的何安石牧師（Ernst Harbakk）和幾位員工到友愛之家來探望我們。茶敘間，何牧師給我們說：「我們很高興麗清小姊妹在我們中間，她是我們的「小太陽！」而當富美小姊妹患病做手術後，雖然她已離職多時，但她當年的同事也常來探望小姊妹，給予她支持和鼓勵。

從 1978 年至 85 年，在大埔友愛之家、負責菜園的耶穌樂儀小姊妹（Madeleine Louise de Jesus），給我們寫下在她的回憶中印象最深刻的片段：

「1978 年我抵達香港後不久，有兩位法國泰澤團體的兄弟也到大埔來，住在我們菜園中的石室裡。我們有各自的生活，但每天黃昏我們一起詠唱晚禱。有許多青年來訪兄弟時，也成了我們的朋友。」

我主要是負責菜園的工作，每周定時把菜蔬送到九龍一間酒店的餐廳。工作相當多，幸好有兩位韓國的初學生來跟小姊妹學法文，課餘也幫忙我們的園務。」

在這七年中有好些「大事」，更令我難忘。

首先是那關閉了三十年的中國大陸竟然打開了她的大門，讓國外的華僑可以回鄉與家人團聚。我們分享了麗清小姊妹首次回鄉，與她闊別多年的弟妹歡聚的喜樂。

1979 年 10 月底，會祖耶穌瑪大肋納小姊妹在耶穌珍妮小姊妹和耶穌佳蘭小姊妹 (Carla de Jesus) 的陪同下，往中國觀光後，順道來港探望我們。我們都很高興地圍繞在她身旁，靜聽她講述在旅途中豐富的見聞。在小堂裡，會祖高聲祈禱說：『上主，我為普世各地的小姊妹懇求祢，求祢賞賜她們有勇氣，充份活出耶穌嘉祿兄弟的神恩。但願她們不會由於缺乏慷慨或對人失尊敬，而使這神恩衰退無味。』

會祖小住期間，燕霞小姊妹在會祖手中領受了十字架，開始她保守生的階段。這期間的一個主日，香港教區的副主教、林焯煒神父代表主教往大埔友愛之家，為會祖的重臨香江奉獻感恩聖祭。這一天，有位修道近二十年的姊妹，上主讓她藉着與會祖的邂逅，給她另闢蹊徑，踏上跟隨納匝肋工人耶穌的道路，終成為今日的耶穌麗芳小姊妹。

1982 年廣州鄧以明總主教上錦山來看望我們。他過去二十餘年，在大陸嚐盡了鐵窗風味。現在重獲自由，卻以一份令人敬佩的平靜，給我們分享他在獄中的生涯。」³⁶

大埔友愛之家也是小姊妹對中國大陸的關懷事工的踏腳石！配合八十年代中國政府對落實宗教自由的政策，小姊妹除祈禱外，也透過探親、訪友、觀光，甚至置身於國內的機構服務，以簡樸的臨在，接觸國內的兄弟姐妹，表達對他們的關懷。

她們多位前往國內服務的外籍朋友，在較長的假期中，都會到大埔友愛之家來度假；如此這裡遂成為朋友來往歐亞之間

36 耶穌樂儀小姊妹於 2008 年 7 月 22 日自法國來信。

的驛站。小姊妹也款待由大陸出來參加短期課程的神父、修女們。這也是一個橋樑的服務和合一共融的見證。

由 1987 年開始至 2001 年，耶穌麗芳小姊妹每周一次，前往教區聖神研究中心工作；藉此表達友愛會支持、參與教區對中國教會的服務。這中心由已故胡振中樞機所發起，成立於 1980 年。它的宗旨是協助教區當局對中國不斷轉變的情況作出適當的回應，以及推動本地教友聯同普世教會負起關心中國教會和中國社會的使命。中心從創立至今，由香港教區主教湯漢主持，並由多個修會和傳教會的會士、修女鼎力合作，也有教友的參與和貢獻。小姊妹有幸能以簡單的臨在，置身其中，分沾這份合一與共融的恩澤，並由每位同工身上學習良多。

此外，小姊妹在家也利用閒暇，嘗試翻譯會中一些靈修文獻或書籍，以與中華兒女分享她們自耶穌嘉祿兄弟和耶穌瑪大肋納小姊妹身上所承受的精神遺產。

此外，由於來自越南的耶穌明燕小姊妹的臨在，使她們有機會廣泛地招待越南的兄弟姊妹。小姊妹不獨每周一次探訪監獄中的越南犯人，且在她日常生活裡接觸無數的越南朋友。他們中很多都是 70 年代中期到香港，而滯留下來的船民。小姊妹在難民營中接觸了她們。許多年輕的女子離營後，在港結婚落籍；但由於言語、風俗、習慣的不同，遂產生了許多的家庭問題。小姊妹與她們自是「同聲同氣」沒有言語的隔閡，既能聆聽，又能善言安慰；再伴以祈禱的支持，假以時日，終能幫助她們重建和諧的家庭，且溶入本地的社會。這麼多年來，透過明燕小姊妹的貢獻，使友愛之家也成為越南兄弟姊妹們的家。

在港服務的菲律賓朋友，他們也是小姊妹的座上客。在大埔友愛之家，有的是大自然的恩賜：寧靜的小堂，寬大的菜園。多少次，在假期中他們有獨自上到這小山岡來休憩祈禱的；有時卻三五成群在竹林裡燒烤，盡情歡唱。說實在的，招待他們

的小姊妹的英語相當有限，但他們需要的，是一顆開放、款待的心。

從 2001 年至 2003 年，有兩位小姊妹在雲南山區一孤兒院服務。且聽耶穌麗芳小姊妹給我們分享她這期間生活的點滴：

「由於幾位佛教老朋友的極力推薦和支持，安玲小姊妹和我終於有機會到雲南麗江的華坪縣服務，一圓我們的中國夢。這是一間小小的孤兒院，總共有四十八名兒童，男女各半。年齡介乎三歲至十六歲。除了幾個漢族外，其餘都是少數民族。有傈僳族、納西族、彝族等。白天他們全部都到附近的學校上課，下課回來，在院裡過着團體的生活。

我們以義工的身份在他們中間，分享他們的起居作息。至論我們所做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日常瑣事。諸如替孩子們縫縫補補，洗洗擦擦；看顧他們做功課，注意他們的衛生習慣等。另一方面，由於這裡沒有教堂和神職人員，我們有幸讓耶穌聖體與我們相伴同行。深信祂無言的臨在，不獨給這院舍中的小孩，也給這山區整個小城的人民帶來無限的祝福。

那年國慶七天的假期，大部份的孩子都到親戚家。回院那天，他們中有不少不怕山路崎嶇，背着山地的產品，如核桃、



耶穌燕霞小姊妹與華坪兒童家的小朋友 (2003)

紅薯、花生、南瓜、葵花子等回來，興高采烈地與大家分嚐。有位九歲的小女孩，悄悄到我房間來，

羞怯地給我遞上一個綠中帶紅的大蘋果。原來是她從爺爺給她僅有數元的零用錢中，花了一元八角給我買來的。這可相等於四斤普通蘋果的價錢啊！翌日，我邀她和她的弟弟與我一起共享這碩果。她一面高興細嚼，一面對我說：『我從未吃過這樣好吃的蘋果！』我注視着她一派天真的神情，含笑點頭回應道：『我也是！』此刻，她那雙精靈的大眼睛更閃爍着滿足的異彩！這張美麗的臉龐至今仍歷歷在我眼前。」³⁷

3. 常人中的常人

為跟隨納匝肋人耶穌、這位降生成人的天主，祂愛情的奧祕乃從馬槽中的軟弱無能開始，而在加爾瓦略山的十字架上完成。

天水圍友愛之家（2005 年至今）

由於小姊妹之年齡老化和缺乏聖召，她們終於在 2005 年春，把大埔忠信里的房屋，交還香港教區，結束她們山上四十八年的田園生活。同時，衷心感謝香港主教陳日君樞機眷顧，把天水圍嘉湖山莊賞湖居、以前聖葉理諾堂區神父的宿舍和辦公室的兩個相連單位，無償借給小姊妹們居住。是年三月，小姊妹遂在水圍建立她們在香港僅有的友愛之家，以她們貧乏微弱的力量，繼續她們宣揚福音的使命，開始她們歷史新的一頁。

無獨有偶，這個堂區的本堂神父，原是她們在將軍澳的本堂——聖母聖心傳教會會士、顧厚德神父（Ferdinand Bouckhout）。顧神父給小姊妹打趣道：「妳們為什麼老是跟着我呢？」這堂區也如大埔的一樣，對小姊妹都十分了解和接

37 耶穌麗芳小姊妹於 2002 年 10 月 26 日自雲南來信。

納。在這短短的三年間，堂區的兄弟姊妹們具體地分享了友愛會的喜樂和悲傷。首先是 2005 年 11 月 13 日，嘉祿·富高兄弟被列入真福品時，陳日君樞機蒞臨本堂奉獻感恩祭。當日共祭的十多位神父乃來自四大洲多個不同的國家，足見普世教會主內一家的精神，小姊妹昔日的鄰居和老朋友們，也不遠千里而來，分享小姊妹們的喜樂。³⁸

小姊妹也不會忘記為友愛會到港五十周年而衷心感謝天主。2006 年 12 月 3 日，與她們熟識多年的區成賢神父（Francis G. Elsinger）特地從南丫島到天水圍來，與小姊妹們一起向上主獻上讚頌之祭。是日參與這家庭慶典的，都是她們最忠誠的老朋友：如大埔鄰居宋師奶、香港仔的教友陳梅瑟夫婦、劉錦榮夫婦、陳譚麗瓊女士，唐福雄夫婦和外方傳教女修會郭愛蓮修女等。他們數十年來都以友誼默默地支持小姊妹。此外還有從羅馬來的耶穌伯以納德小姊妹也欣逢其會。³⁹



香港主教陳日君樞機在水圍聖葉理諾堂慶祝嘉祿兄弟被列入真福(2005)

38 《天水圍友愛之家日記》，2005 年 11 月份。

39 同上，2006 年 12 月份。

小姊妹搬遷到天水圍不多久，安玲小姊妹便發現患了癌病。這樣便讓她們明白如何與長期患病的家人同行。透過小姊妹的病苦和奮鬥，加強她們對生命的反思和珍惜；更深切地探求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準備與主最後的會晤——平安地接受死亡！無可否認，這確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但小姊妹同時深深感到，這也是上主給她們偌大的一個祝福。在安玲小姊妹離世前一年，多次出入屯門醫院，該院的醫護人員、天主教牧靈部的兄弟姊妹和義工都多方面給予小姊妹支持、鼓勵，幫助安玲小姊妹堅持到底。而安貧小姊妹會修女也常常給她們伸出援手，幫助她們度過難關。

2008年4月8日，耶穌安玲小姊妹安息主懷。4月19日，友愛會在聖葉理諾堂為安玲小姊妹舉行踰越聖祭。安玲小姊妹是第一位安葬在香港的小姊妹。她們亞洲區的洲際參議員、耶穌仁子小姊妹（Céline In Ja de Jesus）特地從韓國前來參加葬禮。整個堂區的兄弟姊妹，也分擔了她們痛失姊妹的憂傷。

無論年老、疾病和死亡，並不阻礙小姊妹繼續活着她們的聖召；常人中的常人——為跟隨納匝肋人耶穌、這位降生成人的天主，祂愛情的奧祕乃從馬槽中的軟弱無能開始，而在加爾瓦略山的十字架上完成。是以為小姊妹而言，即使她們已屆退休之齡，在可能的範圍內，仍到不同的醫院、監獄和護老院，以友誼和聆聽，留在那些最被社會忽略者的身旁，以她們單純的臨在，給予他們一線希望和安慰。

以下是耶穌雅蓮小姊妹探訪病人的一點分享：

「我的朋友莊潤生今年3月5日過世。．．．．那天，當我到醫院看見他的床是空的，我便立即明白。兩年前，我在屯門醫院遇到他。他患有鼻咽癌，正在那裡接受電療。他經常坐在床上，他整個喉嚨如燒焦似的。．．．．從他的氣管上開了一個孔，為幫助他呼吸。他不能講話，除非要很出力用手按着那個

孔……他也不能正常由口進食，而是插胃喉輸送養料。我們很少談話，只說很簡單的幾個字，但我們彼此明白，尤其透過手勢、眼神、或握住手。他知道我很『寶貝』他。他經常對我說：『妳有心！』

在醫院留醫幾個月之後，他被送到元朗一間老人院，而我也經常去那兒探望他。間中他會返回醫院看醫生，或住在醫院數天。

後期，我差不多認不出他來；因為他的臉孔腫脹得很厲害。他用筆寫給我：『我想升天去。』他並不是教友，但因着我隱晦的臨在和醫院中那位牧師對他的支持，我知道他是相信天主，相信耶穌和相信永恆的生命的，雖則他並沒說出來。

他雖承受很大的痛苦，卻滿具尊嚴和勇氣，細心關照。當我前來看他，靜靜地坐在他的床邊，他的這個態度，委實令我感動。

我確信主耶穌必會歡迎莊潤生進入祂的慈懷中，因為他已與祂的苦難同化。我知道，如今在天主的身邊，我又多了一位朋友和保護人……並且我們會再見的！」⁴⁰

「誰接待你們，便是接待我；誰接待我，就是接待那派遣我來的。」（瑪 10：40）

耶穌明燕小姊妹也分享她十多年來探監的經驗。

「1975 年大批的越南船民湧到香港來。胡振中主教上任後，即呼籲居於香港的越南神父、修士、修女們前去探望難民營。1992 年負責監獄的神長邀請我往監獄，探望那裡的越南人；透過教區的幫忙，

40 2008 年 5 月 1 日耶穌雅蓮小姊妹在水圍友愛之家接受筆者訪問。

給我申請了探監的通行証，是以我能方便探監，直至如今。

在監房中有各式各樣的犯人.....最近這三年，百分之八十的越南犯人是患有愛滋病或吸毒的。他們便是我探望的對象。其中有一個吸了毒，又是愛滋病的末期病人，由於失望，他自暴自棄，做了很多傻事，致使當局不得不把他隔離起來。我決定去探望這個人。第一次，第二次，他都不出來。第三次他終於出來見我了。我給他打招呼：『你好！』他垂着頭，回答我：『你好。』然後便是一片靜默。隔了好一會兒，他慢慢地抬起頭來，望着我微笑.....我也向他微笑；就這樣開始了我們的友誼，開始了我們的談話。他希望我帶給他一本聖經。幾個月後，他告訴他想辦告解。我告訴他，如果我找到一位有空而又能說越南話的神父，那是很好的；但並不是容易的事！他明白，卻很清楚給我說：『是的，如果神父不能來的話，沒關係；但妳得向他說出我的願望。』

當其時，在香港並沒有越南神父。而我認識的一位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林銘神父（Pierre Lam Minh），他在越南出生；但我知他非常忙碌。我只好給他打電話，告訴他這個朋友的故事。他很爽快地回答我說：『修女，在我們的生活裡當給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優先。』這使我喜出望外，馬上替我的朋友給他約時間。

到了約定的日子，我陪同神父到監獄。神父隔着玻璃，看着我的朋友，用對講機與他通話的。出來後，神父十分高興告訴我，他們一起唸了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誦、並齊唱了一首敬禮聖母的越

南歌……但相信沒有人明白他們唱的是什麼！我也替我的朋友高興，並為這位真正的善牧感謝天主。

聖誕節前夕，我這位朋友便出獄，並遣返越南。他離港前，我探望他最後一次。他滿心喜悅告訴我：『我衷心感謝這位聽我告解的神父。雖然我仍然帶着病回去，但我的心是多麼的輕快啊！我肯定這個聖誕小耶穌必定誕生在我心中。』

每次探監之前，我會重溫抄錄在我探訪小冊子上會祖的說話：

『在妳們的路上所遇到的人，那怕是人類中最可憐的一個，也有他人性的尊嚴，而人性尊嚴是如斯重大的事！必須要常常尊重所有的人，永遠不要以一種自大的態度對待任何人。在天主面前，並沒有高級、低級之分的。心懷尊敬，必須以愛去結合，甚至去填補不同種族之間的鴻溝；要接納我們所愛的那個人的一切。』⁴¹

在這友愛之家中另有三位小姊妹仍可上班。有在茶莊做清潔工的，有在食品工廠做包裝的，也有在聖神研究中心做兼時工的。

以下是耶穌嘉麗小姊妹分享她的工作經驗。

「如今我已邁過『知天命』之年！慶幸仍能找到一份工，就是在葵芳一有機食品工廠裡做包裝。這工作既刻板，又骯髒，又勞累。我的同事有男有女，他們都是一生勞碌的工人。我敬佩他們的堅忍、持久有恆的個性和富有生活的智慧。

41 2008年5月1日耶穌明燕小姊妹在水圍友愛之家接受筆者訪問。

從一開始他們便很自然、很隨和地接納我成為他們的一份子。這確實幫助了我超越我的疲乏。我已不再年輕，所以甚至有時我也會感到我的身體已有點消耗過度！但我很高興能置身在他們中間。我體會到，原來我竟提醒了他們天主的臨在。有時他們很俏皮地給我說：「『嘉麗，妳信天主的，可不是嗎？耶穌救救我們吧！』這句開玩笑的話，卻成為我內心的祈禱：『天主，祢存在的，祢在這裡！願祢的名受頌揚。耶穌，求祢拯救我們全部的人吧！主，感謝祢，讚美祢！』」⁴²

每年香港教區 12 月 8 日都會為在港服務的神父、修士、修女的晉鐸，入會或發願的銀禧、金禧和鑽禧慶賀的。2008 年耶穌小姊妹友愛會將罕見地有三位小姊妹參加這盛況。發願銀慶的有耶穌燕霞小姊妹和耶穌嘉麗小姊妹；發願金慶的有耶穌雅蓮小姊妹。就如許多修會一樣，為讓當事人更濃縮地體驗這慶典，她們也在自己的小團體中先行慶祝。她們就提前在九月的第一個主日，接近她們會慶的日子舉行。特請多年來與她們同行的姚崇傑神父來主持這家庭式的慶節。與她們同樂的，也是跟隨耶穌嘉祿兄弟精神的默存會修女，和在俗獻身的耶穌仁愛協會的姊妹。還有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的修女。這小小的羊群，仍然滿懷依恃天父的心，偕同聖母瑪利亞，從心底唱出她的頌主曲。猶記得姚神父講道中所提示的、結合耶穌心靈的三部曲：亞爸、亞孟、亞肋路亞。

其實，由於她們的貧乏與卑微，天主常透過一些善心人對她們分施祂的慈愛。如果今日她們有健康、有力量能繼續為天主的愛作見證的話，首先固然是上主對她們無時無刻的眷顧；同時也是因為她們真的很幸運，到處遇上無數的善心人，包括

42 2008 年 5 月 1 日耶穌嘉麗小姊妹在水圍友愛之家接受筆者訪問。

教會內的兄弟姊妹和社會上的人士，都給予她們諸般的愛護和無償的幫助。小姊妹對這些恩人，常銘記心中。

過去這麼多年來，每當小姊妹有病時，尤其需要接受手術時，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聖德肋撒醫院和聖保祿醫院，多少次是她們的投奔之地。那裡的修女、醫生、護士和員工們，上上下下都很親切地接待她們——這些耶穌的小姊妹——白白地、不求回報地細心照顧她們。尤其是周寶煌醫生、姚保鎰醫生、鍾泰榮醫生和已故的劉偉佳醫生等，都儼如她們的「家庭醫生」般，盡心盡力地醫治、關顧她們的健康。

另外還有一位陳永傑牙醫，他是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資深的會員，差不多二十年來，也是為小姊妹無償地服務。不獨如此，他服務時所流露的那份細膩之心，更叫小姊妹感動。

由於篇幅有限，這些美麗動人的故事，不勝枚舉。小姊妹無法盡述她們所領受的所有恩惠，也不能列舉所有施惠於她們的恩人的名字；然而在小姊妹的心中，她們永遠不會忘他們當中的每一位，並在祈禱中求好天主親自一一報答他們。而且使他們告慰的，就是小姊妹透過這些寶貴的體驗，便幫助她們更容易明白聖經，和更鼓勵她們去實踐耶穌福音的聖訓：

「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瑪 10:8)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對其臨在香港宣揚福音的回顧、反省及展望

「從納匝肋還能出什麼好事嗎？」

「你來看一看吧！」(若 1:46)

耶穌小姊妹回顧過去五十年在香港的臨在，可說是「另類」的修道方式。這絕不是為了標奇立異，引人注目。簡言之，由始至終，只是為了跟隨納匝肋人耶穌和祂的福音，在耶穌嘉祿兄弟和耶穌瑪大肋納小姊妹為她們開闢的道路上，以她們軟弱

的力量，設法嘗試忠於這「在人群中度默觀生活的聖召，並以真福八端的精神與鄰人締結友誼。」

在香港這個科技日新月異，事事講求高度效率的社會，人們到處充滿競爭，以金錢掛帥；「向錢看！向上爬！」是這個城市的口頭禪和潮流。這一切很明顯地與福音的精神背道而馳；而耶穌小姊妹友愛會臨在香港宣揚福音的方式可說恰恰與這潮流相反。她們記得如耶穌所說的：「他們不屬於世界，就如我不屬於世界一樣。」（若 17：16）

為回應耶穌對她們的呼召，在這熙來攘往的大都會，她們努力嘗試跟隨祂的芳蹤，度簡樸、清貧、卑下的默觀生活。她們明白這納匝肋聖召的核心，不是要做什麼，而是她們為人的態度。嘉祿兄弟說：「我們對人的好處，並不在乎我們所說的話或所做的事，而在乎我們與耶穌密切結合關係的程度。」⁴³

五十年過去了，耶穌小姊妹自問：這些年來，她們以友愛會固有的神恩與使命臨在香港的獻身生活，可有什麼貢獻或收穫？如果以人的肉眼來看，似乎看不到什麼答案。但耶穌卻對她們說：「你來看一看吧！」是邀請她們以另一種眼光，一種深邃的、心靈的眼光去觀看生活的內涵、生活的真相，那便是默觀的眼光。

在「看」之前，祂邀請她們「來！」意思是說：必須來到納匝肋生活，好使這生活把她們慢慢地轉化過來：轉化她們的心思、念慮、她們的眼光、她們的價值觀、她們為人的態度。她們也就這樣做了。她們來到了納匝肋跟隨耶穌怎樣過活。在這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她們的環境、她們的鄰居，無形中都成了她們的老師，教在不言中，日復一日地，塑造了她們。她們遂漸漸地看到了肉眼所看不到的事物！的確是這樣的，「天主

43 明鏡，《一粒麥子》（台灣：光啟出版社，1982），頁 92。

偏召選了懦弱的，為羞辱那堅強的。」（格前 1：27）這也是為踏上真福的途徑。（參瑪 5：3 - 12）

五十年來她們得到最寶貴的果實，就是友誼。這友誼讓小姊妹們成為見證者：為那隱藏在每個人身上的生命和善的力量作見證。同時，它也讓小姊妹們對人類那份在主內的手足情誼和普世博愛的宏願得以實現。

目前在香港生活的耶穌小姊妹寥寥無幾，且大部份已上了年紀；即使如此，她們都滿懷信心，都願意繼續度納匝肋的生活——在白冷聖嬰的光照下，這生活在她們眼中是如斯的寶貴——她們的使命便是「念茲在茲」，活在當下；處於這消費主義和弱肉強食的社會洪流中，逆流而上；以不設防和不索償的精神繼續與人交往，締結友誼。藉着友愛之家的團體生活，見證在愛內的合一，姑勿論人性的脆弱，這超越國界、種族、年齡、性格的共融，藉着主的助佑，是可能的。

即使她們的年齡越來越大，體力日益衰退，加以進會聖召奇缺，她們有形的活動必然漸漸式微，甚或停頓。然而無論如何，她們切願「活到老，活到底。」身為代禱者的使命，始終是她們奉獻生活的意義，是她們存在的依據。

在 2008 年 10 月友愛會在三泉總會所召開的全球區會長的會議中，年近九旬的耶穌珍妮小姊妹在回答小姊妹有關聖召日漸式微的問題時，平靜而深切地鼓勵小姊妹說：「有如那盞長伴聖體台前的小燈，散發着極之微弱的火焰，卻指示一個偉大無比的臨在的事實。即使這火焰再微弱不過，卻正燃燒着，光照着……」⁴⁴ 的確，人生如此，確是值得的！

面對年老、疾病、死亡，也讓小姊妹從自身發現時代的徵兆。基督徒的價值觀豈不建基在十字架上的矛盾嗎？聖保祿已經告訴我們：「十字架上的基督為猶太人固然是絆腳石，為外

44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通訊》，2008 年 11 月份。

邦人是愚妄，但為那些蒙召的人，不拘是猶太人，或是希臘人，基督卻是天主的智慧。因為天主的愚妄總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總比人堅強。」（格後 1：23 – 25）

所以生、老、病、死，人之常規，並無礙於小姊妹繼續度納匝肋的生活。相反，這些人性看來的痛苦、不幸的經歷，正是幫助她們達到與十字架上的基督結合的途徑。這是一條巴斯卦的道路。耶穌以身作則：「一粒麥子如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纔結出許多子粒來。」（若 12：24）從耶穌出生（瑪 2：23），一直到祂死亡（若 19：19）和祂復活（谷 16：6），祂始終是納匝肋人！

再者，小姊妹追隨耶穌嘉祿兄弟——他熱愛這位納匝肋人耶穌至如痴如醉的地步，甚至在沙漠中如祂為所愛的人捨棄自己的生命——她們也切願和他一樣，一脈相承，日復日地為主奉獻自己的生命，一直到上主所願意的時刻，即使寂靜無聲地消逝，深信在神州大地一隅，必會結出合時的果實！

後記

今年初，香港友愛之家的小姊妹們決議，接受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的邀請，參與編寫香港教會的歷史，並請我倆負責此事。打從那天開始，我們總是誠惶誠恐，懷着兢兢業業的心去履行這個任務。直到今天才把最後的一章寫好，並揀選了一些照片，總算可告一段落，心頭也宛如放下一塊大石似的，衷心感謝天主。

說實話，我們是很喜歡這個工作的。因為在整個過程中，有機會與小姊妹們一起返本溯源，探討過去這五十年來友愛會在香港的見證生活。不過，並不是說沒有困難。尤其經過了差不多一年的奮鬥、努力，我們深深感到這確是一份挑戰，也是一份祝福。我們既不是學者，更不是習慣寫歷史的人；在一切工作如常的情況下，勉力抽空而為。加以在本區會中我們都算

是後進的小姊妹，對於本區會早年的歷史，只是道聽途說；因此我們所需的資料，非由其他前輩的小姊妹給我們提供不可。幸虧凡在本港服務過的小姊妹，無論遠近的，都視此為大家的事，非常合作，這確是上主的祝福。

我們明白，這二十餘頁的小史，並不算是什麼論文，它或可說是友愛會香港區會小姊妹們的一份「集體回憶」。文內所引用的章句，除了聖經外，全部都取自會祖的日記、信札、友愛會的會規、文獻、友愛之家的日記等。

除了得小姊妹們提供資料外，還得用電腦書寫；而我們對電腦的應用都是「初學生」。感謝聖神研究中心同事們不厭其煩的教導，尤其是張景唐先生和鍾麗嫦小姐耐心的指點，使我們可以一字字、一頁頁地打下去。陳興邦女士在百忙中抽空，對本文的校對和文句的修飾，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最後當為選用的照片作掃描，我們也是一竅不通的，只有求助於我們堂區的祕書曾瑞芳小姐；她一向都是「見義勇為」，也駕輕就熟地給我們完成了。天主賜我們這麼多的天使給我們白白地幫忙，還有許多姊妹和朋友都以祈禱默默支持我們，使我們終於完成「壯舉」！在此一一感謝。自然也不會忘記感謝：邀請我們參與這項目的天主教研究中心的夏其龍神父和同工們的幫助。求上主一一報答大家，賞賜各人聖神豐盛的恩寵，繼續在不同的崗位上為祂的愛作見證。是為祝禱。亞孟。

參考書目

思高聖經學會譯釋 《聖經》。香港：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68。

Petite Soeur Magdeleine de Jésus. *Du Sahara au Monde Entier*. (Paris, Nouvelle Cité, 1981).

Petite Soeur Magdeleine de Jésus. *D'un Bout du Monde à l'autre*. (Paris, Nouvelle Cité, 1983).

耶穌安妮小姊妹,《主牽我手》(香港：香港真理學會，1998)

明鏡,《一粒麥子》(台灣：光啟出版社，1982)

《友愛會會規》

《友愛會生活細則》

《友愛會綠色小冊》

《香港仔友愛之家日記》

《大埔友愛之家日記》

《油麻地艇戶友愛之家日記》

《沙角尾臨屋區友愛之家日記》

《鴨脷洲友愛之家日記》

《天水圍友愛之家日記》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通訊》

附錄

1. 聖母痛苦方濟傳教女修會簡史

修會歷史

聖母痛苦方濟傳教女修會，屬聖方濟正規第三會的修道團體，跟從聖方濟的生活理念：【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主（瑪 12:30），並愛其近人如己者（瑪 22:39）；恪遵耶穌基督的福音，生活於神貧、貞潔及服從中。按照聖方濟的芳表追隨耶穌基督，努力遵守耶穌基督的命令和勸諭。與聖而公由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所有願意事奉主的全體人員，一同堅持於真的信仰及補贖中，度皈依天主的福音生活於祈禱、神貧及謙虛精神中，戒絕所有邪惡，並恒心為善至終，以便接受基督的召請『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罷！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罷！』（瑪 25:34）我們誓許服從並尊敬教宗及聖而公教會，同時，應當勸勉並熱誠地互相敬重、服從和尊崇。】（聖方濟正規三會會規第一章）

聖母痛苦方濟傳教女修會的始創，源自一位主教和兩位神父的恩寵。首先由早於 1905 年來華，1909 年於中國衡陽晉鐸，1928 年晉牧，任衡陽宗座代牧區首任代牧，富傳教熱忱精神的意大利熱那亞方濟會士柏長青主教（Mons R.A. Palazzi），在 1937 年，與另兩位方濟會士，當時任總堂司鐸的寶仁神父（Rev Fr Brouni）和任修院院長的雷永明神父（Rev Fr Gabirel Allegra），商討創立一所女修會，並以聖母痛苦為主保。及 1938 年，修會獲聖座許可成立，並於 1939 年首批初學修女入會；會祖把修會命名聖母痛苦方濟女修會，以亞

西西聖方濟的精神、熱愛天主聖言，特敬在十字聖架下與基督一同自我犧牲、赤誠奉獻的痛苦之母、使普世人類獲享救贖之恩；在會祖柏長青主教及其得力助手——可敬者雷永明神父的指導下，服膺地區主教的需求，提供福傳基地、侍奉上主、服侍天主子民。

承先啟後

會祖方濟會士柏長青主教極愛中國、更愛中國青年，早在 1920 年代，他在中國湖南衡陽興學，教道青少年，提昇人的素質、尊重人，授以技能並著重態度，使之實踐福音精神，好讓天國臨現人間。

該會 1939 年成立於中國，於 1949 年大陸解放期間會祖柏長青主教委託雷永明神父照顧逃難到香港的修女，修女們再赴澳門，至 1952 年逃往美國加州。柏長青主教於 1957 年赴美探望修女，了解並鼓勵修女重返中國傳教；修女們於 1958 年得雷永明神父協助，應香港白英奇主教的邀請，首任總會長李芝芳修女（Mother Leola）帶同成春儒修女和劉玉珍修女，於 1958 年 2 月 2 日飛抵香港教區——沙田協助福傳事工——展開教育工作，創建聖母無玷聖心學校，其後加辦幼稚園和中學，為沙田地區作育英才，建樹教會。

修女發願加入修會、聖召、奉獻生活

修女是渡修道生活，通常說是聖召生活、由上主召喚、人自由回應。開始學習修道——跟隨基督——對聖經、教義、會憲、會祖的精神等等，皆要終身學習並因時制宜的實踐，至返回天父懷裏才完滿此修道生活。修女願意以愛還愛，善渡此生。

為一位修道人，效法基督自願地將整个人生奉獻予上主；工作模式是獻身生活的媒體，藉閱讀聖經、恒常祈禱、

每天的重新奉獻，信賴上主與我們同行、甚至是祂背起我們走的經驗面對每一天。

在中國

1939年9月17日五位保守生，在湖南衡陽南鄉聖母聖衣堂，由會祖柏長青主教親自為她們 Sr. M. Theresa Kuo、Sr. M. Gemna Keung、Sr. M. Rose Liu、Sr. M. Clara Kuo、Sr. M. Agnes Kuo 舉行轉會衣典禮，成為本會第一批初學修女。經過一年初學的訓練，她們於1940年9月22日，在聖母聖衣堂會祖柏主教面前發了初願；修女們亦開始協助衡陽教區慈幼堂照顧孤兒和傷殘人士。第二批初學 Sr. M. Gemna、Sr. M. Josephine、Sr. M. Cecilia、Sr. M. Angela、Sr. M. Martha 和亞約大西亞，1941年12月8日會祖柏主教為她們舉行轉會衣典禮，柏主教亦於是年委派了第一批發願的郭加納修女為本會首任院長。1942年新修院聖母痛苦會院落成，唯正是中日戰爭之際，修女們艱苦渡日，在會院內種植蔬果、並養豬和家禽供自用，亦紡紗賣錢以助生活費。第三批初學 Sr. M. Catherine 於1942年12月8日在會院聖堂，由會祖柏主教舉行轉會衣典禮。

1944年春末，中日戰爭突然緊張，日軍離衡陽市不遠，地方政府下令人民急速疏散到鄉間避難；當時局勢大亂，會祖柏主教要修女們帶同數位修生分散避難，修女們便離開衡陽南下逃難至1946年重返衡陽會院。

1947年四位美籍方濟傳教會修女自山東因共亂逃難，經教庭駐華黎公使轉介給會祖柏主教，四位修女發願加入我們的修會；自始聖母痛苦方濟傳教女修會有中美兩國成員，便由國籍成了國際修會。其時，華北的共亂愈來愈厲害，會祖主教願意修女們能早些遷居香港，故她們又得再度南下逃難。

1949 年 5 月 1 日修女們乘火車離開衡陽，兩天一夜之後來到香港。雷永明神父和李士漁神父在火車站迎接修女，安排修女們分別寄居於堅尼地道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會院、銅鑼灣聖保祿女修會的育嬰院，雷永明神父代替會祖主教照顧修女。同年 8 月修女們轉往澳門，暫住於教區印刷館二樓，為華北總修院工作：管理廚房、教授英文；數位修女和修生則就讀於聖羅撒學校，一位修女則在醫院當學護。及後，雖在逃難中，仍為四位保守生轉衣當初學修女，是為 1949 年 10 月 4 日聖父方濟的瞻禮日。修女們在澳門安頓下來，會祖主教因留守衡陽教區，受到共黨的虐待，終而病倒；當地神長不忍柏主教受罪，為柏主教申請返意國治病。會祖主教不得以離開湖南衡陽，經港往澳看望自己的修女，委派李芝芳修女為首任總會長，並委託雷永明神父照顧本會修女。修女們分批於 1951 年和 1952 年，再由澳門逃難往美國。

在美國地區

兩位美籍修女送美國後，亦發展會務。自 1950 年在加州聖十字架城，開設可容納 80-90 人的聖加辣避靜院，舉辦週末團體避靜，推行避靜牧民，提供為婦女、夫婦、各項特殊主題、語言等服務。修女們相繼從澳門到達聖加辣避靜院。

數位修女於 1953 年前往 Portland 俄城 Oregon 的 Beaverton 開設可供 60 人退修的和平避靜所；除了週末避靜之外，週日修女為天主教學校學生舉辦退修日，夏日教理進修課程，個人神修等。

隨着兩地有女青年入會當修女，服務天主子民的工作亦多元化，如堂區牧民、學校、男童院、女童宿舍等。

1957 年會祖主教往美國視察本會的會務，勉勵中美兩國的修女相輔善渡修道生活，共同合作發展傳教事務和會務，同時鼓勵中國修女返回中國，服務天主子民。

1996 年到加拿大溫哥華，Richmond 從事堂區牧民。

在香港地區

雷永明神父得知柏主教之意，亦悉香港教區白英奇主教欲請修女協助在沙田興學，便推介本會修女到沙田服務。這樣修女們在 1958 年 2 月 2 日再度踏足香港，服侍中國天主子民。

當時，天主教香港教區在沙田有一所二層高洋房，集聖堂、學校、神父宿舍於一身，另有一所舊兵房，便成了我們第一所會院。

修女們於 1958 年 6 月 14 日到沙田，便立即在聖堂的天主教小學任教和協助堂區工作。傳教士到任何地區是要提供當地所需之服務，這樣成春儒修女、劉玉珍修女、李琪修女便接受師資培訓；修女們無需選擇，而是回應上主的安排。香港天主教教區其時正要發展沙田堂區，祂的意旨就是要這個修會在沙田興學。教庭代辦高公使、柏主教、雷神父、美國友好等籌募經費；在港方濟會士蒲師禮神父、韓守善修士協助買地建校工程，至使修女到沙田六年後（1964 年），一所二層高、十二間課室（當時具規模）的學校落成，美國會院亦配合訓練師資人才，派遣來沙田當修女教師。小學在 1964 年、幼稚園在 1971 年、中學在 1981 年分別落成，為沙田作育英才，透過教育工作呈現天主的面貌，每一位聖母無玷聖心的學子皆成良才，以善行造福社稷，見證天國臨現人間。

在台灣地區

1969 年應臺北教區主教邀往臺灣服務。是年 2 月 12 日，首批兩位修女由香港到臺北基隆市，在和平之后堂區協助王榮和神父傳教工作，組成了慕道班、聖詠團，亦管理亨利幼稚園及往醫院探訪，直至 1971 年。

1970 年代兩位美籍華人修女，自美往臺中中興新村耶穌君皇堂，協助郭藩神父在中興新村的福傳事業，從事堂區牧民事工。

1978 年至 1981 年，復應郭飛神父的邀請，負責蘆州天主堂的堂區福傳工作，同時管理幼稚園；修女們每天風雨無阻的往返，服事天主子民。

七十年代臺北地區發展較南部為佳，當時不少仕女隻身在北部工作，因而宿舍需求急切，我會秉承會祖精神，與臺北教區羅光主教商議，決於臺北三重市興建一所可容納百人的女子（女工）宿舍，為民解困，體認基督福音精神（瑪 25:34-36）。除了女子宿舍，我會亦自美派遣華人修女，到臺北三重市，協助堂區福傳，負責主日學、慕道班、探訪長者教友、送聖體、訪醫院和任全職幼稚園些工作。

八十年中期，因臺北輔仁大學學生欠缺宿位，本會為學生設想，在泰山明志路興建一座樓高四層、容納過百女生的宿舍，輔導宿生解決人際關係、家庭等問題。協助泰山堂區牧民工作，主日學、青年營、夏令營。為臺北地區的需要，能為更多民眾的益處，本會決提供更有效的服侍模式，使天國子民受惠。

該會自 1969 年到臺北教區從事福傳，至今近四十載，一向輸入人力，加強教區建設——兩所宿舍，協助堂區牧民工作，默默地履行聖父方濟愛教會建設團體的精神，不求己益，與痛苦聖母徹底的奉獻結合，造就天主子民。

教育工作

培育人成才、不是一下子的事，是一點一滴累積；整個培育園地同工，在信念上、行動上要達成共識，並切實踐行不易。學子本身受教、奮發、進取、負責，皆需要悉心、耐心、愛心來灌溉耕耘。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建於 1964 年（沙田文禮路 35-37 號）
提供 28 班半日制小學教育。將於 2012 年 9 月遷往大
圍美田路 1 號，轉為全日制 24 班的小學。

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於 1971 年啟用（沙田文禮路 31-33
號），為一所半日制的幼稚園。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在 1981 年成立，於沙田乙明邨街 4
號，提供中學教育。

聖母無玷聖心大家庭的碩果——聖母無玷聖心校友會
（IHMA）於 2009 年成立，涵蓋曾就讀於中、小、幼
的聖母無玷聖心人皆可加入校友會行列。

牧民工作

沙田堂區 由聖心堂到聖歐爾發堂

該修會自 1958 年和堂區范賚亮神父一起為沙田居民服務，以教育作為使徒工作，悉心栽培天國子民，作育英才，為堂區提供人力、場地以廣福傳。當時每一位修女皆投入堂區的牧民工作，當青年聖母軍神師、聖詠團指揮、琴司、教授要理、聖堂事務員（裝飾）等。其時教友人口不斷增加，小堂不敷應用。李安諾神父默默籌措擴建聖堂事宜，待一切就緒後，他便交棒予年輕神父。他休假後往大澳堂區侍奉上主。玉屋一聖心堂於 1974 年拆掉，平日彌撒於該會修院小堂舉行，主日彌撒則在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舉行，堂區善會活動借用聖母無玷聖心學校，輔祭會、聖詠團、青年及成年聖母軍、聖體會、聖言宣讀組等集中力量，推動福傳，及 1976 年，聖歐爾發堂的建築大致完成。聖歐爾發堂於 1977 年 3 月 27 日祝聖啟用，沙田眾多的屋邨亦相繼落成，牧民、福傳兩方皆得照顧。成立禮儀組：輔祭會、聖詠團、聖言宣讀員、加上特殊送聖體員、祭臺事務員（花藝）、接待員負責聖事

禮儀。傳道組：主日學、青年、成年慕道班導師，專責傳福音。牧民組：聖體會、聖母軍、各屋邨教友聯絡員（設專巴接送教友）、關社、茶座等。我會修女在禮儀，傳道和牧民三方面，皆盡力協助，使之發揮效能，見證基督臨於沙田。

87年7月沙田堂區一分為三，以沙田獅子山公路左邊區域為聖歐爾發堂、公路右邊再以城門東西分界、西為華福準堂區、東為聖本篤準堂區。由於聖本篤堂未興建，該會借出乙明邨聖母無玷聖心書院便充當該堂主日的彌撒中心，直至1993年。

1999年底該會仍如昔日與堂區同行，參與禮儀、傳道事務，唯範圍減輕了，只有四位修女主日到堂區服務，場地上提供會院作平日彌撒，主日則開放小學供主日學上課使用、支援英文團體等。

該修會應白英奇主教的邀請，得可敬者雷永明神父、蒲師禮神父等恩人的幫助，建了三所學校、會院。由宗座外方傳教會慶祝來港150年的文獻中得知，完成了恩理覺主教的遺願：恩主教在臨終時仍然記掛沙田未建有聖堂、天主教學校和宿舍；前輩的努力和足跡，促使後輩緊緊追隨。該修會獲教育局批出一所位於大圍發展區的新校舍；為配合大圍區的新發展，沙田的天主教團體、堂區、學校，又會有新的發展和面貌。

在港歷屆省會長

1958 – 1967	院 長	郭 純修女
1967 – 1970	准省會長	成春儒修女
1970 – 1974	准省會長	成春儒修女
1974 – 1978	准省會長	郭 純修女
1978 – 1982	准省會長	郭 純修女
1982 – 1986	省會長	朱懿修修女

1986 – 1990	省會長	朱懿修修女
1990 – 1994	省會長	周學美修女
1994 – 1998	省會長	周學美修女
1998 – 2002	省會長	李 琪修女
2002 – 2008	省會長	周學美修女
2008 -	省會長	周學美修女

大事年表的供稿人： 鍾妙嫦修女 聖母痛苦方濟傳教女修會



陳日君樞機與在港修女於2006年9月聖母無玷聖心書院建校二十五週年感恩聖祭後，攝於聖聖本篤堂。

左起：桑德詩修女、夏美琴修女、林櫻英修女、溫蔚茵修女、陳日君樞機、吳潔英修女、李琪修女、周學美修女、鍾妙嫦修女、黎安德修女



溫蔚茵修女與小學師生參與2009年聖母無玷聖心書院及聖母無玷聖心學校週年運動會

2. 安貧小姊妹在香港的簡史

1910 年宗座代牧師多敏神父 (Fr. Dominico Pozzoni) 邀請安貧小姊妹來香港創院，但該項邀請未能成行。1915 年師主教與當時聖雲先會會長艾菲先生 (Mr. J.M. Alves)，再度提出邀請，但也由於當時的困難和時勢，這項邀請直至 1923 年才能落實。期間，艾菲先生急切渴望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老人得安置，就租用了一幢原屬於德國路德會，後來在大戰期間被政府沒收了的一幢大宅。這幢大宅位於九龍塘近深水埗傳說名叫百步里的一個山坡上，可容納 80 名老人。艾菲先生並請嘉諾撒修女在安貧小姊妹抵達香港前暫時照顧那批老人。嘉諾撒修女遂派了兩位修女負責這工作。安貧小姊妹終於在 1923 年 2 月 3 日抵港。

在安貧小姊妹抵達香港後的首個聖若瑟瞻禮，即 1923 年 3 月 19 日艾先生更為院舍安排了正式的開幕典禮，並邀請了眾多有名望的商賈參與盛會，好讓更多的人認識該修會和幫助院舍的需要。

四年後，藉著儲蓄和總會院的幫助，安貧小姊妹從一位華人富商的遺孀處購入一所龐大的中國式大宅並加以擴建。擴建後，這座院舍（昔日的牛池灣聖若瑟安老院）容納名額達到 390 之多。聖若瑟安老院自創立於 1923 年，八十年來一直為社會大眾服務，直至舊的院舍差不多無法再進行改善工程，就在 2003 年遷往上水。

1939 年恩理覺主教邀請安貧小姊妹在香港創立第二間安老院。1958 年白英奇主教和社會福利處再次邀請，於是第二間安老院開始創立，位於黃竹坑。

「安貧小姊妹」這個名字蘊涵了真福八端的神髓，闡釋了天主賜給她們的神恩。這個名字邀請我們仰視基督的「悲

憫心謙」。結出「自甘作小」的果實，並反映天主對長者的關愛，雖然這個反映經常是微弱的。

並肯定人性尊嚴遠在一切物質科技之上，安貧小姊妹致力為長輩們提供一個舒適、祥和寧靜的「家園」，讓他們住在「院舍」就如住在自己的「家園」一樣，活出生命的價值與尊嚴。

除了起居飲食和醫療的照顧外，小姊妹陪伴長者擁抱老年，面對有限和不足。人生的歷程，就是會生病，衰老和死亡。生命來自天主，只有天主才可以拿走。生與死是一體的兩面，死與生是同樣的莊嚴。在年長者面對死亡這生命轉化的一刻，小姊妹守在他們身旁，為他們祈禱，幫助他們在家人的圍繞下，安然的躺在天主的臂膀中。提昇生命和死亡的尊嚴是安貧小姊妹安老服務的崇高部分，款待聖願的高峰。

3. 聖母潔心會大事年表

為江門教區首任主教華理柱——美國瑪利諾外方傳教會會士所創立，並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一日蒙教宗庇護十一批准成立。修女們投入榮主救靈工作，在一九五四年到達香港，繼續以會眾同心合作，由牧民工作建立教會，正如聖保祿厄弗所書所載「為成全聖徒，使各盡職務，為建樹基督的身體」。（會章一）

該會的精神透過青年及幼年的教育事務，堂區、醫院等牧民工作，傳揚福音。

本港大事紀要

1954 年修女三人(歐茂蓮修女、陳玫瑰修女、楊耀蘭修女)，獲政府批准到達香港。同年江門教區第二任主教柏增主教為該會在香港摩星嶺購置修女宿舍一座，並籌劃開辦第一間幼稚園。

1958 年該會在瑪利諾神父會會長葉欣榮神父資助下，五位修女(羅道樂修女、林若瑟修女、李喜德修女、傅喜善修女、王德蘭修女)參與東頭村的傳教工作。

1959 年該會蒙白英奇主教批准為香港教區的合法女修會，而首批來港的修女共 9 人，同年即有香港女青年入會，及創辦摩星嶺潔心幼稚園。

1964 年該會香港摩星嶺初學院落成，這是江門教區柏增主教發起策劃，當柏主教逝世後，由葉欣榮神父資助策劃以竟全功。

1967 年於九龍新區秀茂坪創辦潔心小學。(1995 年停辦)

1969 年創辦九龍鑽石山潔心幼稚園。(1991 年停辦)

1970 年接辦黃大仙潔心幼兒中心。

1971 年創辦九龍牛頭角潔心幼稚園。(1990 年停辦)

1972 年創辦九龍橫頭磡政府津貼潔心女子中學，由該會創立人華理柱主教主持動土禮。

1973 年接辦秀茂坪福音幼兒中心。
(2000 年秀茂坪福音幼兒中心改為聖母潔心會福音秀茂坪幼兒中心暨幼稚園。)

1977 年接辦九龍慈雲山聖西滿幼稚園。(1992 年停辦)

1990 年創辦天主教彩霞邨潔心幼稚園。

1991 年創辦摩星嶺慈星閣仁愛服務中心。

2008 年開辦聖母潔心會白田安老之家。

歷屆會長資料如下：

1954-1960 歐茂蓮修女

1960-1993 陳玫瑰修女

1996-1999 李貞德修女

1999-現在 潘雅惠修女



左起：林美德修女、馮思雅修女、郭雅蓮修女、戴潔瑩修女、
潘雅惠修女、趙嘉敏修女、譚耀德修女、傅喜善修女

4. 母佑會中華區在香港的大事年表

聖母進教之佑孝女會（母佑會）意大利文原名為 Figlie di Maria Ausiliatrice (FMA)，英文名為 Daughters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1872 修會緣起

母佑會發祥於意大利北部一個名為摩爾尼斯的小村。當時偉大的青年教育家若望鮑思高神父在社林城已名聞遐邇，且創立了慈幼會。他又因為聖神啟迪及聖母瑪利亞直接的安排指引，與瑪利亞陶美尼加瑪沙利羅創立了母佑會，以實施預防教育法固有的基督化教育計劃，給女青年深切的期待，提出救恩的答覆，作為參與基督救贖使命的方式。

今日母佑會修女共計有一萬四千多位，分佈於全球五大洲，九十餘國家。

母佑會中華會區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主要從事教育及堂區牧民工作。在香港有三十位修女服務，主辦兩間政府資助中學(聖母書院及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一間私立小學(聖母小學)、一間幼稚園(聖母幼稚園)及麗達補習社，也有修女在堂區和教區小學做牧民及要理教授等工作

1923 年 1922 年六位意籍的母佑會修女於一年前秉承着會祖聖若望鮑思高神父「與我靈，取其餘」的傳教熱忱，毅然決然的辭別鄉土故里，親朋友好，由前廣東韶州雷鳴道主教率領，經歷數十天艱苦困頓的航程，終於在 1923 年 3 月 15 日抵達韶州。

由於救靈深切，修女不怕語言土人情的隔閡，隨即接辦已設有由小學到師範的勵羣女中。修女們一方面為基督的兄弟服務，另一方面也積極培育下一代天主葡萄園的新血，力求教會本地化。

- 1934 年 由母佑會中華區會長海倫娜修女領導部份修女北上上海，擴展會務，開設學校，宿舍，也接辦了一所頗有規模的聖心醫院。在中國三十年，傳教工作一直在戰火和教難的黑暗日子中堅忍地支持下去的。
- 1945 年 部份修女開始離開中國，到澳門教區服務。
- 1946 年 中華區正式成立，共有修女二十六人，會院五座。
- 1950 年 修女相繼陸續退出大陸，轉到香港來，先在九龍鑽石山一塊地上起了一所小型幼稚園。救靈神火燃燒着修女的心，逼使她們千辛萬苦的力求發展榮主救靈的教育工作。
- 1953 年 由於香港政府要清拆鑽石山的屋宇，修女便由鑽石山轉到九龍黃大仙竹園買下一間小屋，及後在竹園興建了兩間平房校舍，設有幼稚園一、二年級，學生一百二十二人，名為聖母學校。
- 1963 年 仰賴聖母進教之佑大能的幫助和社會各界熱心人士的支持和修女本身的苦幹，此後逐年遞增，聖母學校在一九六三年矗立在慈雲山下，班次由幼稚園至中五，學生四千餘人。
- 1969 年 修女們為了擴充聖母學校，向政府借貸，在沙田坳道擴建校舍，名為聖母書院。
- 1973 年 母佑會來華傳教金禧，為能擴展服務至新界新區的女青年，修女又於新界葵涌開辦另一間女子中學——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以鮑思高神父和協

創會祖瑪利亞瑪沙利羅修母的一貫精神，用愛心和耐力去作育女青少年。

母佑會中華會區歷任區會長

1946-1956	Sr. Elena Bottini	和多理修女
1956-1963	Sr. Caterina Moore	傳智仁修女
1963-1970	Sr. Erminia Borzini	卜慈爾修女
1970-1979	Sr. Franca Dardanello	羅潔英修女
1979-1982	Sr. Lina Chiandotto	江慧貞修女
1982-1988	Sr. Franca Dardanello	羅潔英修女
1988-1994	Sr. Agnes Yick	易婉儀修女
1994-2000	Sr. Rosetta Lee	李美燕修女
2000-2006	Sr. Cecilia Tse	謝錦芳修女
2006-現在	Sr. Monica Liu	廖敏慧修女



第三排: Sr. Orsolina Serra(薛美麗修女), Sr. Agnese Wong(黃碧玉修女 now 103 years old), Sr. Itala Romano(羅惠英修女), Sr. Lina Motter(莫懿德修女)

第二排: Sr. Clara Lei (李群英修女), Sr. Elisabetta Peters(卜實仁修女), Sr. Antonietta Quaglino(居淑貞修女), Madre Elena Bottini (frist Provincial Superior of FMA in HK)(首任區會長 和多理修女), Sr. Antonietta Pilla (First Principal of Our Lady's College)(聖母書院首任校長 白志潔修女), Sr. Luigia D'Agostini(達嘉慕修女), Madre Caterina Moore (2nd Provincial Superior of FMA in HK)(第二任區會長 傳智仁修女), Sr. Liang Teresa (梁德寶修女, now 87 years old)

第一排: Sr. Socorro Machuy (馬惠嫦修女), Sr. Teresina Shan(沈建明修女)



1957 - Sr. Teresina Shan(沈建明修女) with the group of girls for the First Communion always in Our Lady's School

5. 顯主女修會大事年表

使命

顯主女修會的修女順從聖神的召喚，按福音勸諭，把自己奉獻給天主，為跟隨基督並和祂合作，以建設祂的神國。按會祖的使徒計劃將天主的愛顯示並帶給青少年，尤其是最貧苦的青少年。修女們藉着彼此的瞭解和親切的關懷，組成一個充滿喜樂而簡樸的家庭式團體，以分享基督的愛，使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更加充實豐富。

精神

顯主會修女懷着一份「以樂事主，愈顯主榮」的精神，以內在的熱誠，喜悅和平安的心態去接受並克服種種困難和考驗。我們奉聖女小德肋撒為主保，效法她的謙遜精神，聯合祈禱和工作，更有效地去愛主內的兄弟姐妹。

在慈幼大家庭內

顯主會與慈幼會及其他後來產生的團體組成慈幼大家庭。彼此共融於同一的精神內，促進友愛的交談和合作，並在使徒工作上產生豐盛果實。

在教會內

顯主會乃按會祖的宏願而創立之隸屬教區之國籍傳教女修會。修女滿懷着基督的愛和傳教救靈的熱火，徹底投入教會的使命，忠心致力傳播福音、牧民服務、教育青年及社會福利事業。

為貫徹教育和牧民服務，該會實施著聖若望鮑思高的「預防教育法」，以理智、宗教和愛心去培育青年，使他們確立基督化的價值，發展健全人格。

簡史

- 1906 2月13日雷鳴道神父（Fr. L. Versiglia）率領第一批慈幼會士六人從意大利抵達中國（澳門）。
- 1917 慈幼會接管韶州（韶關）傳教區。先在始興及南雄工作，後到樂昌及連縣等地展開教務。1923及1925年雷鳴道主教邀請兩批母佑會修女來教區服務。其時他已關心國籍聖召。
- 1924 召開第一屆中國主教會議，鼓勵各教區創立國籍女修會。雷主教也參加了是次會議。
- 1925 雷主教吩咐耿其光神父，參照鮑思高神父的精神編寫新修會會憲，並命名這新修會為「顯主女修會」，恭奉里修的聖女小德蘭為特別主保。可惜因雷主教之猝死而未能完成立案手續。
- 1930 2月25日，雷鳴道主教與高惠黎神父在視察教務旅途中，為保衛三位同行少女免受土匪傷害，在犁頭咀英勇殉道。
- 1931 5月30日，耿其光主教從萬民福傳部獲取批准立案，認可「顯主女修會」為教區修會。藉母佑會修女和廣州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的幫助，開始國籍修女的初步培育。
- 1936 12月12日，開始第一屆初學，有四位初學生。由此時起直至1953年，初學院從未間斷培育有志修道的女青年。在1953年顯主女修會共有21名發願修女。

- 1940 修女們先後在連縣、韶關縣等教會學校任教及從事傳教牧民工作。
- 1946 韶州代牧區昇格為教區。耿其光主教逝世。
- 1949 中國大陸解放。有些修女被迫遣散回家，有的則被囚入獄；第一批修女之一的劉雪芬修女於 1977 年於廣州附近的監獄中病逝。
- 1953 有賴慈幼會郭怡雅神父協助下，8 位修女先後從廣東省韶關成功到達香港，她們積極重建修會，並投入堂區服務。
- 1955 兩位修女派往九頭角諸天神之后堂區協助瑪利諾會譚拔士神父傳教工作。另有兩位修女派往諸寵中保堂協助米蘭外方會馬廸理神父傳教工作。
- 1957 蒙香港白英奇主教批准在接納顯主女修會歸屬香港教區。
- 1958 在香港開始第一屆初學，初學生共有六人。
- 1960 創辦德雅小學。
- 1961 服務於元朗崇德英文書院。
- 1962 創辦德雅中學。
- 1964 修女派往澳門路環九澳聖母村痲瘋病院服務。
- 1964 於九龍建設聖心修院。
- 1966 慈幼會郭怡雅神父病逝。
曾露思修女獲香港教區白英奇主教委任為顯主女修會第一任會長。同時允許慈幼會會士作本會顧問。
- 1967 往台灣板橋開設無玷聖心修院及創辦華光幼稚園。

- 1970 接辦庇護十二世學校，直至 1978 年交與香港教區接辦。
- 1971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在香港召開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
同年，修會創辦聖母玫瑰書院。
- 1975 往加大拿溫哥華聖方濟各堂區服務及接辦托兒所。
往柴灣海星堂服務及協助幼稚園工作。
- 1976 11 月 13 日，教廷宣佈承認雷主教及高神父的事跡。
同年，往美國三藩市聖伯多祿聖保祿堂服務。
- 1977 創辦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並於 1987 年交香港教區接辦。
- 1978 往美國波士頓聖三堂服務。
- 1983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雷鳴道主教和高惠黎神父為真福。
同年 11 月 19 日假座堅道總堂舉行隆重慶祝。
- 1984 往美國西雅圖展開海外華人牧民工作。
- 1985 往加拿大列治民聖保祿堂區展開海外華人牧民工作。
- 1986 修訂的會憲與會規在香港獲永久批准。
- 1987 慈幼會總會長衛甘諾神父訪問韶關，與四位初期的顯主會修女相遇。
- 1989 派往加拿大卡城創辦托兒所及服務於聖保祿堂區。
- 1993 在國內韶關重開初學院為培育當地聖召；再次借助廣州中華無原罪聖母會修女協助培育。
- 1997 慈幼會總會長韋基神父訪問韶關；與五位修女相遇。
- 1998 往黃大仙聖雲仙堂區服務。

- 2000 顯主女修會會祖雷鳴道主教冊封為聖人。
委派修女參與慈幼會在廣東省石灘鮑思高技術培訓中心的事工
- 2004 韶關嬰德堂，顯主女修會初學院關閉後五十年，兩位修女矢志永願。負責韶關、南雄、樂昌、連縣、仁化等鄉鎮的牧民工作。
- 2004 按照第八屆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顯主女修會會長向慈幼會總會長正式申請加入慈幼大家庭。
- 2004 重新購回韶關庭園此教會產業作為日後整體規劃發展。
- 2005 為韶關教會重新建設社區服務中心，以服務當地青年。
- 2005 7月28日顯主女修會獲接納成為慈幼大家庭成員。
- 2008 韶關社區服務中心大樓進行奠基禮。

該會曾經服務過的堂區包括：聖德肋撒堂、基督勞工堂、基督君王小堂、紅磡聖母堂、長洲花地瑪聖母堂、柴灣海星堂、聖博德堂、聖老楞佐堂、聖依納爵堂、聖方濟各堂、聖雲先堂、聖亞納堂等。

歷任會長的任期簡史

(甲)早期— 1953年顯主會八位修女逃難來香港定居。本會最初因為是隸屬慈幼會管轄、所以沒有立案註冊，郭怡雅神父被委任為本會會長直至1970年。自1971年慈幼會要本會獨立及立案註冊，再不能請慈幼會會士坦任為女修會會長。

于1971年一曾露思修女被委任為本會會長職位，並隨即按大公會議籌備本會會員大會。

(乙)于 1972 年召開第一屆會員大會，也訂定會長任期為六年一任。

1972 至 1978 年一曾露思修女被選為會長職位，此乃為第一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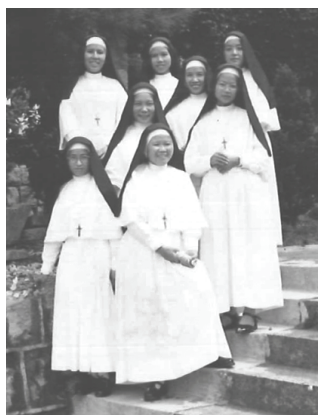
自 1978 年會長任期則改為四年一任。

(丙)1978 至 80 年	李月好修女上任二年為會長	第二屆
1980 至 82 年	曾德蘭修女接任二年為代會長	第二屆
1982 至 86 年	郭月華修女上任為會長	第三屆
1986 至 90 年	戴振容修女上任為會長	第四/五屆
1990 至 94 年		
1994 至 98 年	陳惠芬修女上任為會長	第六/七屆
1998 至 02 年		
2002 至 06 年	曾美琮修女上任為會長	第八/九屆
2006 至 10 年		
2010 至 14 年	陳惠芬修女上任為會長	第十屆



2010年8月7日 第十屆會員代表大會，由香港教區湯漢主教監察選舉
地點：香港總院——聖心修院

第五排：關餘安修女，郭秀蘭修女，馮鳳群修女，張秀清修女
第四排：梁麗媛修女，陳尚歡修女，張漢卿修女，施碧芝修女
第三排：甘寶珊修女，會美瓊修女，戴振容修女
第二排：陳惠芬修女，郭月華修女，曾露思修女
第一排：鄧瑞珍修女，伍志芳修女，謝肇中神父，湯漢主教，
謝德貞修女，梁貞德修女



日期不詳：1953 - 1960 年 地點：牛頭角修院 八位來港重組修會的修女

第三排：曾露思修女，張梅貞修女，黃玫瑰修女
第二排：梁貞德修女，鄧瑞珍修女，曾育群修女
第一排：謝德貞修女，伍志芳修女

6. Congregation of Our Lady (CND)

The founders of this Congregation are Peter Fourier (1565-1640) and Alix Le Clerc (1576-1622).

Foundation in Hong Kong

In 1964,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Congregation of Our Lady (CND) decide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founding a new community in South East Asia, in addition to those already existing in Vietnam.

July 1964 : 2 sisters visited Hong Kong

16 September 1964 : agreement, in principle, of the bishop (Bishop Bianchi) reached.

January 1965 : departure of 4 sisters from Vietnam (3 French and one Vietnamese) for Hong Kong.

Two flats at Prince Edward Road (between St. Teresa's Church and St. Teresa's hospital) were rented: the aim was to experience living among peopl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ir life.

In 1966, two other Vietnamese Sisters joined the first group.

The intention in Hong Kong was not to open a school, as had been the custom in every new foundation of the Congregation up till then. On the contrary, while preparing themselves for the future mission by studying the local language (Cantonese), their aim was to find out what might answer the needs of th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They soon understood that knowing the local language was indispensable for any kind of work there, because it enables them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and to have an insight into the

civilisation and culture of the country,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to any missionary work.

Very soon, in September 1966, they started the Language laboratory (Teaching : Chinese, English, French), inspired by the method of New Asia College – rather modern and intensive, and giving good results – while adapting it a little, because they had noticed that sometimes, some missionaries – priests or members of religious congregations – did not have the time, or the intellectual or financial capacities to follow the more intensive training of the New Asia College.

1966 : 3 years after the opening of Vatican II : Liturgy and some concepts of Theology have been renewed. They noticed that in some congregations, the spiritual formation (scriptural, liturgical, theological ...) of the sisters needed to be renewed too. So, one of the siste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some members of the Major Religious Superiors of Women in Hong Kong organized “inter-congregation” seminars and lectures to help the sisters to open up and to understand the new changes of Vatican II. At that time, some lecturers had to use English, so they started English courses at the Language Laboratory to help the sisters to keep up their English and to access new publications in this field. In taking part in these seminars and lectures with Sisters from different Congregations, they were able to strike up various relationships too.

They started also French classes for students who were preparing to continue their studies abroad.

The house took the name of “Friendship House” , because one hope was that all those who came there would want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From 1966 to 1970, the work of the community was devoted essentially to teaching in the Language Laboratory, the Sisters, according to each one's qualification and the needs of Hong Kong at that time, helped also :

- to promote the Montessori Method in some kindergartens in Hong Kong
- to give some courses on “Catechetical methods” at the Diocesan Catechetical Centre.
- To teach Bible in a “rooftop” Primary School in Hung Hom.

In 1967, the Bishop asked the Congrega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Caritas, to be in charge of the Language Laboratory in Caine Road.

In 1970, the Parish priest of Hung Hom asked them for a sister to take on full time work in his parish : catechumenate for adults, catechism for children and spiritual direction for some groups.

Around March 1971, several sisters having had to leave Hong Kong for various reasons, they were not able to continue their teaching in the language Laboratory, which led to a change in their apostolic activities.

In 1977, the first Chinese came to join the Congregation. Although she is handicapped by polio (poliomyelitis), as a teacher in a subsidized primary school, she continued teaching until her professional retirement in August 2008. Thanks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kindness of her supervisors and principals, she has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her mission of educator. Since September 2008, she has been working full time for the parish to which the sisters belong.

In 1978, two sisters came from France and joined the group in Hong Kong. With the arrival of “boat people” from Vietnam, the 2 sisters worked in the refugee camps, as they were fluent in Vietnamese.

As teachers working in subsidized schools, as an interior decorator specializing in churches, as working with the Diocesan Liturgical Commission, as pastoral workers in parishes, as counsellors or translators in refugee camps, as co-ordinator at the Catechetical Centre... they try to live in unity of heart and soul in the diversity of their apostolic activities and never to forget their educative mission, which is to work for the growth of the “whole Person”, and especially to “Make Him (Jesus) grow” in them and all that they do and wheresoever they are.

While remaining faithful to the vocation as educators, they have more or less given up the key position in “their own institutions”. They have changed the model of operating a common work in which every member had her special place and “other people” came to work with “them”, to going out to do different kinds of work (according to each sister’s qualifications and abilities) where they take their place in existing structures or in movements much bigger than their own.

Their motto is :

“Unity in essentials,
Freedom in matters of choice,
And above all and in everything charity” (St. Augustine)

Sisters in charge for the Congregation Notre Dame (CND) in HK

1965-1967 Sr. Marie Noelk Monteil

1967-1968 Sr. Elaine d'Aligny

1968-1970 Sr. Marie Véronique Deseille

1970-1976 Sr. Genevire Lamarche

Then no record

2003 – present Sr. Jacqueline Luong



從左至右：蔡錦文，原潔玲，余蕙瑛，梁錦萍

7. 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

修會簡史

本會是由一個名為「廣州中華無原罪聖母女善會」開始的，其會員是一群熱心事主的女青年，共聚一起，為傳揚福音而生活。自 1918 年，廣州教區便派遣這些成員到各鄉縣傳教。當時廣州教區巍暢茂總主教(Msgr. Antonius Fourquet)十分強調教會本地化並致力栽培國籍神職人員。1932 年 12 月 8 日巍主教把這個已漸趨修會形式的團體以教會法典立案為「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首任會長是謝天神修女。

本會以遵守福音勸諭，秉承無原罪聖母的德表，救靈榮主為第一宗旨。本會為一國籍修會，致力福傳，特別導引中華同胞認識、愛慕基督，使天主神國早日臨現中華，此為第二宗旨。

本會修女被派往教區轄下各地輔助神父傳教，並管理學校、醫院、診所、癲瘋院、孤兒院、托兒所等，修女人數超過一百，傳教足跡遍及兩廣。

可惜好景不常，隨後爆發的中日戰爭及 1949 年大陸政權易手，使本會飽受衝擊——修院被迫關閉，修女被強行遣散。幸好，1951 至 1954 年間，石納德、楊盛翰、楊招眉、葉麗朝及楊慕雲等修女，幾經波折終能成功申請抵達香港。

抵港辦學

50-70 年代

1954 年 4 月蒙戴天恩神父邀請，抵港的修女在西環聖嘉祿學校任教，有一位則在西環聖母玫瑰堂區服務。1959 年離開聖嘉祿學校，同年，頂辦北角渣華街之榮光小學，改名「聖

安當學校暨幼稚園」，是本會在港開辦的首間私立學校。由於北角的校舍不敷應用，翌年(1960)遷校往銅鑼灣金龍台，這是一座自置物業、樓高四層的戰前樓宇。

其後，本會為支持普及教育，向政府申請在油塘撥地建校。當時的油塘區全是徙置大廈，甚少學校。，1968年新校啟用，命名「聖安當小學」，位於欣榮街(現址為港鐵「油塘」站)。新校分上午及下午兩校。上午校為私立(包括小學預備班)，下午校為政府資助。當年居民多屬勞工基層，收入有限。因此，私立上午校的學費，儘量低收，希望讓更多區內學童受惠。

及後，本會再向政府申請撥地，希望能在附近興建一間政府津貼的女子中學。1972年，位於油塘高超道的「聖安當女書院」落成啟用。

80年代至今

至於港島金龍台「聖安當學校暨幼稚園」，因校舍殘舊，不太適合教學用，終在1985年停辦。

1999年，為配合將軍澳支線「油塘」站的興建，與當時的「地鐵」公司達成協議，將位於欣榮街的聖安當小學遷往附近之新建校舍(油塘道一號)。同年，小學預備班正式註冊為「聖安當幼稚園」。幼稚園位於新校舍的一樓。

為配合教育改革的要求，2008年8月，私立的「聖安當小學上午校」全面停辦；而政府資助的下午校亦於同年9月轉為全日制「聖安當小學」。

牧民工作

除教育外，本會修女亦往堂區服務，主要負責教理講授、探訪及善會神師。

香港教區於 1991 年成立教區醫院牧民委員會，為病人提供「全人治療」關顧服務。十多年來，本會修女亦曾加入此醫院牧靈行列，與病患者同行。又近年開始，也有修女作探監服務。

本會直屬香港教區，現有修女十一位。



從廣州抵港五位修女：左起楊盛翰修女、葉麗朝修女、石納德修女、楊招眉修女及楊慕雲修女（攝於 1955 年，香港）



本會全體修女與神師林銘副主教合照

索引

一至三劃

一國兩制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67, 157
 十字架的愛護者 (Lovers of the Cross), 20
 小童群益會 (Boys and Girls Clubs Association), 176, 213

四至六劃

中英聯合聲明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67, 204
 仁愛小城 (City of Charity), 47
 厄瑪奴爾·拉法·庇理羅士 (Emmanuel Ralph Belilios), 36
 天主教職工青年會 (Young Christian Workers), 200, 204
 天神會 (Holy Angels), 114, 145
 巴烈德 (Cyril Barret), 183, 188, 197, 201, 208
 巴斯卦 (Paschal), 8, 286
 巴黎外方傳教會 (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 10, 16, 28, 38-40, 51, 69, 72, 280
 文化大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53, 146-148, 151
 王小球 (M. Goretti Wong S.K.), 91
 王德蘭 (Marie Pauline Wong), 55, 66, 68, 75
 代牧 (Vicar Apostolic), 40, 102, 132, 168, 228
 加爾·猶迪 (Karl Justi), 26
 古寧 (Thomas Cooney), 171, 173
 弗德烈·盧押 (Frederick Lugard), 29

本雅明·諾爾·古斯 (Benjamin le Noel de Groussy), 14, 75

甘浩望 (Francesco Mella), 264

白英奇 (Bishop Lawrence Bianchi), 50, 53, 134, 136, 138, 142-143, 150, 183, 228, 249

白敏慈 (Marciano Baptista), 197, 214

白禮達 (Peter Brady), 187, 197, 200-201, 210

安玲小姊妹, 258, 268, 275, 278

艾蘭德 (Marie Noel Aranda), 57

七至十劃

佐治·博爾 (George Byrne), 41

伯大尼會院 (Bethanie), 40

余理謙 (James Hurley), 166, 179, 187, 190, 193, 196-200, 204-206, 210

吳智勳 (Robert Chi-fun Ng), 197, 204, 209-210, 214

庇理羅士感化院 (Belilios Reformatory), 36

李伯納, 79

李宏基 (Bishop Peter Lei), 196, 228

沙路易 (Louis Chauvet), 7, 9

沙爾德 (Chartres), 7-10, 12-13, 15, 17-18, 21, 23, 26-27, 31, 42-43, 51-52, 74, 283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2, 7-8, 11, 13, 16, 24, 34, 61, 223, 227

狄恒 (Alfred Deignan), 166-168, 170, 182, 194, 197, 202, 205-207, 211

狄奧多·奧斯定·科嘉 (Theodore-Augustin Forcade), 10

- 良十三世 (Pope Leo XIII), 169, 224
- 谷紀賢 (Sean Coghlan), 194-195, 199
- 亨利・亞瑟・卜力 (Henry Arthur Blake), 29
- 依納爵靈修 (Ignatian Spirituality), 189
- 佳播・祖賓 (Gabrielle Joubin), 11-12
- 和主教 (Mgr Louis Piazzoli), 17, 22, 29, 111, 228
- 周耀真 (Elisa Joseph Chow), 51
- 孟家華 (Patrick McGovern), 178, 186, 193-199, 213
- 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 10, 17, 38-39, 102, 107, 118-119, 122, 170, 211, 228
- 宗座代監牧 (Pro-Perfect Apostolic), 10
- 宗座外方傳教會, 40, 42, 50, 56, 60, 81, 198, 227, 252, 256-258, 264
- 宗座監牧 (Prefect Apostolic), 14, 16, 78, 81, 94, 96-97, 161, 227-228
- 明愛醫院 (Caritas Medical Center), 143, 145, 148, 152, 157, 259
- 林玉珍 (Magdalene Lam), 223
- 林海瀾 (Lim), 172
- 武大加蒙 (Octacamund), 225
- 祁玫瑰・瑪利 (Rose Mary Clifford), 66
- 祁祖堯 (Gerard Hugh Casey), 46, 187, 208
- 初級字母教授 (ITA, Initial Teaching Alphabet), 65
- 金正中 (Sr. M. Conleth), 229, 237
- 金神父 (Leon Robert), 28, 30-31, 34, 37-38
- 長春社 (Hong Kong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193
- 長洲思維靜院 (Xavier Retreat House), 174, 178, 199, 204
- 侯奕純 (Joe Howatson), 176, 178-179, 182, 213
- 保祿・十字・庇雅 (Paul de la Croix Biard), 22, 75
- 保祿・葛德・馬列主教 (Mgr Paul Godet des Marais), 8
- 保祿・遮打 (Paul Chater), 30
- 威廉・賈納 (William Gardner), 39
- 思華小姊妹 (Pte. Sr. Dominica Pascale de J.), 253-254, 257, 264
- 施惠淳 (Joseph Shields), 166, 204, 207
- 科利 (Joe Foley), 183-184, 197
- 美國天主教傳教會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 Inc., Maryknoll Fathers), 40
- 耶穌小姊妹友愛會, 242-244, 246, 249-250, 268, 282-285, 288
- 耶穌秀霞小姊妹, 266
- 耶穌明燕小姊妹 (Pte. Sr. Maria Y de J.), 261-262, 274, 279, 281
- 耶穌會 (Society of Jesus), 40-41, 46, 98, 120, 166-181, 183, 185-202, 204-208, 210-215, 224-226, 228, 255, 257
- 耶穌道微小姊妹 (Pte. Sr. Dominique de J.), 257, 269
- 耶穌嘉祿小兄弟, 243-244
- 耶穌嘉麗小姊妹 (Pte. Sr. Claudia Elisabetta de J.), 242, 270-271, 281-282
- 耶穌瑪大肋納小姊妹, 242, 247, 249-250, 273-274, 283
- 耶穌瑪大肋納麗清小姊妹, 255
- 耶穌瑪利・嘉俾小姊妹 (Pte. Sr. Marie Gabrielle de J.), 252
- 耶穌德蘭小姊妹 (Pte. Sr. Thérèse Blandine de J.), 255

- 耶穌麗芳小姊妹, 242, 273-276
- 胡振中 (Bishop John Baptist Wu), 62, 69-70, 152, 156, 179, 195, 198, 229, 255, 271, 274, 279
- 范達賢, 169-170, 173
- 韋羅娜 (Verona), 79, 82, 120, 160-161
-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 181, 183, 189, 213
-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Catholic Students), 179
-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Diocese), 198
- 香港明愛 (Caritas-Hong Kong), 53, 67, 89, 142, 154-155, 157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175
- 香港耶穌會士, 166-167, 169, 178-181, 183, 190-191, 211, 214
- 香港修會會長聯會 (Association of Major Religious Superiors), 189
-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172, 194
- 香港復康會 (Hong Kong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 200
- 香港監牧區 (Hong Kong Prefecture), 16
- 十至十二劃**
- 夏波登的海倫 (Helene de Chappotin), 225
- 夏禮士 (Richard Harris), 176
- 姬瑪利・聖心 (Marie du Sacre Coeur Gil), 36, 68
- 容達榮 (John Pittavino), 56
- 師多敏 (Bishop Dominico Pozzoni), 29, 117, 161, 168
- 徐仁壽 (Peter Tsui), 172, 188, 212
- 徐志忠 (George Zee), 166, 194, 196-197, 204-205
- 徐倩玲, 145
- 徐誠斌 (Bishop Francis Hsu), 151, 188, 193, 195-196, 228
- 恩保德 (Gianni Giampietro), 264
- 恩理覺 (Bishop Enrico Valtorta), 38, 40-41, 43, 122-123, 126, 133, 136, 138, 161, 171, 211, 229
- 桑得嵐 (Narciso Santinon), 60
- 海澤黎 (Domenico Maringelli), 256
- 盎神父 (Luigi Ambrosi), 14-16, 81, 96, 161-162
- 神操 (Spiritual Exercises), 189
- 納匝肋印刷所 (Nazareth Press), 40
- 納德・貝克維 (Bernard de Marie de Broqueville), 51, 75
- 馬良 (John O'Meara), 178, 183
- 高主教 (Timoleone Raimondi), 22, 102-103, 107, 107-110, 123, 228
- 高德華 (Mgr. P. da Costa Vaz), 249
- 高慧儀 (Lucie Ko), 63, 66, 75
- 國難籌賑會 (War-Relief Association), 174
- 基督生活團 (Christian Life Community), 214
- 基督君王堂 (Christ the King Chapel), 37, 39-40, 71
- 張佩瓊 (Marie Isabelle Tchang), 51, 55, 61-63, 75
- 教宗保祿六世 (Pope Paul VI), 189, 192
- 曹魄 (Paddy Joy), 177
- 梁志修 (Stanislaus Leung), 60
-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二 (Second Vatican Council), 54-55,

- 67, 152, 191, 203, 205, 228, 232, 238
- 梅海倫娜 (Helena May), 32
- 梅軒利 (Francis Henry May), 32
- 理雅各 (Giacomo Zilioli), 252
- 許禮仁 (Mairt Cyran), 187, 197
- 郭年士 (Edward Collins), 181, 183, 189, 197, 204, 206, 210, 213, 255, 257
- 郭樂賢 (John Collins), 167, 175, 179-180, 182, 185, 187, 197, 199-201, 213
- 陳心意 (M. Cynthia Chan), 91
- 陳香梅 (Anna Chan), 45
- 陳福偉 (Frank Chan), 174, 197
- 麥健泰 (Thomas McIntyre), 168-169, 195, 201, 204, 206-208, 210, 224
- 麥當奴 (Daniel MacDonald), 169-171, 174
- 勞伯壠 (William Lo), 166, 181, 190, 206, 211, 214
- 勞資關係協進會 (Industrial Relations Institute), 178, 186, 195, 198, 213
- 勞達一 (Laszlo Ladany), 195, 205-206
- 喜樂之家 (House of Happiness), 23-24
- 湯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 166, 190, 193, 214
- 華南修院 (South China Seminary), 166, 168, 170-171, 173, 175, 180, 212, 228
- 菲力斯・佐頓 (Felicie Jourdan), 17, 25, 75
- 雅芳善・科嘉 (Alphonsine Forcade), 12, 75
- 雅蓮小姊妹, 261, 271, 278-279, 282
- 雅魯伯 (Pedro Arrupe), 191-192, 194, 202
- 馮瑞芬 (Margaret Fung), 223, 227
- 黃金蓮 (Margaret Wong), 65
- 傳信部總監 (Prefect of Propaganda), 15
- 奧古斯・嘉萊 (Auguste Gallois), 11
- 奧斯加・梅利 (Oskar Muller), 26
- 聖母孝女會 (Children of Mary), 39, 114, 145
- 聖母軍 (Legion of Mary), 50, 133, 145
- 聖母宿舍 (Our Lady's Hall), 41, 48, 50
- 聖母產科醫院 (Pavillion Notre Dame), 48, 62
- 聖母無玷之心堂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hurch), 60, 256, 271
- 聖母補辱會 (Society of Marie Reparatrice), 225
- 聖老楞佐堂 (St. Lawrence Church), 53, 62
- 聖沙勿略・維美斯 (St. Xavier Vermeersch), 40, 75
- 聖保祿之友 (Friends of St. Paul), 66
- 聖保祿庇護所 (St Paul's Refuge), 36
- 聖保祿育嬰院 (St Paul's Orphanage), 48, 58
- 聖保祿醫院 (St. Paul's Hospital), 25, 34, 43, 48, 62, 67, 70, 283
- 聖若瑟會院 (Casa San Jose), 73
-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The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166, 189, 193, 210, 212, 214
- 聖童之家 (Holy Childhood / 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 13-15, 18, 19-25, 27-28, 35
- 聖嘉諾撒瑪大肋納, 79
- 聖瑪素 (Ste Marcelle), 12, 26, 75

聖德肋撒堂 (St. Teresa's Church), 42

腺鼠疫, 25, 106, 109-112, 116

十四至十六劃

董樹德 (Frank Doyle), 180, 205-207

賈美蓮 (Carmela Santos), 66

雷絲·莫斯 (Louise Morse), 11, 21, 73, 75

嘉利華 (Richard Gallagher), 46, 169, 171-172, 1740

嘉理陵 (Sean O'Cearbhallain), 210, 214

嘉祿·霍賓·鄭信 (Charles de Forbin Janson), 19

嘉諾撒醫院 (The Canossian Sisters), 89, 122, 126-127, 129, 132, 140, 143, 148, 157

嘉祿·富高 (Charles de Foucauld), 167, 201

瑪大肋納院, 98

瑪加利·聖保祿·盧斯 (Marguerite de St Paul Nuss), 38, 75

瑪利·安娜 (Marie Anne de Tilly), 8, 74

瑪利諾修女, 231

瑪麗·米素 (Marie Micheau), 8

瑪竇·彌敦 (Matthew Nathan), 29

樂維威村·迺桑里堂區 (Levesille La Chenard), 7

樂維威學校的女兒 (Daughters of the School of Levesville), 8

潘多默 (Thomas Byrne), 178

磐石 (The Rock), 169, 173-174, 212

蔡伯德 (Patrick Joy), 40, 167, 171, 174-175

十七至十九劃

鄭文玲 (M. Dorothy Cheng), 91

鄧乃理 (Dan Donnelly), 174

鄧以明總主教, 202, 273

鄧蓮如男爵 (Baroness Lydia Dunn), 52

魯瑪利·奧古斯 (Marie Auguste Roue), 71

冀世安 (Ciaran Kane), 184-185, 189-190

穆家田 (Dick McCarthy), 188-189

賴詒恩 (Thomas Ryan), 98, 120, 168, 173-178, 180-181, 183, 198, 212-213

儲蓄互助運動 (Credit Union Movement), 167, 179-180, 191, 196

戴本雅明 (Benjamin Dei), 14, 27

戴雨谷 (Joseph Tai), 174, 197

擦鞋童會, 176, 213

簡力達 (Gerald Kennedy), 174

顏思回 (Andrew Granelli), 42

顏愛群 (Liam Egan), 199-200

魏志立 (Harold Naylor), 166, 168, 170, 172, 193, 205-206

懷雍 (P. René Voillaume), 245, 248-249

羅海倫 (Helena Noronha), 64

關小梅 (M. Anna Maria Kwan), 91

類思·尤真·雷諾 (Louis-Eugene Regnault), 15

寶血女修會, 78, 120-121, 257

二十至二十二劃

龔樂年 (Fergus Cronin), 176, 181, 183-184, 188-189, 197

Index

- Adam Schall Von Bell, 190
Association of Major Religious
Superiors, 189
Bethanie, 40-41, 76
Boys and Girls Clubs Association,
176
Caritas Medical Center, 143
Casa De Beneficencia, 85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 181
Charles de Forbin Janson, 19
Chartres, 7-9, 11, 13, 16, 22, 24,
28-29, 34, 60, 76,-77, 223
Children of Mary, 39
Christ the King Chapel, 39
Christian Life Community, 214
City of Charity, 47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175
Daughters of the School of
Levesville, 8
Feast of St. Francis Xavier, 167
Finn, Dan, 218
Hong Kong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193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Catholic
Students, 179
Hong Kong Prefecture, 16
Hong Kong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 200
House of Happiness, 25
Ignatian Spirituality, 189
Industrial Relations Institute, 178,
186
Ladany, Laszlo, 219
Legion of Mary, 133
Leon Robert, 28
Lim, 172
Lovers of the Cross, 20
Marie Anne de Tilly, 8
Marie Auguste Roue, 71
Naylor, Harold, 219
Nazareth Press, 40
Octacamund, 225
Paschal, 8
Paul de la Croix, 17, 22, 75
Paul de la Croix Biard, 22, 75
Pavillion Notre Dame, 48
Prefect Apostolic, 10, 14
Prefect of Propaganda, 15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172
Rerum Novarum, 169, 224
Ryan, Thomas, 76, 165, 220
Santinon, Narciso, 76
Shoeshine Boys' Club, 176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223,
227
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 10
Society of Jesus, 168, 170, 172,
219
Society of Marie Reparatrice, 225
South China Seminary, 171
Spiritual Exercises, 189
St. Paul's Hospital, 25
St. Teresa's Church, 43
Verona, 79, 81, 164
Vicar Apostolic, 10, 39
Xavier Retreat House, 174
Young Christian Workers, 200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叢書主編

蔡惠民教授（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黎志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賴品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譚永亮教授（召集人）（香港中文大學）

學術顧問團

包智光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張學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房志榮教授（台灣輔仁大學）

夏其龍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關俊棠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Prof. Leo D. LEFEBURE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勞伯堦教授（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陸鴻基教授（多倫多約克大學）

Prof. Roman MALEK, SVD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Sankt Augustin)

Prof. Peter C. PHAN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鐘鳴旦教授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Prof. Leonard SWIDLER (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譚偉倫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田英傑神父（宗座外方傳教會）

楊秀珠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General Editors of the Series

CHOY, Wai Man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LAI, Chi Ti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AI, Pan Chi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VEIRNE, Patrick, CIC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ordinator)

Advisory Committee

BARRIQUAND, François, MEP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EUNG, Hok M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NG, Chih Jung Mark, SJ (Fujen University, Taipei)

HA, Keloon Lou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WAN, Tsun Tong Thoma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FEBURE, Leo D.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LO, William, SJ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LUK, Hung Kay Bernard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MALEK, Roman, SVD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Sankt Augustin)

PHAN, Peter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STANDAERT, Nicolas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SWIDLER, Leonard (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TAM, Wai Lu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ICOZZI, Sergio, PIME (Pontifical Foreign Missions Institute)

YEUNG, Sau Chu Alis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叢書 史料及工具系列 (5)
《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

編者： 夏其龍，譚永亮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 (852)3943 4277
傳真： (852)3943 4451
網址： www.cuhk.edu.hk/crs/catholic
電郵： catholic@cuhk.edu.hk
承印： 明愛印刷訓練中心
二零一一年九月初版
ISBN： 978-988-19046-3-8

Catholic Studies Publication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ference Tools Series (5):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Chinese vers.)

Editor: Louis HA, Patrick TAVEIRNE
Publisher: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4277
Fax.: (852) 3943 4451
Website: www.cuhk.edu.hk/crs/catholic/
Email: catholic@cuhk.edu.hk
Printer: Caritas Printing Training Centre
First Edition: Sep 2011
ISBN: 978-988-19046-3-8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1 by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